官德明鉴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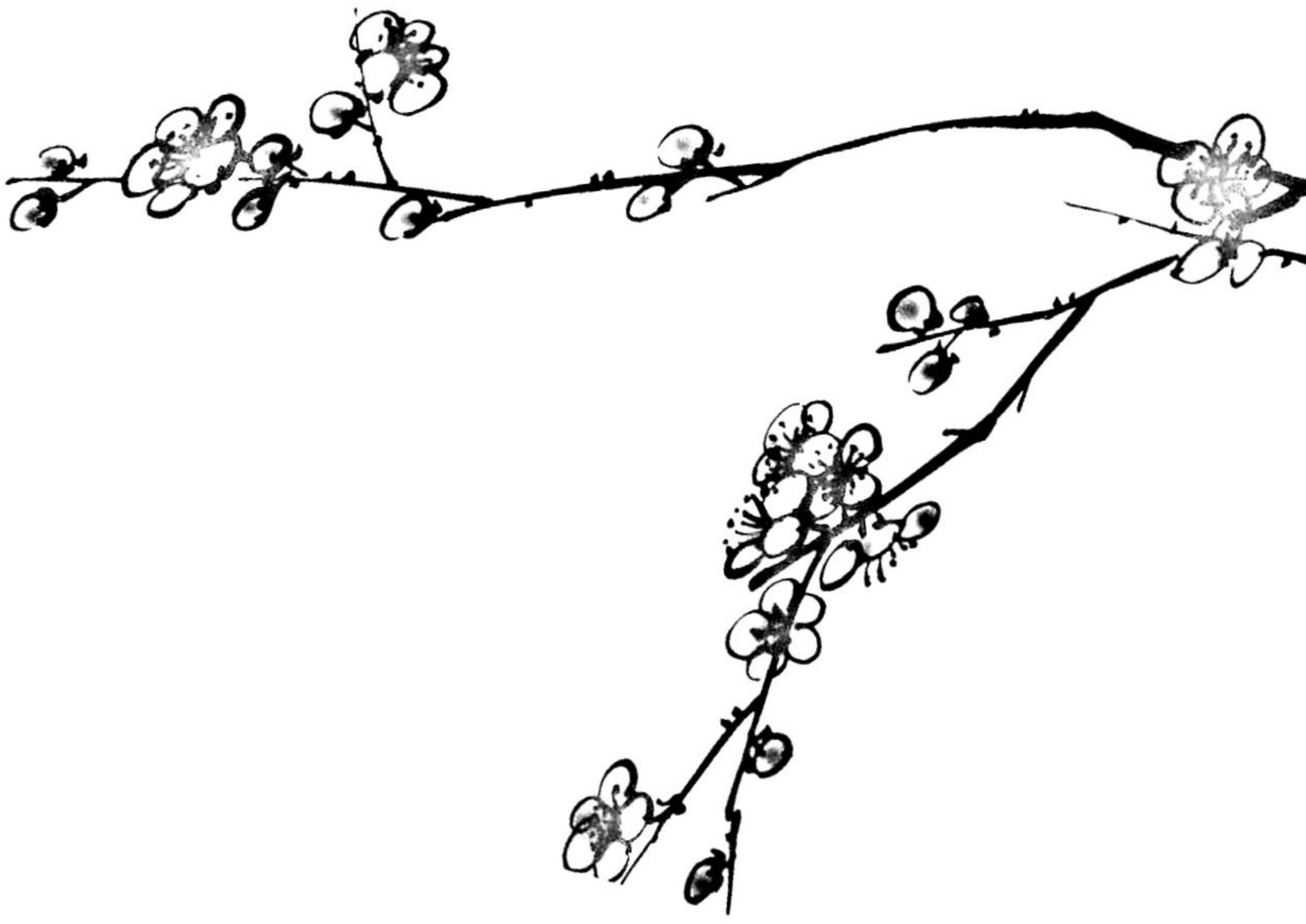
——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

王海鹰 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书名题写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管理局党组书记 杨士秋



编委会

主　　任：徐　明　梁一波

副 主 任：吴　炜　李　斌　李　铭　沈金明
　　周志芳　吴　琦　肖仲伟　陈　强
　　王海鹰

委　　员：沈卫新　姚其华　俞　前　朱根龙
　　蔡　薇　王　怡　周　军　陈永康
　　于振华　沈春荣

主编单位：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吴江市档案局
　　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编：王海鹰

副 主 编：沈卫新　姚其华　蔡　薇

编　　写：顾晓红　钱晓燕　王来刚
　　赵　玲　顾婉秋　谭　亮
　　王彩凤　谈　燕　胡　晴

序一

在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追溯历史，放眼鲈乡，清官能吏，彪炳千秋；迈步前行，决胜当前，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定当比古人做的更好，志存高远。

吴江自古地灵人杰、民风纯雅，历来崇文尚德、勤勉聪慧。在太湖母亲的滋养哺育下，一大批名人英才先后涌现，其中不乏万人称颂、流芳后世的清官廉吏。被后世尊称“了凡先生”的袁黄一生立德扬善、勤政爱民，成为明清时期为官行善之楷模；而以廉明公允、清正传家的父子尚书吴洪、吴山，以“清节为天下第一”的清代巡抚陆燿等等，都是吴江的杰出代表。先人们用自己的公、善、慎、廉，为我们树榜样、明方向，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做法、好经验，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官德纯正则民风淳，官德沦丧则民德降，官德是为政优劣的分水岭，是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加强官德建设，常修为政之德，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更是人民的急切期盼。当前，吴江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大步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全市党员干部本着清廉勤政、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投身“党员干部进万家”活动，深入推进“双察双保”活动，听真话、访真情、解真难，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坎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努力建设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乐居吴江。这既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张扬。

此次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档案局、市地方志办公室梳理历史脉络，联合编撰出版《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既是我们贯彻落

实中组部“党的干部要保持思想纯洁，坚定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自觉遵守者、示范引领者和坚定维护者”要求的有效手段，也为我们在全市开展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素材。回望历史，总结过去，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史为鉴，自省自律，发挥带头作用，主动担当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创造更辉煌的明天！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中共吴江市委书记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

序二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全面反映吴江历代从政官吏勤廉故事的《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所谓“官德”，即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官风正则民风纯。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一定会往哪边倒。所以古今中外的政府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官员的从政道德素质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中，对官员在立国、为官、安民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形成了公、勤、廉、仁等一系列具操作性的考核评价标准，也涌现了一批朝廷倚为栋梁、百姓礼敬爱戴的清官廉吏。

吴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从来不缺少为官秉正的人才典范。如北宋时期的七都长渠港村人谢涛重视贤才，勤于考绩，曾向朝廷推荐了30多人。为表示对自己的推荐负责，他声明如自己推荐的人犯了罪，自己愿意一同受处罚。其光明磊落、为公尽责的政治品格赢得了同朝众官员的称赞。明代出自吴江的吴洪、吴山父子先后出任刑部尚书，不畏权贵，廉明公允，在明代17家父子尚书中独树一帜，为江南乃至整个明代官场树立了榜样，让人们看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良之臣的品质。被称为乾隆朝“清节为天下第一”的陆耀虽身为朝廷二品大员，家产仅有“九当十三车”；在吴江做知县“治行为江南最”的郭琇，深获康熙皇帝赏识，敢于弹劾大学士明珠等权臣的腐败和结党营私之风，对清王朝朝纲的整肃和朝政的巩固，及后来人们所乐道的“康乾盛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再如近代史上的

施则敬、施肇曾兄弟，施则敬曾多次参与天灾和战祸中难民的救济，一手创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施肇曾则先后出资创办了北京中央医院、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育英中学和附属育英小学、震泽镇初级中学等慈善教育机构，将吴江士绅乐善好施品质发扬光大。再如在黎里新前家弄底建造居所“退一步处”的张曜，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民族危难之际，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征战边疆，重创阿古柏军队，收复新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现代，更有二十六访江村、毕生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当代中国社会学开拓者孙本文，“两弹一星”功臣杨承宗、程开甲、杨嘉墀等仁人志士。

这本书按照“莅事以勤，泽被后世”、“律己以严，清正廉洁”、“存心以公，恪尽职守”、“抚民以仁，孝亲敬人”、“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等进行分类，涵盖了官德的基本内容，也方便了读者阅读。书中不仅记载了在吴江土生土长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为官之士，也记录了在吴江为官行政的外地杰出人士、与吴江有渊源的名人。同时本书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把现代曾从政的有杰出贡献的人士也涵盖在内，极大地丰富了官德典范的内容。

只有“常修为政之德”，以德感人，以德树威，带好队伍，才会展现更多的人生亮点，永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在科学发展的交响乐中奏出人生最美好的乐章。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吴江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书，希望成为吴江公务员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乡土教育的不可或缺的素材。

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
吴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序一……徐　明
序二……梁一波

第一章　莅事以勤　泽被后世

顾野王：训诂史学大家……3
李　冏：长虹卧波垂虹桥……6
谢　涛："荐才连坐"机制的倡导者……9
谢景初：筑塘功臣　造纸名家……11
向子韶：丹心铁骨　抗金名将……14
盛　昶：尽忠直言　敢于担当……17
叶　绅：为民请命　泽被乡梓……20
盛应期：劲骨刚肠　勇于任事……22
周　用：端亮有节的治水能臣……25
袁　黄：《了凡四训》扬名四海……28
沈　璟：曲坛盟主……31
袁　俨：累倒在抗洪救灾第一线的知县……33
吴兆骞：传播江南文化的使者……35
周元理：办事稳妥的栋梁之才……38
沈毓桂：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41
万青选：江苏南北挂钩第一人……44

施肇曾：乐善好施　有志于时 ……47
徐幼川：退耕还湖　造福乡民 ……50
张慰慈：中国政治学的先驱 ……53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开拓者 ……57

第二章　律己以严　清正廉洁

何　源：东吴遗老“赛包公” ……63
吴　洪：廉明公允　刚直善断 ……65
陆德如：矢志清白　国门卫士 ……68
王国光：衙门前竖起廉政碑 ……70
陈九成：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 ……73
沈　瓒：秉公办案　为民伸冤 ……75
吴　默：清廉刚正“吴铁汉” ……77
沈　琉：两袖清风　甘于清贫 ……79
叶绍袁：午梦堂中一名士 ……82
章日炌：洁身自爱　风清气顺 ……86
叶　燮：为民请命的诗坛才子 ……89
郭　琇：康熙帝赞许的铁笔御史 ……92
陆　燿：以清节为天下第一 ……95
沈桂芬：坐着“驴车”上班的宰相 ……98

第三章　存心以公　恪尽职守

陆元方：深得武则天赏识和信赖 ……103
黄　由：钦点状元 ……106
平思忠：含冤忍辱守边疆 ……108
吴　山：饮水思源　政声卓著 ……110
沈　啓：呕心沥血著写《吴江水考》 ……112
朱国祚：守礼治事的忠厚长者 ……115
周道登：秉性耿直　大智若愚 ……118
周宗建：浩然正气斗阉党 ……120
洪祖烈：忠义人杰　舍身救国 ……123
吴　易：太湖义师　威震江南 ……125
殷兆镛：四朝老臣　铮铮铁骨 ……128

吴燕绍：醉心边疆铸鸿篇……130
施则敬：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133
钱崇威：是非分明　不为敌诱……137
施肇基：杰出的外交家……139
邵力子：中国最早倡导计划生育的人……143
杨天骥：早期民主革命的鼓吹者……147
蓝公武：被追认的中共党员……151
金诵盘：孙中山器重的"是医国手"……154
沈体兰：出席开国大典的教育家……157
倪征噢：淡泊从容莅海牙……160

第四章　抚民以仁　孝亲敬人

吴　璋：千里寻母的"全孝翁"……165
陈尧弼：敢于为民做主　重视县域建设……167
金　洪：心中永远装着百姓……169
王　哲："三好"为铭　刚正不阿……171
张明道：两只旧箱子　一段吴江情……174
李迁梧：体恤民情　真诚待人……176
叶重第：留存"清白"在人间……179
刘时俊：坚不可摧的"刘公堤"……182
盛王赞：利为民所谋……185
潘见龙：让江南稻米在中原飘香……187
钮　琇：长哀民生之多艰……190
徐达源：热心乡梓　不遗余力……193
费兰墀：为民请命的松陵进士……196
任兰生：因公殉职　留下不朽遗产……199

第五章　忠于国家　服务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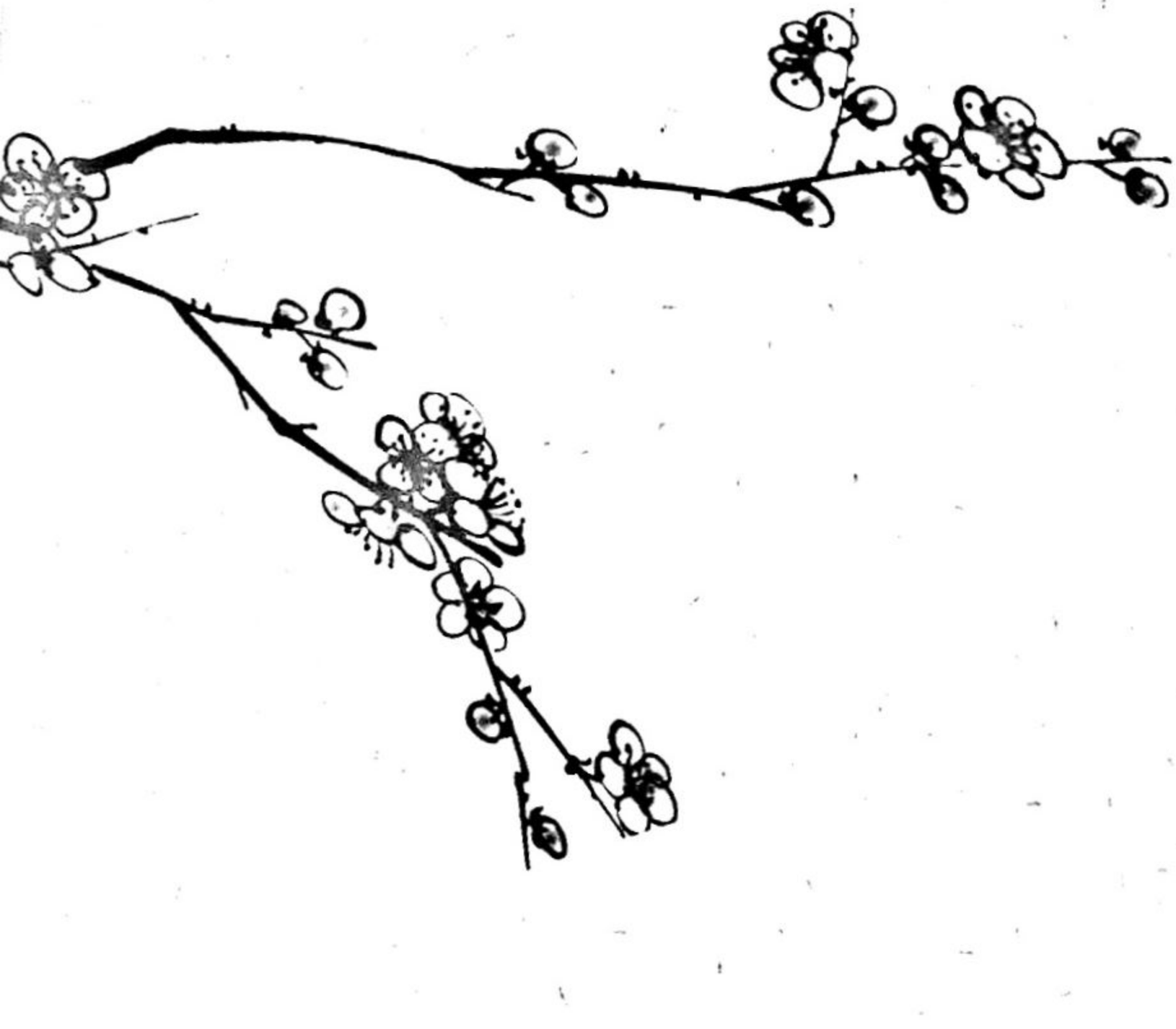
杨　芷：抗击倭寇保平安……203
张　曜：金戈铁马战边疆……206
陈去病：一腔热血　爱国爱民……209
柳亚子：南社旗手　革命诗人……213
钱　刚：北伐战争急先锋……217

张应春：现代妇女运动先驱者……220
金佩扬：迎来吴江解放的中共地下党员……223
费孝通：志在富民　矢志不渝……226
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229
程开甲：立学报国的“核司令”……232
杨嘉墀：影响中国科技历史进程的人……236
后记……240

花生以勁泽被后世

第一章

明鉴录



顾野王



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吴淞江滨常有潮患侵没田庐，吴江北门外一都之地，宅内有一轩，名“听江轩”，每临潮患，人们就会看到一位须眉霜白的老者，立于江滨大声恫吓潮患，潮水竟然神奇般退却而去……这就是在吴江民间流传甚广的“喝潮大王”顾野王的传说。

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今吴江松陵镇三里桥畔顾墟）人。顾野王出身吴地名门望族，祖父顾子乔曾任梁朝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亲顾烜曾任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顾野王从小聪明颖异，9岁写成《日赋》，文采可观，12岁随父去建安（今福建建瓯）任所历练，撰成《建安地记》两篇。梁大同四年（538），顾野王拜太学博士，后历任诸王府记室参军、国子博士、太子

率更令、撰史学士、大著作掌国史、黄门侍郎等职。太清二年（549）八月，大将军侯景作乱。顾野王回到吴江召募乡党数百人，救援京城建康（今南京），又到东阳与刘归义据城抵抗。

顾野王身历梁、陈二朝，当时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却特别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并兴，出现学术文化思想多样化的局面。顾野王与王褒、姚察、陆琼、褚玠、傅绎等具“才学之美”的朋友，交往密切，共同切蹉研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

顾野王博学宏才，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一生著作丰富，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学、方志、史学等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语言学。他在任梁太学博士时，奉命编撰字书，“总会众篇，校雠群籍”，搜罗考证汉魏齐梁以来古今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编撰“一家之制”的《玉篇》30卷，当时他年方25岁。此书采用南北朝通行的楷体，收字一万六千九百十七个，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对后世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黎庶昌《书原本〈玉篇〉后》论曰：“《说文》讨篆籀之原，《玉篇》疏录变之流。”确是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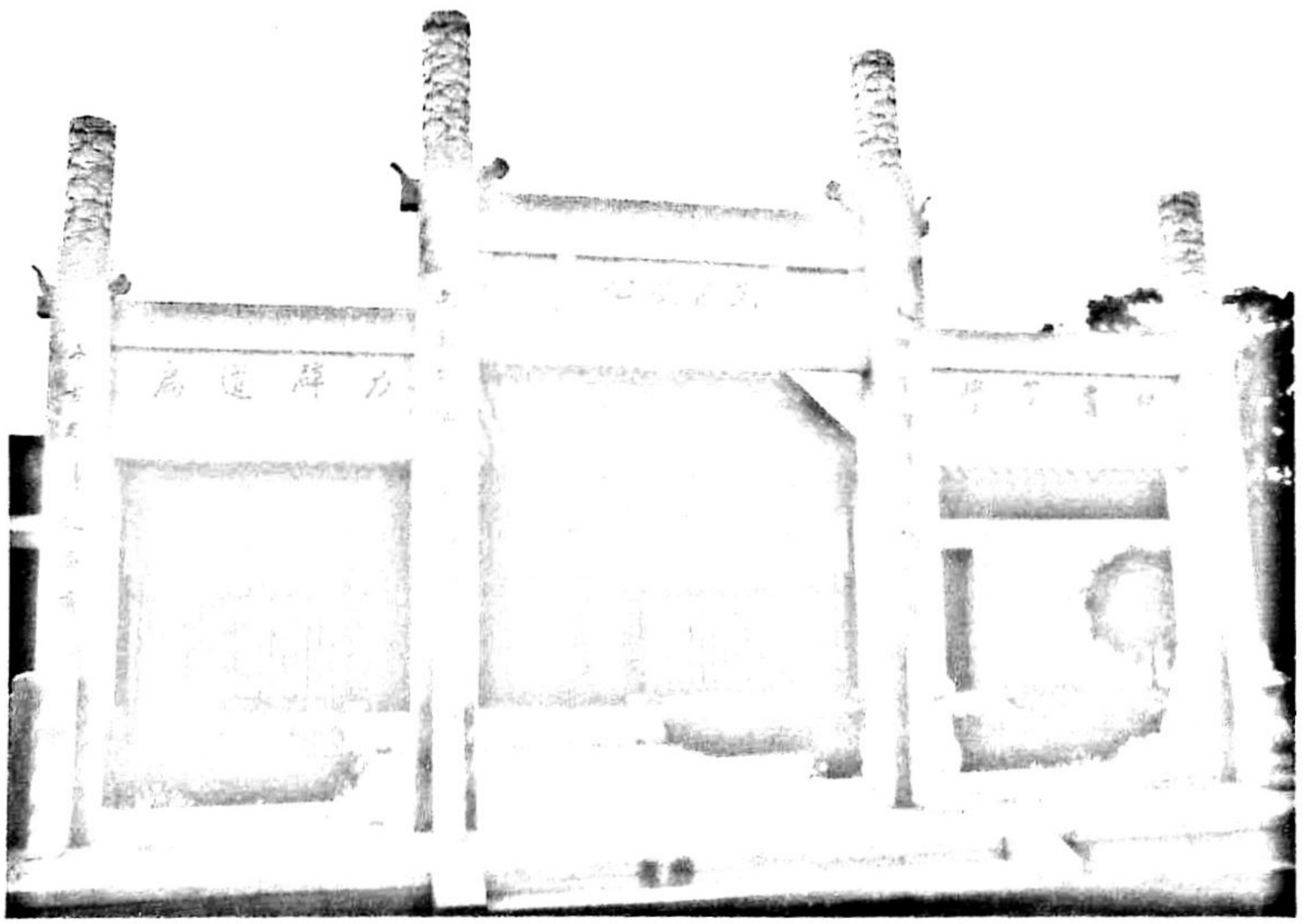
顾野王历任史官，对史学深有研究。他曾撰写《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遗憾的是尚未完成便撒手人寰。他又撰写《陈书》三卷、《顾氏谱传》十卷，已佚。撰《舆地志》十卷，为全国性总志，全书虽佚，尚有佚文可辑。从现存《舆地记》文字考察此书专载地名，颇涉风土人情、古迹物产，而其突出贡献还在于地名合于史事，如载丁卯港云：“晋元帝子车骑将军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此为名。”（辑自《嘉定镇江志》卷六）载丹徒宫云：“在城南，宋武帝微时故宅地，后筑为宫。武帝躬耕丹徒，及受命，耨耕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辑自《至顺镇江志》卷十三）这些载述，可补史载之不足。因此，这部舆地学专著，凸显了顾野王的史才，实已入历史地理学之范畴。另外，他还撰有《符瑞图》、《分野枢要》、《玄象表》及志怪小说《续洞冥记》等，可见顾野王遍及于通史学、史传学、谱牒学、历史地理学，富褒贬于纪传之内，观世变于史述之中，确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顾野王还善丹青，绘画艺术尤以人物、草虫著称。《宣和书谱》卷二十载：“野王善画，（宣城王）乃令野王画古贤”，“画草虫尤工，多识草木虫鱼，诗人之事，画亦野王无声诗也”，评价极高。宋代御府还收藏着他的一幅《草虫图》。他的书法艺术，笔力劲健，俊爽不群，“硗肥之挺质，俱竹柏之凌霜。”窦泉因而将他写入《述书赋》中，唐人还能见到他具名的草书手迹。

综观顾野王的语言学、史学、类书学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可以看出他的学问虽然渊源儒术，但充分表现出全面化、多样化的特色，同时更显示崇尚求真务实，讲究面对现实人生的特点，一反儒家经学之繁琐和六朝时崇尚玄学清谈的风

气，呈现出“经世济民”的可贵特征。这应该说是儒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而顾野王恰恰正是制造这个亮点的众多学者中的一位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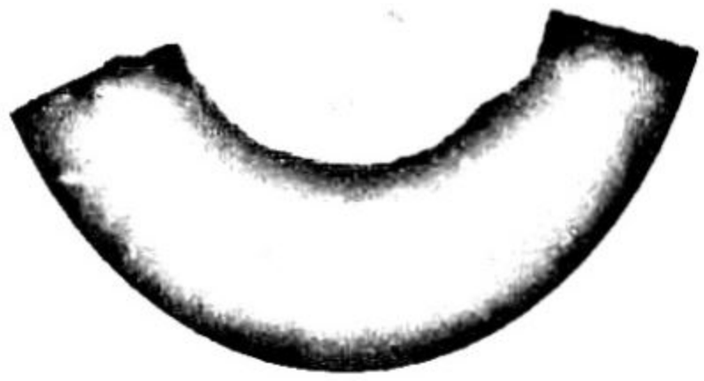
后人为了纪念顾野王这位先贤，曾在吴江北门外一都之地的顾野王的旧宅顾墟建有顾公庙。初建无考，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秋九月，吴江知县石处道因事来至顾墟，见一古祠甚为简陋，遂问随行之人，答曰：顾公庙。石知县进祠拜谒，只见顾公之像“绘形于板”，且“衣冠不正”，于是，“撤除腐弊，改作基构，立其像，设榜以位号，春秋祀之”，并自作改建之记。明宣德、成化、崇祯，清顺治、康熙、嘉庆、同治等朝的吴江知县或顾野王后裔，对顾公庙历有重建、修缮。2007年，中共吴江市委、吴江市人民政府又重建了顾公庙。



顾公庙（顾野王纪念馆）

李问 长虹卧波垂虹桥





倘若时间能被定格，那就让它定格在北宋庆历七年(1047)。吴江县衙内，一方神圣不容抗拒的诏书、一堆数以百万缗的捐款、两张愁眉不展的脸……在一颗为民办实事的勤政、爱民之心驱动下，知县李问在县尉王庭坚的支持下，为吴江历史创下了浓墨重彩之笔——决定兴建垂虹桥，为民造福。

北宋庆历三年（1043），李问以大理寺丞来任吴江知县。当时，吴江信佛的人很多，信徒们对建造庙宇奉祀菩萨都能慷慨出资。李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与县尉王庭坚商议，让老百姓出资将庙宇改建为庙学。他们向老百姓宣传，向富户呼吁，建庙宇奉祀菩萨，不如出资兴办庙学，这样孩子们有书读，可以使家乡的人才脱颖而出，光

耀地方。

开始，老百姓对办学不感兴趣，在李问和王庭坚的努力下，大家明白了道理，就纷纷解囊响应。没有多久，百姓的捐款钱数达到了百万缗（每缗1000文钱）。于是，李问请人设计了庙学式样，准备动工。正要动工时，接到朝廷“郡县不得重建新学”的诏书。这道诏书给李问和王庭坚两人建庙学的劲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对朝廷的诏书，他们无可奈何。捐款到手了，庙学却不能建，李问和王庭坚心急如焚。他们两人都有一颗为民造福的心，面对这些捐款，没有把其占为己有，也没有划作官银加以挥霍。他们商议着无论如何要用这笔钱为吴江百姓办件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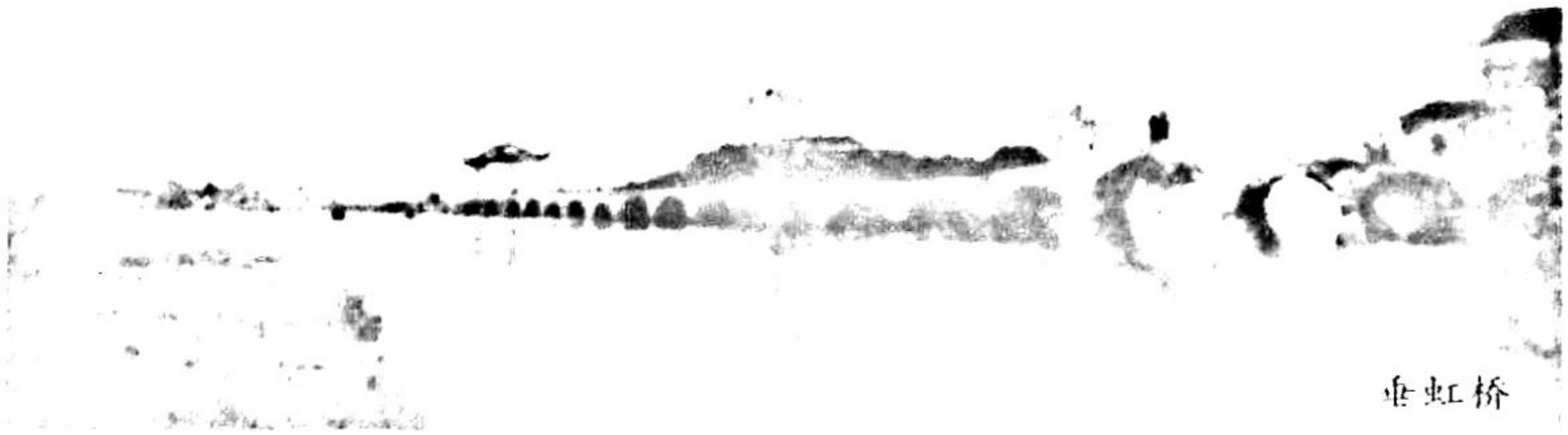
当时，吴江的县城跨吴淞江源头，分南北两个城，西面是浩渺的太湖。百姓往来于南城、北城只能靠船只，左江右湖风急浪高，船翻人亡事件时有发生。望着这滔滔吴淞江水，李问和王庭坚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将建庙学筹得的银两，在吴淞江口建一座桥，方便大家的往来。

这么宽的江面，又在太湖的风口浪尖上，要建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问他们的决定招来了许多非议，但是并没有动摇他们造桥的决心。他们请来了建桥的队伍，精心勘测，认真地组织施工，克服了种种困难，庆历八年（1048）六月二十八日桥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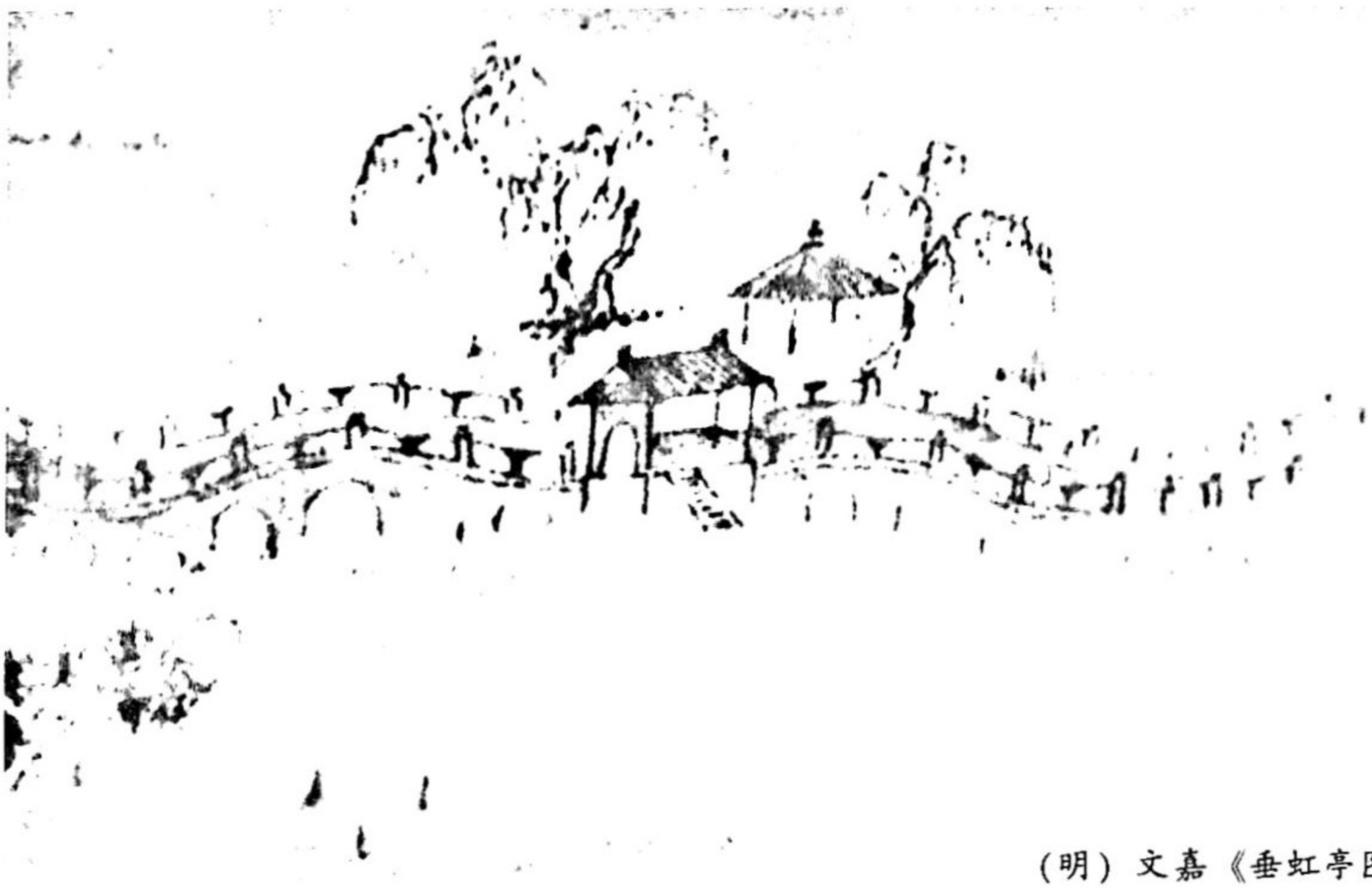
这座桥全长千余尺，用木料万计，桥面建有护栏。他们给这桥取名“利往桥”，取有利于百姓往来的意思。为方便路人歇息，桥之两堍分别建有“汇泽”、“底定”凉亭。

在桥的两堍建木坊，上面写了“利往”桥名，还在桥上建有一亭。因为它是吴江境内最长的桥，其实也是江南最长的桥，吴江人就把它称为“长桥”。左江右湖，一座木桥蜿蜒其间，仿佛是长虹卧波，登临四望，万景在目，成了天下的绝胜之处，文人们将其比作垂虹。久而久之，“垂虹桥”的名字就叫开了，“利往桥”的名字倒让人淡忘了。垂虹桥横跨在吴淞江上，不仅有利于人们往来，而且成了吴淞江上的一道风景线。

垂虹桥的木桥历史一直延续了270余年，期间曾因风涛冲击或兵燹之灾而数度重建，桥孔最多时达99孔。直到元泰定二年（1325）才改建为连拱石桥，共62孔，



垂虹桥



（明）文嘉《垂虹亭图》



（宋）米芾《吴江垂虹亭作》

总长1300余尺，其中有3孔特大桥孔，以通巨舟。此后，历经明清两朝近10次的修建，孔数增至72孔。到1915年时，垂虹桥桥堍两亭、桥面栏板等均已荡然无存，桥孔亦半陷陆地，仅存44孔，础圮柱斜，颓卧波心，因此又进行了大修。

垂虹石桥的建成，消除了苏杭驿道的最后一个险要大渡口。自此商贾云集，墨客聚会，吴江成为车船之都会。历代文人歌咏垂虹的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中有宋朝的苏轼、王安石、米芾、郑獬；元朝的倪瓒、剌多拉；明朝的唐寅、沈周、文徵明、王世贞；清朝的吴梅；民国的陈去病等人的400余篇作品，这在桥史上也堪称“之最”的。

垂虹桥在我国古代桥梁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1957年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垂虹桥于1967年5月2日夜晚坍塌，给吴江的文物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目前，它仅存在东西两端27余孔，吴江市政府已对外露的7孔进行了修缮，并辟建了垂虹遗址公园。

吴江历史绵延数千年，县官可谓超数百之众，而李问因为勤政、爱民，他的名字就像垂虹桥一样，被吴江子民代代相传，载入史册。

谢涛

“荐才连坐”机制的



宋真宗即位初年规定，官员若犯贼罪，不论轻重，都要处分曾经荐举过他的官员。第二年又重申了这一规定。实行这种“连坐法”，就促使推荐者要对被推荐者进行认真的考察，尽力避免任用那些有可能贪污犯罪的官员。而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员必须有人推荐才能晋升。这其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这“荐才连坐”的最初提出者，是吴江人谢涛。

谢涛（959—1034），字济之，七都长渠港村人，祖籍河南太康。其父亲谢崇礼携全家迁至七都，后来又搬至同里。淳化三年（992）谢涛中进士，后为四川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谢涛尝划守御之计。事平，以功迁观察推官，后任四川益州、华阳知县、太常寺

博士、两浙转运使、礼部和吏部郎中，后拜秘书监，又迁太子宾客，逝后追封为礼部尚书。

咸平元年（998）宋真宗即位之初，为了挖掘人才，下诏向朝廷推荐有治国政绩的官吏。这次被推荐的有24人，谢涛就是其中的一位。宋真宗召见了这24位有政绩的官吏。受召见后谢涛被外派安抚益州、利州等地，在抚民治政过程中，谢涛重视贤才，勤于考核官员的业绩，回到京城后向朝廷推荐了30多人。

谢涛一下子推荐了这么多人，引起了朝廷部分官员的非议。宰相毕士安也认为他推荐的人太多了，中间难免有平庸之辈。谢涛回应道："有罪，愿连坐之。"就是说自己推荐的人犯了罪，自己愿意一同受处罚。谢涛不顾个人安危和前途得失大胆举荐人才的行为，得到了同朝众官员的认可和称赞，而他"荐才连坐"的主张更是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从此，宋朝法典多了一条推荐官员需要连坐的条例。

谢涛为人光明磊落，办事兢兢业业，处理事情先从国家利益、百姓利益出发。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去世，为护送真宗灵柩，有人提出要拆掉城墙房屋，让灵柩通过。谢涛得知此事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先帝在世时，出城外主持封祀大事，带了仪仗，物品也多，但没有拆掉过一间房屋，一垛围墙。现在，有了如此奢侈的陪葬器物，还要劳累州县百姓，这已经违背了先帝从俭薄殓的遗诏，如再要拆除城墙毁坏民宅，这更不符合先帝的遗旨了，请朝廷慎重考虑。"朝廷终于赞同了他的说法，保全了城墙房屋。

四川农民起事失败后，田庐荒废，时有诏令"有能占田而倍人租者，舆之。"因而，大片肥沃之田，均被地方豪强所占，大批流民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时任华阳令的谢涛，收了诏书，把田地还给了原主人，受到了农民的爱戴。

谢涛少时就勤奋好学，14岁已能讲解《左氏春秋》，20岁，游学苏州，试写表章颂扬赵匡胤、赵匡义统一中国功绩，大受吴中文士钦服，因此名扬江南。他喜好诗词，与欧阳修、范仲淹时相唱和。景祐元年（1034）十月，病殁开封，年75岁。次年三月，子谢绛扶柩南归，葬于富阳。欧阳修为其作墓志铭，范仲淹撰神道碑。

谢景初 筑塘功臣 造纸名家



在吴江人文历史记载中，勤政惠民的七都人——谢景初，一直以来为百姓所称赞。他制造发明的“谢公笼”至今被世人推崇，他从政期间禁豪强，筑海塘，办学堂，一心为民，恩泽百姓，政绩显赫。

谢景初 (1020—1084)，字师厚，号今是翁，祖籍湖南太康，谢涛之孙，谢绛长子，七都长渠港村人，后居同里。

谢景初博学经文，尤长于诗，为欧阳修、王安石、梅圣俞所推重。他曾为姨夫梅圣俞编辑诗文。他读了黄庭坚的诗后十分喜欢，后来把女儿嫁给了黄庭坚。黄庭坚自云得句法于他的丈人谢景初。

宋庆历六年（1046），谢景初中进士，任职浙江余姚

县。谢景初上任余姚县知县时，范仲淹写了一首《送谢景初迁凭宰余姚》诗送给他，诗中有句云："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贤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风为君来，绿波满平湖……未能同仙舟，离樽少留驻。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勉励他勤政惠民，这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在当时，上林、云柯及余姚等地方濒临东海，经常闹水灾，遭到海潮冲决，田庐淹没。谢景初就积极筹划，筑海堤捍潮患。宋庆历七年，谢景初率领百姓初筑。塘系土堤，西起云柯，东达上林，东西绵长9公里多。在修筑堤岸时，谢景初用身体挡住风霜雨雾中的毒气，为百姓们鼓气。谢景初修筑的大古塘，原名莲花塘，俗称后海塘。余姚人民直至今天，对谢景初筑建大古塘都倾注着深沉的亲情。当地百姓称大古塘为"英雄塘"、"祖先塘"；称因筑塘而掘的大塘河为"育恩河"、"母亲河"。近千米长的堤岸筑成后，宋名相王安石，欣然写下了《余姚县海塘记》，颂扬曰："自云柯而西，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县事谢君为之也……"

而此期间，上林湖一带又发生了地方豪强侵湖为田的事件，为解决乡民争夺山



上林湖

湖之事，谢景初亲自度量了湖的高下、广狭、灌溉亩数以及堰闸的大小、高低，制订了《湖经》，由后任知县发给农家，公布于众。在他领导下，上林湖经过治理，风光旖旎景色如画，人气极旺。诗人高鹏飞作有“风静湖光一鉴浮，青山四顾淡舒眸”的佳句，传承咏诵。谢景初也曾写《寻余姚上林湖山》、《观上林垁器》诗句赞美。

谢景初在余姚任职期间，统一管理农田水利，抑制豪强侵湖为田及抢夺灌溉用水，以保障农业生产正常；管理海盐生产，严禁偷煮海盐，规定盐民必须依法纳税，增加财政收入；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与当时王安石、韩玉如、谢景平齐名于吴越，被誉为“四贤令”。

谢景初最突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政绩，更在于他制造了“谢公笺”，使他名声远扬。元费著《蜀笺谱》称：“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名）、师厚（字）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浦寄弟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

唐末五代时，隐居在四川成都西郊外浣花溪的薛涛，感到当时的纸不适合自己写小诗，就命工匠做成狭小的纸，因为她喜欢红色，就做成了深红小笺。谢景初在薛涛的基础上制造了一种纸，这种纸以优质厚料精制而成，光滑坚韧，莹润如玉，细密耐用。这纸是一种经过加工的染色纸，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种色彩，艳丽新颖，雅致有趣。后来，谢景初向浙江富阳的纸农商传授了先进的腌、漂及制作技术，使这纸投向了市场，并且后来一直为宫廷采用，人们有这么一种说法：“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

由于这种十色纸是谢景初发明的，后来就被称为“谢公笺”，与汉末晋初的“左伯纸”、唐末五代的“薛涛笺”同为我国三大名纸。

向子韶

丹心铁骨 抗金名将



南宋时期，皇帝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始，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女真骑兵纵横驰骋，大肆侵掠屠杀，导致国家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面对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残酷现状，中原地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金名将，“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岳飞，“勇猛过人，胸怀韬略”的韩世忠，“英雄虎胆，壮志难酬”的辛弃疾，“倾己所学，七旬不老”的宗泽，“断首数千人，功建义而死”的杨再兴，“清约如寒士，誓死保家园”的向子韶等。其中，名将向子韶曾到吴江任知县五年，在吴地留下“因地制宜，秉公办事，行履高洁”的美名。

向子韶（？—1128），字和卿，河南开封人，为宋神宗赵顼向皇后的本家侄子，北宋名相向敏中的玄孙。他天资

聪慧，勤奋好学，15岁入最高学府太学，元符三年庚辰科（1100）中进士。崇宁三年（1104），向子韶由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判官任满，调到吴江任知县。

向子韶到吴江时，苏州一带正在流行私铸冥币。关于冥币，因百姓沿袭埋物祭地、散币送葬的风俗，使冥币成为祭祀时生者对死者思念的载体，大为盛行。编撰《资治通鉴》的宋人司马光曾大力批驳唐人王玙宗祠祭祀之行为，说："焚纸钱似巫术，让习礼者羞耻。"所以，在宋朝，冥币是有所限制的，私铸冥币更是迷信、违法的事。然而，苏州知州许光凝碍于民俗，对这件事听之任之。向子韶到任后，立即在吴江境内发了禁令，严禁私铸冥币，同时向许光凝上书，讲明利害关系。后来，朝廷果然派人来追查此事，其他各县都把责任推到知州身上，而向子韶既没有争辩，也没有出示当初给知州上书的底稿，他这种态度使许光凝十分感动。结果，从知州到其他各县知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降级处分，惟独向子韶一人没有受处分。从中可看出，向子韶为人谨慎、清正明恕的一面。

大观元年（1107），苏州地区施行25户人家为一个大保，进行集中管理。知州孙杰召集各县知县来商议，提出每一大保建一个鼓楼，安排5名保丁进行巡视警戒，一旦发生偷盗抢劫就击鼓，互相通知。向子韶不赞成这种做法，说："争斗会从这件事上开始。"他认为，一个大保才25户人家，如此稠密地设置鼓楼实在是劳民伤财，何况保丁平时无事可干，倘若无事生非起来，很容易发生争斗，社会反而将不得安宁。台面上一时争论不下，别的知县都劝他不如先答应下来，回去办不办是自己的事情。向子韶认为，阳奉阴违不是大丈夫所为，答应了回去不办，是对上司的大不敬，会犯违令罪的。他大胆表白自己的意见，并详细陈述理由，主张防盗问题上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切不可采取劳民伤财、留下隐患的策略。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后，知州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停止一保一楼计划。从中亦可看出，向子韶为官尽责、实事求是、不阿谀奉承的一面。

大观三年（1109），向子韶调任开封府右曹参军。靖康年间（1126—1127），他开始担任淮宁（今河南淮阳）知府。建炎二年（1128）六月，金兵进犯淮宁，向子韶率领部下，坚守城池。城内有审时度势者劝向子韶弃城避去，他大声疾呼："汝等坟墓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意思为："这里是你们的祖坟所在地，离开了这里。你们能到哪里去安身？我一定和大家一起死守这块地方。"他劝导百姓要对故土和宗墓有忠爱眷恋之心，鼓动士民誓死抗敌，永不言弃。他的英勇气概，激发了百姓保卫家乡的激情。当时，守军只有4000多人，守将岳景绥本想放弃淮宁城，率领军士和百姓撤往南宋高宗赵构所在的江浙一带。向子韶不同意，认为如果各地都这样遇到金兵就跑，哪里还有国家的安宁，而且也不符合尽职守土的为官之道。经他极力劝说，岳景绥决定留下守城，后来在领兵迎敌中奋战至死。

金兵日夜攻城，向子韶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冒着箭林石雨与金兵殊死搏击，同时派遣弟弟领兵杀开血路，去东京留守使宗泽那里搬救兵。无奈救兵还未到援，城

就被金兵攻破了。向子韶继续率领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金兵首领坐在城头，劝他投降，并命士兵强按他下跪喝降酒。向子韶始终顽强屹立，并手指金人破口大骂，最终英勇就义。向子韶全家除了一个弟弟刚去唐州（今河南唐河）任知县，一个6岁儿子幸存外，他的三个弟弟子率、子袞、子家等阖门皆遇害。向子韶的事迹得到朝廷褒彰，追封他为通议大夫，谥号忠毅，对他家殉难的其他6人亦进行了追封。

文儒出身的向子韶不但文韬武略兼备，而且还是位情趣高雅的收藏家。宋人张择端的鸿幅巨作《清明上河图》，辗转到了宋徽宗手中，经收藏后赐予向家，金兵破城灭门后，此画被金人夺去，所以向子韶是宋时收藏该图的最后一位藏家。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松、竹、梅的刚正不阿和清高雅洁，涌现出许多坚持正义、不图私利、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杰出人物。曾为吴江父母官的向子韶，如浩瀚星空中璀璨闪烁的一颗，他的美名与英烈们一起流传，他气节高昂、铁骨铮铮、至死不屈的英勇事迹也载入了光辉史册，受万人敬仰。



向子韶曾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盛昶 尽思直言 敢于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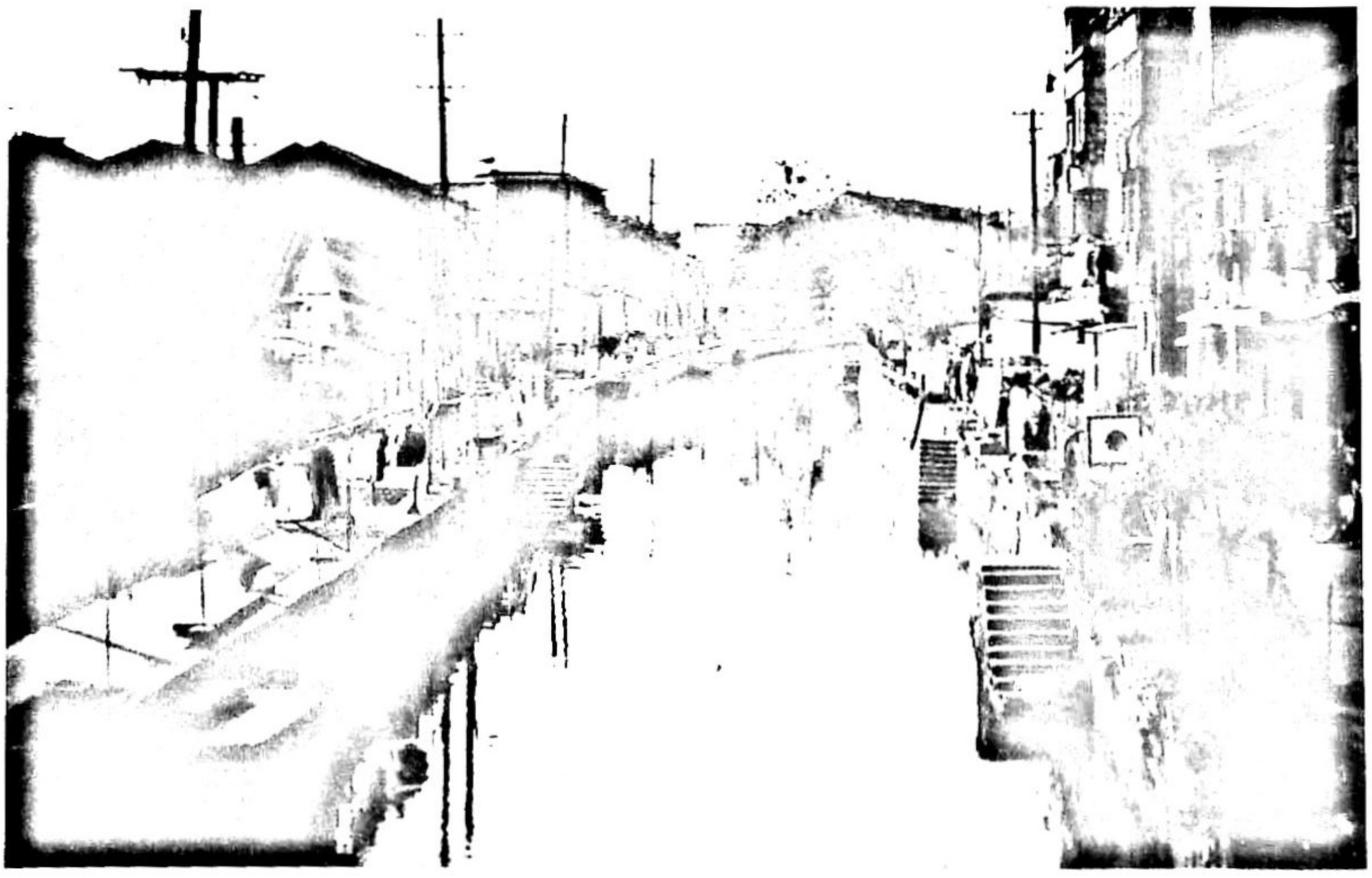


宏大威严的金銮殿上，六个大臣一字排开跪倒在地上，旁边侍卫高高举起廷杖，重重打下。其中一名跪着的大臣高呼："陛下，听说过以前有杀谏臣的吗？现在既然这样，就请杖杀臣一人好了，与其他人无关"。说话的就是直言敢谏的盛昶。

盛昶，字允高，松陵镇盛家库人，明景泰元年庚午(1450)举人，二年辛未科中二甲第27名进士，授监察御史，曾到山东清理马政，管理马匹的饲养和征调，请求蠲免赋税利息。四年，巡按广东时，更新制度，从简行政。五年三月，泷水瑶民起事，他又单骑前往劝降。从他早期经历看，他已经非常了解民情，善于处理民间矛盾。

当时，景帝朱祁钰在宦官兴安的鼓动下，笃信佛、

道两教，遇有灾异就求仙访道，卜问凶吉，即使北京保卫战的功臣、兵部尚书于谦的劝谏也听不进去。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干大臣纷纷奉迎，连部分御史上的奏章都是一些长生不老炼丹之术和逢凶化吉的妖言咒语。盛昶对此不屑一顾，极欲寻找机会进行劝谏。景泰六年（1455）七月，面对外有蒙古瓦剌部落的侵掠，内有黄河水患、中原大旱的局面，盛昶与同僚倪敬联合同为监察御史的江阴杜宥、芜湖黄让、罗俊、汪清等六人一同给景帝上奏章，请求皇帝停止无故用国库钱粮分发寺庙之举，取消在宫中开挖人工湖、造龙舟等靡费工程，减少大小宴请，对那些至今仍被囚禁、敢于直言的大臣进行宽赦。景帝看了奏章非常不悦，批给礼部处置。礼部大臣回奏皇上说：这是盛昶、倪敬等人对皇上的忠诚直言，体现了一片忠爱之心，陛下应该宽容。但景帝仍耿耿于怀，气愤未消，命令对上奏御史们进行廷杖。没过多久，吏部尚书王翱和御史萧维祯奉旨考核百官，按照皇帝的意思，将牵涉上奏的御史一并贬为典史，其中盛昶被贬职到广西古田县（今广西永福）。同僚们与盛昶依依惜别。谁都清楚，如此结果皆因盛昶曾经在通州时，不愿仰时任都御史王翱的鼻息，把王关在门外结下的梁子。盛昶诙谐地对同事们说："还算好，到底给我保留了一个'史'字"。



盛家厍

当初盛昶等上奏章后，一次，皇上召都御史萧鎡到左顺门议事，守门太监舒良、王诚对萧说："皇上要取你的首级。"萧问为什么，舒良说："谁让你教御史们胡说八道的。"萧不慌不忙地回答："尽忠进言是御史的职责，谁能禁止得了？因为这事皇上要砍我的头，未必是真的，莫不是公公们假传圣旨吧。"舒良、王诚听了自知理亏，才装出笑脸谦让过去。萧鎡出宫后问盛昶，奏章上提及的靡费之举是从哪里得知的。他据实说，是从经常出入宫门的御医，名叫盛宏的族叔那里听到的。盛宏知道后坐卧不安，既恨自己多嘴，又怨盛昶嘴快，觉得非引来杀身之祸不可。盛昶安慰族叔说："不会死的，至多戍边罢了。"果然让他言中了。

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诏命受景泰六年御史之祸的人均提升为知县，盛昶得以调为四川罗江任知县。当朋友问他对降职、移官的感受时，盛昶以诗戏答："才劣岂宜居要地，性憨只合对青山。铨曹自有知人鉴，一度移官一度闲。"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天大旱，他组织百姓凿井挖塘1250余口，不仅救了急，而且为当地留下了永久的水利工程。当时，德阳人赵铎受人诬告，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就派兵去捉，逼得他造反，伪称"赵王"，进而骚扰附近各县。罗江原本没有城墙，盛昶率众筑起护城土墙，引水作壕沟绕城周边，并布下奇兵内外设伏，约定以炮为号。一切准备停当，派人去诱赵军，赵军队伍入城不到一半，他便里应外合，使赵军首尾不顾而大败，保得一方平安。

天顺八年（1464），盛昶调任叙州（今宜宾）知府，临离开罗江时，用多年的积蓄修建了稍为像样一点的县署。在叙州期间，朝廷遣将征讨洪筠、高士佺，前军失利。盛昶在后军，矢石击中两耳，仍奋力拼杀，终于击退了对方。督阵使者将他列入上报军功名单，他却以重听（指听力下降）辞归。回来后，搬到苏州城里，并招呼兄弟们一起搬去，又迎养姑姊之无依无靠者。朝廷追述军功，派使者将赏赐送到家里。卒年6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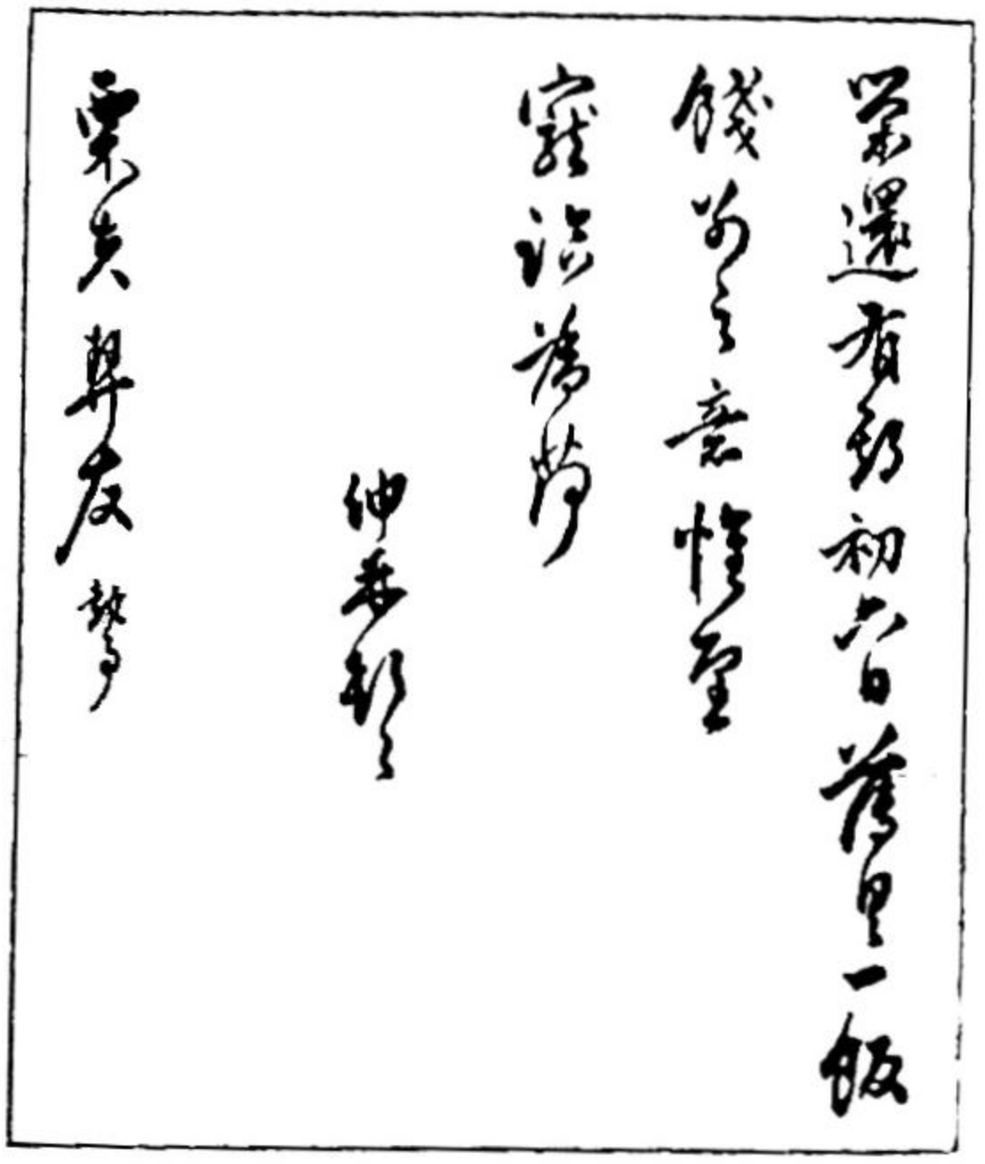
罗江县原来没有名宦祠，盛昶离开后，老百姓将他的画像置于罗真观（今万佛寺）。提学胡直公函到县要求建名宦祠，并为他立传。正觉寺（后为马驰寺）主持洪净风烛残年时，在《藏身碑记》中也记载了盛昶对罗江的贡献。乾隆三十年（1765）任罗江知县的杨周冕敬佩盛昶的为人和他在罗江的文治武功，特意在盛昶修建的县署上题了"列吾宇者，勿游手，勿比匪，勿犯法违条，便是王风第一；抚此都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徇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的名联，把盛昶与东汉时期为民兴利、深受老百姓爱戴被称为"杜母"的南阳太守杜诗相提并论，诫勉后人。

叶绅



明弘治七年（1494）的夏天，霪雨霏霏。官船上一位官员久久伫立雨中，官船经过的正是他家乡吴江。常年在他乡为官，今朝能远远、匆匆地望一眼桑梓之地，对这位官员来说，已是无比的欣慰和满足。可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了……连绵不断的暴雨中，雨水、河水、湖水汇集成肆虐的洪水，正吞噬自己的家乡……身为朝廷大臣，不能保家乡百姓平安，日后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面对家乡的愧疚之情、面对江浙沿河民众所罹患的水灾，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令他坐卧不安，从而直言上疏……家乡百姓感恩这位吴江籍官员，特在垂虹桥西北建三贤祠纪念，后再修爱遗亭，取其爱遗乡梓之意。他，就是叶绅。

叶绅（1440—1505），字廷缙，号毅斋，吴江北厍叶家



叶绅信札

埭人，吴中叶氏第二十世。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弘治元年（1488），授户部给事中，调吏部，历礼部左给事中。叶氏先辈曾抵制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外辱，元朝时叶氏一族一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天下后，叶氏上下还来不及欢庆，就迎来了一场灭门之灾。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强令江南部分富户迁入南京，叶家不愿离乡背井，被朱元璋灭门。在满门抄斩中，刚满周岁的叶福四在家人的保护下，逃离了朱元璋血腥的屠刀，避祸隐居到了吴江北厍的分湖滩边，生枝散叶，繁衍生息。到百年后的成化末年，分湖叶氏出了第一位进士，那就是叶绅。自此，叶氏二十二世叶可成、二十三世叶重第、二十四世叶绍袁、二十五世叶燮等代出进士，名重江南。

弘治七年（1494）叶绅奉命前往福建、浙江巡视，路过吴江，正值太湖洪水泛滥，民罹饥馑。为此，叶绅上书朝廷：国家粮饷仰给东南，顷苏、松、常、杭、嘉、湖诸郡水道湮塞，甚为农事害，请择任廷臣中有才力者疏通之，并议蠲赈以甦民困。不久，朝廷命工部侍郎徐贯来吴中，负责指挥开浚吴江吴淞江、白茆江等水系工程；派遣户部主事祝萃前来负责救灾，使百姓得以钱物救助，解除了水患之扰。吴江百姓为了纪念叶绅和另外两位御灾抗患、卫国救民的吴江人——吴岩、沈璐，在垂虹桥西北修建三贤祠。后在三贤祠旁，为叶绅再建爱遗亭，取其爱遗乡泽之意。

弘治十年（1497），身任吏部给事中的叶绅，不计个人安危，上书责斥深受弘治帝宠信的太监李广八大罪状："诓陛下以烧炼，而进不经之药，罪一。为太子立寄坛，而兴暖疏之说，罪二。拨置皇亲，希求恩宠，罪三。盗引玉泉，经绕私第，罪四。首开幸门，大肆奸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应祯辈称广为教主真人，广即代求善官，乞赐玉带，罪六。假果户为名，侵夺畿民土地，几至激变，罪七。四方输纳土供，威取势遏，致民破产，罪八。内而皇亲驸马事之如父，外而总兵镇守称之为公。陛下奈何养此大奸于肘腋，而不思驱斥哉！"弘治听之有理："姑置之。"几个月后，李广迫于压力，饮鸩畏罪自杀。与此同时，叶绅又劾尚书徐琼、童轩、侯瓒，侍郎郑纪、王宗彝，巡抚都御史刘璇、张诰、张岫等二十一人。叶绅后擢尚宝少卿，卒于任上。

盛应期

劲骨刚肠 勇于任事



明孝宗时期，孝宗迷上斋醮，太监李广投其所好，帮忙张罗建造斋宫，烧制丹药，深得孝宗欢心，从此扶摇直上，一时间可谓“权倾朝野，纵恣无度”。但就是这样一号人物却对当时的一个小人物——刚刚被授予都水司主事一职，专门管理山东济宁一带的水闸的盛应期颇为忌惮。有一次，李广家人枉顾盐法，贩运私盐，途中经过济宁，遇到盛应期执行公务，早闻盛应期刚正不阿，李广家人不敢以身犯险，慌乱中忍痛将私盐倒入水中，落荒而逃。直到弘治十年，李广勾结南京太监秦文，诬告盛应期阻拦新办贡船，才将其贬往云南安宁任驿丞。但盛应期丝毫不后悔。

盛应期（1474—1535），字思征，号值庵，永乐朝御医盛寅四世孙，吴江人。弘治六年癸丑科（1494）进士，授

工部都水司主事，历任云南安宁驿丞、禄丰知县、顺庆府（今四川南充）通判、武昌府、长沙府同知、云南佥事分巡金沧洱诸道、河南按察使、山东右布政、陕西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右都御史总理河道等职。在为官从政的仕途上，盛应期几经谪迁，但他生就一副劲骨刚肠，秉公执法，直言极谏，不媚权贵，不屈服于权力。

正德初年（1506），盛应期升任云南佥事分巡金沧洱诸道，促使听信谗言明争暗斗的景东土著知府父子重归于好；武定土著知府凤应死后，其遗孀摄理府事，其儿子朝鸣为寇作乱，多行不法。盛应期单车入境，进行劝说，终于使其母子改邪归正。当时镇守太监梁裕在云南横行，盛应期与御史张璞、副使晁必登联合进行抵制。梁裕就弹劾三人。因这些太监都是皇帝身边的人，皇帝听信一面之词将三人逮捕下狱。张璞竟被拷打致死。直至正德九年正月元宵节，乾清宫失火，谏官们趁机出面帮他们说话，盛应期才得以复职。

嘉靖二年（1523），盛应期任江西巡抚。此时的江西刚刚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当时湖区流寇充斥，他派军队巡查，



盛应期石刻像

在渔民中订立团保法。为鼓舞民心，救助百姓，盛应期上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钱数十万，并让原本运至南京的米47万石、银20万两用于赈济百姓。此举使江西民心振奋，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盛应期不但尽心为百姓解燃眉之急，还从长远考虑为百姓谋福利。他下令江西各地官府在光景好的时候积极储备粮食，充实粮库，以备荒年不时之需，至百余万石。继任者萧规曹随，继续施行储粮政策。皇帝进行褒奖时总是不忘盛应期的建策之功。

嘉靖六年（1527），黄河泛滥，河水溢入漕渠，导致沛县北部的宿道口淤积数十里，粮船受到影响不能通行。工部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材等人请求将昭阳湖东面的漕渠旧河道重新修建开通。盛应期通过实地调查，提议在昭阳湖东面，新挖一条长约一百四十余里河道，北部由江家口进去，南部从留城口出去，这样相对于疏浚漕渠旧河道省力而利益长远。朝廷认同盛应期的方案，于是招募劳动力65000人，投入白银20万两，期限6个月完工。但是工程进行到4个月时，恰好遇到旱灾，这时，有人进言说是因为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开挖河道导致上天发怒，从而出现旱灾。皇帝听信了谗言，命令取消这次工程。盛应期请求推延一个月以完成这个工程，但皇帝不允。最初盛应期请旨让郎中柯维熊帮助分浚支河，柯维熊也力赞新河之议，而此时却说新河不便。盛应期上奏请求自行解决，皇帝更加恼怒，诏令将盛应期与柯维熊一并革职。不久盛应期被赦免，以原官职退休。在30多年后的隆庆六年（1572），左副都御史朱衡正是循着盛应期新河遗迹完成了新河的开通工程，给河道运输带来了很多便利，造福了后世。

周用 端亮有节的治水能臣



“中华园林网”上刊登的《华夏治水名人》一文中，记录了从夏代至清代光绪年间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的27位治水名人，其中就有他的名字；“黄河网·黄河记事”栏目中，有他的“倡沟洫治河”之议；“咸阳市水利局网·水利百科知识”中，有用他的名字作为治水代名词的文章；他是《盛泽镇志》、《平望镇志》人物传中重笔阐述的古代人物——明代吴江人周用。

周用（1476—1547），字行之，号白川，吴江盛泽人，长居平望烂溪。周用一生宦海沉浮，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任地方要职及工、刑、吏三部尚书，勤政务，慎操守。嘉靖二十七年（1548）卒于任上。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入府学乡贤祠，堪称一代名臣。周用曾孙周



周用《柳荫牧马图》

宗建，在与阉党魏忠贤作最坚决、最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堪称一代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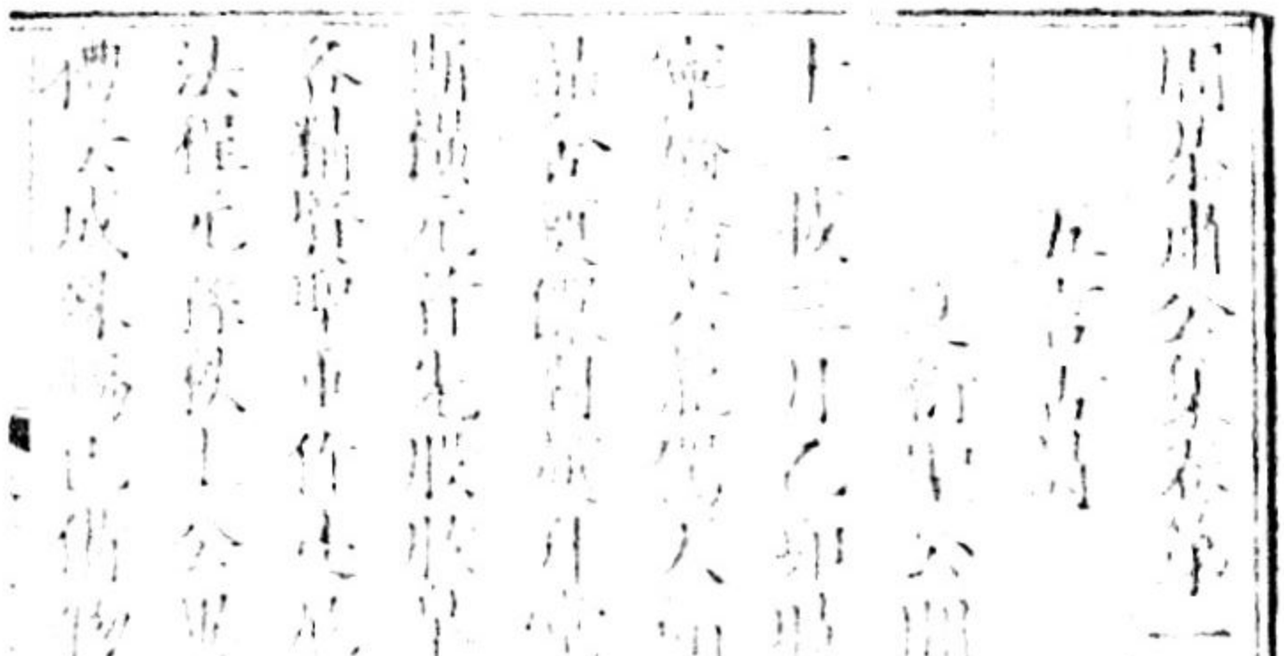
正德初年，周用担任南京兵科给事中，劝谏武宗朱厚照不要派太监刘允到乌斯藏（今西藏）招“活佛”，请黜尚书、都给事等官，并要求惩处镇守江西的矿税太监黎安。后出朝为广东左参议，镇压了番禺地方反叛。嘉靖初年，担任河南右布政使期间，代监司审理南阳潜狱囚犯，监狱为之一空。正值大旱，他亲自管理汝宁（今汝南）赈济分所，到老百姓家里清查户籍，发放写有“赈”的凭条，拿了去领救济米和物品。这样，原先乡里管事的人就无法从中捞取好处，救活了无数人。

嘉靖八年（1529），周用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今赣州一带，包括广东、福建、湖南的邻近地区）军事。当时有一个大强盗经常扰乱地方，官军多次围剿不能抓获。周用通过调查，了解到大强盗手下一人有动摇的心思，就派人召这人来，周用向他讲明道理，恩威并施，用作内应，设计杀了大盗，使地方得到了安宁。除了

大盗，他又分析了赣南出现大盗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贪官污吏，还在百姓的赋税太重。于是他立即着手清除贪吏，并下令地方均衡徭赋，缓收征科，安抚流民。过了一年，地方治安明显好转。他调整商税，使已经逃往别处的商人重新回到南赣，发展了当地的商品流通。

周用的业绩得到了朝廷的关注。不久，他进京先后担任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南京刑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工部尚书。担任工部尚书期间，首先刹住了采购上的歪风。他发现为皇宫采购东西的官吏，经常接受贿赂，先给商人钱而后进货，让奸商因此而获利，让朝廷由此而受损失，他就命令百姓将货物直接送到衙门并立即付钱，这样，官吏的私弊也就杜绝了。

周用为人诚恳、端亮有节，为政崇尚少说多做，深得当事官员的敬重，在当时已被称为“名臣”。他曾改任刑部尚书，任职后因皇帝宗庙起火而自请免职。嘉靖十五年（1536），众官员极力推荐他再任工部尚书。再次任职后的他，足迹几乎踏遍数千里的黄河沿岸。经过实地踏勘，他发现，数千里黄河，其实只有河南开封兰考的东西方向有河可以使河水分流，而其他地方没有，就提倡沟洫治理。他认为修了沟洫，黄河的水可以分流，分散到田间地头，不仅可以消除黄河的洪患，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他的这种治河思想，打破了历史上单纯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治河名人”。



《周恭肃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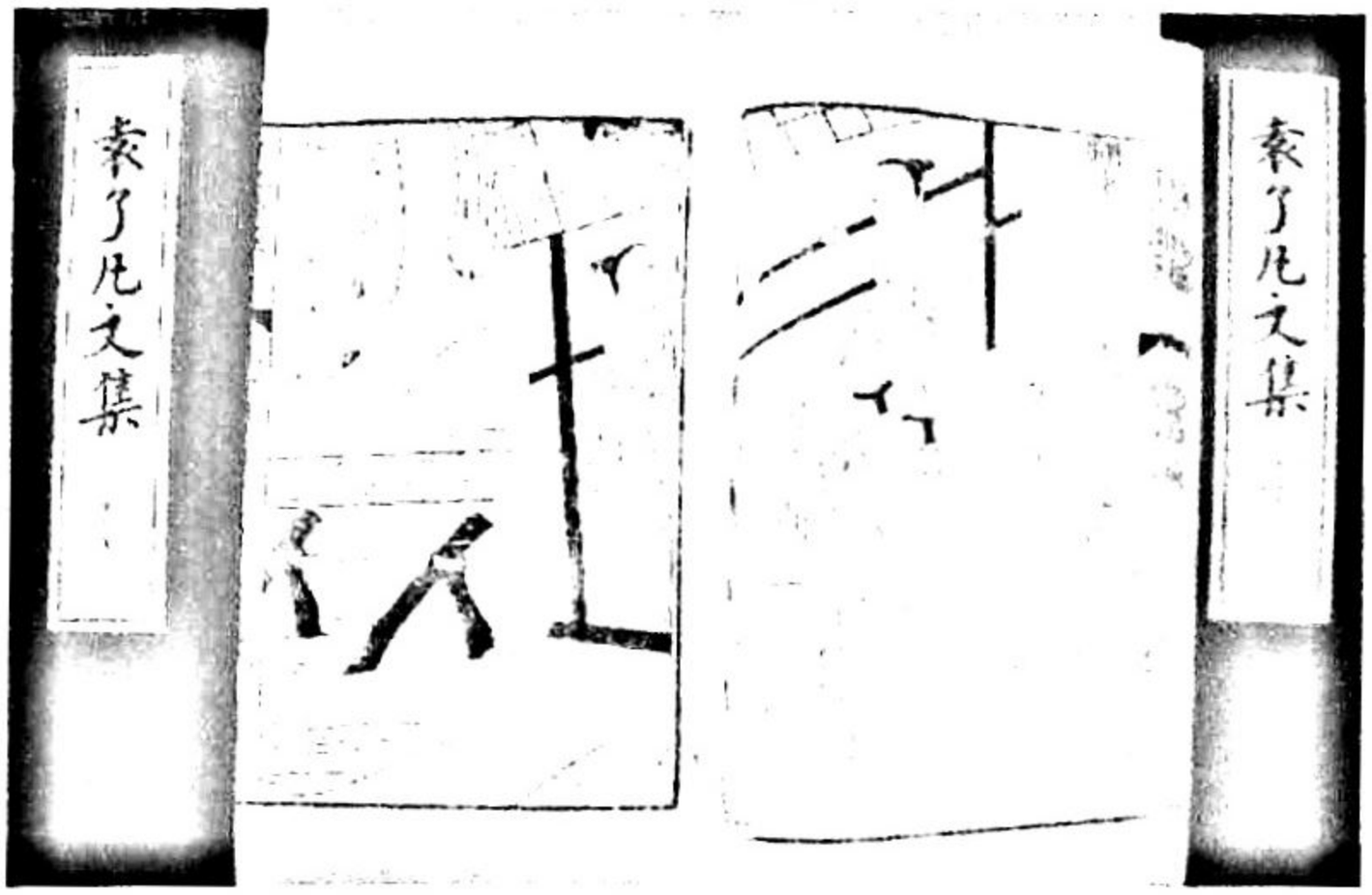
袁黄《了凡四训》扬名四海



几年前，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在吴江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了凡》，向世人全面展示了袁了凡一生立德扬善的精神和事迹。电视剧的主题曲唱道：乾坤及轮转，沧桑一梦间……历数前朝事，了凡有箴言：让爱心遍洒寰宇，善意满人间。

袁黄（1533—1606），字坤仪，号了凡，吴江芦墟人。是明朝时期吴江出的一位奇人，后世多以“了凡先生”尊称。作为明朝重要的思想家、学者，袁黄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明万历十六年（1588），袁黄任直隶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县）知县。当年，宝坻水灾频发，农业收成低微，人民穷困。袁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体察民情，并以自己的薪



袁了凡文集

俸来抵偿赋税，使饥荒中的宝坻民众“全活甚重”。随后，他又实施了一系列“善政”，以改变宝坻的境况。在宝坻任职的五年中，袁黄“爱民重而官箴轻”，正直勤政、廉洁爱民，以民众之心为心，所作所为皆能利民惠民，用自己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学树立起难得的清官形象，被誉为“宝坻自金代建县800多年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

万历二十年（1592），袁黄被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虽然是位文官，但他熟知兵法，足智多谋，对历史上的攻守战例作过全面研究分析，又曾独行于塞外一年多，九边形胜、山川营堡历历能道。而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发起侵朝战争。应朝鲜求援，明朝派军队赴朝鲜援救。蓟辽经略宋应昌深知袁黄擅长兵法，上疏请他到军前策划，袁黄便随军赴援朝鲜，参加“明万历朝鲜之役”，是袁了凡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业绩，他出谋划策，往往有言必中，然而这也是他从仕途巅峰跌到谷底的一个转折点。

在平壤战役中，袁黄和主将李如松因技术问题发生分歧。他坚决反对李如松采用以“诱兵迎战倭寇”的战术，并下令禁止李部诸将“割敌首级报功”的做法。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李如松极为恼怒，独自引兵东去。日寇趁机攻击袁黄的军队，幸亏袁黄机智应对，将日寇击退，而李如松的军队最后却被日寇击败。李如松以10项罪名弹劾袁黄，导致袁黄被迫停职返乡。直到天启元年（1621），了凡的冤

案终于真相大白，朝廷追叙了凡东征功勋，封他为尚宝司少卿的官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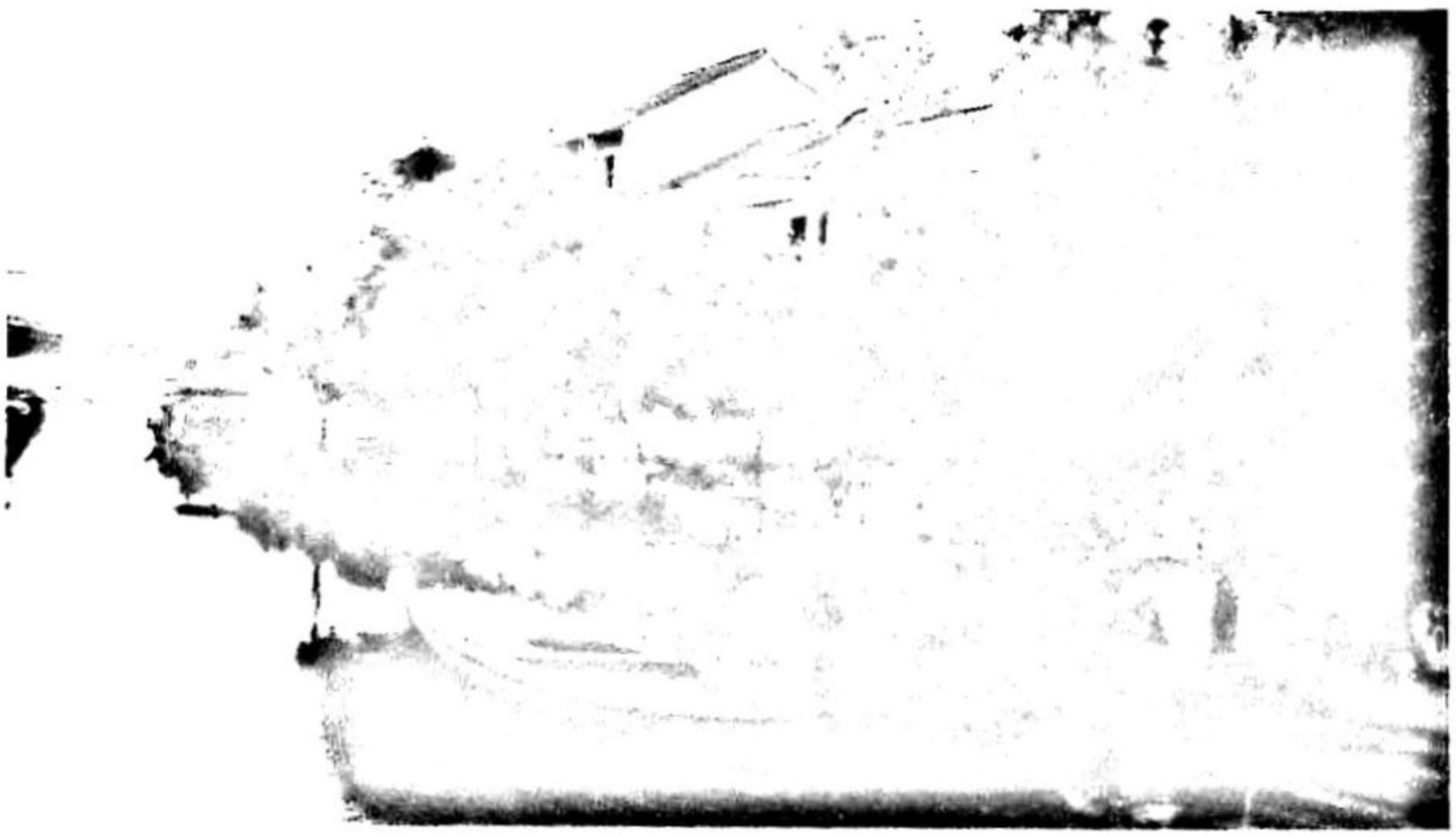
在学术方面，袁黄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在所著的养生学专著《摄生三要》中，袁黄提出了聚精、养气、存神识摄生之三大纲要。其渊源似合乎道家的精、气、神，但袁黄从医学观点进行解释，而不是一般道家所讲的玄机，且有理论，有方法，也有他自己实践的体会，至今仍不失为具有特色的养生学专著。

袁黄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吴江周边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这也与袁黄等人在人才培养和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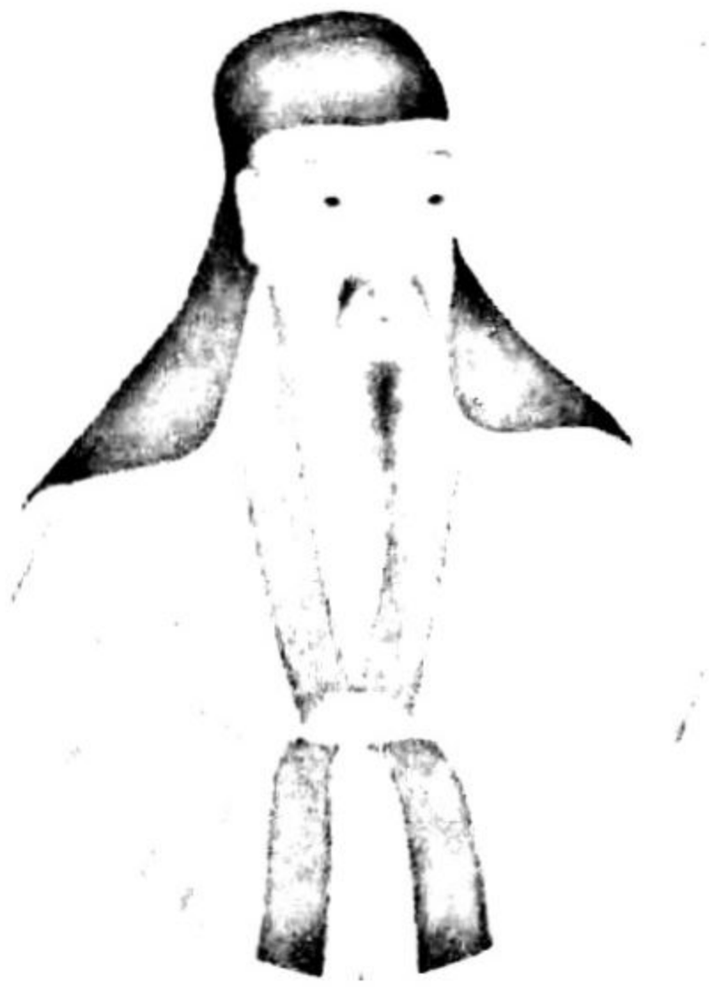
袁黄还是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他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在书中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这本书还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生活中，袁了凡通过记过“功过格”的方法，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自律。这在当时官宦之家极受推崇，并且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对江南民间慈善事业起了指导作用。袁黄与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

现在的吴江人，没有理由忘记袁了凡，我们为吴江出了这样一位先贤奇人而感到骄傲自豪，并自觉向他学习，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



芦墟赵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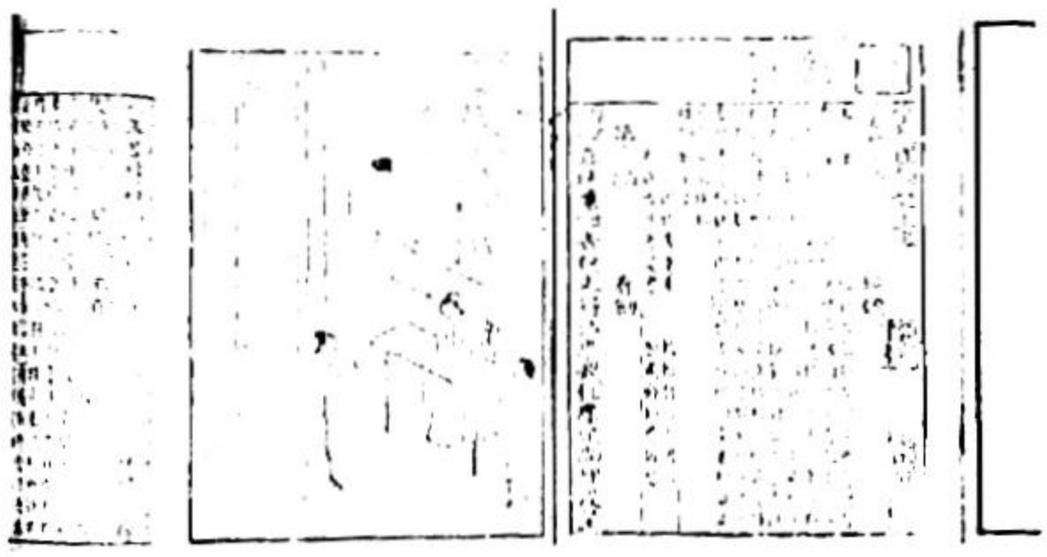
沈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5月18日宣布了首批“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名录，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9个项目入选，其中中国昆曲名列榜首。这一评选结果，令苏州人感到无比欣喜和自豪，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昆曲发端于昆山，中兴于吴江。在明代中叶的戏曲界，与汤显祖齐名的还有另一个名字——沈璟。沈璟在400多年前就离开了人间，然而，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他创立的昆曲“吴江派”却永远留在人间。

沈璟（1553—1610）明代戏曲家、曲论家。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吴江松陵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性旨，左迁吏部行人司司



《埋剑记》

正，奉使归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沈璟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璟对政治失去了热情。辞官回乡后，他决意袖手风云，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

居于乡里，他开始对家乡的戏曲活动感兴趣。吴江县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有家庭演出，有民间演出，前者如顾大典家，“家有清商一部”，“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潘柽章《松陵文献》卷九）；民间演出更多，或者是职业班社商业性演剧，或者是迎神赛会及节日期间的戏剧活动，苏州城内更是日日演剧，夜夜笙歌。在这个“歌舞之乡”的艺术熏陶下，沈璟迈上了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

沈璟边阅读，边做笔记，边思考，边写作。最终以蒋孝旧编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为蓝本，结合昆山腔调唱实践，精心摸索17年之久，终于在他54岁那年，写成了《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及《南词韵选》、《唱曲当知》等，建立了一整套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体系，被人誉为“词林指南车”。

沈璟还确立了自己的戏曲理论主张。他的观点是，剧本必须在音乐上协律，戏曲语言必须本色，通俗易懂。他的创作主张以后成为吴江昆曲创作的方向。

沈璟还强调注重舞台演出实践，直接纠正了当时“案头之曲”的创作弊病，造成了“场上之曲”创作演出的盛况，从而促进了明中叶戏曲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在明代传奇作家中，沈璟是个多产作家，他生平写过17种传奇，全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即《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沈璟的一个个戏曲剧本留在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个戏曲故事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中。

沈璟在家乡其间，专心戏曲的同时，也关心和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他曾写过一篇《吴江县重修儒学记》文章，对家乡重修儒学之举大加赞赏。沈璟还非常推崇人才，做官时为朝廷发现人才，在辞官归居后也时时为国家推举人才。

沈璟居家后一直致力于昆曲的创作与研究，积劳成疾，身体素质每况愈下。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十六日，冰雪覆盖江南，病痛交加的沈璟永远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

吴江人沈璟，像一颗灿烂的明星，闪烁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名垂青史。

袁俨

累倒在抗洪救灾第一线的知县



明天启七年（1627），一个异样寒冷的日子，令广东高要百姓提心吊胆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知县袁俨呕血不止，为高要百姓累倒在了任上，以后的洪水来袭、瘟疫突发……一切灾难的降临，已永远没有了他奔走操劳的身影，百姓哭声不绝，充斥大街小巷，此情此景，如丧父母、如失所生。

袁俨（1580—1627），字若思，吴江芦墟赵田人，是著名学者袁了凡之子。他性格直爽，为人坦诚，少承家学，博极群书，尤留心经济。诗、赋、古文，握笔千言立就。天启五年（1625）进士，就任广东高要知县。

高要县因羚羊峡有居高扼要之势而取名“高要”。高要地理位置独特，史称“当西南之要冲，扼两广之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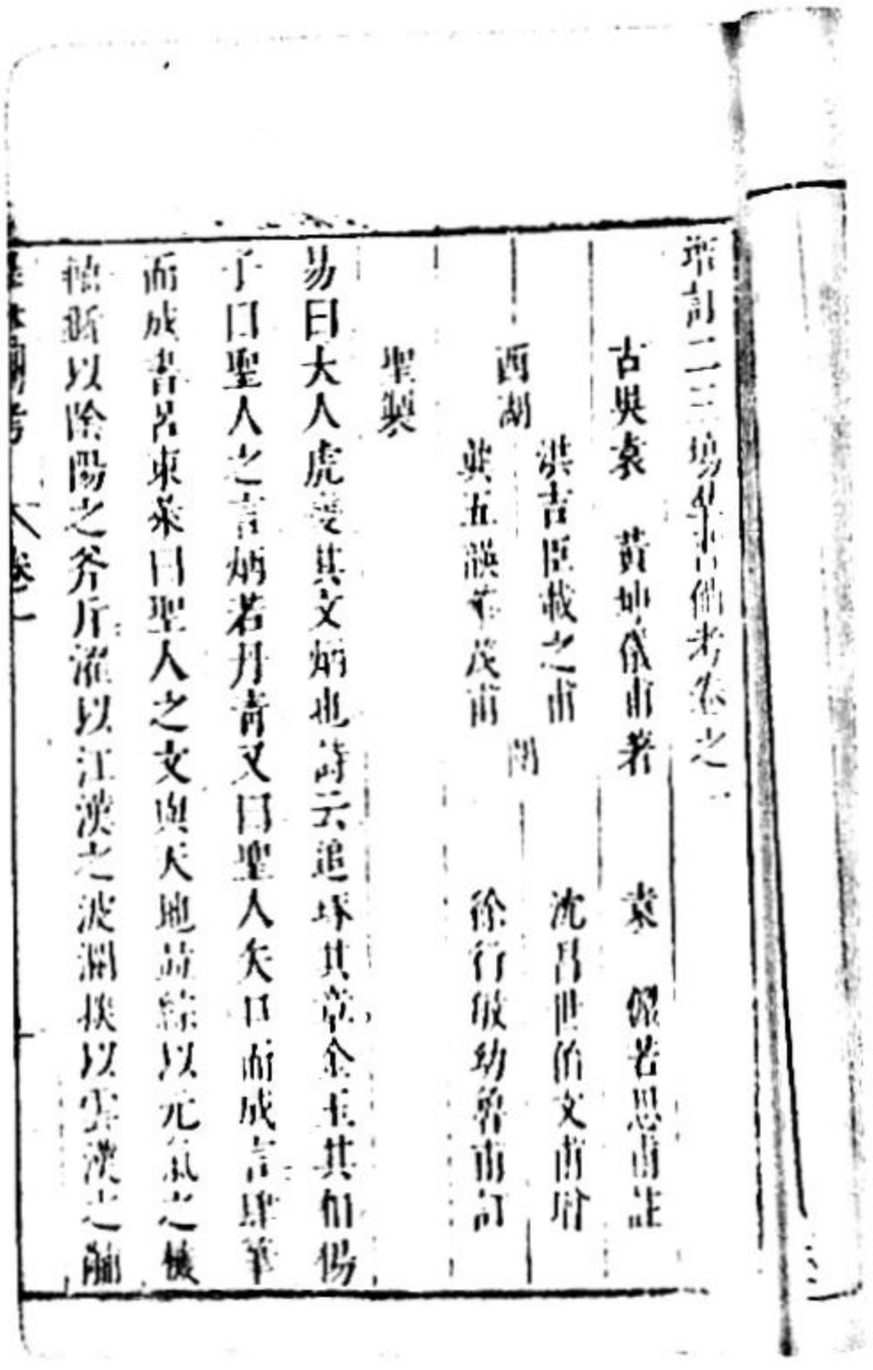
是岭南传播古代中原文化的重要通道，古时县城位于西江边上。天启七年（1627）夏季，山洪暴发，西江水猛涨，高要城中水深3尺，全县田地被淹，房屋倒塌无数，屋舍、尸体随洪峰奔涌，一泻数里，其景凄惨不堪。活着的灾民食无是处、居无定所。时值盛暑，炎热不堪。袁俨自小生长在江南水乡，深知盛夏水灾过后极易引起瘟疫，后果不堪设想。袁俨奔走在暑雨之中，竭力救援，搭席棚安置灾民，带头捐俸施粥、购置棺木，捞溺死者入殓……

人称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忙完洪灾、疫情，秋季的连阴雨又接踵而至。成熟的庄稼眼看着烂在了田里，已经收割好的堆在屋里发霉。虽然袁俨知县一再劝富家巨商捐米赈灾，但米价还是不断上涨。甚至达到无米可买的地步。他深入灾区，调查灾情，抚慰灾民，开仓发赈，忙得焦头转向。

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和超负荷地工作，原本仗着自己有伟岸丰隆、七尺男儿身的袁俨，还是积劳成疾，终日呕血不止。属下和家人无数次劝其就医、休息，但他仍抱病冲在一线，指挥救灾、赈灾，灾情终于得到了缓解，可袁俨知县也彻底病倒了。朝廷知此事，下令让他回原籍休养。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启程回归故里吴江芦墟，呕血不止的袁俨就不治身亡。他的经济才能还没有来得及在高要施展，他要为高要百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袁知县累病、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开，整个县城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高要百姓给出的肯定也是至高无上的——盖棺之日，其灵位即入名宦祠，这在高要3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

高要两年知县，袁俨献出了生命，带回的是一副棺椁、几件换洗衣物和几床被褥。落叶归根之日，家人扶柩出城，高要百姓几乎倾城而动，一路追送、一路呜咽，依依作别着这位深爱高要百姓的父母官。临别西江边码头，送行的百姓跪地嚎哭成一片，一遍又一遍地叮咛着，“袁大人一路走好，你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呐，高要离不开你啊，百姓离不开你啊”。高要县民，用最朴实的言语，送行着这位勤政为民的好知县。


袁俨作注的《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

吴兆骞

传播江南文化的使者



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千佛寺外，冰天雪地。顾贞观站立寺内，雪花飘在他的手上，冰冷冰冷。身穿厚实棉袄的他，依然感到十分寒冷。这寒冷来自东北，来自遥远的宁古塔。此情此景，又一次让顾贞观想到了自己的挚友——江南奇才吴兆骞。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号季子，出生于吴江松陵镇一个官宦之家。吴兆骞少时颖异不凡，7岁读书，9岁时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10岁写下《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后来，随父亲宦游楚地4年，终因张献忠起义，奉母归里。清兵入关后，吴兆骞归隐乡里，与江南士大夫互唱互和。顾贞观比吴兆骞小6岁，禀性聪颖，才思敏捷；尤其擅长诗词，声望与吴兆骞并驾齐驱。两人



位于黑龙江海林市的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

因文结缘，成为莫逆之交。

顺治年间，江南一带的才子齐聚苏州虎丘，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结社活动。此活动由钱谦益授意，吴梅村出面组织，目的是为“慎交”、“同声”二社调和，作二社的和事佬。当年，吴兆骞、尤侗、计东、顾贞观都是“慎交社”的重要人物。虎丘大会上，吴兆骞与诗人吴伟业即席唱和，“吴梅村嗟叹，以为弗及”。一时吴兆骞、陈其年、彭师度被并称为“江左三凤”，吴下英俊才子，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吴伟业更是对吴兆骞赏识有加，对宾客说：“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林吴兆骞，才若云锦翔”。由此也奠定巩固了吴兆骞在江南士林中的地位。

正值吴兆骞名声大振、踌躇满志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科举冤案却将这位江南才子抛入了苦难深渊。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闱科场案”，吴兆骞为仇家所中伤，遭人陷害，含冤下狱。最后查出的结论竟是“审无情弊”，但吴兆骞仍被发配到极边之地宁古塔。

宁古塔的生活异常艰辛，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江南，一个富裕家庭里走出来的吴兆骞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考验。吴兆骞终日以粗粮为食，寒冷的冬天，还要亲自拿斧头敲凿冰块来取水。

生活的艰辛困顿还能克服与忍受，精神的孤寂与内心的苦闷，更使吴兆骞痛苦不已。“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被流放的只能够用诗句化解心中的忧伤。而这一流放就是23年，期间，吴兆骞亲身投入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开馆授徒，传播知识，创作了大量爱国诗篇，还得到宁古塔将军巴海器重，任其为书记官，并教授其子课业。

洁白的雪花，飞入顾贞观眼睛里。吴兆骞被流放后，作为朋友的顾贞观为了救助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然而，春去秋来，自己的诺言一直却无法实现，好友至今还是远在边外，生死未卜。想到此，顾贞观义愤难填，挥笔泼墨，写下那篇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金缕曲》：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知

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当时，顾贞观担任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老师。纳兰性德虽出身华贵，却非纨绔子弟，且自幼聪明好学。纳兰性德在读了顾贞观写给吴兆骞的《金缕曲》，情真意切的词句，让纳兰性德感动万分，也和了一首《金缕曲》送给顾贞观，以表明自己营救吴兆骞当义不容辞：“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顾贞观趁机相托救吴一事。纳兰性德答应帮忙，后经多方运作此事，并与徐乾学等人出资救赎，终于使得吴兆骞51岁那年离开宁古塔，得以重返家园。

23年，弹指一挥间，吴兆骞终于生入山海关，回到北京后，他一直住在徐乾学家里。后来成为纳兰性德弟弟的老师。

吴兆骞很快就返回苏州故里，并在友人童年好友汪钝的资助下，筑屋三间，自己命名为：“归来草堂”。长期的严寒生活，兆骞已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竟然大病数月，后来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康熙二十二年（1683），吴兆骞复去京师。那时他已疾病缠身，一年后在贫困潦倒中逝于京师旅邸，时年54岁。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封建制度的摧残下，终化为一抔黄土。

因家境贫寒，纳兰性德为他料理了后事。吴兆骞一生著有诗集《秋笳集》8卷、《归来草堂尺牍》1卷以及与友人合编的《名家绝句钞》6卷，还有部分著作现已失传。

被遣戍宁古塔的流人，能生还的极少，大部分都客死该地，吴兆骞总算是这场大悲剧中的幸运儿。如今，站在宁古塔历史的废墟上，见到的只是斜阳古道、衰草荒烟，耳边仿佛仍然响起流人们血泪的呻吟和绝望的呐喊。



《秋笳集》

周元理

办事稳妥的栋梁之才



周元理（1706—1782），字秉中、丙衷，吴江黎里人，原籍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

乾隆三年（1738），周元理考中举人。十一年，到直隶（今京津冀及相邻地区）蠡县任知县，后又调至清苑。因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推荐，升为广东万州（今海南万宁）知府，改任霸州（今属河北）知府，调易州（今河北易县）知府。后来在担任宣化知府时，政绩突出，受到乾隆赏识，一路升官，历任清河道（驻今河北清河）、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在山东巡抚任上，他组织疏浚了小清河入海道上的浒山、清河两个湖泊，减轻了洪水对下游的压力。不到半年，又升为直隶总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组织疏浚了天津永定河、子牙河，修筑津门5闸，

增建三叉河西岸桥梁9座，增设涵洞，泄水入海河。然而最深得皇帝嘉奖的，却是他圆满会办钱度贪污案并押解钱度到热河行宫的任务。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署理云南巡抚诺穆亲下令彻查义都、金钗两矿厂财务时，管理义都铜厂的宜良知县朱一深，揭发云南布政使钱度及其三子钱鄂等仗势勒索，以后又查出钱度用国库银放债吃利息，前后放银2200余万两，获利4万余两，而从其家抄出藏银竟至10万两。此事引起朝廷的重视。三月五日，担任直隶总督的周元理得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陈焕报告，说接到河南安阳县的通报，钱度案的共犯湖南按察使法明将进京朝觐，三月十八日要到汲县（今河南卫辉），两三天就可到达直隶境内，请他协助捕获。

接到报告后，周元理紧急部署，令布政司、按察司派人，率领保定府同知沈士濂前往，在定州的清风店拿获法明，并查明家人翟玉仍在湖南任所。拿获法明后，周元理一面派候补同知金树屏、保定右营千总刘云龙，将法明及其3名家人和随带行李5驮，一并解赴云南督查衙门接收，一面行文湖南巡抚纽拿法明家人翟玉，就近解往云南收审。三月十九日，周元理将有关情况奏报乾隆皇帝。周元理在奏折中



周元理故居

称，他是从邸报（流通于朝廷与各省间的传抄小报，摘登官方的确切信息，为中国现代报纸雏形）上得到的消息，虽然当时并未接到皇上的谕旨，但是“邸抄业已通行，即与奉有谕旨无异”。

每逢夏季，皇帝都要到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办公。七月初，周元理接到上级公文，说钱度已于五月十三日，自云南省城解往热河行宫。公文中说，起解时钱度已经“气体衰弱，狼狈不堪，经由地方嘱令留心”。七月十一日，抵达直隶磁州。

钱度被押解进直隶地面后，周元理立即将钱度入境情况奏报乾隆。乾隆不想让这个贪官死于途中，他是下定决心要将其明正典刑的。因此，乾隆朱批“亦应速催至热河来”，认为“该犯既入直境，距热河程途不远”。七月十九日，乾隆又令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给周元理发出廷寄，谕令“著周元理速饬押解各员，沿途上紧催赶，务于七月二十三四解到热河，勿令迟缓”。接到皇帝谕旨，沿途各地都紧急行动起来，生怕案犯死在自己的地面上。

当时正值酷暑，天气炎热，本来可以夜行晓宿，但那样势必会延长时间增加风险，干脆还是昼夜兼程。为了延长钱度的性命，囚车上面搭起了遮阳棚，囚车里放置了冰块，还安排专人拿着大蒲扇给他扇风，饮食也尽量安排好，想方设法让钱度多吃点。为了防止上面追究，说对死囚犯照顾太好了，押解官员和沿途地方官还煞有介事地做了点表面文章。每到囚车前必先吐一口吐沫，以表示对犯人的鄙视，大蒲扇也做成了骷髅形状。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让钱度苟延残喘地一步步地靠近热河行宫。七月十八日钱度被解到保定，二十四日亥时（晚上9点—11点），钱度按时被解到热河行宫。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二十五日，钱度被斩首。

乾隆皇帝对周元理的办事作风非常满意，在奏折上朱批“如此方是大臣办事之体，可嘉也”。乾隆四十年（1775），周元理整70岁，乾隆御赐“福”字匾、上方珍物和在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乾隆四十五年（1780），周元理晋升工部尚书，因年老多病乞休，回乡不久即逝世。今黎里柳亚子故居即为周元理故宅。

沈毓桂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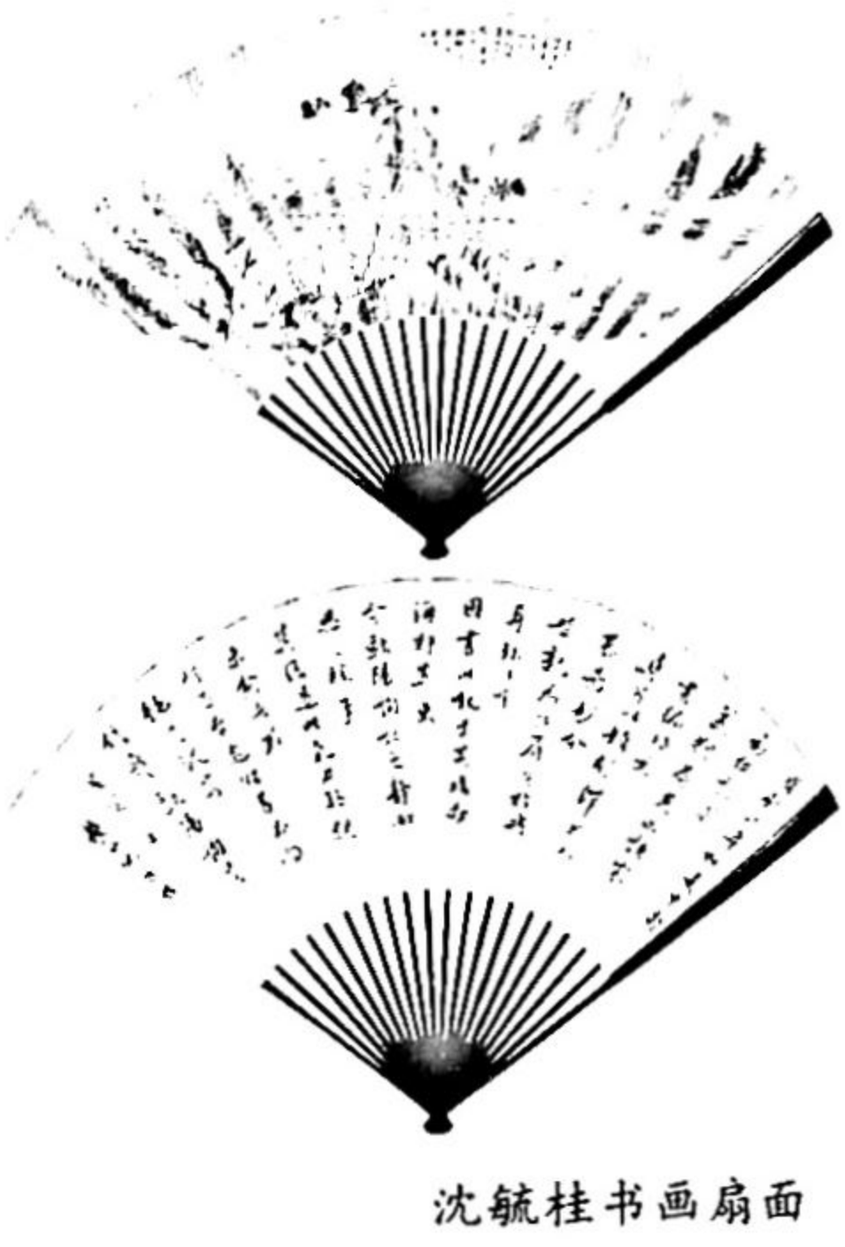
他的一生都在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懈努力，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记载了他所做的点点滴滴。他曾担任西方传教士代笔文士、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参与创办《万国公报》，与蔡尔康合编中国最早的通俗报纸《民报》，后又创办上海中西书院，与西方学者共同翻译《英国志》、《中西关系略论》、《格致探原》及天文、化学、算数、医理诸书30余种，共培养具有中西学知识人才3000余名。他就是吴江名士沈毓桂。

沈毓桂（1807—1907），曾用名沈寿康，号赘翁、匏翁、匏隐士、古吴困学居士等，祖籍松陵镇，后迁居黎里镇，清末教育家、翻译家。

沈毓桂与《万国公报》有着不解之缘。同治七年



沈毓桂全家福



沈毓桂书画扇面

（1868）九月初五，他在上海协助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了《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初五，《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光绪九年（1883）七月廿八，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停刊。《万国公报》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

在《万国公报》馆工作的近20年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蔡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自同治十三年（1874）《教会新报》更名

为《万国公报》至光绪四年（1878）三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林乐知返美至光绪九年（1883）《万国公报》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政《公报》”时期。光绪十五年（1889）《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4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10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沈毓桂“学究中西，罩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他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并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政治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显示出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光绪三十年（1904），宋耀如携长女爱琳陪去拜访97岁老人沈毓桂。当得知宋爱琳的名字后，沈毓桂捋须微笑曰：“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啊，应该有中国式的名字。”宋耀如颇以为然，请他另起名字。沈道：“女性的名字，当然应该文雅些，不若‘爱’为‘霭’，改‘琳’为‘龄’。‘霭’和‘蔼’两字通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有‘望中庭蔼蔼兮’。”宋耀如欣然接受了此建议。“爱琳”改名“霭龄”，大姐名字一改，下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相应改为“庆龄”和“美龄”了，于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宋氏三姐妹的名字得以更改。

沈毓桂还通过历次捐款资助赈灾，先后被加封为知县衔、知府衔，及三品官衔。光绪三十年(1904)年近百岁之时，经同乡官员推荐，江苏巡抚端方奏请朝廷，加封其二品官司员，准其旌表在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江苏巡抚陈夔龙根据乡绅朱以增等呈请，会同两江总督端方共同奏请，沈毓桂再被封为二品官衔。

万青选

江苏南北挂钩第一人


万青选书法对联

一向言行低调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少见地对记者夸赞说："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这一部分"。他的母亲万冬儿即是本文传主万青选的女儿，因排行十二，娘家人都称她十二姑。万青选去世前一天，1898年1月8日，外孙周恩来出世。周恩来童年听得最多的人物故事，就是外公的事迹。周恩来六岁时，万氏带他回到娘家"万公馆"定居，约有四年之久。周恩来自由出入万青选的藏书室。周恩来少年时出众的文学素养，与万公馆的丰富藏书有相当大的关系。可以说，万青选在擦肩而过的外孙身上，留下了不少"再生"的影子。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万青选曾三度在吴江任职。同治二年（1863）十月至同治四年（1865）十月担任震泽知县，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至同治十三年十月署吴江知县，光绪元年（1875）接任震泽知县，任职半年。后来万青选赴江苏淮安任职，在吴江



盛泽圆明寺桥



周恩来母亲万冬儿

任职的经验对他在淮安施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江南的富庶繁华、农耕技术的先进、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以及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水利和航运的完备和发达，促使他在回到苏北以后作出规划和部署，把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理念传授给当地的百姓。

万青选深知要百姓安定，必先农食富足。因此他到任后出主意，想办法，让民休养生息。针对清河县农民单纯种植粮食的耕作制度，“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劝导农民种植经济价值高的棉花和桑树，又从先进的江南雇技工师，教农民采棉纺纱、养蚕缫丝、织布织绸，走多种经营和学工、兴工的新路。据说，当时山阳县的河下镇到清河县码头镇“户户皆闻织机声”。万青选把江南“种桑养蚕”整个产业移植到江北，对促进淮安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了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江苏历史上“南北挂钩”第一人。

万青选（1818—1898），字泉甫，一字兰谷，号少云、少筠、少畇，晚号随庵，祖籍江西南昌，寄籍湖北江陵。曾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盐城、吴江、震泽和江清县（今淮阳市清浦区）等地做官达30余年，官至里河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驻淮安府清河县），颇有政绩。

万氏家族与苏州地区的渊源关系要追溯至万青选的祖辈。与万青选祖父同辈的万廷悟，在常熟县任知县。万青选的两位伯父万承纪和万承绍分别在元和县和长洲县任过知县。

万青选初任震泽知县时，正值太平军战败撤离吴江之时。战后的吴江满目疮痍，县内设施毁损严重，百姓流离失所。他体恤民情，为民谋利，重在休养生息。早起晚睡处理公务，日常生活极为简约。他非常重视文教，同治四年（1865），百

姓生活逐渐好转后，他便会同吴江知县沈锡华重建大成殿，在县内鼓励读书向学。同治十二年（1873），担任吴江知县期间，他又会同震泽知县李庆云，续建县学崇圣祠、明伦堂等，使县学比咸丰战乱前更具规模。

万青选还是个治水专家。吴江塘岸既是重要的水利设施，又是南北运输的交通要道，历代官府都重视维修。万青选深知塘岸对吴江生命攸关，看到塘岸年久失修，官府又无力维修，他深为心痛，便于同治十三年倾其所有俸禄捐献出来，修筑自三里桥至八坼大浦桥塘岸，共3110丈（10多公里）。

盛泽的圆明寺桥，是当时盛泽陆上连接外地的交通要道，因大水漫漶加之年久失修，一度坍塌。万青选主政时，力主修复。他亲自募捐，还采用“凡断民讼曲直，曲方输款以助桥资”，历时三年修成，直至解放前夕炸毁。

他在震泽任知县半年后，便调任南京江浦知县，一年多后，又回调淮安。差不多在此前后，万青选两房32个子女中的第十二个女儿万冬儿出生，时在光绪三年（1877），便是周恩来的生母，按《江苏通志稿》的说法，万十二姑可能生在震泽。此说，不禁引起研究者浮想联翩。

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流域十年九灾。在清河县任职期间，万青选始终矢志不渝地抓治水，他把治理太湖、运河水利的经验充分发挥出来。清江浦（今淮安市主城的部分地区）有一条明代开挖的文渠，是市民饮用水的重要水源。但至万青选任清河知县时，文渠因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水流不畅，又脏又臭。于是他具文呈报驻节淮安府的漕运总督文彬，提出疏浚文渠的请求，并得到批准。他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募民夫，疏浚了文渠，把原本浑浊的渠水变成一条清流玉带。引水不忘开源人，喝着清澈甘甜渠水的两岸民众，无不交口称赞知县万青选的修渠功德。至今，文渠还在淮安市发挥着作用。

万青选为政不尚苛察，断案公正，“而钩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无误。当盗匪蜂起，他主持修筑代圩护城；当天灾降落，设厂施粥，赈济灾民，曾“全活十多余万人”。他为官廉洁公正，体恤百姓，深受民众爱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在他逝世十余年后，当地百姓还念念不忘他的恩德，“邑人牒请大府醵赀，建祠祀之”，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光绪年间江浦有过23任知县，志书上唯一记载政绩的，只有万青选一个人。

曾施肇

乐善好施 有志于时



创办北京新亨银行和上海永亨银行。

创办北京中央医院。

创办上海闸北水电厂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创办上海育英中学和附属育英小学。

创办震泽镇江丰农工银行。

创办震泽镇初级中学。

创办震泽镇震丰缫丝厂。

……

他生命的大半个世纪生涯，是在劝募赈灾、从政外交、管理铁路交通、创办金融、兴办教育、维护佛教等事业中度过的，且桩桩件件无不留下他的光辉足迹。民国元





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年，政府设置嘉禾勋章，授予那些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他先后获二等嘉禾勋章；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一等大绶嘉禾勋章以及二等文虎勋章；并被载入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名人录》、《民国人物大辞典》。他的名字叫——施肇曾。

施肇曾（1867—1945），字鹿珊、号省之，吴江震泽人，为当地望族，世代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施肇曾祖父施右娱“敦行积学，慨然有慕于范文正公之为人”，尝“倾赀以助赈”，“凡孤嫠茕独接于前者，其危难如己在厄”。父亲施静安也是位“种善树德、有志于时”之人。施肇曾幼年受传统教育，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并在上海电报学校专学英语兼学时事。青年时，施肇曾就与施氏各子弟奔赴全国各地投入救灾赈事。光绪十七年（1891），赴直隶劝募救灾。十九年（1893），施肇曾随驻美公使杨儒赴美，后补纽约正领事官，补知县，加四品衔。此后，施肇曾还任过大清国驻印度尼西亚巴东、英国伦敦、新加坡、吉隆坡、澳大利亚惠灵顿等地的领事，并兼任驻葡属帝汶岛领事等。在国外，施肇曾目睹中西之别，“阅历既深，爱拟采他国之长，以补吾国之缺”，爱国、强国之心，从此化作了他事业的原动力。

归国后的施肇曾，参与了我国早期铁路的建设。经湖北汉阳铁厂提调，兼办京汉铁路工程、后又驻沪杭甬铁路总办、京汉铁路南段会办，督办陇秦豫海铁路事宜，任陇海铁路局局长，还兼管同成铁路事宜等。

施肇曾诚信守义，且人脉极广，在从政的同时，投身实业界和金融界，取得极大成功。1915年就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两年后为中国银行董事，创办了北京新亨银行和上海永亨银行。1918年创办了北京中央医院。1924年创建上海市闸北水

电公司。

受“崇教尚文”思想的影响，施肇曾十分关注教育。在任光华大学校董事会董事的施肇曾，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捐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建设礼堂，捐资兴建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为富国强国培养人才。1921年在无锡学宫旧址，与陆勤之等捐款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聘请前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任馆长；先后聘请了陈石道、金松岑、钱基博、周予同、吕思勉、郭绍虞、周谷城等知名学者任教，并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等来校讲学。1938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育英中学和附属育英小学。

在实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施肇曾又把眼光转向慈善事业，减灾救济、普救众生。有文记载，施肇曾“为扩义滂仁之举，凡遇各省水旱、凶荒、兵灾、疾疫，抚循噢咻，发粟授衣，不可偻指计”。如在唐文治家乡太仓，历年来“迭被灾害，贫穷无告”，乡亲们对于施肇曾的仁爱救济之义举，感怀在心，“沾润泽者，口碑载道”。

中年的施肇曾皈依佛教，热心慈善事业。1922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他被推为董事长，并捐资建造智照堂，后又修建杭州梵天寺，与王一亭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佛教维持会，维护佛教；并与叶恭绰、黄涵之等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动物保护会，宣传保护动物。

除了拥有一颗博爱之心、爱国之心外，施肇曾还有深深的家乡情结。在出行必船的江浙水网地带，纤道写满了船家的希望，也注入了船家多少的辛酸、甚至泪水。施肇曾就与南浔富绅庞莱臣捐资，筑通震泽至南浔的运河纤道，解决了逆水行舟问题；后又与人捐资重建浔震塘十二里，接筑平望、梅堰塘工，倡捐巨金，首尾五载工竣，水漱不淫，桑土以安。

要从根底上促进家乡的发展，掌握知识是首要。1923年，施肇曾与胞弟施肇基一同出资两万银元，在震泽镇创办震泽初级中学，并采用现代教学方法、管理理念，培养家乡子弟。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才被迫关闭。一位长者至今还记忆犹新地称赞他：“凡乡里兴办教育事业、社会公益等善举，无不乐助”。

与此同时，施肇曾还在震泽创办了江丰农工银行，注册资本国币20万元，他本人入股10万元。1926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施肇曾，还为家乡创办了震丰缫丝厂，为震泽丝绸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幼川 退耕还湖 造福乡民



民国的县长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勤快，唯徐幼川在任时间最长（1934—1937），在吴江留下的印痕最深，吴江的百姓们也对徐幼川县长所作的贡献，铭记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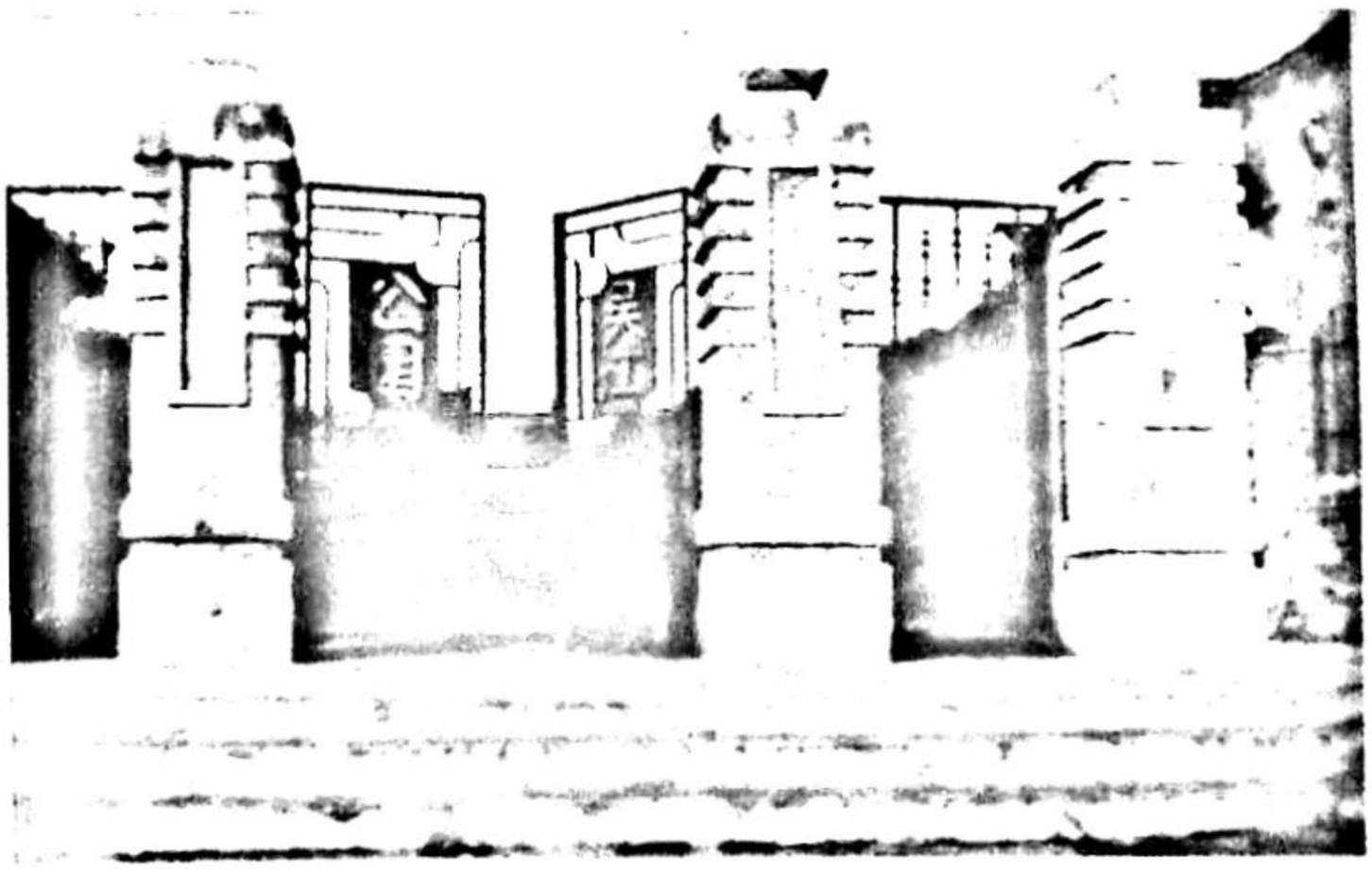
1934年，徐幼川到吴江走马上任。当时吴江县的政府前有一对石狮子伫立着，而政府宽敞通道两侧则是班房。班房与通道等宽，像个走廊，有木栅栏，所谓“坐班房”就坐在那里的长凳上。被判“坐班房”的人，常常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徐幼川觉得这样的做法实在太封建，太羞辱人了，便下令把班房栅栏拆掉了。

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的建设与得名，亦与徐幼川有关联。

吴江公园，此地原有一座被当地称为“松陵八景”之一的“七阳山”，清末期间，镇上的居民用碎砖瓦、垃圾及

疏浚市河玉带河时所出的淤泥堆积而成。到1918年间，七阳山上还是光秃秃的，时由县知事李世由和知名士绅等人先后在山上遍植松树。1923年，城中绅缙提议在此建造公园，后因经费不足而搁置。

1934年，县长徐幼川决定将“七阳山”及其周边共28亩土地辟为公园。他出钱带人在山上种植松树及修筑围墙，铺园路，绿化园地，建中山纪念堂，修四面厅，造“息楼”、亭构，以及在四面厅前凿池堆山、安置喷泉等工程，公园的格局规模开始形成，至1935年正式定名“吴江公园”。从此七阳山上松林郁郁苍苍，生气勃勃，成了松陵人的一大休闲去处。



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



昔日中山街

上任的第一年，徐幼川便坚持去各个乡镇视察，边视察，边认真做好调查报告。4月13日，县长徐幼川第一次巡视芦墟。“保卫团驻地为城隍行宫，居该镇东南端，适当要冲，建有钜厚之散兵濠墙，及瞭望台，颇足自固。”6月6日，徐县长第二次到芦墟，指出“最近芦墟镇发现鼠疫，死亡百余，实与该镇露天粪缸之到处罗列，秽气熏蒸，不无关系”。

他在视察盛泽绸业的报告中写道：盛泽绸的年销售额达百万匹以上，“三五年前，价值约近一千万元之谱”，销往长江一带汉口、长沙、四川，及福建、广东、平、津、沪、杭，远及南洋群岛。此后，他还在盛泽等地推行改良蚕农训练。在震泽开浙帧塘震泽新河，疏浚河路。

在保障江南水利事业，维护江南自然生态环境中，徐幼川也作了不少贡献。1934年江南大旱，太湖水位骤落，围田甚易，有一批客民首先树标筑圩围田。而这次围田面积之广、圩埂之坚、工程之速，绝非昔日一般农民围垦湖田可比，这些围垦侵占湖心，妨碍水道，对水利的危害非常明显。据《吴县志》载，东太湖几乎全部被客民围筑成田，围堤横梗湖中，将太湖之水与下游完全隔绝，使吴淞江、娄江水源断绝，但吴县、吴江一带人民无法引水，下游昆山、嘉定、青浦、上海农田原依赖吴淞江、娄江以及其支流灌溉者，都缺水无法浇灌。受损害农田约700万亩左右，损失不可胜计。假如遇到涝年，上游天目山一带发生大水，奔腾而下，仅有淀山湖、柳湖可以蓄积，根本不足以供宣泄，势必决堤而出，滨湖低洼各县，将被灾受淹，成为水乡泽国。

1935年6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派代表金家凤、工程师刘衷鳞、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义、吴县县长吴企云、吴江县长徐幼川与地方人士张一鹏等，会同入湖勘察围田，决定强制拆圩。当地农民因切身利益受围田之损害，对拆圩积极参与，数日内即全部拆除。徐幼川在遣散客民时，给予发放路费。

徐幼川在任职县长期间，重建吴江的北门城楼。当时800多米长、4米多宽的中山街，也由他指派修建成弹石路。此外，徐幼川还创办了《吴江县政》杂志，意义深远。

张慰慈

中国政治学的先驱



2012年10月26日，在丹桂飘香、万物收获的季节，从吴江走出去的我国政治学先驱张慰慈的孙女张旦悦，千里迢迢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回到吴江寻根。市档案局局长沈卫新、副局长王怡等热情接待，并陪同参观了市档案馆和静思园。参观中，张旦悦回忆了祖父的一生，并向档案馆捐献了有关张慰慈的照片和资料。她说这是第一次来吴江，追寻祖父家乡的景物。吴江很漂亮，城市建设很好，是鱼米之乡，今后要多来吴江走走，带下一代来吴江看看。

张慰慈（1893—1976），字祖训。中国近代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后担任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



张慰慈后人吴江寻根（中为张旦悦）。

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生产局参事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上海市长陈毅特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著有《英国选举制度史》、《市政制度》、《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说》、《政治概论》、《政治学》、《宪法》等。译著有《现代民治政体》、《妇女论》等。

张慰慈和胡适是至交好友，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上海澄衷学堂学习时期。澄衷学堂教学环境宽松，民主气氛浓厚。他们在老师吴江人杨千里（天骥）的指导下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并萌生鼓吹民主、喜谈政治的志趣。宣统二年（1910）胡适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张慰慈越过重洋给胡适寄去了一部《马氏文通》，让胡适在大叹作者马建忠“用功之勤”，对他学习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的同时，也深深感念张慰慈的良苦用心。两年后，张慰慈也到美国留学，入埃阿瓦大学，五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二人结伴回国，并一同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回国后，张慰慈与胡适一道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发挥学识专长，先后发表了《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美国委员式的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等文章。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张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在上面先后发表《制宪问题》、《市政问题》等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慰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制度、国际政治和妇女问题，他对欧洲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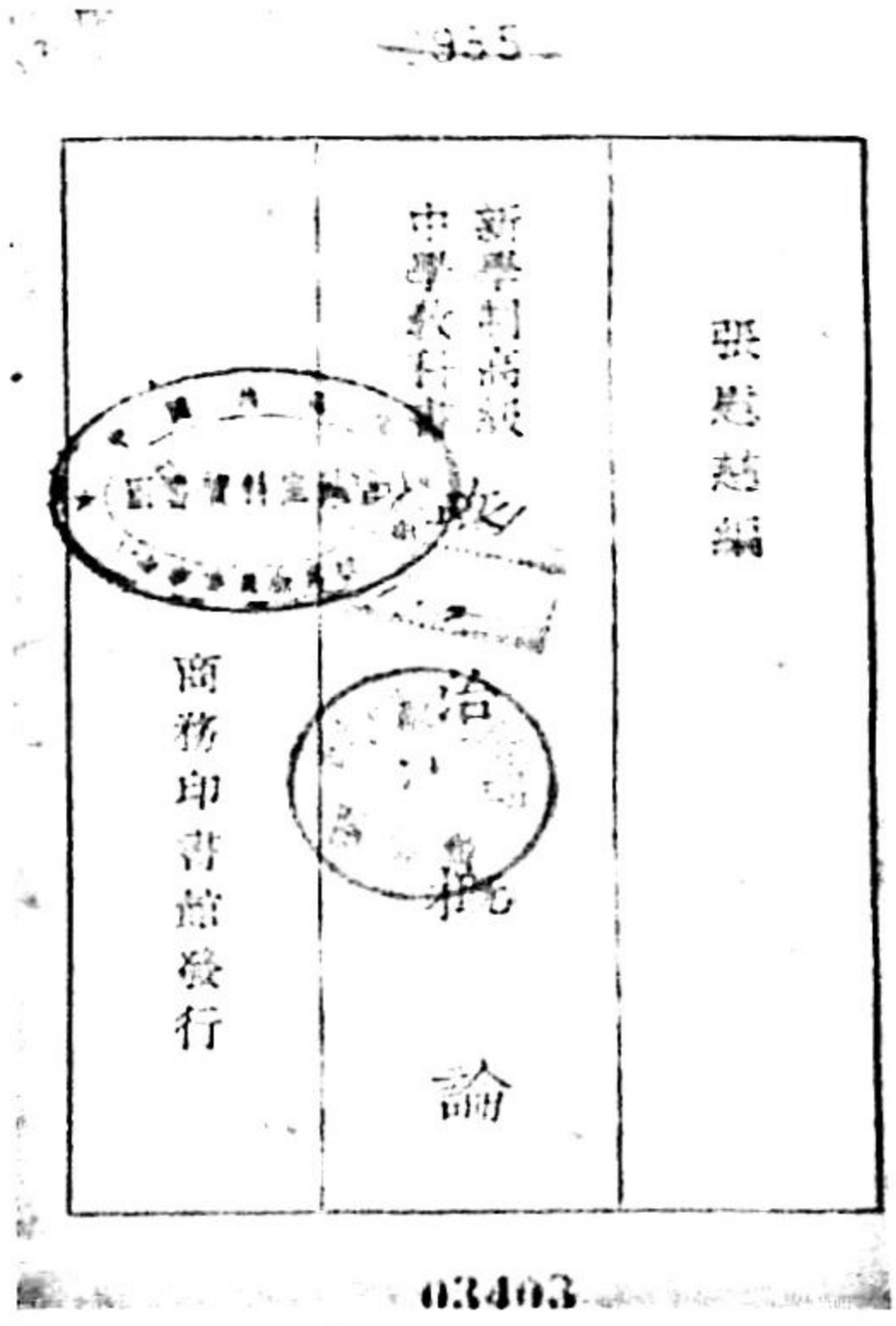
史和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作为同学和同事，张慰慈和胡适的交往十分密切。1918年11月下旬，胡适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张慰慈寄去100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胡适也将1919年10月陪同美国学者杜威夫妇到山西讲学的所见所闻和初步印象，写信给张慰慈。张慰慈与胡适一道参加了民国自由知识分子举办的两次重要的签名活动。第一次是1920年7月的《争自由的宣言》，第二次是1922年的《我们的政治主张》。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多次文字合作。比如1922年《申报》创刊50周年，该报以《最近之五十年》为题邀请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这5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当时胡适受邀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专门请张慰慈和高一涵完成政治哲学部分。张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外政治哲学的流派、变迁与分歧，完全符合编者提出的“得其至精，可以窥专科；得其大概，可以充常识”的要求。步入中年后，胡适与张慰慈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胡适每到南京、上海，都要和他见面。有时要从上海出境访问，张慰慈总是不辞辛苦地迎来送往，安排一切。

1922年，经胡适介绍，张慰慈结识了从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归来的徐志摩，遂成为好友。1925年10月，徐志摩开始担任《晨报副刊》主笔，邀请张慰慈写稿。张慰慈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妇女论》在《晨报副刊》发表。叔本华的文章犀利幽默，嬉笑怒骂，痛陈时弊，针对当时欧洲的妇女颇多贬抑揶揄之词。为了免于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徐志摩为之



张慰慈翻译的《现代民治政体》



张慰慈编写的《政治概论》

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字，“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以公正客观的角度来读这篇文章。其后，张慰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又写了《论妇女的智力》，算是补救之作。但张、徐二人的良苦用心，仍无法平息社会上的情绪化言论和人身攻击。此外，徐志摩还组织了“仇俄友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是“问题与主义”和“科学与玄学”之争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在这次讨论中，张慰慈写了两篇文章《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和《我也来谈谈苏俄》，从客观角度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区别，坦率地表达了对苏俄的看法，还用大量篇幅谈了苏俄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现在读这些文章，仍可以看到作者的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遇难后，张慰慈立刻奔赴现场处理后事。随后，他又护送徐志摩灵柩回乡安葬。这在徐志摩的朋友中，是不多见的。

1919年后的十多年间，张慰慈在学术上有着非凡的表现，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和译著，其中由胡适作序的两部极有价值。一部是1923年出版的《政治概论》。这本书原来是为高中生写的一本教科书。其最大特点正如胡适所言，是作者没有堆砌大量术语、引述新奇学说，而是以一种“平易恳切”的态度和风格，把政治科学的概念、政治制度的历史当作普通常识向读者讲述。因此胡适称赞书中“处处注重政治生活的训练和政治制度的意义”，是普通公民应该阅读的一部很好的政治学教材。另一部书是1925年出版的《市政制度》。胡适说：该书一个特别的长处，是“不偏重制度的介绍，而兼顾到制度背后的理论与历史”。在这篇序言中，胡适还介绍了张慰慈的一个观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因此能不能建设好、管理好一个城市，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据。他希望张慰慈的这本书能够引起国民的注意。张慰慈是一位善于从普通常识入手，以司空见惯的现象为基础，结合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周密论证，总结出普遍性规律的高手，而在城市问题上具有的超高研究水平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此外，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在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方面也颇有影响，他翻译的《现代民治政体》也获得后人“高手妙译”的评价。此一阶段，在张慰慈的倡导下，中国政治学界开始把市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大学里设立市政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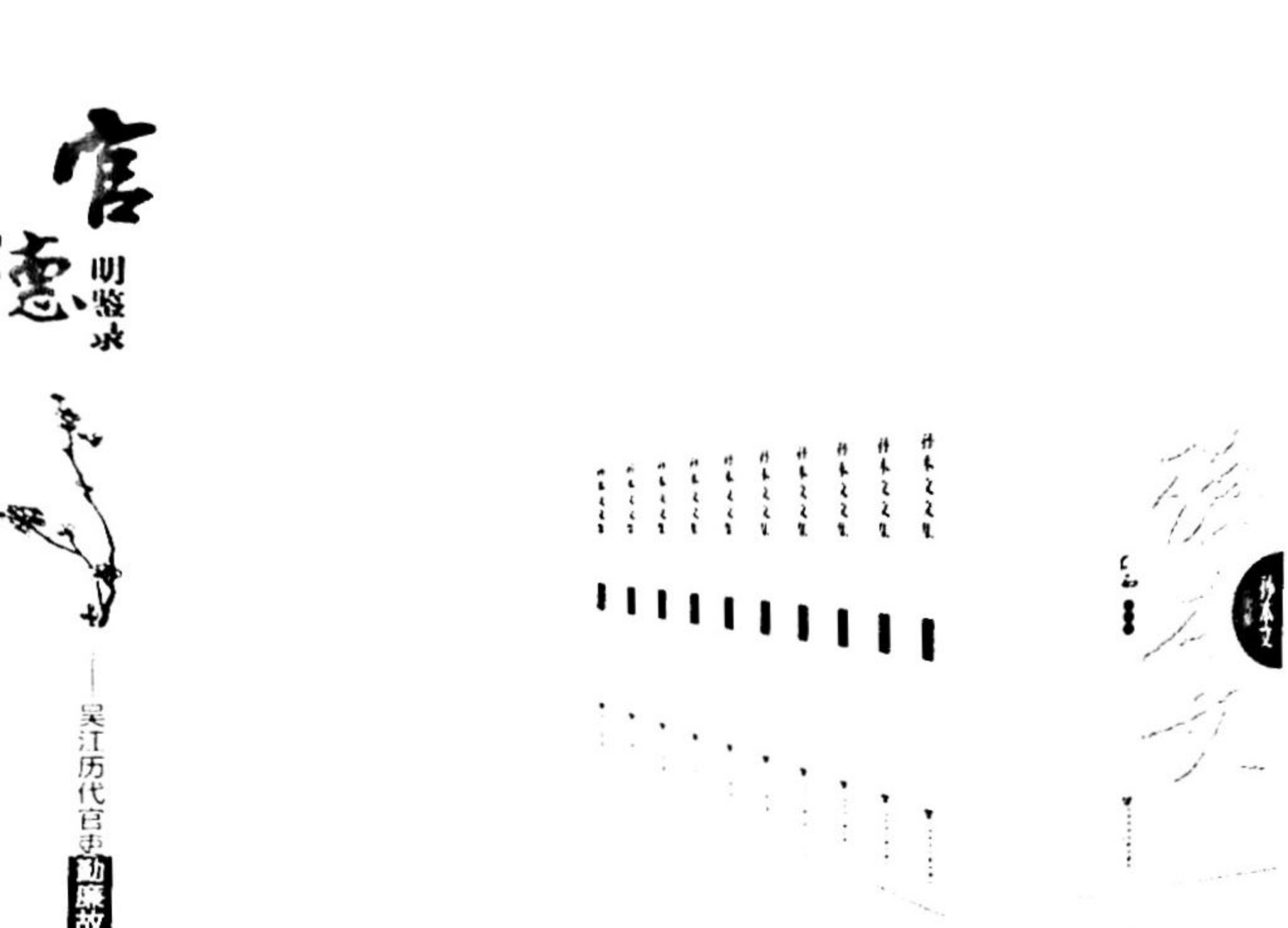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初，张慰慈离开学界进入铁道部工作，先后担任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等职务，抗日战争期间出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战时生产局参事等职。

张慰慈的妻子名叫孙孟录，号令澜，无锡石塘湾人，系出生名门，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又曾留学美国专攻美术，因此和张大千、刘海粟、颜文樑、徐志摩、陆小曼等人也交往密切。



2012年5月19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重要活动之一“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暨《孙本文文集》首发式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梁一波代表家乡人民出席纪念会并致辞。

纪念会上，孙本文先生之子、87岁高龄的孙世光先生回顾了父亲的生平。他特别提到，自己与四弟曾两次报考中央大学，均未被录取，而父亲孙本文当时就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教务长，但从未想过动用个人威望给予子女以任何便利。此后，兄弟俩通过努力，分别考取了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孙世光还提及，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孙本文在混乱局势中挺身而出，与潘菽教授一起主持教务维持委员会，把学校完整地交到人民政府手中。孙世



《孙本文文集》

光的回忆，让与会者了解到书斋之外的孙本文，体会到他的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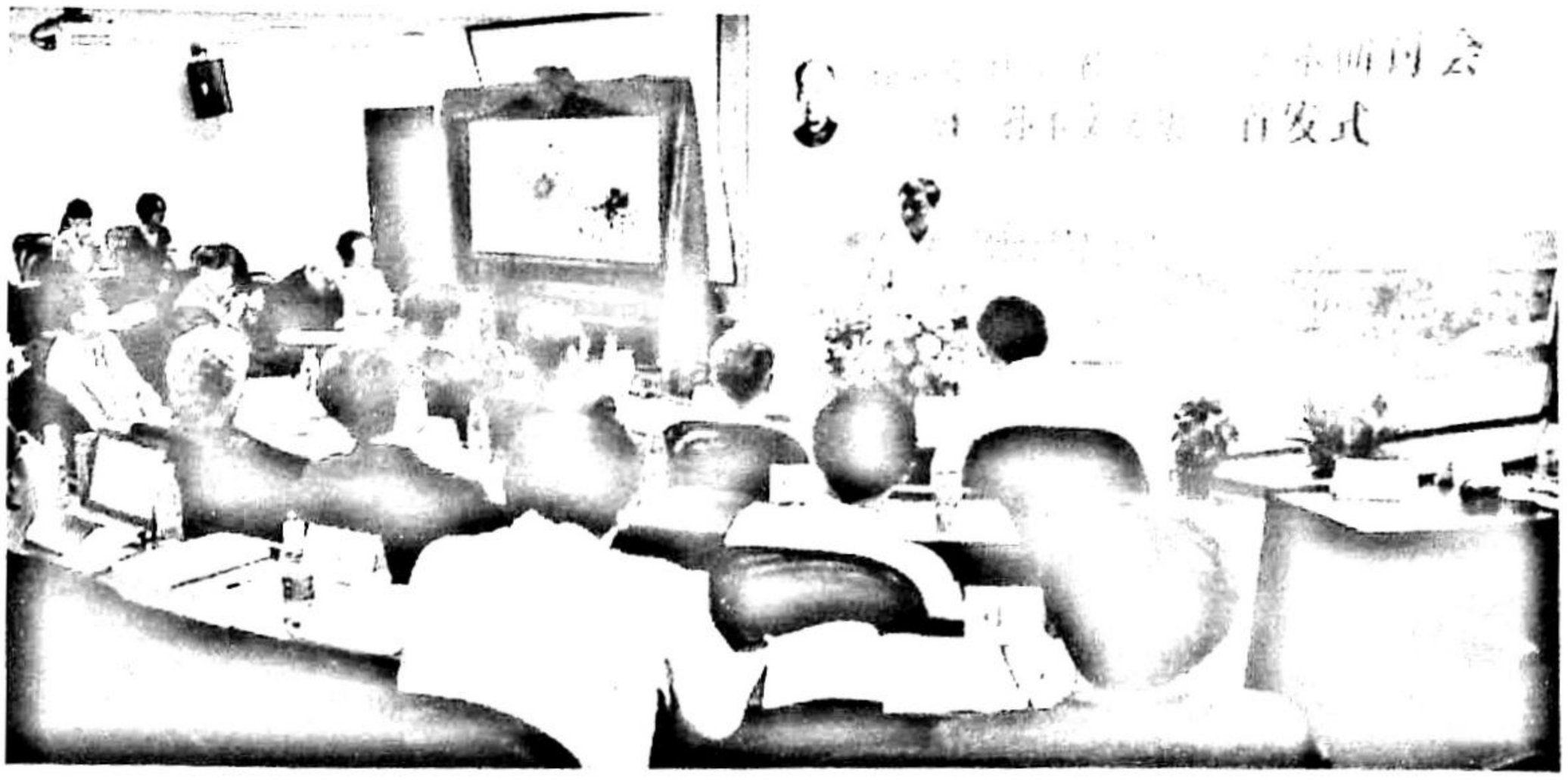
纪念会上，有学者谈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两位吴江人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功不可没。然而世人更多的了解来自吴江籍名人费孝通，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闻名世界，他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跨文化交流，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体系和各种近现代社会发展观有效融合起来。而同乡孙本文比费孝通更早意识到“文化和合”的重要性，他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将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文化沟通的超前理念融入到近代、当代的社会学的研究、发展中去。

孙本文（1892—1979）吴江七都人，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原名彬甫，号时哲，曾用名孙共。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1926年留学美国期间，获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复旦公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26—1928年在复旦大学讲授社会学，1929—1949年任中央大学教授，并长期兼任社会学系主任。1928年与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任理事一职，并主编《社会学刊》。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设社会学系后，聘孙本文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

社会学是一门横跨经济、政治、人类、历史及心理的学科。孙本文，出身寒门，却秉承教育家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钻研精神，重视社会学的中国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大量的实地社会调查和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的专著。代表作

有：《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社会变迁》、《社会学原理》、《现代中国社会问题》(4卷)、《社会思想》、《社会心理学》、《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当代中国社会学》、《人口论ABC》等。他的专著多本被列入当时著名的“大学丛书”，并且一版再版，对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社会学原理》一书被采纳为全国大学的通用标准教材，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资料，并提出中国社会学今后应从事的工作方针，为当今社会学者所称道。

1962年《英国社会学杂志》有文章声称：“可以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香港学者黄绍伦也指出：“本世纪50年，中国是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中心。”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社的核心人物，孙本文无疑是颗最耀眼的明星。他将“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民族作出贡献，并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一席之地”作为自己的目标，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发展起到关键作用。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以及1947年美国出版的《中国手册》中，都有他的简传。上世纪80年代德国出版的《国际社会学家辞典》所介绍的中国人就包括毛泽东、李达、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陈达、费孝通等。



“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暨《孙本文文集》首发式现场。

深受美国心理学派和文化学派影响的孙本文，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着力阐释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剖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强调欲改造社会即在改造文化。他综合国内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体系，主张社会行为研究，并创造了一套折衷的科学分类法。他在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也有建树，曾提出过8亿人口是中国“适度人口”的主张。1942年，教育部于全国学术界遴选确定了30名“部聘教授”（相当于现今的院士），孙本文成为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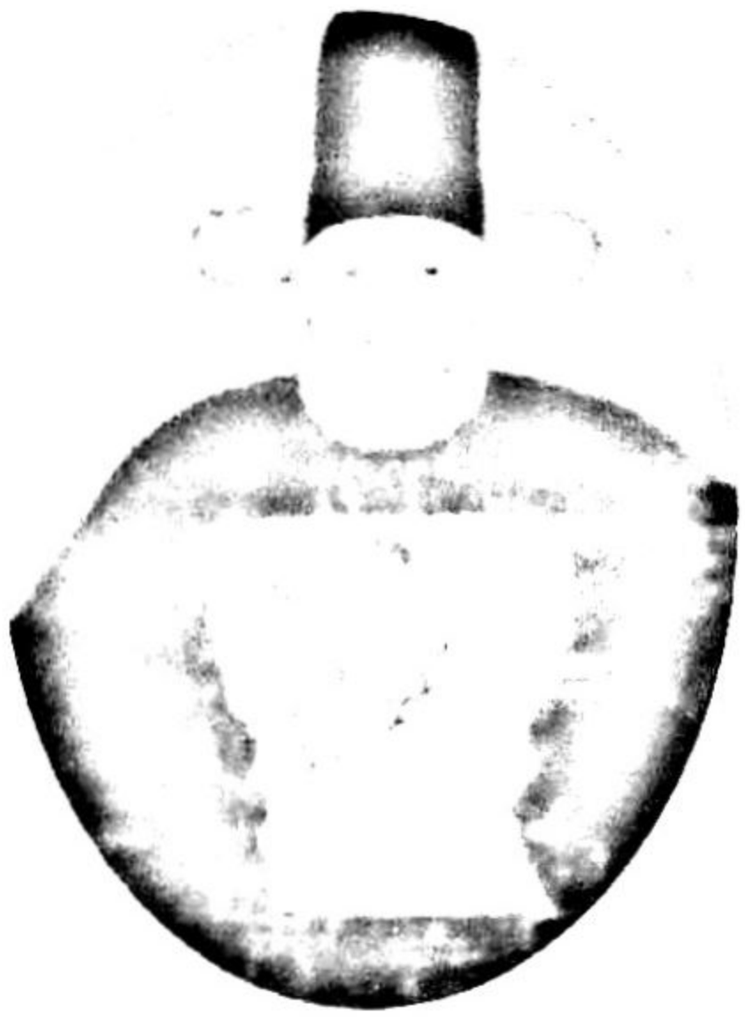
怀念一代社会学家孙本文，中国近代最权威、著书最丰的社会学者，社会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胸怀“救祖国于时艰心愿”的伟大学者，他用奇特的拼搏的一生，展现了吴江太湖儿女坚韧、谦逊、务实的优秀品质，也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敏而好学、海纳百川的科学态度。他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也是我们吴江人民永远的骄傲。

官德

明鉴录

第一章 律己以严 清廉洁

何源 东吴遗老“赛包公”



明洪武年间，广西梧州连年暴雨。那边的地势以山地为主，连续的暴雨，终于引发洪水泛滥。大片洪水涌进了梧州城，淹没了田地，导致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吴江人何源任广西梧州知府。

何源，初名德源，字幼澄，生于明洪武二年(1369)，吴江同里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被选上贡生，第二年在乡试中得第七名，会试中得乙榜第一名，授山东德州学正。历任德州知州、广西梧州知府、礼部员外郎、郎中，官至江西右布政使。

面对梧州的水灾，何源深入灾区，了解灾情，看到了百姓背井离乡的情景。大家商议要向上申请救灾款项缓解灾情，何源说：“如果按常规奏报上去，再等待朝



同里一隅

廷下发的赈济款物，到那时，百姓都遭难了，哪等得及？必须另想办法救急！”何源首先带头捐出了自己的薪俸，又劝导富裕人家捐钱捐物，提出人人都奉献一份爱心，又规定钱物分别轻重缓急开展赈济发放。此善举救活了不少受灾的百姓。

救灾工作结束，社会基本稳定后，何源就动手禁毁境内乱搭乱建骗人钱财的淫祠，禁止劳民伤财不时兴起的划船赛事。他还修建学校，制定教规条例，用文化来提高地方上的人文素质。

后来，何源转任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外放到今陕西凤翔县，为郑王府右长史。他看到郑王朱瞻垠时常流露出骄傲情绪，就绘了一幅《欹器图》进献，勉劝郑王。郑王看了这幅图若有所思，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对何源也更加敬重。好事传千里，皇帝知道后，就下令进行褒奖，并调何源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无论在哪里任职，何源始终保持以身作则，廉洁自持，跟随他的手下，也就没有人胆敢营私舞弊，形成了良好的习惯。

正统初年，朝廷要征调江西的驻军去守卫辽东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万全（今河北宣化）等地。南兵北调的说法在军队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官兵们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当时，何源正任江西右布政使。他知道后就上书说：“南方人不耐严寒，派他们到那里去后，得病、死亡的人必定很多，不如让他们就在家乡效力。”何源从实际出发，说得合情合理，朝廷同意了他的主张。何源就在原来选定的兵士中，精简掉了3000多名年少和体弱的，让其他人隶属于南昌卫服役。

何源任职期间，赈灾民，毁淫祠，修学校，这一系列善举深得民心。正统三年（1438），何源辞职回到家乡同里。他历经五朝，为政廉洁，两袖清风，人称“赛包公”。

同里镇上的遗老堂是何源的故居，他告老返乡后，一直居住于此，自号东吴遗老。终日焚香读书。家无余资，唯书籍万卷。

何源不仅政绩可赞，他的文章也称颂一时，著有《澄花集》。卒年86岁。墓地选址于遗老堂附近的长山，尚书魏骥为其撰墓志。

长山原为一片连绵丘陵，遍地花草，丛树苍翠，鸟语宛转，登高远望，碧波荡漾的九里湖中，七子长山连绵不断。同里胜景“长山岚翠”就是此地。可惜“文革”期间围湖造田，将这里的自然风景完全破坏，丘陵夷为平地。然而，明江西右布政使何源的墓至今留存于长山上，供百姓瞻仰、缅怀。

吴洪 廉明公允 刚直善断



明正德初年，南京刑部正在审理宁河王邓愈后代兄弟争夺赐田一案，原被告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但刑部内所有官吏，都在为他们的尚书吴洪捏一把汗。朝野上下都知道，前不久，兵部尚书刘大夏因痛恨太监刘瑾引诱正德皇帝沉溺骄奢淫逸，便连续千次上疏，劝告皇上，被刘瑾知道后进谗言欲治罪。武宗帝让大臣复议，众大臣都随声附和，只有吴洪和另一位大臣仗义执言，为刘大夏辩白，使刘大夏逃过一劫。由此，刘瑾这个当朝权阉对吴洪刻骨仇恨。而赐田案一方的后台，就是这刘公公！执法不阿将意味着什么，吴洪自己心里比谁都明白，可他还是惊堂木、令牌，该咋干就咋干。案毕，吴洪褪下身上的官服，毅然辞官归乡……

吴洪（1448—1525）字禹畴，号立斋，吴江松陵人，“全孝翁”吴璋的第三子。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贵州按察副使、广东按察副使巡视海道兼摄盐政、福建按察使，厘剔奸弊，矫矫有风节，正德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吴洪任南京刑部主事时，即精于法，平反冤案，担任广东巡视海道兼理盐政后，更是一尘不染，除却许多宿弊。御史王哲想修葺公署，却苦于经费短缺。按照《盐法》规定，公家是可以做生意的。这种生意可以获利数倍，但一直被权门豪族所把持。他建议，把这些生意平均摊派给商家，让他们上交一定的盈利。王御史采纳了他的意见，很快就解决了经费。镇守太监专用的4个水驿站，本来各有1艘船供他们使用，历来由地方供给。时间长了，太监反而要让地方上缴纳费用，后来又提出要另外征用船只。御史汪宗器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并追回被太监们无理收取的费用。吴洪考虑再三，为了不致引起与通天的太监们的对峙，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以防有变，建议只革除已经沿袭下来的规矩，不再追究以前强征的费用，事情被处理妥妥贴贴。官军中有滥杀



吴洪石刻像

无辜、敲诈勒索的，他捕杀首恶安抚其余，使事态平息。

弘治朝（1488—1505），吴洪转任福建按察使，在到达福建境内时，建宁、延平（今南平）正值大水，民不聊生。他以贷赈灾，帮助百姓渡过了难关，转危为安。驻守汀州、漳州的军队饷银短缺，他把征收的商税结余拿出来填补，安定了军心，稳定了社会。瑶族土司要求官府拨款解决开支。在商量时，有的官员觉得答应了这次，以后再来要怎么办？不答应又极有可能出乱子。吴洪当机立断，采用以贷款名义，妥善解决难题。

福建的珍珠自古被称为“南珠”，质地比其他地方所产的有独到之处。有些人为了巴结官府，就常常乘夜色提了来给长官送礼。一次，属下来报说有一官员求见。那官员进来后，就送给吴洪一颗珍珠，他对吴洪说：“我没什么求取，请收下此珠，不要多疑。”吴洪笑着说：“有修养的人送礼物，只要一本书就够了，何必送珍珠呢？”“凡是行贿总要夹封信，你怎么只有珠子没有信呢？”说得那官员脸红耳赤，只得把珍珠拿了回去。

吴洪在福建任上，明恕清白，断案没有冤枉的。有一次他接手一个命案：有叔侄两人一起出门，一直同行同宿。有一天夜里，因为有事，两人就分开住宿了。叔叔在桥下的客栈住宿时被人用器械杀死了。侄子认为一定是客栈老板与附近之人行凶，便告到衙门。这案子一审再审没有头绪，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吴洪亲自明察暗访，终于查明是个渔人行的凶，就把那渔人正法了，为其他人洗清了冤屈。又一次，有一富人坐便轿出门，由一家奴随行。回来时，主人为了观赏风景，便与家仆一起步行，半路上被劫道者所害。主家就将家奴与两个抬轿的人告到衙门，但几经审问都难以断定。吴洪审查了这件事，认为家奴与两个抬轿人同时从主家出发，主家都知道，而他们一起在中途杀了主人，又回主家报信，这种可能性不大。于是就去街坊里巷暗查暗访。有一个老妇向他反映，富人被害那天，她看到有个典财人的衣服上有血迹。于是，吴洪就立即派人将典财者捉拿归案，经审理真相大白。还有一次，有一个富人犯了罪，用千金贿赂吴洪的家仆吴成，遭到拒绝。吴成将此事报告他后，吴洪立即将犯罪的富人绳之以法。

在吴洪身上，后人看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良之臣的品质。其子吴山也官至刑部尚书，在依法惩治位高权重的翊国公郭勋时，被免官回归故里。史称明代父子尚书17家，惟有吴洪、吴山两代尚书都以廉明公允见称，为江南乃至整个明代官场树立了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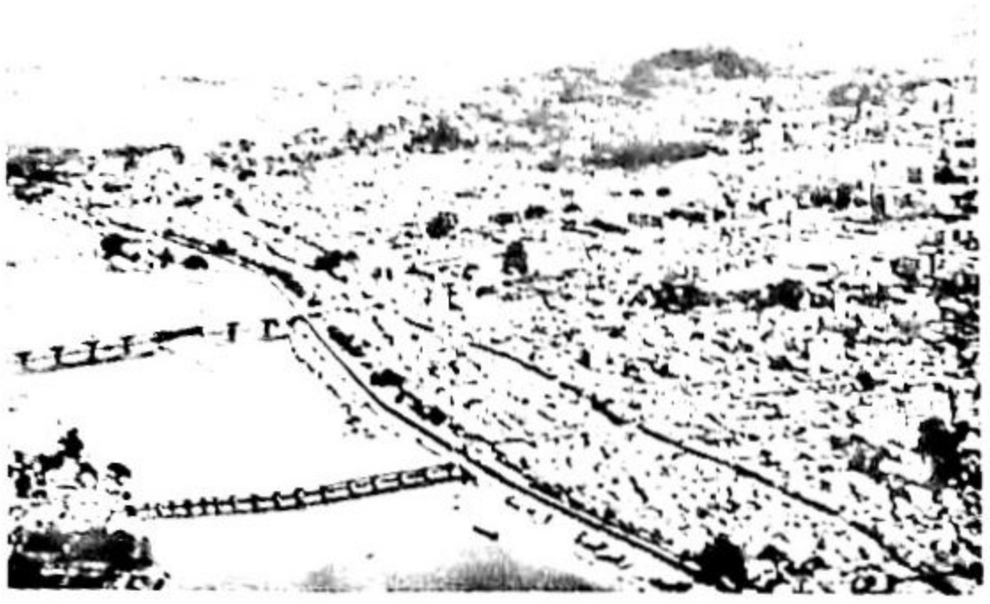
陆德如



陆德如，名金。出生在松陵镇西门外十里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全家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穷困。

在少年时代，陆德如就显得非常懂事，比同龄孩子稳重早熟，性格腼腆不大爱说话。但陆德如清楚地知道，唯有用功读书，才能报答养育自己的父母，才能改善家人的生存境况。于是，他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学习上。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明正德十一年(1516)，陆德如遂愿考中举人。次年，陆德如被授予工部主事，升迁为员外郎，出任福建漳州知府。陆德如辞别父母亲人，走马上任。

漳州靠海，有漳江经此入海，为天然良港，历来海上对外贸易发达。按照规定，只要是领取了执照，按时



鸟瞰漳州城

按货交纳了关税的商人，就可以自由进行商事活动。但是，总有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向关口上的官员行贿，动辄万金，打通关卡，以方便自己走私。同时，漳州沿海一带也时常有海盗出没。官盗勾结，抢夺民财也是家常便饭。如此下来，便形成了官吏衙役与巨商富贾勾勾搭搭，守军与海盗狼狈为奸的不良风气。

生活的苦难养成了陆德如坚强、独立、果断的性格。他到任漳州后，了解到实情，便痛下决心堵塞各种漏洞，严格海运的征税与关卡管理，限制吏胥的营私作弊，凡发现勾结运户走私漏税、收受贿赂的一律严惩不贷。陆德如雷厉风行，秉公办事的作风，及新制定的管理制度，打击了那些不法商人往日的嚣张气焰，更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时间，来求见陆德如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都想通过关系向陆大人送礼，以图新任知府对他们网开一面。

但陆德如矢志清白，不收一文钱的贿赂，更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请客、宴席。他的这些举动，使一些隶属下官的利益受到损失，更是给猖狂进行走私活动的海盗们以沉重的打击。黄日金就是参与走私活动的一名海盗。之前，海关的官吏们都被他打通，走私十分方便，陆德如的一系列管制，约束限制了黄日金的走私活动。于是，黄日金扬言要率海盗攻城，踏平漳州。

陆德如得到消息后，悄悄做好了御敌准备。当黄日金率众围攻漳州城时，杀声震天，海盗们如狼似虎向漳州几个城门发起攻击。陆德如临危不惧，紧闭城门，指挥守城官兵和市民保卫漳州。他趁海盗们喘息的机会，带兵冲出城去，会同漳州守军将领夹击海盗，包抄后路，一举抓住了为首的黄日金和大批胁从者。陆德如下令将黄日金和其他一些为首之人斩首示众，对那些被逼的跟随者，则从轻处理，也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陆德如的胜利也挑起了漳州地方及福建的官员们的热情，他们提出所有海盗一律处斩，好向朝廷汇报，多得一份奖赏。当时，又有温州府来人持函向陆德如告发，指明是某地人士为盗，要他派兵进行剿灭。但陆德如认为，下海为盗者毕竟是少数，很多人都是为生活所困，逼不得已。所以，不应该采取一律处斩的措施，应该逐一了解详情，然后区别处理，贸然派兵必定会株连无辜，就拒绝了官员们的要求。据此，漳州地方士和温州府联名弹劾陆德如，致使他被罢官回乡。

以后，陆德如又被重新起用，担任江西按察司副使。陆德如历官20年，矢志清白，尤其在漳州有口皆碑。他离开后，士民为他立了德政碑。回到家乡后，他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间陈旧的住宅，根本无钱修葺。

王国光



在吴江，存有一块碑刻《王侯去思碑》，是明代吴江人为了纪念著名的政治家、财政专家和文学家王国光而立。

王国光，字汝观，号疏庵，山西阳城人，是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改革下，明朝中叶迎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国光考取进士，从入仕起就是出名的清官。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吴江知县，到任后第一天，王国光在衙门前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山西王国光，初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如此公开自律的县官，吴江的老百姓还是第一次遇到。

王国光谨记着嘉靖皇帝在其出任吴江知县行前的召

勉谈话：吴江“人繁物阜，人繁难理，物阜易动，惟勤惟廉，庶其克之”。石碑上书写的诗句，表达了他一心一意治好吴江的决心，也表明了他惟勤惟廉为国效劳的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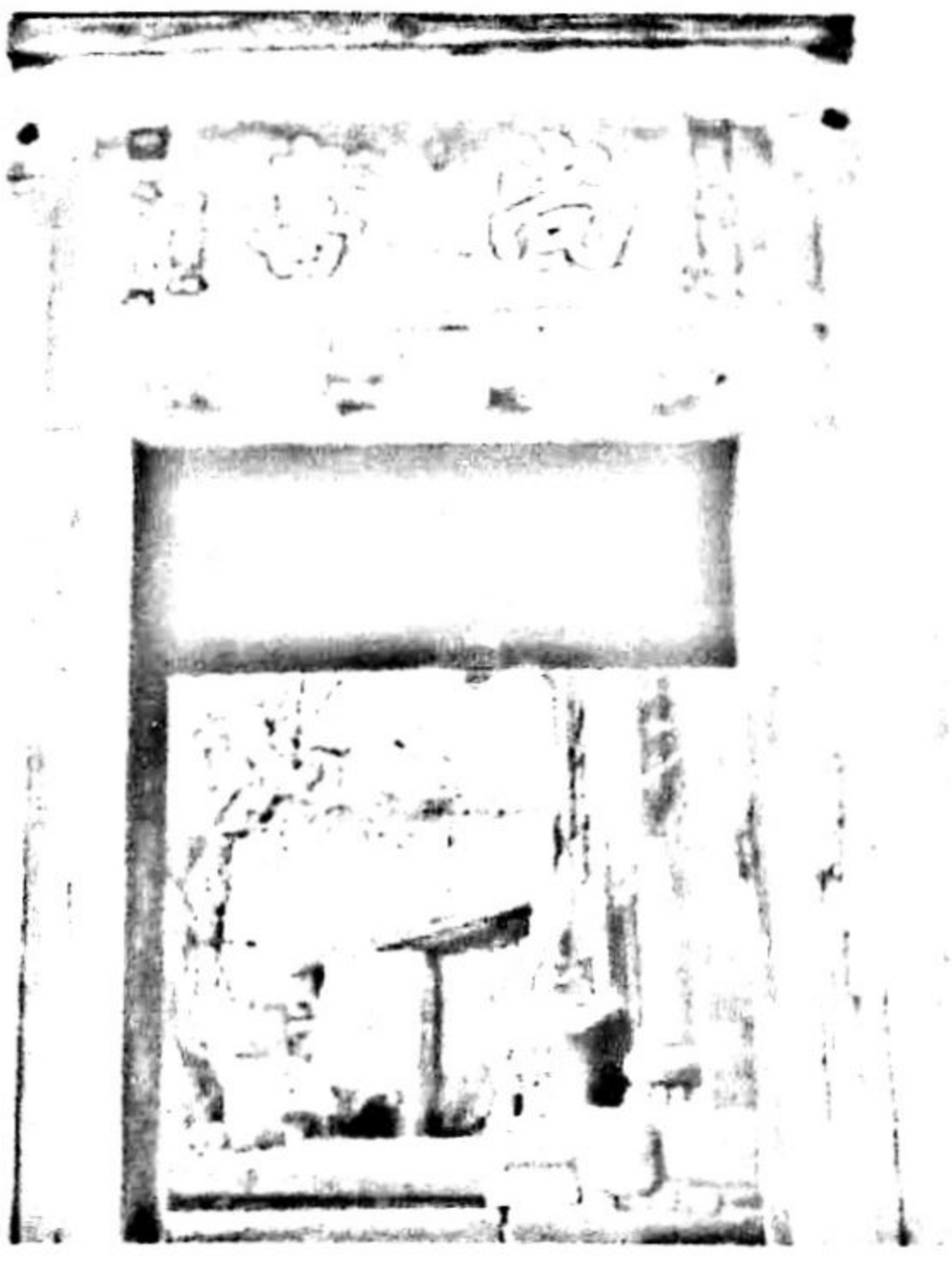
立于言，鉴于行。王国光到任吴江之后，雷厉风行，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他裁减吴江当地的赋税损耗，减轻百姓负担。上任不足两年，就裁减漕运损耗五万石。

王国光天资聪明，记忆力特强。不仅所管辖境内的各类案件都能断得清清楚楚，连邻县发生的案件，他仅凭蛛丝马迹的听闻，就能推断个分毫不差。到后来，周围县城凡有疑难事端，皆向他请教，同僚称赞他为“神明判官”！

在王国光一系列良好措施的实施下，没过多久，吴江现“古循良之风”，初显物阜民丰之态，到处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他离任吴江时，吴江众乡宦、名士100余人联名刻石，立《王侯去思碑》，以表对其挽留之情。吴江的百姓也对这位造福一方的清官、好官留恋不舍，说“遇到这样的好官，也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

在嘉靖朝，有如王国光这样能力的官员不多见，因而王国光差不多是“哪里最难办派到哪里”。之后王国光又相继在河南、直隶(今河北）各地做知县，所到之处，皆是明王朝上下公认“难治”的地方，他一如既往为官清廉，多次为民解困，所过之处，



王国光故居

皆“百姓安居，咸称其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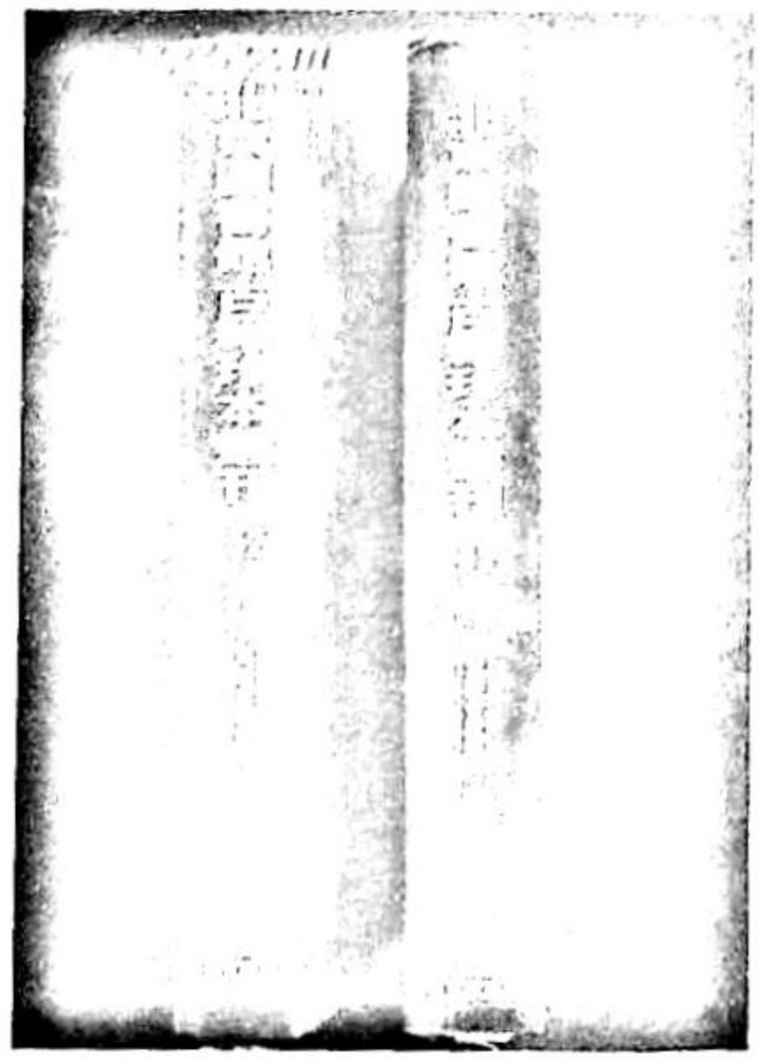
王国光为官，素来以性格刚直，为官清廉著称，而他的能力更在官场上有目共睹，比如任职吏部的时候，他可以对全国各地知县的姓名如数家珍，仅凭申报上来的一点材料，就能迅速推断出地方官的政绩优劣。

官场的几番浮沉，不足为怪。60岁的他出任户部尚书后，参与张居正的改革。他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1576)，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田赋情况辑成《万历会计录》。这是现存历代会计录中最完整的一部，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及明代中后期的田赋制度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万历十年（1582），70岁高龄的王国光致仕归家。他用神宗赐的建府之金兴学助教、建设乡里，将阳城土城改建为砖城，为百姓浚河聚水，以灌溉农田，恩泽后世，至今为人称颂。

回顾王国光的一生。当他踌躇满志，踏入官场之日，正是大明王朝日趋没落之时。正是处于这样不安定的大环境下，王国光忠君报国、惟勤惟廉的志向，更显得难能可贵。

如今，王国光已去世400多年，但在他的家乡山西上庄村，当地的百姓提起他来，仍赞不绝口。每年的正月十五，村里的人都要排演“天官回乡”的节目闹红火。而我们吴江的百姓，也永远不会忘记王国光对吴江做过的所有善举。





王国光编纂的《万历会计录》

陈九成

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



陈九成，字信斋，河南杞县人。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三甲第30名进士。是年，被派到江南水乡吴江当知县。

在吴江众多任期的知县中，陈九成的任期很短，在任九个月就染疾去世了。但他秉公执法，管束下属的巧妙方式，以及造福百姓的显著事迹，一直以来被吴江人民传颂。

陈九成刚授职时，同行们向他祝贺，还极力称赞吴江，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江是位于苏杭的腹地，吴江的知县绝对是个肥缺，而且征赋收税的工作也要比其他地方轻松。陈九成听后，淡淡一笑。对他来说，穷地方、富地方都是一样的，知县工作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



（康熙）吴江县老地图

吴江的确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当年朝廷对吴江一带的赋税征收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如所说的那般富裕，而是过得十分辛苦紧张。

据说，当初朱元璋统兵平定江南时，吴人都拥戴吴王淮东张士诚，跟着他一起进行抵抗。所以，大明王朝从洪武朝开始，为了报复不肯归顺之仇，便对这里的赋税征收特别重。据统计，吴江一个小县上交的皇粮国税，要抵上内地一个府的数额，甚至还要大大超过。一亩田的赋额是内地的十几倍。因为赋税数额大，征收的次数多、漏洞又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批从中捞取好处的贪官污吏。他们或巧立名目额外加税、或包揽刑讼，结成了上通官府，下连豪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背负着沉重的税收，勉强过生活。

陈九成到吴江后，深入各个乡镇，视察民情，了解情况。他看到大多数的百姓都面黄肌瘦，日不饱餐。等具体问及官府、赋税征收等情况时，很多老百姓都欲言又止。也有个别百姓大胆直言，向陈知县吐苦水，希望新任的知县能秉公办事，解决百姓的温饱。

经过详细走访调查，陈九成大概掌握了当时吴江的现状。一番努力后，他首先从打击豪强入手，秉公执法，公开审理案子，使得这些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豪强收敛了许多。

陈九成知道，官府与百姓的联系纽带，在于那些跑公差的吏胥。他了解到：这批吏胥在衙门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但只要一出衙门，就是天皇老子也难于约束掌控，对底层的百姓更是百般刁难。如此看来，吏胥的胡作非为直接加害于百姓。

于是，陈九成先出告示，说明公差入乡下户办事办案的方式方法，让全县百姓知晓监督。并且，他还制作了一批黑色的木签，作为吏胥出门办事的凭据，并在签背面刻上“口不饮酒，手不要钱”八个字，当作所有吏胥公差的座右铭。

与此同时，陈九成还制定了违反“八字”之戒的惩治条款。也有个别公差，不把“八字”之戒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陈九成知道后，立即按惩治条款执行，公差跪地求情，陈九成不为所动，凡违反条例者一律严惩。

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约束了吏胥，限制了他们的非法行为。严厉的惩治条款保证了“八字”之戒的实施。这样一来，当差的下去再也不敢随便伸手，也不敢大吃大喝、吆五喝六了。这在无形中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当地的百姓无不拍手称赞。

400多年前，陈九成提出“口不饮酒，手不要钱”这八字之戒，不仅造福了吴江的百姓，而且对今天的政府官员同样有深刻的启示。

沈璟 秉公办案 为民伸冤



吴江自古文人荟萃，达官名宦历朝尽有。沈璟，这位两袖清风、曲艺双馨的明代先贤，以他那清正廉明的为官之态，以及曲艺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流传。

沈璟，字孝通，又字子勺、子与，号定庵，南直隶苏州府吴江人，光禄寺丞沈璟之弟。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进郎中，后任江西佥事，两年后乞归。家居十八年后，被荐补广东佥事，刚入境即病逝，卒年55岁。

在刑部期间，沈璟断案尊重证据事实，审理了一系列的冤案错案，不但为被害者伸了冤屈，同时也给了深藏的罪犯给予应有的惩罚。武宁王徐达裔孙徐绳勋的孙



（康熙）吴江县老地图

吴江的确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当年朝廷对吴江一带的赋税征收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如所说的那般富裕，而是过得十分辛苦紧张。

据说，当初朱元璋统兵平定江南时，吴人都拥戴吴王淮东张士诚，跟着他一起进行抵抗。所以，大明王朝从洪武朝开始，为了报复不肯归顺之仇，便对这里的赋税征收特别重。据统计，吴江一个小县上交的皇粮国税，要抵上内地一个府的数额，甚至还要大大超过。一亩田的赋额是内地的十几倍。因为赋税数额大，征收的次数多，漏洞又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批从中捞取好处的贪官污吏。他们或巧立名目额外加税，或包揽刑讼，结成了上通官府，下连豪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背负着沉重的税收，勉强过生活。

陈九成到吴江后，深入各个乡镇，视察民情，了解情况。他看到大多数的百姓都面黄肌瘦，日不饱餐。等具体问及官府、赋税征收等情况时，很多老百姓都欲言又止。也有个别百姓大胆直言，向陈知县吐苦水，希望新任的知县能秉公办事，解决百姓的温饱。

经过详细走访调查，陈九成大概掌握了当时吴江的现状。一番努力后，他首先从打击豪强入手，秉公执法，公开审理案子，使得这些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豪强收敛了许多。

陈九成知道，官府与百姓的联系纽带，在于那些跑公差的吏胥。他了解到：这批吏胥在衙门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但只要一出衙门，就是天皇老子也难于约束掌控，对底层的百姓更是百般刁难。如此看来，吏胥的胡作非为直接加害于百姓。

于是，陈九成先出告示，说明公差入乡下户办事办案的方式方法，让全县百姓知晓监督。并且，他还制作了一批黑色的木签，作为吏胥出门办事的凭据，并在签背面刻上“口不饮酒，手不要钱”八个字，当作所有吏胥公差的座右铭。

与此同时，陈九成还制定了违反“八字”之戒的惩治条款。也有个别公差，不把“八字”之戒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陈九成知道后，立即按惩治条款执行，公差跪地求情，陈九成不为所动，凡违反条例者一律严惩。

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约束了吏胥，限制了他们的非法行为。严厉的惩治条款保证了“八字”之戒的实施。这样一来，当差的下去再也不敢随便伸手，也不敢大吃大喝、吆五喝六了。这在无形中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当地的百姓无不拍手称赞。

400多年前，陈九成提出“口不饮酒，手不要钱”这八字之戒，不仅造福了吴江的百姓，而且对今天的政府官员同样有深刻的启示。

沈璟 秉公办案 为民伸冤



吴江自古文人荟萃，达官名宦历朝尽有。沈璟，这位两袖清风、曲艺双馨的明代先贤，以他那清正廉明的为官之态，以及曲艺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流传。

沈璟，字孝通，又字子勾、子与，号宁庵，南直隶苏州府吴江人，光禄寺丞沈璟之弟。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进郎中，后任江西佥事，两年后乞归。家居十八年后，被荐补广东佥事，刚入境即病逝，卒年55岁。

在刑部期间，沈璟断案尊重证据事实，审理了一系列的冤案错案，不但为被害者伸了冤屈，同时也给了深藏的罪犯给予应有的惩罚。武宁王徐达裔孙徐绳勋的孙

于徐某，寻花问柳无恶不作，败坏门风，长辈们在夜间趁其熟睡时将之勒死。死者母亲为了遮人耳目，就诬告家奴杨凤与女婢春娥因为私通且行败露而杀死主人。当时的审案官员听一面之词，不问缘由就将两人判了死罪。沈瓒在复审时，找出诸多疑点，终于还了两人的清白，惩治了真正的凶手。

朱邦奇嫌其儿子上不孝敬长辈，下不照顾兄弟姐妹，父子俩在发生口角时，一失手将其打死。事情被街坊出首告到官府，初审官怀疑是朱邦奇特别宠爱的小妾所生的儿子所为，理由是兄弟俩为了争夺财产，弟弟杀了兄长，就贸然判弟弟死罪。沈瓒接案后，最终审理清楚，按律定了朱邦奇的罪。他在刑部几年，类似的疑案被他明断不少，解脱了冤屈者，伸张了正义。

沈瓒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物质的诱惑面前始终坚定不移。万历十九年（1591），沈瓒被外放为江西按察司佥书，让他去署理某州的盐政。照理这是个肥缺，日常往来的节余数目相当可观，可以归他任意支配，或者干脆归他所有，但他硬是一尘不染。他觉得，在这种位置上迟早要被人拉下水，宁愿不做这个官，也不肯自毁一世清誉，于是呆了二年就请求解职回乡了，当时他才37岁。

沈瓒回乡家居18年，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但他从不为个人事情到官府去走后门，但碰到大事又敢于仗义执言，毫无顾忌。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江发大水，连高田都淹没了。他上书太子少保王锡爵请求蠲免征赋，发放赈济。沈瓒又提出救灾方略12条，县里照此办理，救活了无数性命。

沈瓒一生以节俭为本，接待宾客礼到为止，从不铺张，但周济困难却从不吝惜。族叔沈佐坐了冤狱，他为之奔走10余年，终于把案子翻了过来。沈佐死后，他不仅掏钱安葬，而且抚养遗孤，还把自己的家产分一半给他们。其兄沈璟沉湎于戏曲，两个儿子濒于失学。他亲自对两个侄子进行教授，后来都成了名。

沈瓒为人礼贤下士，视家奴仆人为亲人。他的老仆人秦卿没有后人。万历三十年（1602），老人在弥留之际，一定要将自己名下200亩田产送给他。沈瓒坚决不肯接受，与老人商量后，把田产作为族人的衣食靠山，亦不枉老人一片好心。安葬好老人，他捐出自己的数十亩田，加上各房捐助的共430亩，作为义田，捐出庄房作义庄，作为贮米的仓库。这些田，经历了三代70年，许多贫困的族人都赖以渡过难关。

沈瓒和其兄沈璟同为当时吴江派戏曲作家的代表。所作今见《太霞新奏》等曲选中，兄弟二人之下，沈家后人在戏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为昆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沈瓒存世著述有《定庵尚书大义》、《节演世范敷言》、《近事丛残》、《静晖堂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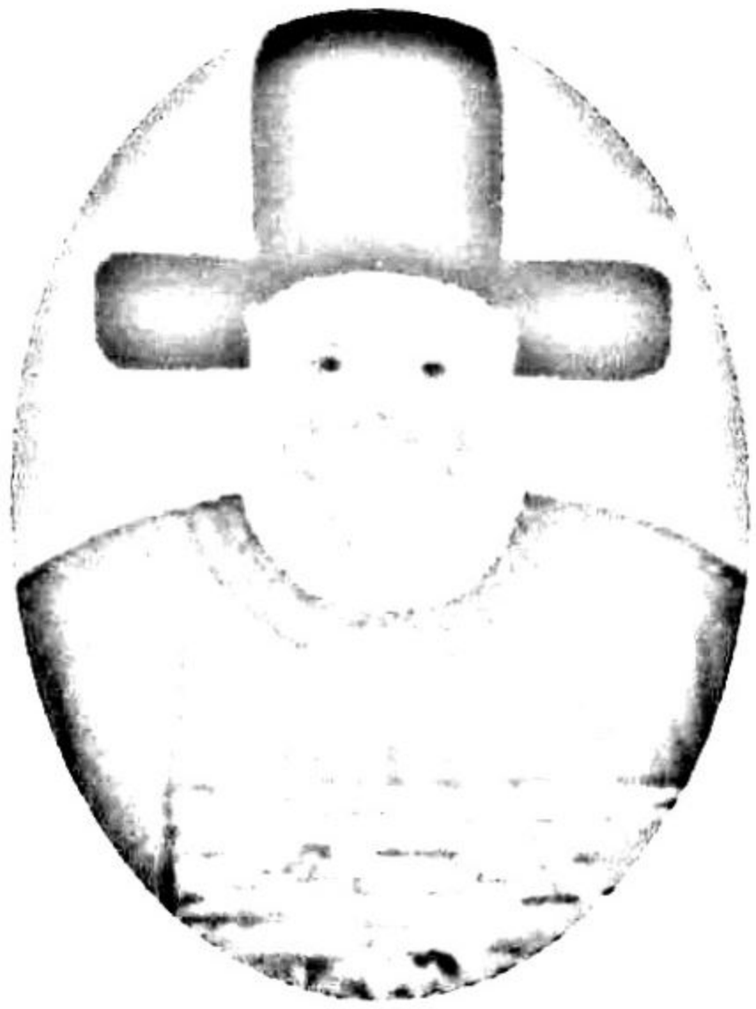
万历四十年，沈瓒被任命为广东按察司佥书，由于不适应南方湿热气候，刚进入广东就一病不起，竟在半路上去世了，一代才子，就此陨落。



《近事丛残》

吴默

清廉刚正“吴铁汉”



吴默（1551—1637），字因之，明万历进士，吴江七都人。吴默资性沉稳敏慧，喜好静悟，以经学名于诸生间。万历二十年（1592）会试第一，官至太仆寺卿。

吴默为官清廉，正直不阿，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品德高尚，朝廷每年要举荐有才能的官员，地方上第一个就推荐他。他在礼部任职时，有个无锡人登门拜访，并奉上价值千金的珍宝送给他，想请吴默帮忙上疏说情，以便让他能够世袭父亲的官位。吴默严辞拒绝，说道：“你如果应当得到世袭的官位，我会上疏的，这是我职责之内的事，为什么要行贿呢？”被拒绝的无锡人不死心，固执地几次来找吴默，吴默都坚辞不受，决不为利益所惑。



七都洪恩桥



位于苏州山塘街普福禅寺旁的“义风园”（五人墓）

识人识性，明辨是非的吴默，曾留下一段仗义直言上谏贪官的佳话。当时任吴江知县的刘时俊，廉洁爱民，体恤百姓，为官在吴中一带口碑是最好的。但在一件运输事件中因替老百姓讲话而得罪了一位漕卒，被督漕李三才向上诬告。吴默刚到尚宝司任职，与刘时俊并不相识，但他很早之前就听说刘时俊的贤名，就找到河道御史为刘时俊讲话，御史将李三才状告刘时俊的奏文拿出来给吴默看。吴默仔细看过，说“为了百姓受过，就是这个知县贤惠的地方。”吴默认定刘时俊犯的是莫须有的罪，于是他再次向朝廷为刘时俊鸣冤。

时任吏部尚书孙玮了解情况后，采纳了吴默的意见，仅罚了刘时俊两个月的俸禄而没有罢他的官。此后，吴默还向皇帝上疏揭发李三才的奸恶。三年后，李三才贪污事件东窗事发，人皆佩服吴默有先见之明。

吴默后来寓居同里镇，因为他仗义执言，刘时俊经常驾着小舟，带着书童去看望他，同时向他请教政事的得失，做事的利弊，吴默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刘时俊，这样，刘时俊治理吴江的名声越来越好。

吴默生性耿直刚烈，他看不惯的人决不交往。魏忠贤的党徒崔维华，后来也到吴江当知县，吴默看不惯他的为人，态度鲜明地表示不会与他有交往。“崔维华如要挽我，我一定逃之深山。”吴默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天启年间，朝政腐败，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镇压江南东林党人，苏州的周顺昌等五位义士挺身而出，慷慨就义。崇祯七年（1634），83岁高龄的吴默带头出资率众人安葬周顺昌等五人于虎丘山塘的普惠祠内，并立了墓碑，以作纪念。

吴默在晚年把家迁到了苏州城，当时从知府到巡抚，不少官员都登门向他请教，但凡民间疾苦，他仍都要关心过问。因为有他在，吴中的豪贵都不敢为非作歹，他成了当地一位不在官位的督察大臣。吴默清廉刚正、直言敢谏，被人们称为“吴铁汉”，而他的高洁操守也一直为后人传颂敬仰。

沈琉 两袖清风 甘于清贫



沈琉，松陵镇人，从小就聪明伶俐，前程被长辈们格外看好，所以童子试时，外公孙某特意嘱托督学选拔时进行照顾。沈琉听说后认为这不是靠真才实学去求得的功名，就推说生病，拒绝参加考试。

沈琉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沈琦，沈琦平时督促沈琉的学业，兄弟俩相互学习和帮助，之后他们又一起去参加考试。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发榜时，沈琦、沈琉兄弟俩同时考中三甲进士，沈琦中了第90名，沈琉中了第170名。兄弟同科考中进士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地方上也感到荣耀，家里更是高兴得欢天喜地，为此大摆宴席庆祝兄弟俩高中，贺客盈门，着实热闹了几天。

沈珫考中进士后，因为父亲沈倬早逝，母亲生病，就主动担起侍奉母亲之责。直到母亲去世，守孝期满，才补安徽凤阳府学教授，转南京国子监学正，迁刑部主事，升郎中。后经吏部郎中张凤翔推荐，他出任山东东昌府（今聊城）知府。

上任不久，沈珫就了解到一个情况，当地历来将税银的节余留给吏胥公用，用税银的节余去贿赂上司。他对经办这件事的吏员说："我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会用这笔钱去馈赠别人，税银节余是百姓为了解决官府临时急用的，你们不劳而获成何体统。"这样一说县内就没有欠交税银赋粮的，取消了这种陋习，贿赂之风遂绝，僚属也纷纷效仿。

沈珫任职期间遇到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有一个姓张的人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却没有人敢碰他。就因为他的侄儿是当朝吏部郎中张凤翔，他打着这个侄儿的旗号经常做坏事，胡作非为。沈珫接到当地人告发张某的状纸后，做了认真调查，最终判定其确实有罪。他并没有因为张凤翔是推荐自己的人而徇私放任，而是按律法将他的叔叔治了罪，他认为这是对张凤翔的最好报答。

沈珫为了使上下办事减少



沈珫石刻像

差错，他每月与府中的少傅朱延禧碰头，了解情况，兴利除弊。民事诉讼到堂，他都用礼义加以开导，让双方回去自首，不加刑罚。他从政以仁义为本，审案不用刑，凡是没有触犯大律条的都适当网开一面。由于他的良好治政，当地老年人都告诫子孙不要犯事，别让沈知府为我们操心。逐渐东昌府的监狱里长满了草，衙役们也不再摸刑具。从这些方面足以看出沈珙宅心仁厚，不乱用私刑，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沈珙为政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万历四十一年 (1613) 春，福王朱常洵离开京城就藩洛阳。往常随行太监们都要乘机在地方上敲诈勒索，而此次途中正要经过临清。沈珙就提前通知商家到时歇市。太监们到了后一无所获，很快就离开了。沈珙不仅关心百姓更是重视生员的学业和文章，经他选拔的六人，到了秋试都被选中。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沈珙任满，考绩名列第一，升为山东按察副使，负责兖东道。时兖州旱蝗大灾，又有刘好问、孙可训作乱，僚属都借故不作为。他先将家室安置回江南，而自己则在属地身兼数职大刀阔斧办事，开仓赈灾，擒杀罪魁，捐俸设常平仓，招抚逃荒的士民回来，使人口没有太大的减少。第二年麦大熟，他就辞职归居吴山（今属吴县越溪）。兖州的士绅百姓都拉着他极力挽留，最后他只好乔装改扮，换了坐骑才得以离开。

回到吴江后，沈珙即隐居在吴山，足不入城，直到万历四十八年 (1620) 七月，神宗朱翊钧驾崩，才出山吊唁。当时，吴江知县康元和听说他与应天（今南京) 巡抚王象恒认识，想请他帮忙美言几句以求进身，赶到山中却终不得见面。后来，从虚掩的门缝中见到沈珙轩昂的仪态，不觉自惭形秽悄悄而归。

沈珙在任上注意节俭，衣食行止从不铺张。他不像有些官员那样使用仪仗队招摇过市，只是乘坐简单的轿子，在供官员休息的地方用餐，他都自己付账。他当官20年两袖清风，没有积聚金钱，结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供养不起，只好寄养在别人家里。他的行为也影响了子女，女儿沈宜修不贪富贵，甘于清贫，与丈夫叶绍袁潜心诗文，在历史上留得了清名。沈珙61岁卒后，入祀沂州（今临沂）、东昌名宦祠。后人为了纪念沈珙贤廉，于清道光七年（1827）刻沈珙石雕像，成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叶绍袁 午梦堂中一名士



在中国文学史上，叶氏午梦堂作为一个文学群落，一种文学现象，四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关注。流传于世的《午梦堂集》有九种版本，其中收录了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及其七子四女十三人的大量作品，记录了叶纨纨、叶小鸾、叶小纨等留芳文坛的才情。而成就这一切的家长叶绍袁功莫大焉，他不仅是出色的文学家，还是尽职的官员，不妥协的反清义士。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晚号天寥道人，吴江北厍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

崇祯元年（1628），经过大半年对朝廷上下悉心治理的崇祯帝，把目光转向了辽东边防，感觉那才是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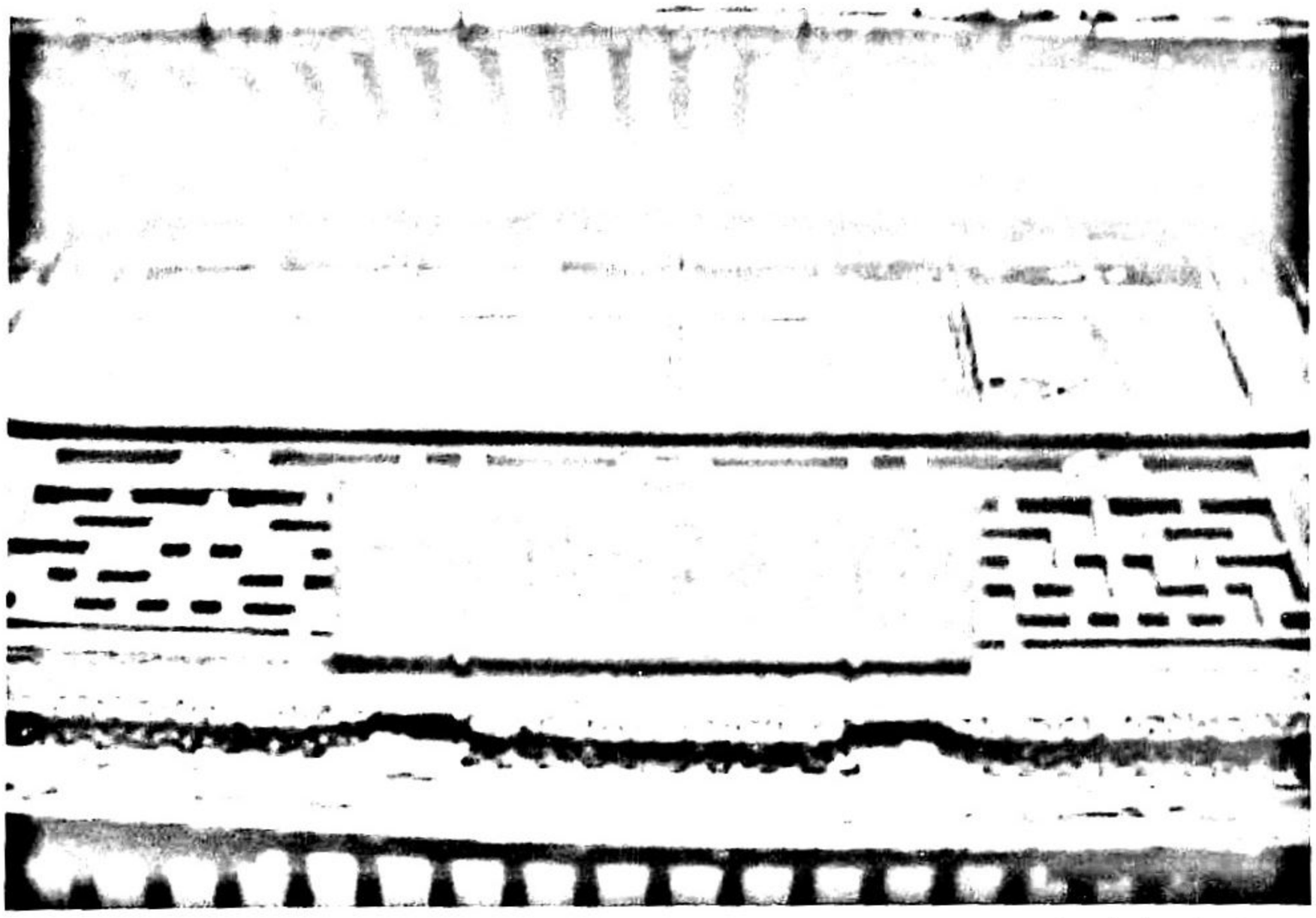
江山稳定与否的大要所在。十月，在工部官员的任职名单中，赫然写着叶绍袁的名字。叶家的几代进士，从叶绅、叶可成到叶绍袁的父亲叶重第，人人都在工部任过职，且个个都有政绩。而叶绍袁的被任命，与自己的祖辈相比较，更多了一层受命于危难的含义。

此时，后金的皇太极接任大汗，势力日益强大，蠢蠢欲动准备南侵。战争迫在眉睫，大量军用物资需要准备，工作自然也不轻松。叶绍袁在工部任上领到的首份任务就是火速回江南催取边疆士兵棉衣的差事，冒着严寒，一路南下，到各地下达指标。经过一年筹备，崇祯二年（1629）十月，叶绍袁带领物资驱车北上，由于天灾人祸，一路上接待南来北往官员的驿站许多已是吏去站空，常常得不到补给和休养。十二月到达山东德州时，后金兵马集结北京城下，京城告急实行戒严。叶绍袁进不了北京，只得滞留在山东，直到第二年后金兵马退回关外后，才入都向崇祯皇帝交差。而此时工部官员们在此次京城警戒中的表现令崇祯大光其火，把工部尚书等抓进大狱，准备重罪惩处。而叶绍袁出色完成任务，总算为工部挽回了点面子。崇祯觉得他办事有点能力，可以委以重任，便钦点为朝阳门城守。

朝阳门为京城东面的城门，是防守满清兵马进入京都的第一道门户，责任重大。上任伊始，叶绍袁便去清点军械仓库，仓库里物资摆放得杂乱无章，仓库旁的工棚里，衣衫褴褛的工匠们像囚犯一样被关着干活，看了让人唏嘘不已。住在城西的叶绍袁，每天要穿过整个北京城赶到朝阳门上班。为了便于工作，叶绍袁把住所搬到朝阳门附近的真武庙中。真武庙由于年久失修，显得破落不堪，生活环境相当艰苦。而更不能忍受的是监工的太监们，他们全不顾社稷安危、民生疾苦，每日只想为自己捞取钱财，监督工程正是他们聚敛钱财的有利时机，而且百般挑剔，叶绍袁不胜其扰。

不久，负责疏浚护城河的官员因私事擅离职守，被大臣弹劾，崇祯皇帝又将疏浚护城河的任务也交到叶绍袁身上，于是，叶绍袁便身兼两职，既是城守，又是河工。在挖河工程中，叶绍袁把官署搬到工地上，吃住都在那里，指挥着上万名役夫，将民工每50人编为一队，每天安排25队民工上工地，交替作业。挖河所需的工具每天需要多少、领出数量、归仓数量，事无巨细，叶绍袁都要亲自一一查点，记录在册。由于叶绍袁待人宽厚，受到民工的拥护，使疏浚护城河的工程完成得较快，前后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工程结束。本以为工程进展得比预期既快且做得好，还节约了近一半开支，可以受到朝廷的嘉奖，不料想，在监督工程中没有捞到一丁半点儿好处的太监们早已在皇帝面前说了叶绍袁不少的坏话，崇祯皇帝虽没有全信，但还是给了叶绍袁一个带罪思过的处分。

面对如此污浊不堪的朝廷，叶绍袁渐渐萌生了退意，真正促成叶绍袁下决心辞官的是演武场事件和袁崇焕被杀事件。崇祯三年（1630）四月，崇祯皇帝在演武场观看演练。负责筹备的兵部主事王建侯与工部尚书南居益之间矛盾重重，加上负责



午梦堂陈列馆

制造炮弹的工部主事李逢申又多次上书弹劾兵部和内阁。于是，兵部与内阁决定利用这次检阅机会进行报复，王建侯找到总兵王威，让他将灰掺杂在火药中，本来要博龙颜一悦的炮弹，纷纷轰隆轰隆地自炸起来，把崇祯气得当即下令将李逢申斩首，在大臣们的苦苦求救下，才得幸免一死，却被终身流放。工部主事逮捕了，可炮弹还得生产，派谁接替呢？最后又选中了叶绍袁。通知下达时，工部官员无不为叶绍袁捏着一把汗。一介书生的叶绍袁根本不懂制造炮弹之事，真是被迫上阵，时时担惊受怕。而朝廷内此时又发生了袁崇焕的“卖国求荣”大案。十月，戍边名将袁崇焕被指以招敌离间罪名，在曾经视其为股肱之臣、中兴名将的多疑寡断的崇祯帝诏谕下被处以极刑，可怜袁崇焕临终尚呼“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皇上多疑寡断，朝内党政混乱，殊无可施展和留恋之处。

不久之后，后金兵马撤到山海关外，皇城的警戒也相应放松，叶绍袁只剩下盔甲厂一项工作。当时负责巡视盔甲厂的是六科给事中许国荣，与叶绍袁是同年进士，经过叶绍袁陈述，许国荣便与工部的官员们商量，设法给叶绍袁另行安排工作，离开盔甲厂这个是非之地。许国荣将叶绍袁的情况向崇祯作了汇报，崇祯便让叶绍袁上疏陈情，叶绍袁便抓住机会将十岁丧父、母亲已年逾七旬的情况说了一番，上疏要求归养老母。按明朝礼制，父母年过七十，当官的儿子可以回家奉养双

亲，保留原来的官职。十一月，圣旨下，允许叶绍袁回家归养。在京做官几年，没捞一分外快的叶绍袁两袖清风，连路费都付不起，没奈何，只得找到在京城做幕僚的小舅子沈君庸（自征），向他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得以启程。

全身而退回到家乡的叶绍袁，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仍心系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除了和妻子沈宜修全力教育4个女儿、7个儿子外，他又根据地方史料辑录成《湖隐外史》，记述家乡分湖一带的风景、古迹、祠寺、名哲、著作以及土产、村落、园墅、桥梁等，有较高的地域研究价值。

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掠取江南后，叶绍袁开始过起联络义军的流亡生活。他同吴易抗清义师有往来，虽没有亲身挥戈上阵，但他坚决地投身反清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飞书驰檄，料量军务”，是抗清义师的“参佐之才”。当抗清义师胜利时，为他们高兴而呼，当义师失败，黯然神伤。同时，他把叶家埭的家也当作反清义士的大本营，他积极相助远道而来的左懋第夫人和宋、王、谢、李等众多进士，让出自家庭院接纳大家。在反清义士昆山顾咸建遭清兵追拿时，他及时出手相救，以至自己的家被清军抢劫一空。甚至，当顾咸建惨遭杀害后，其棺椁从杭州就直接运到了叶家埭……之前，顾的妻儿已经也都投奔、躲避在了叶绍袁家里……在动荡时期、是非年月，有这样的仗义之举，实属难能可贵。

此期间他写的《甲行日注》是其生活实录，对外族入侵士民灾难深重、反清抗清壮举激烈等，都有涉及。在日注中，叶绍袁极力褒扬那些为民请命、正直敢言、对地方作出贡献的历代先贤（包括地方官坤）及当代名士，并对那些平民百姓的义举不惜笔墨加以记载。这部日记可以说既是记录民族大耻，又是记录明末清初江南志士反清抗清斗争的重要史料，同时对了解明末的江南历史进程、反映明末风云际会时期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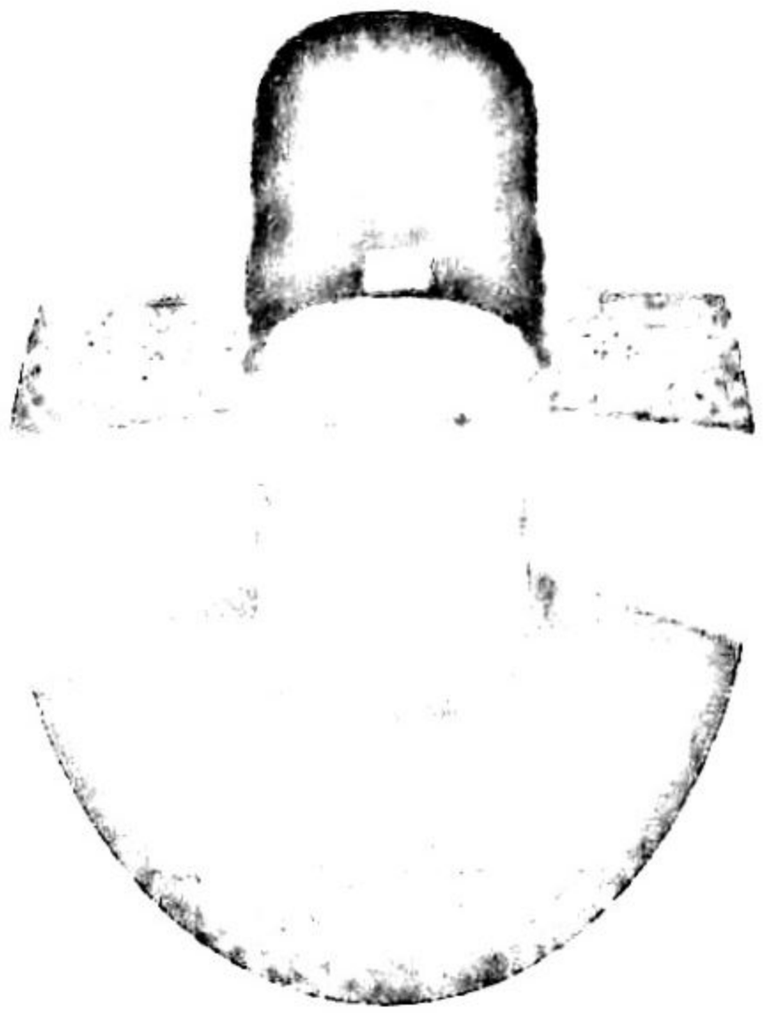


《湖隐外史》



章日炌

清身自爱 风清气顺



知县被世人称之为“芝麻官”，但在历史上，无论是吴江人在外、还是外地人来吴江当这“芝麻官”的，他们或是遏制腐败风气、或是修路铺桥，造福于民而名留青史的，还真不在少数，章日炌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章日炌，字敬明，浙江德清人，明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三甲52名进士，同年来吴江任知县。他是因受康熙元年（1662）“明史案”牵连被杀的潘柽章的外祖父。当年，他正是看中了潘柽章父亲潘凯出色的文章，才将女儿许配到吴江的。章日炌到吴江当知县后，他就让女婿潘凯避嫌，不再抛头露面，只是碰到有关民生大事时，才让他帮助出出主意。

章日炯是孤儿，自小由伯父、通政使章嘉帧抚养长大，耳濡目染对理学和名节有较深的理解。他到吴江就任时，正赶上一年一度商定出公差的事。富户们都想走走这位新知县的后门，托人传条子的、攀亲拉故的，章日炯的家中一时热闹异常。可来人不是吃了闭门羹、就是碰了钉子，三两个回合下来，不少富人就已号出这章知县的脉。在明白“知县路子”走不通后，有的甚至假装将田产转移给租户，以逃避出公差。

得知情况后的章日炯，把负责的小官吏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实事求是地把富户的田产报出来。按规定，田产1200亩的富户，要担任往北运漕粮的小头目，这是个苦差事。他让田产在规定数一倍以上的富户担任。这样，财力上比较能承担得起。其余的负责往南京运粮。尽管如此，还是有不知趣的头面人物来说情，他就一概不予理睬。

每年收缴头赋最让人头痛。他说，洁身自爱是容易的，要消除贪赃妄取的风气就很难了。于是，他仿照浙江德清的做法，在衙门口设两个只能投进去、不能倒出来的柜子。每柜设一吏、一胥、一戥子、一面锣。纳赋人自己把银两称好后，投入柜中，旁边监督的吏胥只要记个数就行了。如有吏胥勒索的，纳赋人可以鸣锣报警，他还不时下堂来查验、监督，遏制了公干人员从中捞取好处、贪赃妄取的邪恶习气。章日炯的这个做法，得到苏州府衙高度肯定，随即通令各县照此办理。



往京城和边远地区运送货物关口很多，到处都伸手要好处。因此，常常是按要求征上来了，却不敢解出去。这也是困扰历任官员的一大难题。章日炌采取的方法是，上面不来催，就暂时先存在自己的仓库里，催急了才突击发运，这样碰到关口也能尽快通过。由于他措施好，吴江的科税在苏州府7个县中总是最先完成。

本县吴溇人虞嶷建议兴修水利，他就努力筹办。长桥边上被民居侵占了许多地方，他下令3天之内全部拆除。他主持修浚了九里塘。运河塘岸自刘时俊主持大修后，又过去了许多年，日见颓败，以致有一夜，驿卒不慎掉入水中，连着溺毙了10余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章日炌十分震惊，便在后堂设席遍请耆老，告诉他们修塘不能再拖的实情，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纷纷解囊相助，款项很快就落实了。崇祯八年（1635），他主持先后修了全坍的塘岸1055丈，半坍塌的2086丈，以及平望西诸家铺水缺内外塘共760丈，还修了长桥、三江桥、翁泾桥。其他如修学宫，改善监狱条件、重修顾公庙等，凡是需要办的、有利于民的事情，他都一一有序进行着。

章日炌还学习天启朝苏州知府寇慎的做法，在全县设500优等生，从中选拔向上推荐，被选中的人相继有了出息。他的外甥潘柽章从小受他公允、磊落品格的熏陶，为人正直、力求上进，15岁补县学生员，与吴炎、顾炎武、朱鹤龄友好，著《国史考异》，注重乡邦文献、乡贤事迹的搜集整理，编《松陵文献》。史称该书“文辞简朴，不事浮华，无溢美，无支离，读者服其精博，谓史才略见”。



潘柽章像

叶燮

为民请命的诗坛才子



康熙十四年（1675）某月，扬州府宝应县衙外，击鼓鸣冤声频传，即便在震耳发聩的威虎棒恫吓下，大堂之上仍是“冤枉”声一片，自此一桩官吏急功近利，冤杀46条无辜渔民性命的大案露出端倪……

也许邪恶注定会碰上正义，新上任的宝应知县叶燮，怀揣报效朝廷、造福民众的梦想，在冤枉、哭诉声不断中，对前任孙惠原本已经结案的案子，进行重新调查审理。原来，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曾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凶，孙惠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46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在查清事实真相后，叶燮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



誉，加以抚恤，还将“奸吏祥”驱逐出境，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叶青天、叶恩人”被百姓颂扬一时……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吴江北厍人。清康熙九年（1670）以浙籍举人成进士，十四年任宝应知县。父亲叶绍袁、爷爷叶重第、太爷爷叶可成均高中进士。父亲叶绍袁、母亲沈宜修及几个姐姐都富于文思才情，一门唱和之作《午梦堂文集》，历代以来为海内外竞相争阅。叶燮自幼善诗文，任笔所至，千言立就，所作《原诗》是清初诗学理论的一座高峰。

叶燮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到任时正值当地水患盛极一时，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康熙十五年（1676），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身为知县的叶燮，还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3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减少了水灾造成的损失。

水灾刚过，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急着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



叶燮手迹

叶燮为宝应知县时，也正是“三藩”军兴时期，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拨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水灾、蝗害，税赋减少、治理投入，小小宝应时常处于财政空虚境地。叶燮多次呈文催拨，勉强拨补，也是大打折扣。在家无余资的情况下，叶燮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江西李振裕是叶燮的同榜进士，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当地李姓关系密切，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要马夫百名，被叶燮断然拒绝，李振裕大怒，自己找到驿站夫头，如数要走马夫。是日，适逢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



叶燮郊游图

裕恼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5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

作为诗人的叶燮，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将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堪为史诗。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将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史称“白田风雅”。

为46个无辜渔民翻案，叶燮得罪了后来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叶燮晋京谒选时，孙蕙对叶燮刻骨仇恨，就差置叶燮于死地。江西李振裕向叶燮索要马夫、鞭死衙役，叶燮不服，得罪了后来升至户部尚书的李振裕。暂缓申报涸田，被当道监司派来的使者厉斥为：居然目中无官；“三藩”军兴多次量文催拨，引起上司不快……在一些官员眼里，叶燮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愤青”之流。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银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于是，缙绅大户让于下，漕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阴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最终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被罢了官。

叶燮离职时，穷得叮当响，就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知道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

叶燮先后东到泰山，登临泰山绝顶，西至嵩山、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大自然给了他美的享受，也抚慰了受伤的心灵，看淡了荣辱得失的他，就愈加热爱亲近自然、自由的生活。最后，叶燮选择了离祖坟不远的太湖横山隐居。这样既可以为先人守坟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无端的滋扰。叶燮还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受到水乡人民的欢迎。

郭琇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初六日，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在家大摆筵席庆贺寿辰。大学士府内热闹非凡，明灯高悬。丫头、小吏来来往往，达官贵人鱼贯而入，传呼声不绝于耳。

戏演得正热闹，酒喝得正酣畅时，突然门房高声传呼："新调京城左都御史郭琇郭大人到！"只见郭琇雄纠纠气昂昂地直入寿堂。明珠先是一惊，马上又出现喜色。这是个敢说直话的硬汉，对他不敢怠慢，忙整整衣冠起迎，嘴上说着："稀客，稀客，快请！快请！"心想：人都说郭琇耿直敢言，刚正不阿，今天也知道来进见我明珠。

郭琇神色庄重，作过揖后，从袖筒中抽出一纸卷。



郭琇行乐图



郭琇书法作品

明珠以为是寿联或贺章，忙开口道："郭大人也来给老夫庆寿，快，快，快把您的大作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郭琇接话说："在下特来送份弹章，请明相过目，正本已面呈皇上。"他说完放下弹章，接过别人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旁若无人，转身直出大门而去。这突然的举动，使整个喜庆的场面冷了下来，寿厅内尽管还在觥筹交错，但气氛已大不如前。拎得清的贺客赶紧喝下杯中酒，向同桌翁翁嘴，找个借口偷偷地开溜了。而剩下的大多数人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心思，奏章的内容是什么，会不会累及自己，再无心思畅饮了。寿辰后没几天，郭琇的一道疏章使明珠受到降级的处罚。

这个郭琇究竟何许人也？郭琇（1638—1715），字瑞卿，号华野，山东即墨人。清朝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进士。十八年任吴江知县，在吴江担任过八年知县。

郭琇刚到吴江的时候，为官不廉政，有人向上告发。视察官员政绩的江苏巡抚，责令他改过自新，否则就要罢他的官。郭琇从苏州回到吴江，就立誓痛改前非。他命令手下用水洗了县衙门的大堂和内室，向老百姓表示要重新做人，请吴江百姓见证。从此，郭琇果然说到做到，他革除了许多对百姓不利的做法，立了一些对百姓有利的制度，使县里的衙役和部门的文吏，钻不到侵害百姓的空子。

在任期间，有个土匪与当地有钱人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一般人都不敢去碰他们。郭琇不信这个邪，查实了他们的罪证，把他们抓来判了刑。

一个强盗大白天在河塘上抢劫过往船只。郭琇接到报案后，立即带人前去追捕。到了河边，那强盗衣着华丽，在船上对前去追捕他的人叫骂不休。郭琇让人驾船驶向强盗的船只，接近时，他纵身跳到了对方的船中，让被抢的人出来作证，人赃俱获，将那强盗抓了起来。

他还善于断案，在吴江做知县的8个年头，政绩列全省第一，被称为"治行为江南最"。对于郭琇在吴江的作为，江苏巡抚汤斌很赏识，就向上推荐。康熙二十五年（1686），郭琇入京述职。当年在江宁巡抚位置上，向郭琇索贿碰壁的余国柱在朝中掌权，就指使吏部扣住汤斌的荐章，还诬说吴江的田赋没有完成定额。康熙皇帝却特别赏识郭琇的为人，第二年就让他当了河南道监察御史。

郭琇做了御史以后，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二十三日，上了《参河臣疏》，陈述河道总督靳辅在户部尚书佛伦支持下治河措施不当，致使江南地区困于水患，百姓怨声载道；二月初六，上了《纠大臣疏》，弹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与余

国柱结党营私、排陷异己、贪污收贿等罪行，因此明珠寿辰的当天才会上演开头的一幕；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上了《参近臣疏》，弹劾皇帝近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和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等植党营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行。郭琇这紧锣密鼓的三大疏，顿时引起“群党侧目，百端交构”，“天子为之改容，举朝为之失色”，“直臣之风，震霆一鸣，金壬解体”，因此时人赠其雅号为郭三本。郭琇也以三次弹劾而名动天下，留名史册，从此就得了“铁笔御史”的美名。郭琇这三大疏，特别是后两疏，有力地抨击了贪官污吏的腐败以及结党营私的不正之风，这对清王朝朝纲的整肃和朝政的巩固，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来人们所乐道的“康乾盛世”，亦是功不可没。因而康熙曾在上谕中赞扬巡抚李光地、彭鹏及总督张鹏、郭琇“四臣皆持正清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山东道御史张显法弹劾山东巡抚钱钰贪黩罪。钱钰为开脱罪责而反咬一口，说因郭琇曾致书举荐即墨知县高上达，遭钱钰拒绝，所以郭琇因泄私愤才驱使张显法弹劾他。郭琇即抗辩说：“某为总宪，岂不敢参一巡抚，而假手御史耶！”部议定郭琇私书罪拟杖刑，康熙皇帝因为郭琇平日耿直敢言，就网开一面改降五品调用，这也算是皇恩有加了。时佛伦为山东巡抚，见有机可乘，便趁火浇油上疏诬告：“郭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总昌家奴，郭之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入贼党伏法。郭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同意此请，将郭逮江宁勘治。康熙皇帝有意为郭开脱，便特谕大学士伊桑阿着无人处问郭琇是否真系郭尔标之子，郭琇即以诬陷作答，且流涕道：“言臣祖父文耀横被尔标之乱夹仇谋害，指仇为亲，实属罗织！”康熙知道这件事后，就特令郭琇告老还乡。然而，郭琇的政敌仍不解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郭的明察暗访，鸡蛋里头挑骨头，非要找出点事来，将郭置于死地而后快。

江苏按察使高承爵想方设法收集郭琇在吴江的过失，却一无所获，便将县丞赵炯经手征收漕米时，亏空2300石的事移到他头上。江苏巡抚洪之杰行文到山东，要郭琇到江宁（今南京）当面对质。此时，山东巡抚佛伦也弹劾郭琇，提出要将他罢官入狱惩治。郭琇大大方方地到江宁对质，审查的结果是亏空的漕米2300多石不是他经手的，他知道后早已自己掏钱补上。最后判定充军，案情报上去，皇帝再念故情，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他削去官职。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康熙第三次下江南到吴江。船刚靠岸就见到运河两岸跪满了喊冤的老百姓，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停船一了解，原来都是为前任知县郭琇喊冤的。康熙大吃一惊，想不到郭琇离开吴江这么多年，感恩戴德的老百姓还是对他念念不忘。返回京城，皇帝对武英殿大学士阿兰德等人说：“原左都御史郭琇在吴江的政绩，到今天还受人称赞，可见是个好官。这人有胆量，又实干，让他去湖广当总督好了。”郭琇接到圣旨，就向皇帝提出几条施政意见，全部被采纳，便走马上任去了。

陆燿 以清节为天下第一



芦墟镇上曾有个老街巷，叫“竖头斋阃”，因为里面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龙章宠锡”匾额而得名。相传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路过吴江，想到正奔丧在家的陆燿，就轻装简从来到芦墟陆宅。本以为会是深宅大院，华堂门第，没想到入眼的却是窄小的庭院，家徒四壁。乾隆不禁有些疑惑，已经做到布政使级别的二品大员，怎么会家中这般冷清？于是他就问陆燿有多少家产。陆燿回答说有“九当十三车”。乾隆更是摸不着头脑。看乾隆大惑不解的样子，陆燿就从抽屉中拿出九张当票，接着又指给乾隆看梁上挂着的老母用旧的十三部纺纱摇车。乾隆恍然大悟，心里感叹不已，回京后即御书满汉文并用的“龙章宠锡”四字之竖头斋匾，赐予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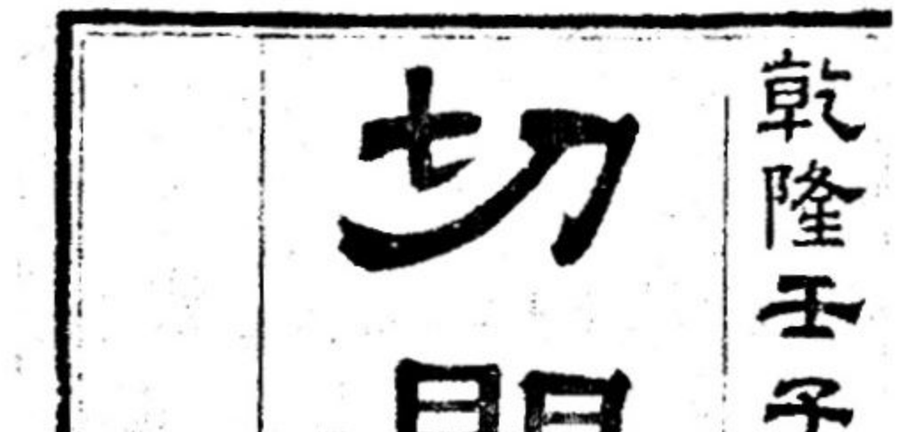
耀。当时匾额两旁有一副对联："修身治国无双士，教学传家第一人。"

陆耀（1722—1785）字青来，号朗夫，吴江芦墟人。乾隆十七年（1752），举顺天乡试，历任户部郎中、登州知府、济南知府、运河道、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为官清廉，奉职勤慎，世称乾隆朝"耀以清节为天下第一"。

陆耀幼承庭训，有志于学，以古代贤达为楷模。陆耀之父陆璨曾担任保德州吏目，虽官微位卑却品德高洁，为官不贪一钱。上司嘉赏其操守，常借口索取其书法作品而给予丰厚回报，陆璨却全部用于修葺保德官舍。因其居官廉洁，家境实属贫寒。陆耀幼年读书时，到了冬天还没有棉衣，母亲用自己的两件旧衣服，中间絮上棉花做成棉衣给他御寒。官至巡抚后，陆耀仍崇尚节俭，从不奢华，也懂得感恩。一直珍藏着那件母亲做的棉衣，时常拿出来抚视，说："此吾风雪中就塾师读，吾母分己衣中絮足之，以衣我者也。"睹物思情，借以怀念自己的母亲。

过去地方官入京觐见，往往要被城门守卫敲竹杠。陆耀担任山东布政使时，某次入京觐见，实在身无长物，无钱打赏，只好把衣被放在城外，充作一般人员，仅带一个仆人入城。进城后，从朋友处借用被褥，用毕归还。他离开山东赴湖南任职时，行李仅被褥和两只衣箱，且箱中大半是书籍。后来在吴江任知县的唐仲冕当年曾同在山东任职，此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还一直提起，以此自勉。

陆耀初至湖南巡抚任所，有个盐商即抬来三万两银子孝敬。问其故，盐商说道："这是老规矩了。前任巡抚号称廉



陆耀《切问斋集》

静，却也照收不误。今天先送这些，以后会按时送来。”陆燿坚决不收，并且明言禁止再送。盐商为难地说：“如果大人不收，那么，这些白金就没有去处了。”陆燿说：“那就用它如数平抑盐价吧！”一时间，湖南的盐价为之走低，百姓得到了真实惠。

按照惯例，各地督抚每年都要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以求皇上垂青擢拔。陆燿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只是挑选几样湖南的土特产进献。乾隆皇帝知道他清廉为本，所以也并不为怪。当时，宠臣和珅羽翼渐丰，官员们争相献媚，惟独陆燿不送一件物品。有人说他在惹祸，但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有一年湖南大旱，湖广总督钮钴禄特升额经长沙亲抵巡抚衙门，陆燿满席皆以蔬肴招待，并说：“此地已许久不曾下雨，祷雨须戒屠宰，因此已好长时间不吃荤腥了。”总督深深为陆燿虔诚求雨解民于倒悬之心感叹，“日前进入长沙，所至各馆舍酒肉淋漓，奴隶醉饱。而家人未有告之，是我之过。”随即，令人撤去餐具，以表悔改之心。

陆燿不但为官清廉，还常常规诫教育下属和子女。他曾手书“廉政官箴”三则，书道：“燕雀处堂，自谓无患。黄金、白璧来则受纳，独不念天处高，而听则卑哉。”又曾说：“院司贪，守令不能不贪。利，莫大于阜民财；害，莫深于夺民食。使上司不贪，则州县不致以苛累病民，何待督责敲扑愁痛之声入人骨髓哉！”他严诫子女勿因自己身份而生事扰民。在湖南巡抚任上，一次因有要事需派儿子返回江南，临行，再三叮嘱随行的塾师陈鸳千：“过郡县，勿使官吏知吾子。”其所带行李也很简单，一路上果真无人知道有湖南巡抚之子过境，以实际行动做到了不扰民。

陆燿的人品同样得到了同朝清正官员的好评。相传他曾与纪晓岚一起求学于董邦达，素来交好，他们都牢记着董邦达的一句话：“人品是一回事，功名是一回事，这是世俗的看法。有人品而建功名是真功名，有功名而不失人品是真人品。”纪晓岚看重陆燿的人品，曾经说陆燿以情操劲节为当代所称赞，追求真功名和真人品，实践了老师的话。

乾隆五十年（1785）湖南发生旱灾，陆燿恰逢有病在身，可是为了百姓，他还是拖着病体，每天冒着酷暑奋战在抗旱第一线，因六月带病在酷暑中求雨，最后积劳成疾，死在任所。去世后，遗物仅被褥和两只衣箱，箱子里一大半是书籍。好朋友徐坚到他府中奔丧，看到这种情况，叹息道：“一贫至此，即使不死，亦难度日子。”乾隆皇帝用朱笔批了“可惜”两字，赐祭。按说，巡抚的俸禄可谓不菲，可他从不挥霍浪费，将节省下来的钱，在京师贾家胡同捐建了一所江震会馆。直到光绪年间，每逢岁时节令，在京的吴江人还常常到江震会馆去祭拜陆燿的灵位。

陆燿在长沙任上曾有两句诗：“能开衡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可算是他的箴言。而“利，莫大于阜民之财；害，莫深于夺民之食”的格言，于今仍有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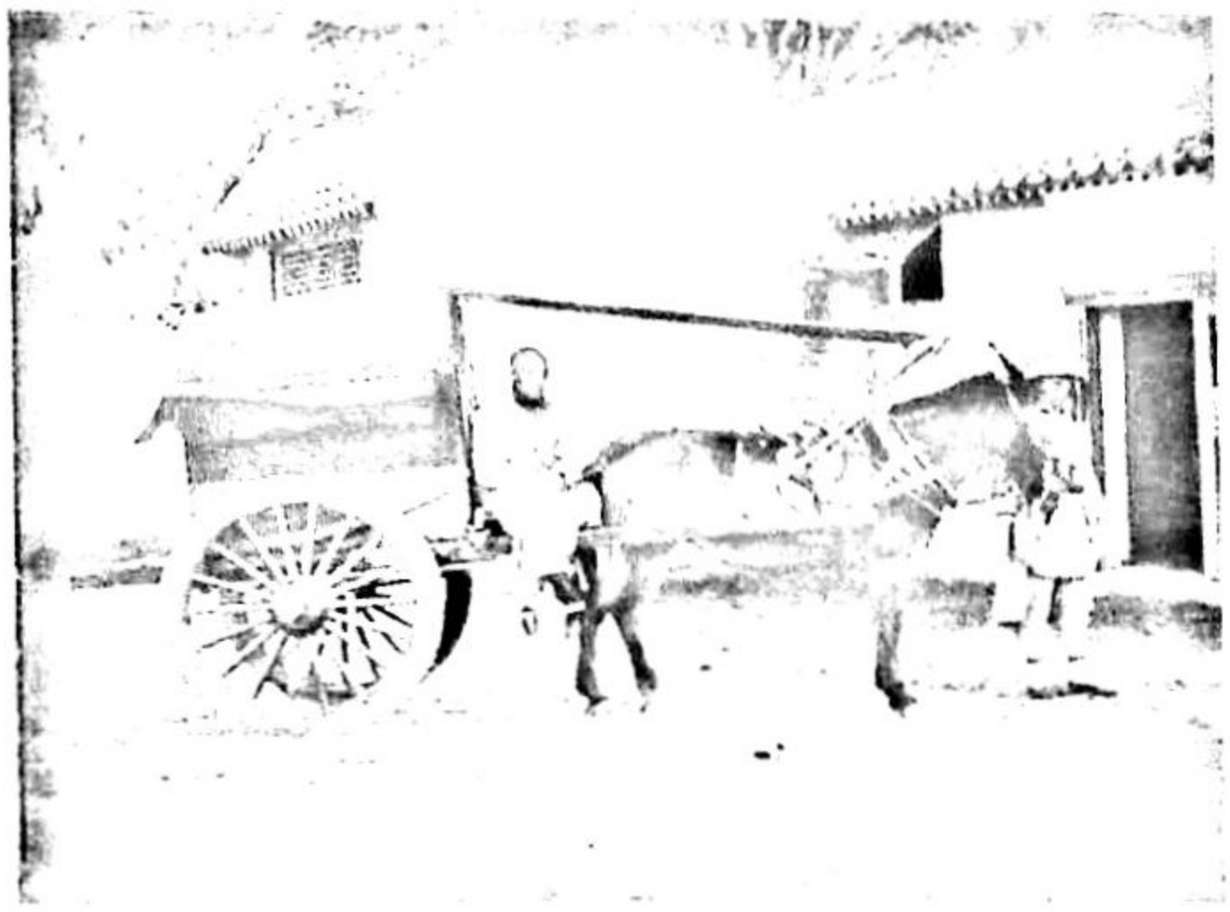
沈桂芬



在清王朝，堂堂宰相出入，不是净水泼地，怎么也该是“肃静”“回避”等道牌开路，后面才是8人大轿出场……就在被清史誉为“同治中兴”时期，从东厂胡同至东华门，一路行来，老百姓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辆晃晃悠悠的黑驴车上，坐着的竟然是上早朝的当朝宰相沈桂芬，就连东华门守门的护卫，也常常不习惯，总是上前厉声吆喝停车，老是闹笑话。就此，沈桂芬落了个“驴车宰相”的诨名。《清史稿》评论道：沈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

沈桂芬（1818—1881），吴江同里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系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音律家沈

璟之后裔。父辈到北京为官，寄籍顺天府宛平。清同治七年至光绪六年（1868—1881）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任职时间前后共计12年之久。



驴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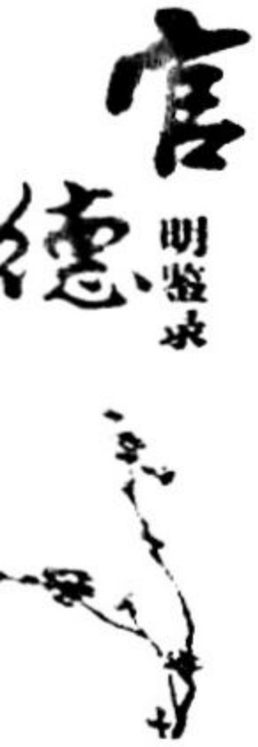
同治元年（1862），沈桂芬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这是个掌管实体的官职，特别掌管朝廷三库事务，使他对朝廷财政与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接触与了解，因此后来就有了他移旗民屯边的想法与建议。

清廷入关后，采用八旗之法加强对汉族的统治，对旗民实行特殊政策，至清末这些“不农不商”的旗人越来越多，成为社会一大问题，北京城里特别严重，怎样安置好旗民成为朝廷一桩头痛大事。沈桂芬精心筹划，于同治三年（1864）三月向皇帝提交奏疏，主张“筹款移屯”安置旗民。具体做法是：选派大员为屯田大臣，在奉天、吉林及独石口外的红城子、开平，张家口外的兴平、新平等处，选找规划可开垦的土地若干顷，造建房屋城堡，添置农具、牛种、军装、器械等，“酌立成规，它中驻扎”。旗户愿移屯者，由户部发治装银30两，沿途官府派车马接送。到屯后，每户给房4间，配备好农具和耕牛。一年四季，“三时务农，一时（冬季）讲武”，而移民的刑罚教养，全由屯田大臣统一负责。“移屯之法”不仅可以让不农不商的旗民丰衣足食，还可以减轻朝廷八旗兵饷的负担、恢复“国初骁健之风”，最终达到“北慑强邻，南卫京师”、边防得以扎实巩固的目的，真是一举多得。这让同治帝眼前一亮，立即采纳其建议，下谕各将军、都统、督抚等认真筹划实施。

沈桂芬出任山西巡抚虽只短短一年多时间，但他勤政爱民，办成了两桩实事。

第一桩：刊发条约，严禁种植罂粟。清末政务松懈，当年曾花大力气严禁的鸦片出现了弛禁，而民间栽种罂粟，趋利若鹜，大片沃土逐渐被占据。山西是个山多地少的省份，百姓粮食供应本来就不足，因此造成粮价涌增。沈桂芬到任了解情况后，马上刊发条约，饬令下属各州、府、县严禁种植罂粟；并通过宣传，让老百姓知道利与害，此举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又将具体情形疏陈朝廷，同治皇帝见到奏疏后，颁行各省，一律严禁。

第二桩：整顿军队，训练精兵。巡抚大臣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掌管军队。清朝末期的军队积弊成疾，毫无战斗力可言，在前线与太平军浴血战斗的是曾



国藩带领的、国家没有任何军饷补贴的“湘军”。沈桂芬对此觉得极不正常，于是他提出对军队要进行整顿。同治四年（1865）四月，他上奏疏提出“宜整军经武，裁弱留强”、增添精兵、提高战斗力的建议。他用了半年时间，将原来军队中的羸弱士兵全部清理；采用奖惩办法，全面开展练兵活动，“每日应练各兵，（每）人给练费二分，技艺娴熟者酌增，劣者革除”；为确保练兵活动的落实，他派员前往各处检查督促，做到精益求精，成为“节制可用之师”。

光绪元年（1875），沈桂芬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到任后的沈桂芬尽力革除弊病，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实事。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当宰相时提拔了一大批汉族大臣。当时，首辅文祥赏识沈桂芬能力，对他比较放权。沈桂芬因此掌握着朝廷实权，于是开始提携了一帮汉人，李鸿章、翁同龢等名臣联袂而起，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汉人占居近半数；“枢要之地，实力加增”。人称“同治中兴”功臣之一。

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七，一纸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使全国哗然。祸虽是兵部、户部侍郎崇厚闯下的，但身为宰相的沈桂芬，心中难辞自责，他努力斡旋、委曲调停、终于另派曾纪泽为谈判代表改订条约。事态有了不少挽回，但沈桂芬还是病倒了，并于光绪七年（1881）阴历正月初一离开了人世。

正在宫中欢度新春佳节的光绪皇帝接到噩耗，感到十分震惊悲痛，特下谕云：“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清慎忠勤，老成端恪。……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力，劳瘁不辞。前因偶患微痾，赏假调理。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特赏《陀罗经》被，并派贝勒载漪带领侍卫10名前往祭奠。加恩晋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定”，并对其儿孙等都一一加封官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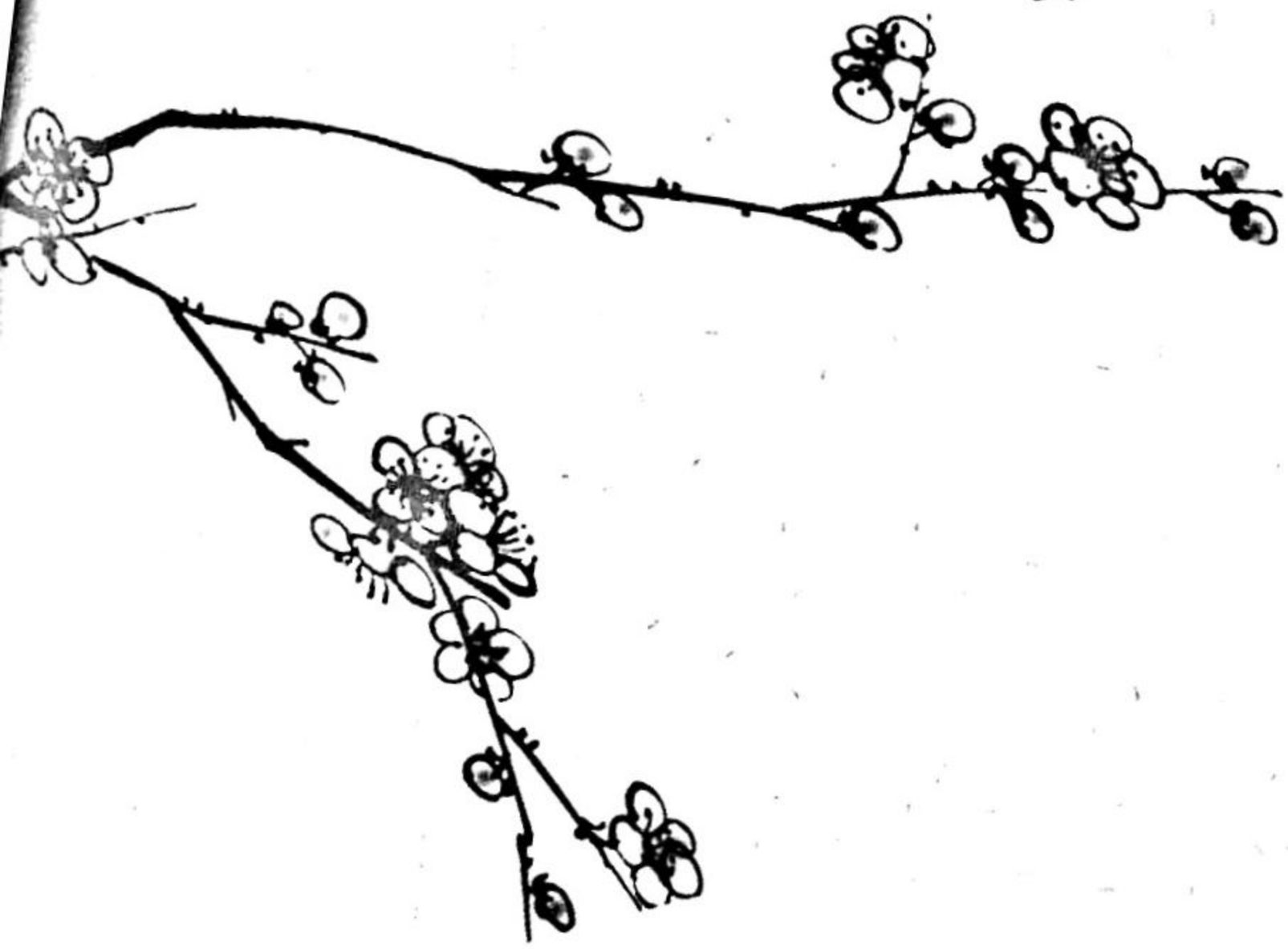
沈桂芬虽然官至宰相，但处世为人低调，始终保持清廉俭朴，“久居政地，自奉若寒素”，于声色货利，一无所好。许多外地官吏到总会向他送礼物，沈桂芬都一一婉言拒绝。他的宰相府在东厂胡同，那条胡同低洼狭小，门前连马都掉不过头来。后被时任两广总督的瑞麟知道，长期在外为官的他，主动将自己的房屋租借给沈桂芬。这样，沈桂芬才有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宰相府”。

沈桂芬屡掌文衡，从不做半点中饱私囊的事情。他先后担任会试阅卷大臣6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7次，殿试读卷官、拔贡复试阅卷大臣各2次，进士朝考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各3次，考试汉教习、汉荫士、汉御史阅卷大臣，武会试较射、武会试复试大臣各1次，为朝廷遴选人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咸丰十一年（1861），沈桂芬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当时“岭南人多豪富，俗重科名，科场舞弊……甲于他省”。他依章办事，全力矫正，使这次考试“风清弊绝，内外肃然；岭海英奇，尽收珊网”。放榜那天，恰逢大雨，广东人由此称之为“甘霖榜”。

身居高位、为官数十年，沈桂芬对故乡念念不忘，曾辑有《吴江沈氏家传》一册。生前曾立遗嘱，将来逝世后定要归葬故里。后辈尊其愿，千里迢迢将其棺椁运回，归葬在苏州西南石湖越来溪旁的庄马头村。

官德

明鉴录



第三章 存心以公 恪尽职守

陆元方

深得武则天赏识和信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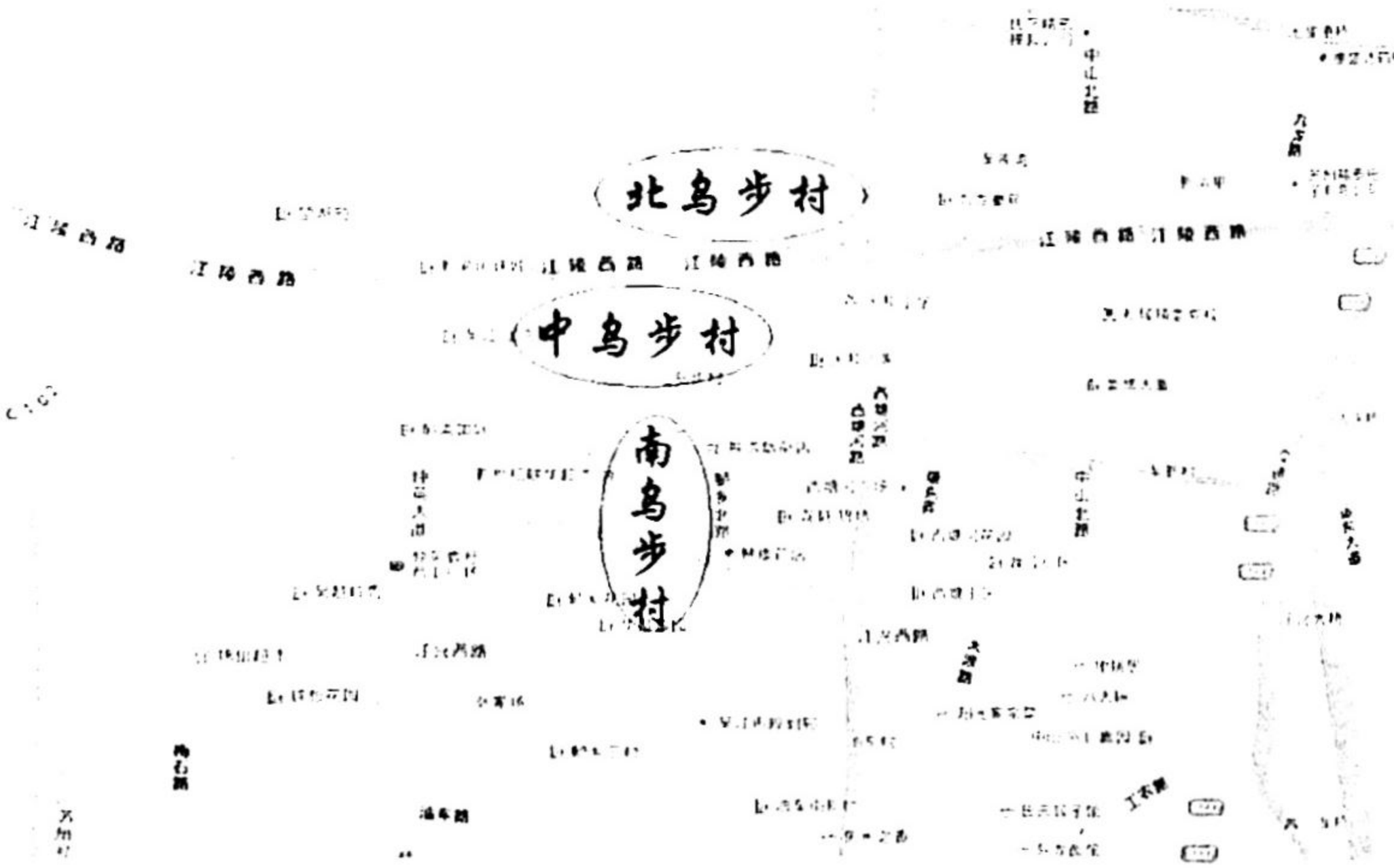
松陵历史上有个显赫家族：大唐宰相世家陆氏一门。父子二人俱为丞相，父亲陆元方相武后，儿子陆象先相睿宗、玄宗。他们既是济世治国的学者，也是勤廉奉公的好官。

陆元方（639—701）字希仲，吴郡松陵乌步村（今属吴江松陵镇吴新村）人，其曾祖父陆琛在陈朝为黄门侍郎，伯父陆柬之善书名家。初唐时的陆元方以通经著称，后举八科皆中。他学识渊博，治国处事均有真知灼见，深得武则天赏识，官至宰相，因生性刚直，仕途几度起伏。

陆元方中举后累次升迁至监察御史。有次奉命出使岭南海外，启航即遇狂风骇浪，陆元方毫无惧色催促船

天道："吾受命不私，神岂害我？"前行中，风浪随即平息。回朝后，他被来俊臣构陷，武则天未理诬告，直升他为宰相，而后却因"附会李昭德"受牵连，被贬为绥州刺史。之后被重用为天官侍郎，兼司卫卿，又遭人谗言"结党营私，推荐亲朋"。武后大怒，将其免官，布衣身份续职观后效。陆元方依旧荐人如初，并回应武后的批评："举臣所知，不暇问雠党。"武后信服他秉公无私，复拜为宰相，没多久又因出言耿直，惹恼了武后，被贬为太子右庶子。最终仍获器重，升至文昌左丞。正可谓：刚正不阿，命运多舛，胸怀坦荡，无惧波折。

陆元方曾于东都洛阳卖小宅。家人将受直矣，买者求见，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买者闻之，遽辞不买。子侄以为言，元方曰："汝太奇，岂可为钱而诳个人。"陆家当初建这处锦绣园，原准备世代居住。后来家道中落，生活窘迫，无奈卖房周转。这座宅院在洛阳非常有名，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雅致幽静，是个难得的好居所，随即有两个商人闻讯前来商购。陆元方直言不讳道出卖房理由，并只按成本折七成出售。商人大喜，交付定金，约定三日后正式交易。外界传言：锦绣园贱价出售，定有不可告人的隐情。购房商人闻悉，心生疑虑，两人决定先去锦绣园实地勘察一番，却未见任何问题，遂立意买下。成交之日，陆元方一听他们准备开酒楼，立即提醒此宅院无出水口，不适宜。商人失望离去，未成



乌步村地图

交。正当全家人为一时没有卖出房子而埋怨烦恼时，商人回转，再次登门要求买下锦绣园。原来，陆元方的诚信令他们感动，并使他们坚信这宅院不会再有其他缺陷，于是执意买下，改开绸缎庄。

美国文豪马克·吐温曾说："人若能摒弃虚伪，则会获得极大的心灵平静。"如今，利字当头，芸芸众生，让心灵难复平静。陆元方的那句"岂可为钱而诳个人"则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儒士"重德、重心性，而不重表面"的谦谦君子风度。

陆元方两度执政，一向清廉谨慎，公正无私地为国选才。武后每到百官人事任命之际，必先秘密咨询陆元方，甚为看重他的意见。陆元方临终时，命人烧掉所有的奏折草稿，说："吾阴德在人，后当有兴者。"又言："吾当寿，但领选久，耗伤吾神。"可见他生前默默帮了不少人，良才择用，积了大德。逝后，他把这一切带走，不留话柄，无须任何人报恩。陆家后辈也无须倚此为照顾，让他们自己努力，自有阴德庇佑。陆元方，在其位，谋其职，一生光明磊落，精忠报国，因此，即使是像武则天那样强悍的女皇也能被他的诚意感动。

后来的事实果真如陆元方所言，他的后代子嗣兴旺，人才辈出，陆象先、陆景倩、陆景融尤其知名。陆景融，体长七尺，面容俊美，性情宽中而厚外，博学，工笔札。他以荫补千牛，转新郑令，颇有政绩。陆景倩，任县令时，被小吏誉为："某某强为清廉，某某诈为清廉，只有陆景倩才是真正的清廉。"陆象先，更是闻名天下的一代良相。

陆象先（665—736），原名景初，唐睿宗认为他"能绍先构，是谓象贤"，赐名象先，后提为宰相。他像其父，不揣察言观色，无心拉拢关系，却屡受他人提携。他为人"器识沉邃"，科举高中，仕途一路风顺，功成名就，坐拥高贵之时依然不骄不躁。陆象先素来为政仁恕，他曾反问杖惩刁民的劝谏者："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树威乎？"他做蒲州刺史时推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自省主张，令所到之处的官吏百姓无不对他怀念不已，这句执政格言也流转为后来的传世成语。陆象先72岁过世后，睿宗的儿子玄宗在位，念其德高望重，皇帝又追赠尚书左丞相官职，谥号文贞。

踱步西塘河畔，江陵大道两旁，昔日的松陵乌步村周围，楼宇林立。古村如今分立几片，深陷楼群包围中，依然奇迹般存活着。大唐宰相世家陆氏望族的光影已然随久远的年轮渐渐淡去，史海钩沉，历史的长空中却永久地留下他们清亮的轨迹，引领着吴地后人继续传承与开拓。

黄由 饮点状元



从松陵坐船，沿着白居易、苏东坡走过的足迹，在一路舟楫荡漾中南行。约摸60里，就到了黄家溪。在今天看来有点偏僻的黄家溪，历史上却极为繁荣。作为盛泽丝绸文化发源地，她是京杭运河财富与文化黄金水道上的一颗珍珠。黄家溪原名野和溪，因为南宋尚书黄由在此建别墅定居，他的后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这块地方就被叫作黄家溪了。

黄由（1150—1225），字子由，号盘野居士，平江长洲（今苏州）人。淳熙八年中状元。历官南安军签判、绍兴府通判、中书舍人、军器少监、起居郎、校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兼吏部、知绵州、利州路转运判官、知成都、以宝谟阁学士

知庆元府、通奉大夫兼沿海制置使、正议大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等职。卒后，追赠太子少师。

黄由被钦点为状元，还曾是一段传奇故事。当时的皇帝孝宗赵昚，是南宋历史上极欲有所作为的一位皇帝。隆兴元年（1163年）赵昚即位后，力图恢复中原，先为冤屈而死的抗金英雄岳飞平反，又起用抗战派将领张浚等抗金。但因准备不足，出师不利，最后不得不与金国签订了《隆兴和议》，割地纳贡。此后，孝宗收复河山的心虽没有湮灭，但却总是郁郁寡欢。皇太后宽解他道："天下事不必乘快，关键是要坚忍，最后事情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而黄由参加殿试的试卷开场白就写道："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孝宗读后，十分喜欢，觉得很符合自己的想法和心境，于是将这份试卷定为第一。



吴江学宫遗址

黄由为人正气，敢于直言。当时，内侍省有个叫甘昇的押班都知，得到孝宗的重用为入内押班，与朝臣曾觌、王抃相互勾结，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争相与他们攀亲附贵。黄由对此不正之风颇为不满，在一次廷试对策中，就谈到了甘昇一伙结帮的事，并且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看法，后来又在孝宗面前进行揭露，使这帮人最终得到了惩处。

黄由为政出自公心，不以私废公。光宗绍熙四年（1193），吏部尚书赵汝愚力辞右丞相一职，被封为枢密使。翰林学士李巘、草麻有"太尉本兵柄"之类的话，赵汝愚认为是在侮辱自己，很是不高兴。不久，李巘转任承旨。黄由当时以左史兼中书舍人身份驳斥赵汝愚，不应以私人感情影响朝廷人事安排，结果被除去宝文阁学士衔，任婺州知州。

宁宗庆元元年（1195）赵扩即位后，极为赏识黄由，封其为礼部尚书兼吏部侍郎。当时，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府王沇任满提出辞职，宁宗要留用他，但发现王沇曾接受朱熹理学被升职，而宁宗把朱熹理学定为"伪学"，因此将王沇的事交由大臣们讨论。大家将王沇定为"伪党"，将他交付吏部，认为这人不能起用。而当时因"伪学"而获罪的，还有赵汝愚等58人。黄由不顾个人安危，连夜上奏章劝皇帝，不要将接受过理学的人都指为"伪学"，这会让人觉得皇帝不能容纳不同学派的人，对治理天下很不利。宁宗读后，觉得黄由说得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还将王沇升了官。但是，黄由却因为越级上奏，被监察御史张岩指责是阿附权臣、植立党羽，被贬为成都知府。

黄由归隐后曾在吴江学宫边建造了一座盘野别墅，内有共乐堂、联德堂、拥书楼、三清阁等建筑，并以"才到松陵即是家"为起首句作《盘墅》组诗。后来，他又在盛泽合路村建了乡间别墅，并在此定居。

平思忠



一袭布衣、一双布鞋，庶民进的却是苏州知府况钟的府邸。况钟就是日后被昆剧《十五贯》歌颂得妇孺皆知的“况青天”。见到来人，况钟马上辞退堂上旁人，热热乎乎地跟来人叙起旧来，并请他在家里饮酒。当时正是大热天，况钟叫来两个儿子拿了扇子为他扇风。况钟对他说：“我不是没有奴仆，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知道你是我的故交，借此报答您。”——这个庶民正是况钟曾经的同僚加恩人平思忠。

平思忠，自号退翁，明代吴江人，洪武年间在吴江县衙当吏役。建文二年（1400）担任礼部主客司主事，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者。永乐三年（1405）升郎中。当时，永乐皇帝朱棣一心想与邻邦友善，四方来朝贡明朝皇

帝的使者络绎不绝，接待任务相当繁重。平思忠保持当年为吏役时的勤奋踏实劲头，工作效率相当高。礼部尚书吕震很看重他的才干。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被下了狱。

接手平思忠工作的人因为不熟悉业务，接待上多有怠慢，特别是对来自北方的使者更是有失礼仪。永乐皇帝经常为此眉头紧锁，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吕震见此奏称，平思忠熟悉与外邦交往的事务，只是现在被关在狱中。永乐皇帝听此立即下旨，将他放出来，并恢复其礼部郎中的官职。出狱后，平思忠妥善处理了北方使节的接待工作，皇帝非常满意。


况钟像

当时，矿税太监杨某在陕西弄得怨声载道，朝廷派敢做敢为的刑科给事中杨弘，担任陕西布政使前去钳制。不久，杨弘受到弹劾被罢官。皇帝要求派得力的人去陕西当参政，吏部就推荐了平思忠。

在陕西，平思忠一如既往勤政爱民，公正执法。一次在审理一桩贪官案子时，正直气盛的平思忠，在公堂上杖打了狡辩不已的贪官。没想到这人善于搞阴谋，竟跑到京城，提了一包财物送到平府，并到处宣扬是平思忠托他带到家里来的。刑部不问青红皂白，把平思忠从陕西提到北京投入狱中。当时朝廷有令，凡是贪赃枉法的，审问时胆敢辩白，一律杖杀。想到清者自清，平思忠含冤忍辱，不敢争一时之快的他，被罚到边疆守防。

平思忠到了新疆后，很快与当地的各族人民融为一体，对新疆的人文、商业情况非常熟悉。当时，新疆的马匹已经很有名气。新疆马长得高大健硕，奔跑速度快，力气大，耐力持久。也是上苍不该憋屈忠良于他乡，那档口正好皇帝想到要买新疆马，就命令太监刘马儿去新疆。而刘马儿感到新疆地方人生地疏，就向皇帝建议：请在新疆的平思忠帮助他协办买马之事。皇帝接受了刘马儿的建议，下诏解除了平思忠守边防之差事，让他协助刘马儿买马。

平思忠第二次被赦出，作为刘太监的随从出使西域。平思忠尽心尽责投入工作，与新疆人广泛联系，精心挑选优良马匹。他们一行先后到吐蕃（青海、西藏相邻地）、乌斯藏（西藏）、朵甘（昌都、甘孜）、陇答等处，赤斤（玉门）、蒙古、罕东（敦煌）、安定（阿克塞）、阿端（格尔木）、曲先（格尔木）、哈密等卫，以及大州、亦力把里（吐鲁番）、阿马尔罕（循化、积石山）、哈烈（阿富汗西北部）、于阗（和田）诸国，采购了一大批良马，像走沼泽地如履平地、特别适用于驿道行走的焉耆马，以及高大丰健、奔跑速度特快、适合于冲锋的伊犁马等。

出色完成了购马任务后，平思忠没有继续做官，而是释然地回到了故乡吴江。那时，曾经受他恩举的况钟正在苏州任知府。他们，一个不借权谋私，清正廉明当着自己的知府；一个家境贫寒，以打渔、种田、读书为业度过余生，却从来不靠旧交情而有所请托，人们称赞他们两人都是贤德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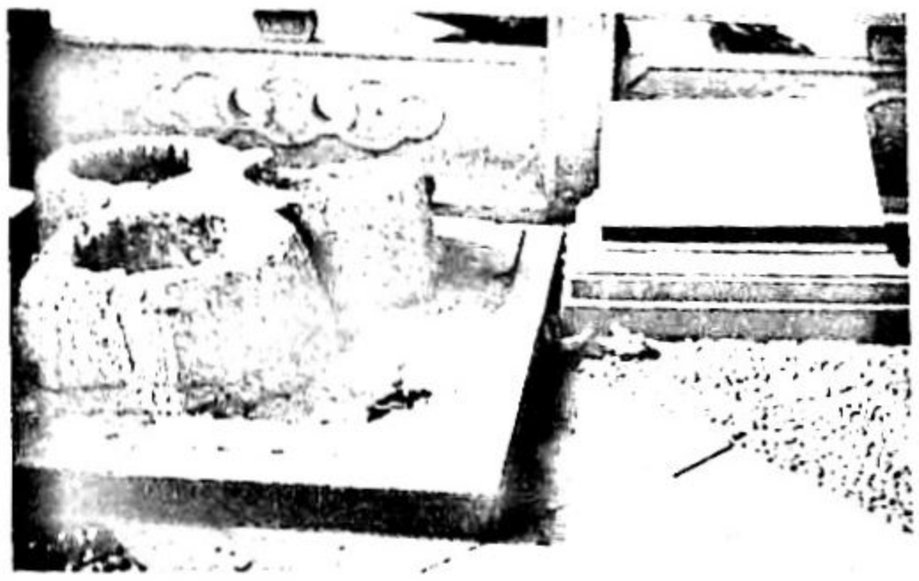


吴山 饮水思源 政声卓著



坐落在松陵镇中心的中山路与流虹路交会处，百姓俗称三角井。此地名得源于坐落其间的一口水井，此井名怀德井，是明嘉靖十一年（1533），时任副都御史的吴山为帮助家乡民众喝到干净的饮水而捐资开凿的。时任知县张明道题名为怀德井，是吴山以德待人的实物佐证。

吴山（1470—1542），吴江松陵人，字静之，号讱庵，为明代名臣。其父吴洪，廉明公允，刚直善断，官至刑部尚书。吴山是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副使、陕西右参政、福建按察使等，官至刑部尚书。吴山为官期间，承扬父志、父德，清正廉明，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曾为江西平反冤案百例，依律惩治位高权重的翊国公郭勋。后人赞其“治狱明允，治河著



怀德井

书。有为有守，永垂令誉”。因与其父吴洪先后都担任过尚书，且都以廉明公允见称，而成为美谈，被后人敬仰。

吴山担任福建按察使时，听讼断案坚持秉公执法，待人接物礼贤下士，在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有民谣“凤之栖兮雏来仪，民之瞻兮其是依”歌颂他为民造福的功德。两年后，吴山调任江西布政使，在任期间，仍以廉靖长厚著称。

嘉靖九年（1530），吴山升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见河南水利工程几乎荒废，历代百姓都苦于水患，他便亲自考查水利，组织治理了沙河的水患，并著《治河通考》十卷，为后人治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为了方便百姓解缴，他力排众议，不顾小人诽谤，坚持将河南的兑粮所移到靠近安阳的回隆镇。

面对贪赃枉法的行为，吴山更是坚决惩办。驻守在临漳府（今临漳县，属河北）的将军朱祐椋，名为官，实为匪。历年来招纳亡命之徒抢掠民财，成为地方一害。他不惧威胁和诬告，宁愿被降职，也坚持上奏章进行弹劾，揭发朱祐椋的累累罪行，将朱祐椋降为平民。

嘉靖十九年（1540），吴山升任刑部尚书，当时翊国公郭勋骄僭不法，受到谏官弹劾。因郭勋是皇帝身边宠臣，皇帝对其一直都很欣赏，大臣们怕得罪皇帝，无人敢表态，纷纷缄口观望。只有性格耿直的吴山冒死上奏，认为根据郭勋犯下的罪行应该治以死罪，其他的党羽依次判刑。但嘉靖皇帝对郭勋不忍心治罪，拿着吴山的奏章久久不下旨，不料后来郭勋竟因病死在狱中。

皇帝听说郭勋死后，一切死无对证，竟恼羞成怒，将吴山削职为民。此时的吴山，已经预料到后果，但他忠于社稷利益，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平静地接受了一切，带着家人打点行装离京，自此归隐田园。直至隆庆（1567—1572）初，时任陕西行太仆寺少卿兼按察佥事的儿子吴邦桢向朝廷申诉，才恢复了吴山原来的官衔，追封太子少保。

后人并没有忘记这位松陵走出的尚书吴山。现今一代贤臣，流芳百世，井边那棵千年古银杏，仿佛是慈祥的吴山老人，透过悠长的历史，默默地护佑着后世故土。如今，三角井作为历史的印记，不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也成为市民称呼吴江市区中心的代名词。



沈啓 呕心沥血 著写《吴江水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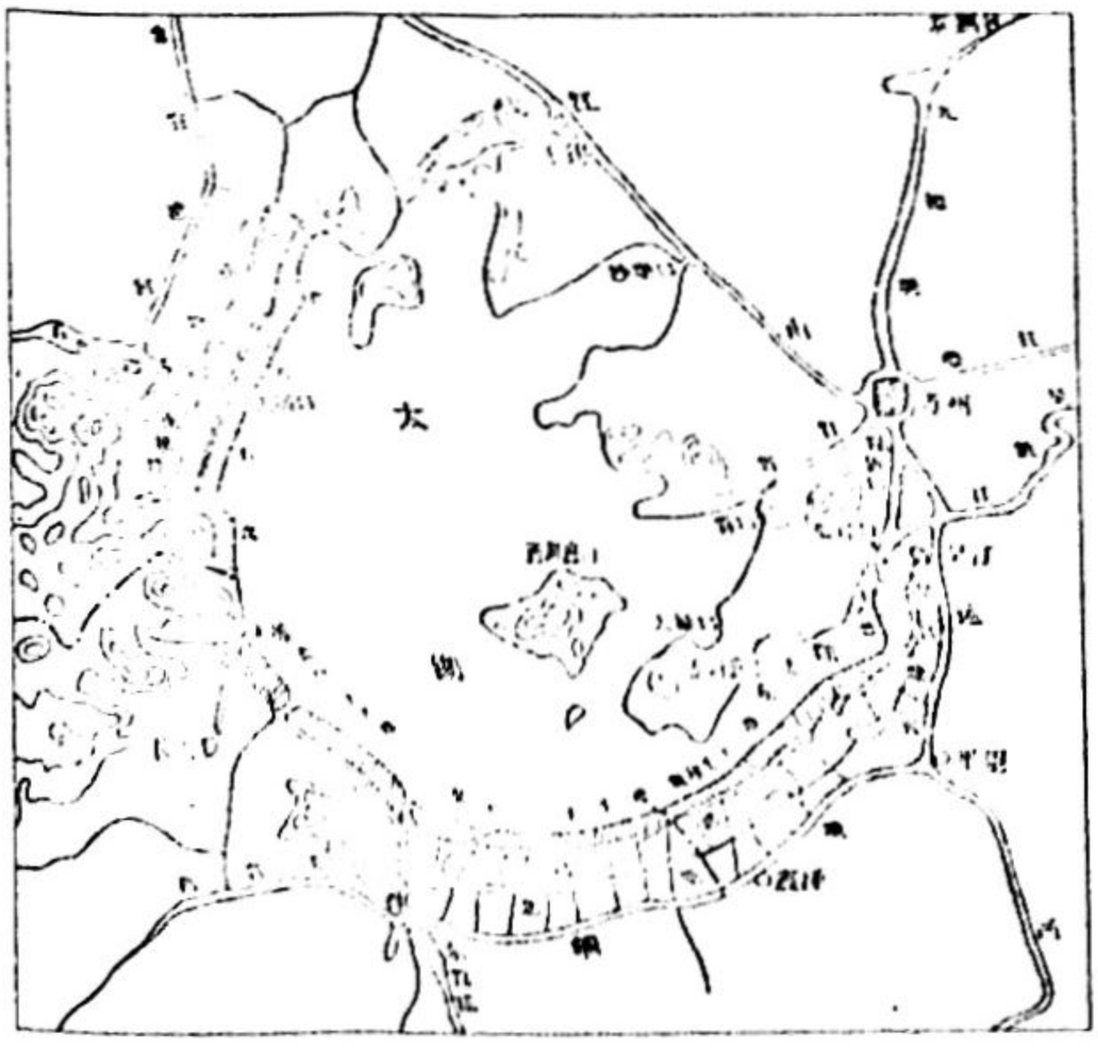
500年前的太湖边住着一位老人，他名叫沈啓，为了将水患变为水利，为地方百姓解忧，不顾年事已高，不分春夏秋冬，身背干粮，沿着太湖一段一段地测量。太湖边的200多个湖荡，上千条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他终于写就了流传后世的《吴江水考》。

沈啓，字子由，吴江松陵镇北门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任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北京刑部主事、绍兴知府、湖广按察司副使等职。

沈啓为人有风骨，处事干练；喜兴作功业，又机敏多智计，长于规划善于理财。任南京工部主事期间，凡官军俸粮、解额积兑之数无不周知。嘉靖十九年



兰亭盛会



太湖水利图

(1540)，朝廷要修缮南京的孝陵，沈啓受命陪同锦衣卫指挥朱某前往现场踏勘。从朱某的言谈举止中，沈啓摸清朱某等想借多列工程项目的名目，从中渔利，就自言自语道，“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皇陵不得动寸土，违反者斩。这次修缮看来是不能不动土了，这可怎么办？”朱某听他这么一说，随即吓得脸色大变，最后决定只修理墙垣。沈啓为国家节省了数万经费。

嘉靖十八年（1539），沈啓曾署理工部都水司监督龙江提举司一职。龙江位于南京城北，面临长江，是明代重要的造船基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船只即从龙江起航。沈啓上任伊始，即受命“通将各船工料数目画图造册，以便检阅”。他也深感船政废弛，弊端丛生，日讨月求，锲研寻究，因旧附新，不到两年的时间，即编纂了《南船纪》一书，内记各船图形、工料数目及因革典司诸例。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传统木船制造技艺”纳入其中。《南船纪》详细记载了明代造船技术，不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实物载体。

嘉靖二十四年（1545），沈啓出任绍兴知府。位于绍兴城西南二十余里的兰亭，是书圣王羲之邀请文人雅集、曲水流觞、挥毫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

沈啓偶然前去寻访，发现曲水、鹅池已面目全非，不禁叹息道："这是王右军修禊之地。禊帖传天下，人人都珍爱，现在荒废成草莽小道，实在可惜。"到任第三年后，治政稍有空闲，他就访求故实，捐俸挖通了水源，修复了曲水、鹅池、墨渚，建起了王氏故址、碑亭等，修旧如旧。次年三月，恢复了兰亭曲水迂回映带、楹栋辉映的旧貌。直到今天，游客到绍兴，必去兰亭瞻访，不能不说是当年沈啓的一大功劳。

明初，太祖朱元璋下禁海令，片板不许入海。天长日久，在生计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沿海商民逐渐在近海与外国贸易。沈啓到绍兴任职的前几年，巨商李光头、许栋、王直等在势家大族的庇护下，占据宁波双屿岛与日本商人交易，并且经常收取日方定金而发不出货。日商不断索债，李光头就向地方官府报称，那里有日本商人在进行非法贸易。官府派兵去围捕时，他们又转而把消息透漏给日商，以此来抵债。当时，海防久废，倭寇对沿海危害十分严重。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倭。他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搜捕通倭的奸民，先后平定了普陀山和双屿的倭寇，并下令在双屿筑寨派兵把守，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内海。闽浙的权贵势族及奸商以通海获利颇丰，因此十分仇恨朱纨。他们一面宣称所捕倭寇尽是良民，一面挟制地方官员从轻处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沈啓不遗余力地推行朱纨的政策，因而被朱纨所看重。地方上的官绅权势为了打击朱纨，就以升官发财来利诱沈啓。沈啓非但没有被迷惑，反而向朱纨建议海禁四款，不久又提出了《禁海八议》，更加具体地陈述海禁的规章制度。这样一来，权贵弹劾朱纨的奏章中，不免也要捎带提到沈啓。嘉靖二十九年（1550），沈啓被调任湖广按察副使。

嘉靖三十二年（1553），沈啓还是因为在绍兴支持朱纨海禁的事情被撤职。回家以后，本可以安度晚年，但他看到家乡由于经常闹水灾，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收成，就决心在有生之年对吴江水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将水患变为水利。他重视前人经验而不迷信古人，注意调查研究，着力实地考察。有一次，沈啓来到一条河边。河水湍急，他一手拉着河边的树枝，一手拿着标杆测着水的深度。为了能得到准确的数字，他艰难地沿着岸下走着，不小心一个失足，掉入了河中，让水冲走了几十米，幸好被人发现救了上来。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吴江水考》一书终于完成。全书分五卷，书前附《吴江水利全图》《太湖全图》、《苏州府全图》、《东南水利七府总图》、《吴淞江全图》、《娄江全图》、《白茆江全图》等七幅水利图，对研究太湖流域治水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专题记叙了古人有关测量水位的记载，说明了我国的做法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吴江水考》距今四百多年，但对当今的水利事业仍然有参考价值，江苏省兴办太湖复堤工程时，曾参照过他的筑堤法。

《吴江水考》的价值，也正体现了沈啓的人生价值。

朱国祚 守礼治事的忠厚长者



场景一：通州科举考试结束，一帮文人在船中饮酒游玩，船行至酒肆，众人登岸，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迎面而来。其中有人急忙夺路便走，竟连夜步行了20多里回到在通州的寓所。

场景二：一大官的两个儿子在街上行走，因是夏天，随从的家人张着大伞，不小心挂破了街边店家的帐篷。吵嚷间，恰好那大官乘着轿子路过，店家向那官泣诉，大官下轿，让仆人把那两个儿子叫过来，拿起竹篦，在大庭广众之下各打了30下，并对店家劝慰有加，令一街人大为感动。

这些史籍中所记载的，正是明天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祚的故事。

朱国祚（1559—1624），字兆隆，吴江盛泽人，为顺天太医籍，其父朱儒为太医院御医，曾孙朱彝尊为清朝著名诗人。朱国祚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状元，授修撰，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又进谕德。二十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兵攻朝鲜，明朝疆土受到威胁。朝臣沈惟敬怂恿兵部尚书石星奏请加封丰臣秀吉为王，朱国祚指斥沈惟敬是“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责问石星：“公独不计辱国乎？”石星不纳其言。后丰臣秀吉死，明朝水军大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官大将李舜臣击败侵朝日军，朱国祚被擢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代理尚书。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戚臣郑国泰请先冠婚，后册立。国祚履职上书，争国本至数十疏，最后建议终被采纳，储位遂定。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谲变、朝廷动荡，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社稷坛枯树生烟，朱国祚复上陈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滥狱四事；云南巡抚陈用宾进献土产，朱国祚劾之。朱国祚力持大体，被称为长者。天启元年（1621），加升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翌年任会试总裁，选拔出倪元



朱国祚墨迹

璐、卢象升、黄道周、吴麟征、徐石麒、张国维等一批名士。朱国祚素行清慎，处事能识大体，人们都称他为忠厚长者。都御史邹元标入宫讲经，在堂上跌倒，皇帝遣中使问罪。朱国祚忙站出为他讲情说："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犹艰。"皇帝为之动容。天启三年（1623），晋少保、户部尚书。太监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提督东厂，专权乱政。朱国祚向熹宗密陈阉党之害，魏忠贤甚为顾忌。刑部尚书王纪为魏忠贤所逐，王纪过去为礼部侍郎时，曾因事得罪过朱国祚。朱国祚捐弃前嫌，不计较个人恩怨，联合朝臣，上疏力救。他甚至叹息说："撤免一大臣如小吏，国事不可为矣。"遂上疏请求辞官回乡，至十三疏始获允，并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退职回乡时，皇帝专门派人沿路护送，并赐乘驿站专车归里，所以当时有大臣羡慕地说，朱国祚归乡如登仙。



周道登 秉性耿直 大智若愚



提起吴江故相周道登，相关的传记和明史典故中对其评价是木讷、无能、不学无术等。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解。这位明崇祯初年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当时朝廷里，可谓位高权重，他能在明朝江山凋零之际，秉承自己耿直的性格处理事务，与“小人”相处常表现出大智若愚的神志，实在也是难得。

周道登（？—1632），宋朝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

天启改元（1621）后，周道登任经筵讲官。当年国家连遭大丧，又是熹宗大婚，财力拮据，但他思路清晰，不慌不乱，把一切处理得有条有理。五年秋，熹宗让他担任

礼部尚书，他却请求辞官归乡。原来，当时是宦官魏忠贤专权之时，周道登耿直的性格，是决不肯阿谀奉承的，没过多久，他便被削职为民。

关于周道登的官运，有着“天赐运气，入阁拜相”之说，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话说崇祯帝即位后，为了重建一套像样的领导班子，他命令大臣们推荐十个能力和人品都优秀的宰相候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十个候选人有了，怎么选呢？崇祯皇帝别有高招——抓阄。第一次抓的结果崇祯不满意，接着又抽了一次，周道登、刘鸿训这次被抽中。周道登第一次晋见崇祯皇帝时，就一口气提出三条建议：第一遵守祖宗体制，第二秉公办事，第三上行下效。此三条建议条条有理，也很合崇祯皇帝口味，全部予以采纳，便让他坐上了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高位。

此后不久，朝廷又要选拔庶吉士时，周道登推举南昌朱氏宗室朱统饰。但翰林院则认为他违反了规定，投反对票。但周道登不为所动，他认为国家唯才是举，用不着避讳宗室，坚持自己的做法。

官场上的周道登，做事耿直，为人却是谦和礼让。在很多人看来，他非常愚笨木讷，《明史》上记载：某日朝会，崇祯帝见某位官员的奏折上有黑齿一词，不解，便请教这位周大学士，周阁老想了半天，回奏道：“黑齿，齿发黑者也！”（意思是，黑齿就是牙齿发黑）。

另几则笑话则是：崇祯御经筵的时候，问周道登：“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想了半天，顺口作答：“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后，再回奏皇上。”过了一段，崇祯忽然想起件事，就问：“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回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真令崇祯皇帝哭笑不得，就连站立在旁边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明史》上的几则记载，真假难辨，或许是有意贬低。仔细想来，在当时十分严格的科举制度下一路选拔出来的人才，周道登决不会是如此愚昧，而是深藏不露。其实，他早已看到明朝气数将尽，上下皆昏庸无能，这样无用之言，应付了得。

周道登与昆曲盟主沈璟是好朋友。崇祯初年周道登被朝廷重新起用，临行前，沈璟写诗《送周文岸太史还朝》送别，诗中希望周道登继续关心民众，把家乡的丝织工人放在心上，还朝做官后，要为他们多讲一些有利的话。周道登读完诗后，非常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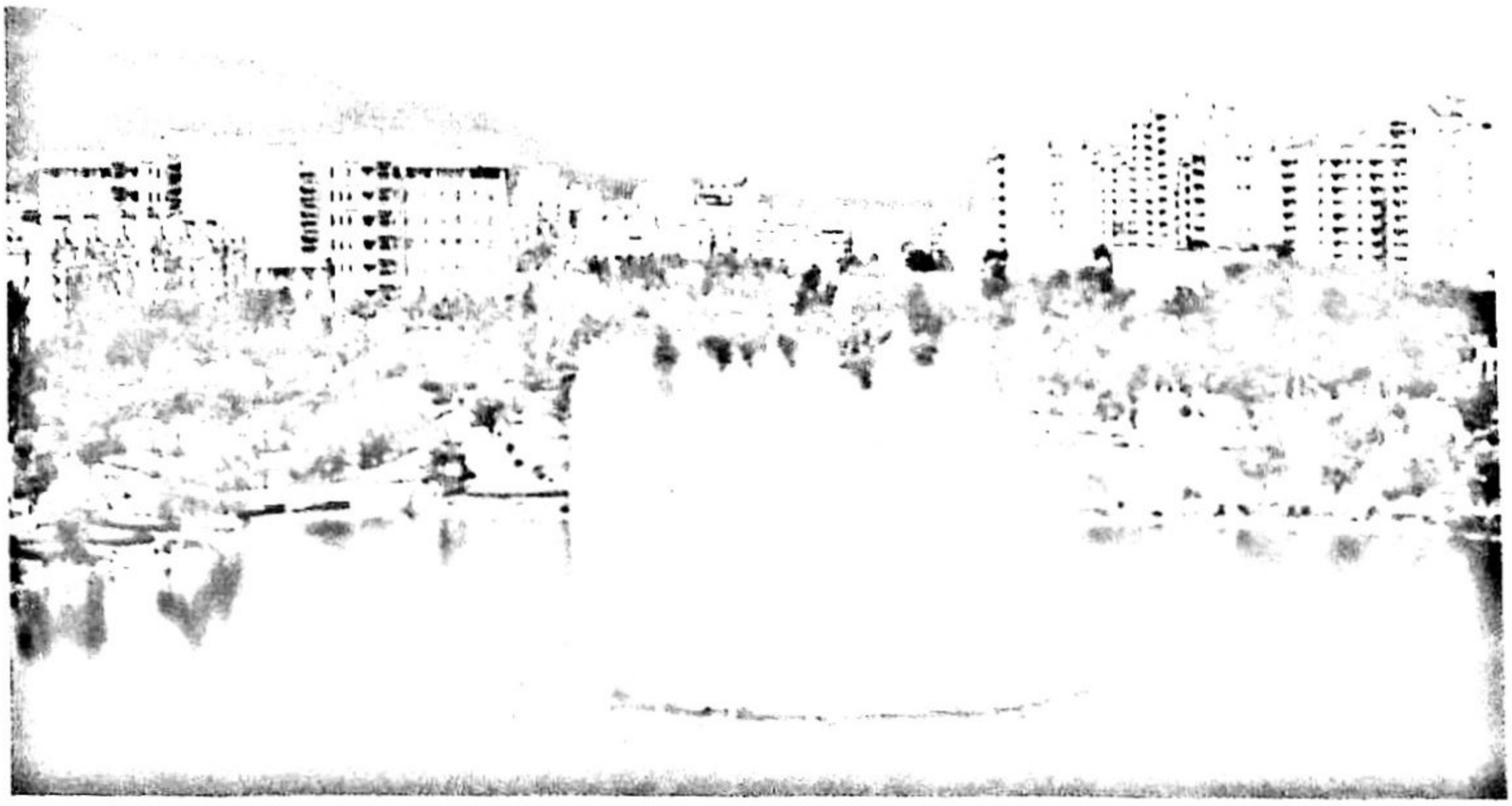
秉性耿直的周道登，在职期间秉公办事，几次推辞朝廷的封赠，也不喜欢拍马奉承，结党营私，由此得罪了一大批官员。在当了一年的宰相之后，御史田时震、任赞化等上章议论他的不是，周道登便被崇祯皇帝请回了老家。在离开京城时，他还向朝廷上书谏议，说蓟门是作战重地，驻兵千万不可滥竽充数，一定要派精兵强将。精忠爱国的思想让人感动。

周宗建 清然正气斗阉党



那是在明天启六年（1626）三月的一天，一群东厂太监杂沓的脚步声，蛮横地打破吴江县城的宁静，直向位于小东门、在家丁忧的当朝御史周宗建府上逼近。周宗建被这帮魏忠贤的太监爪牙械系出吴江后，关进了镇抚司。“你现在还敢说魏上公一丁不识吗？”太监爪牙问。“哼！”周宗建昂着头颅，轻蔑一笑：“一丁不识。”——铁钉钉身，尝尝铁钉的厉害；骨头硬——沸水浇烫，尝尝皮开肉绽滋味……一代忠臣，在与魏忠贤阉党作最坚决、最残酷斗争中，就这么的轰然倒下……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号来玉，吏部尚书周用曾孙，盛泽镇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担任浙江武康县（今属德清）与仁和县（今属杭州）知县，有



今日武康

政绩，四十六年，被召赴京述职，为福建道监察御史。

由于祖父遭到县官的诬害，家道中落，周宗建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他非常了解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曾写过一首《吴农叹》。诗中说："田家终岁勤耕作，获稻秋成未为乐。民间粟少官廪多，辛苦农人食藜藿。丰年犹自苦饥寒，况乃天灾水为虐。税赋东南尽入边，征输岂问年丰恶。司牧年年见岁丰，老农日日填沟壑。"

武康县内土地贫瘠，他担任武康知县期间，废除杂役，禁收潮粮折耗，让民间休养生息。他将俸禄全部捐给地方上用于修学宫、铺路造桥、接济贫困生员就学。他谢绝一切馈赠以及交际应酬，生活琐事全部托付给诚实朴素的家仆操持，常以野菜干佐餐。家仆张铭曾在武康县官廨的墙壁上题诗："中宵独对瓦灯火，尽日惟餐野菜干。"

周宗建年幼时就富有正义感。有一次，他在父辈谈话中听到忠臣杨忠愍被严嵩迫害致死时，他愤怒地吼道："我去找他评理。"周宗建进京城时，正是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斗争激烈的时候，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看到了明王朝的危机，就纷纷起来与魏忠贤作斗争。周宗建毅然站在了魏忠贤的对立面，他上疏历数万历朝内许多人的不是，为受打击的礼科给事中顾存仁等人鸣冤。



天启元年（1621），沈阳被后金攻破，形势危急。周宗建就请求皇上破格用人，召唤被革职的名将熊廷弼。这熊廷弼是抗击后金的军政长官，被魏忠贤等人诬以“贪污”罪名逮捕判了死刑。周宗建愤愤不平，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历数了魏忠贤的罪状，认为长此以往，是忠奸颠倒，国家危亡。见了周宗建的奏章，皇帝却一言不发；而魏忠贤对周宗建则恨之入骨。接着，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在太监魏忠贤的策动下，被重新请入宫中。此事有失皇家体统，周宗建带头极力反对，但他的进谏遭到斥责。

天启三年（1623）二月，周宗建把矛头直指魏忠贤。他指出，现在宫中内有魏忠贤为指挥，旁有客氏为羽翼，外有刘朝掌禁卫，又有郭巩等人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忠臣，满天下已是忍无可忍。还要求追究魏忠贤倾轧朝臣草菅人命的罪责。他为此反被夺俸3个月，出朝巡按湖广，不久丁忧归乡。

天启四年（1624），左副都御史杨涟又上疏，揭露魏忠贤及其手下的二十四大罪状。接着，又有70多名朝臣也上疏揭露魏忠贤，奏疏有100多封。其中有高攀龙上疏崔呈秀贪污受贿、通敌卖国罪行的奏折。据说，这奏折是通过周宗建上奏的。

为人正直的周宗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历数魏忠贤等专权、祸国罪状，成了魏忠贤等太监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直在伺机拔掉周宗建这颗钉和刺。日夜期盼来的机会，就是广宁失守，巡抚辽东的熊廷弼被定下“失疆辱国”罪行，熊廷弼是你周宗建力荐的，“借熊廷弼的罪，杀周宗建的头”，找的就是这份干系。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们一阵阴谋合计后，一路癫狂地直奔离京城千里之遥的吴江小东门，迫不及待地把孝服加身的周宗建逮进镇抚司，一身浩然正气的朝廷重臣，饱受铁钉钉身、沸水浇烫，至死也不向魏忠贤阉党之流低头。

崇祯三年（1630年），在吴江城内仓桥前诏建忠毅坊，在南关（今长桥南）建“首扬忠毅”坊。周宗建曾任职的武康县士民闻讯，将前溪书院更名为“周公书院”，建周公祠、命名周公井，以示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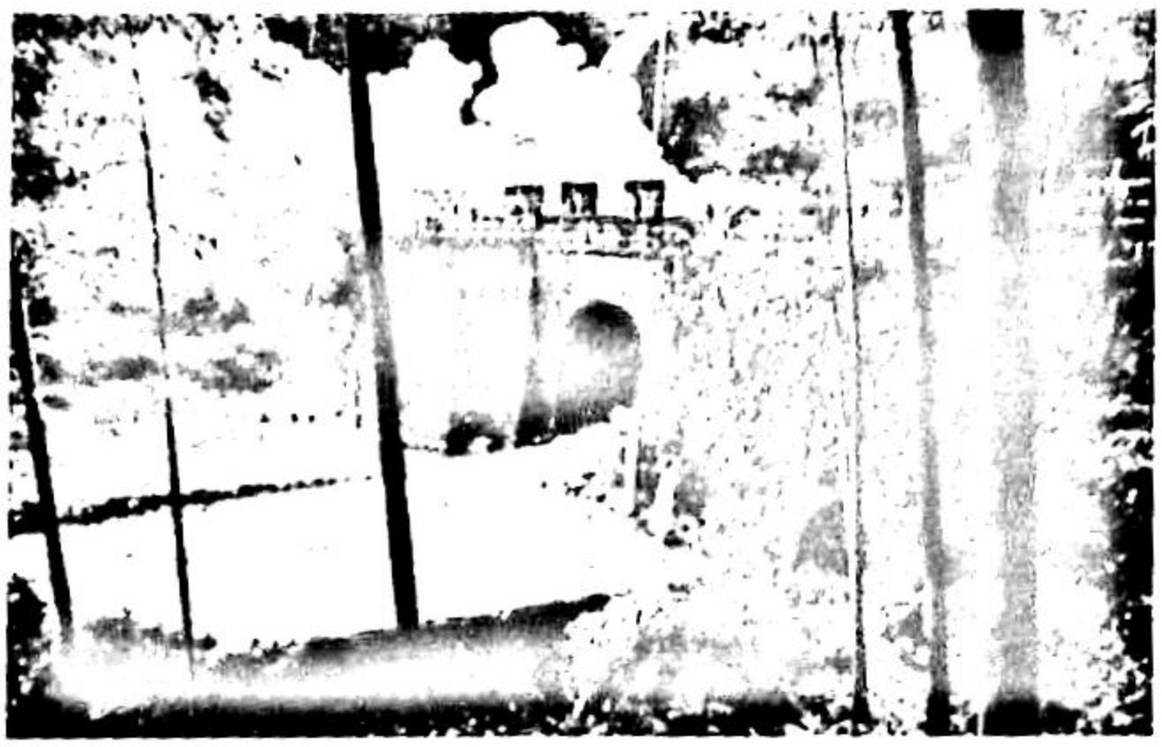
洪祖烈 忠义人杰 舍身救国



民风温婉的江南，一向以出才子文人、富商巨贾闻名。但不乏有人以武起家，从军报国，忠义事迹，流传青史。明末清初的洪祖烈，就是这样一位尽倾肝胆，舍身报国的义士。

洪祖烈（?—1646），字定远，一字山峡，明末吴江芦墟人。因出身贫寒，他十几岁时就到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的当铺做学徒。虽然生活清苦，但洪祖烈自幼生得一身蛮力，体格强于常人。当时县城里流行角力，臂力过人的洪祖烈虽然年轻，但在角力赛中从未尝败绩，有见地的人预言，此子今后必将以武起家。

洪祖烈没有埋没自己的天赋，他在忙碌的闲余，潜心研究《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籍，刻苦练功，至明万历四十



仙霞岭

四年（1616），洪祖烈终于考中武进士，授金山把总，为朝廷征战辽东。初战告捷，又带兵赴贵州，再调防福建、广东。戎马生涯，自此拉开。

虽然出身江南，但尚武的祖烈性格刚烈，不事权贵，屡次陈直，多次险遭宦官魏忠贤迫害。清兵入关之初，南明朝廷刚建立，大敌当前，熟悉军事策略的洪祖烈认为清兵不善水战，向上呈训练水师、凭长江天险抵御清军的计划，但遭到阮大铖、马士英的忌恨，后被革职，报国无门，饮恨还乡。

南明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占领南京的清军继续向南方进军，江浙反清义士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清兵。大家推荐曾在明朝廷当过官的屠象美、李毓新当头领，推荐投降清朝后又反正的陈司为大将军，由前吏部郎中钱棅出钱作军饷，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被革职在芦墟家中的洪祖烈听到消息后，也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响应屠象美等，打起了抗清的旗号，到嘉兴参加战斗。

清军在杭州听到消息后，六月十五日向嘉兴发起进攻。义军与清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混战中，起义军由于缺乏有力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打了败仗。屠象美、李毓新死于混战之中。洪祖烈与钱棅一起带领余下的军队撤离嘉兴，在吴江震泽一带伏击清兵。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也取得了几次胜利。最后，清军集中很大的兵力，对洪祖烈的军队进行了围攻，终因寡不敌众，义军失败，钱棅在战斗中阵亡了。洪祖烈只好带领余部突围，辗转到了福建仙霞岭。当时守卫仙霞岭的是另外一支以郑为虹、黄大鹏为首的义军，洪祖烈带着兵马到了仙霞岭，与他们合兵一处，继续抵抗清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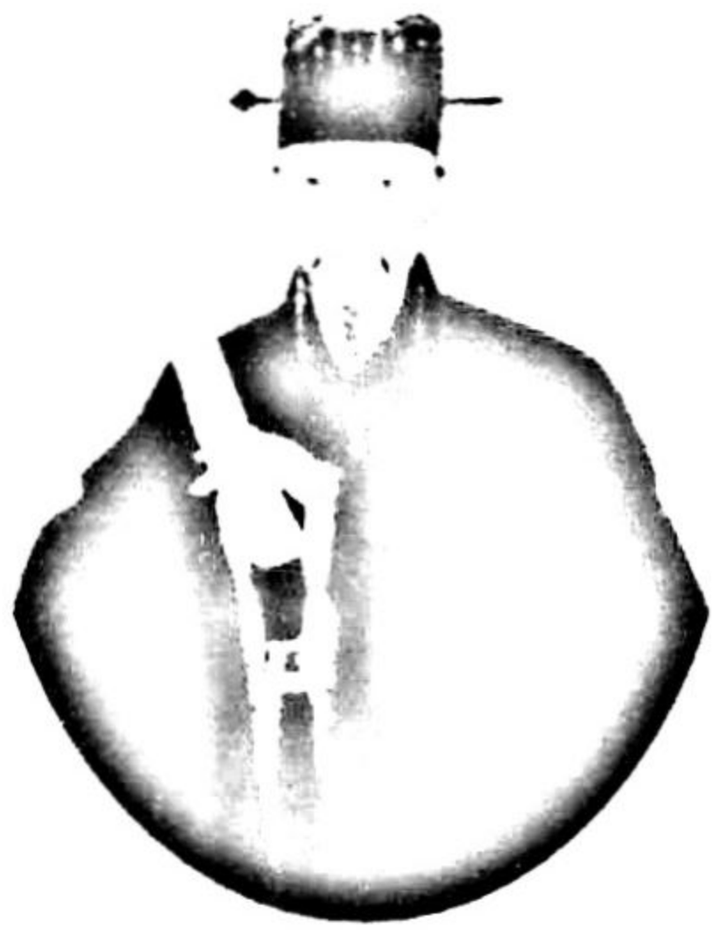
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兵开始攻打仙霞岭。洪祖烈与郑为虹、黄大鹏一起，奋力抵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鲜血染红了仙霞岭。郑为虹、黄大鹏等抗清的官兵大部分阵亡了。洪祖烈顽强地战斗着，最后粮尽弹绝，身负重伤，被清军俘虏。

清兵把洪祖烈押到了某贝勒的面前，贝勒劝洪祖烈投降，洪祖烈誓死不从。贝勒爱惜他的忠勇，不停地劝说着。洪祖烈宁死不屈，咬破舌头喷血大骂贝勒，最后奋起夺下边上一个清兵手中的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慨然赴死。

洪祖烈死得轰轰烈烈，不仅使在场的士兵十分震动，那位贝勒对他的精忠也十分敬佩，命令手下将他的衣冠入葬，他的灵柩由门生王正梵、家仆进兴扶着回到家乡安葬。

吴易

太湖义师 威震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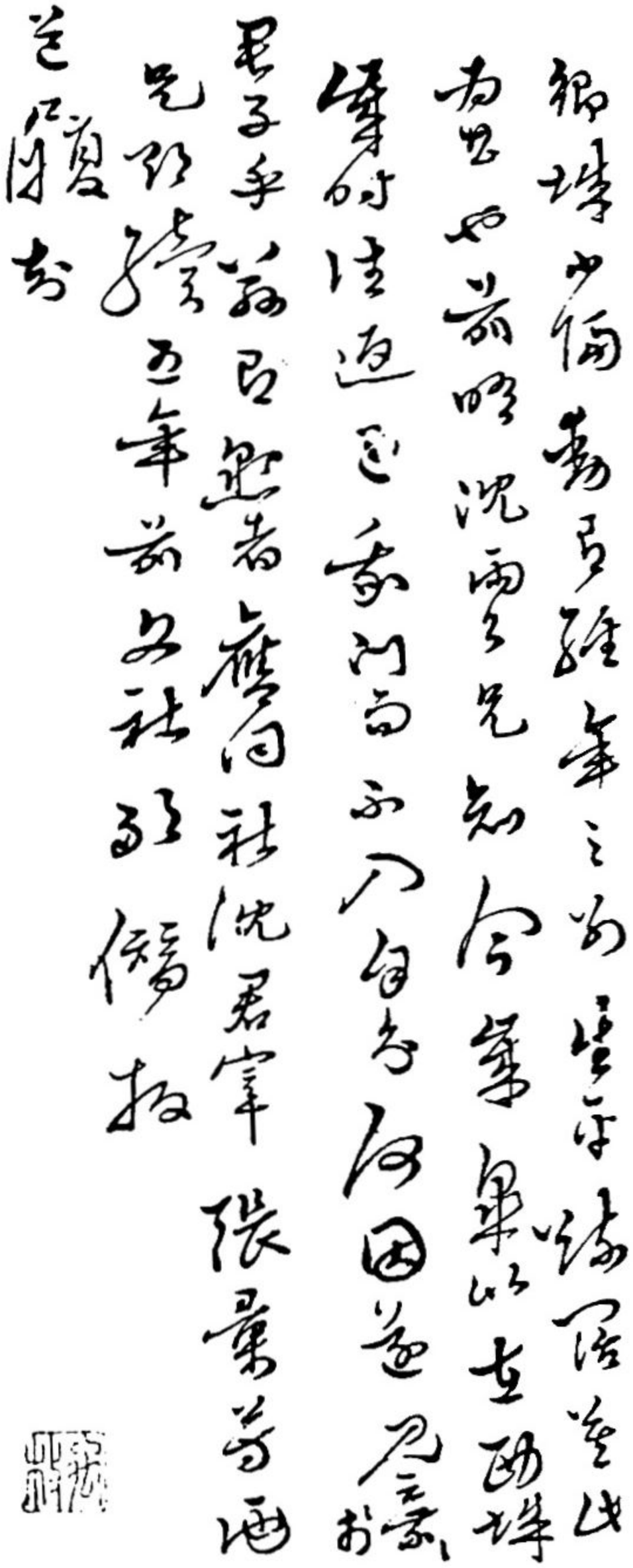


清顺治二年（1645）八月二十一日，对于抗清主帅吴易而言，是怎样的一个腥风血雨之日？清提督吴胜兆会集四郡兵马，将长白荡团团围死，老天也不帮忙，大雨滂沱不止……火炮尽湿，弓弦解胶，偏偏逃命的船只，又负重托，沉没水底，父亲承绪、妻子沈氏和女儿以及好友、众将士纷纷在他眼皮底下或淹死或战死，吴易只身潜水，逃离死地，遁迹太湖深山……

吴易（1612—1646），字日生，吴江松陵人，是万里寻母被颂为“全孝翁”吴璋的五世孙。吴易天生神力，研兵法、好武艺，还是崇祯年间东阁大学士文震孟的高足，文章以议论见长，20岁时已在复社颇有名望，可谓文武全才。

吴易成长在明末抗击后金满洲侵扰年代，在抗击异族入侵中屡建奇功的戚继光、俞大猷等，自小就成了吴易心中的楷模和偶像。明崇祯十六年（1643），32岁的吴易进京会试，中进士。就在许多士人钻天打洞、想方设法捞取一官半职之时，吴易看到的听到的，则是边烽日日告急、山河动荡，大明朝已处乱象横生境地。什么吏部选派、谒选当官等等，吴易一概弃之不顾，他立即整理行头，策马出了京城，直奔吴江柳胥老家，与交往甚密的孙兆奎、包捷、杨廷枢等，酒间纵论国事。

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吴易义愤填膺，五内俱焚，他在门上大书誓言“讨贼复仇”，并撰写了《恢复中兴末议》四篇。正苦于报国无门，传来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开馆礼士、招贤纳才的消息。吴易与朋友商定，由他奔赴扬州，向史可法进献四篇，提出抗击清军、光复明室的内外策略；孙兆奎等则留在吴江，积蓄力量，待机应变。史可法虽没采纳吴易的四篇和策略，但对吴易甚为赏识，留下他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在部队中监督军纪。三个月后，吴易奉史可法之命，督饷水军，开赴江南筹集粮饷。不久，传来扬州失守、史可法壮烈殉国消息。无奈，吴易指挥船队驶往吴江，在三里桥、东太湖等处扎营。他与孙兆奎等义士商



吴易书函

汉、决定倾尽家财充当粮饷，立即起兵抗清。

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一，吴易、孙兆奎在吴江东太湖起兵抗清，树起了江南第一面抗清义旗。因士卒都用白布包头，故又称“白头军”。吴易“屯兵长白荡，出没五湖三泖间”，白头军在汾湖等地不时大败清兵。如清人《思文大纪》记载：“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等，白头军在吴江及周边县开展抗清斗争，一时在江南名声大震。在福州的明朝唐王朱聿键得到消息，授他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江南军事，又升他为兵部尚书。在绍兴的明朝鲁王朱以海也授他兵部侍郎，封长兴伯。清代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称，当时义军蜂起，四处抢粮，勒索富人，只有吴易义军“兵有纪律”。

六月四日，清兵到了苏州，不久向吴江进攻，知县林嵋弃职逃走，县丞朱廷佐开门投降，做了吴江知县。六月中旬，吴易侄子吴鉴听外面传说，明朝将领黄蜚已经带兵到了无锡，要收服江南，十分兴奋。一人赤手空拳就跑到吴江县衙门前，大骂朱廷佐是汉奸，被抓后在胥门的学士街被杀。

吴易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太湖潜回吴江。闰六月十一日夜间，他在城外振臂一呼：“杀鞑子打汉奸的跟我来——”便有30名好汉跟随着他冲进了城内，冲进县衙杀了朱廷佐。不久，白头军的队伍，也从30人发展到了3000余人。

在苏松郡邑相继失守之后，以白头军为中坚的太湖义师，就成了清军的主要征剿目标。对于时局，吴、孙早就洞悉，江南这半壁江山，迟早也会落入清军之手，只是“事成不成总由天，我志可伸不可屈”，即便是肝脑涂地，也要在天地间留一股浩然正气！

八月二十日，清提督吴胜兆从苏州统兵南下吴江征剿白头军。率战船54艘，从白龙桥至平望，在京杭大运河列队30里，声势浩大、军威煊赫。可被吴易、孙兆奎以横拦腰、纵迎头的战术，打得清兵溃不成军，丢下20艘战船和无数尸首，退兵吴江城。当夜，吴易在长白荡大营摆开酒宴，与将士共庆胜利。不料，吴胜兆凌晨即刻会集四郡兵马，将长白荡团团围死，这时又下起瓢泼大雨，炮火尽湿、弓弦脱胶，手足无措中白头军成了笼中之鸟……

长白荡之战惨败，白头军全军覆没。吴易一息尚存遁迹太湖深山，以图东山再起。恰在这时，吴江人周瑞招集数千义兵，在吴江、青浦、嘉善三县与清军搅腾不休。白头军惨败之事，周瑞早有耳闻，更是仰慕这位白头军主帅。顺治三年（1646）初春，周瑞与另外3名义军，将吴易从太湖深山迎回长白荡老营，吴易重新成为了白头军主帅。

那年的元宵佳节，白头军吴易等义军再次攻占吴江城，并冲入县衙，杀知县、劫监狱，大挫了清军锐气。在以后的多次交锋中，清军也是败多胜少。六月，吴易攻嘉善，嘉善知县刘肃之假说要反清，约吴易会谈，将吴易诱捕。不久，吴易就义于杭州草桥门。临刑前，吴易面北而拜：“今日臣之志毕矣。”

殷兆镛

四朝老臣 铮铮铁骨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水木清华轩外的抱柱上，悬挂着一幅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皆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潆荡洵是仙居。"它深化了园林人文意境，更为秀美的庭园增色不少，已成为清华校园内的一处名胜。这幅对联的书写者就是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的清代四朝老臣殷兆镛。

殷兆镛（1806—1883）字补金，又字序伯，号谱经，在家行大，是上海滩女明星第一人殷明珠的曾祖父。殷氏家族祖居河南陈州（今淮阳），后迁江苏。嘉庆十一年（1806），殷兆镛生于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东溪湖村。父亲殷星环，进学成为秀才之后，专事丹青书法，遐迩闻名；母亲张慕莲出身举人之家，知书达理。

殷兆镛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同治七年（1868）授礼部侍郎，并先后任兵、工、户、吏部侍郎。作为清廷四朝元老，殷兆镛不但是位政治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著有《松陵诗经》、《玉尺堂诗文集》等传世。

殷兆镛性格耿直，坚决抵抗列强侵略。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犯天津，他积极上奏，力主抗战，在皇上和诸位大臣都犹豫不决时，他慷慨陈词，当面痛斥他们的胆怯和懦弱。次年，殷兆镛任兵部侍郎，召集各省组织团练，联合抗击英军。在中华大地被列强践踏的乱世，殷兆镛的奔走努力，无异于一支强心针，警醒了国人，振奋了民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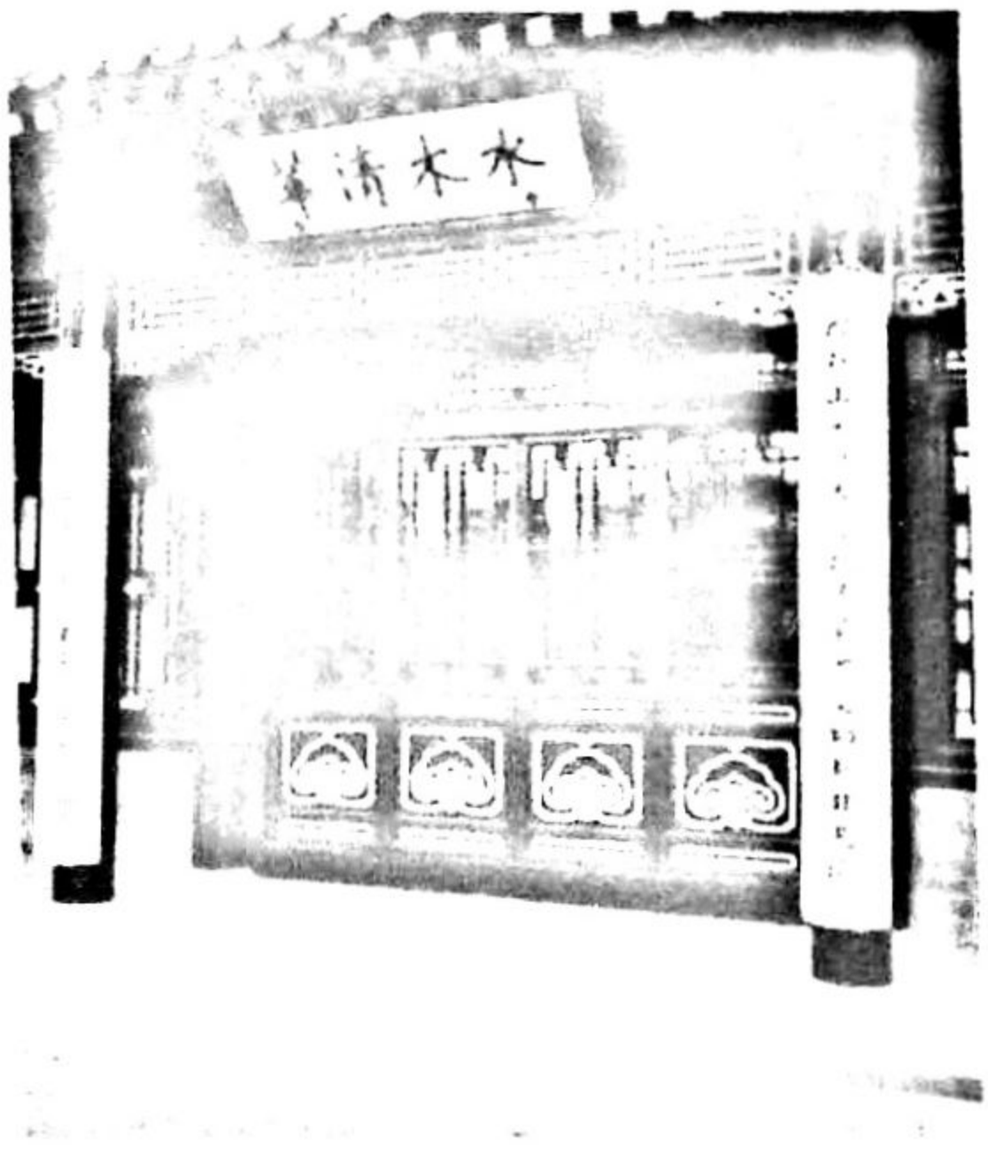
任大理寺少卿时，殷兆镛不畏权势，弹劾将军奕山丧失黑龙江以北国土的行径："以边地五千余里，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奕山因此被革职留任。虽然先后任兵、工、户、吏等部侍郎，但殷兆镛始终未能成为尚书。因此，他自叙年谱便称为"侍郎"。

殷兆镛除在清华园留下墨宝外，不少西郊园林也有他的足迹。同时，他能够将这些事物用年谱记述下来，为后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阅读《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中对与京西名园及活动的记述，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情况。尤其是描述了英法联军入京后焚掠园林的情况，细节翔实。这些园林变迁的细节，不但揭示了侵略者的斑斑罪行，也让后世之人永远记住了历史和国耻。

光绪七年（1881），殷兆镛以病辞官，此时的殷兆镛，已经是一位垂暮老人。在为国鞠躬尽瘁一生之后，带着一身病患，归隐姑苏。在今天苏州城内的萧家巷，仍然保留着殷兆镛的玉尺堂。一部传世的《玉尺堂诗文集》，留给后人凭吊。光绪九年（1883），殷兆镛病逝于家乡。

纵观殷兆镛一生，他侍奉过四代帝君，在大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年代，清廷一片混乱之际，他始终保持着江南人的中庸和儒雅，坚持原则，本分尽职。在列强蚕食中华大地，百姓生灵涂炭，陷于水火之际，他挺着铮铮铁骨，拯救河山，为国尽忠。"高风肃瞻拜，忠孝一遗民"，"草堂怀旧迹，杜宇吊吟魂"这是殷兆镛在《黎里新祀徐俟斋先生祠堂记》中的诗句，如今，我们借着同样的诗句，送给这位吴江走出的先贤。



清华大学庭园对联



吴燕绍 醉心边疆铸鸿篇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一、吴燕绍《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三部书中，被顾老推崇至首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边疆史学家吴燕绍耗尽一生精力之作。

吴燕绍（1868—1944），江苏吴江人，是明代名臣吴洪、吴山的后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任内阁中书。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其子吴丰培，与费孝通齐名，是我国现代藏学家，版本目录学、文献学专家。吴燕绍、吴丰培父子两代长期致力于边疆史研究，为我国边疆史的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吴燕绍长期主管边疆事务，积极开拓边疆地理、历史的考证，他希望通过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证，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他对档案资料非常重视，利用大量档案史料编写了《西藏史地大纲》……

光绪二十年（1894）吴燕绍担任内阁中书职务。按当时的规定，凡发抄之件，均需经过内阁，吴燕绍便在值夜班的时候，将遇到的边务章奏抄录下来。宣统时，吴燕绍调任理藩院主事，在北档房行走，见到涉及蒙古、西藏、新疆的旧档，也都择要抄录下来。《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亦聊以固吾圉也”之语。圉，指边疆。吴燕绍特意将“固圉叟”作为自己的名号，经过数十年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吴燕绍终于完成了《清代蒙藏回部典汇》。

《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记录了清朝政府与蒙古、西藏和回疆三个地区的各类事件逾2000万字。书稿篇幅宏大，辑录了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宣统三年(1911)，满清王朝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史料，包括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图书等各类原始资料。吴丰培谈到父亲的书稿时说，“其中不乏秘



吴燕绍登山图

籍、前人所未经发现的，故内容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地理、史事、军政、外交、风土、人情、宗教、文献，莫不涉及。篇幅之多，字数之夥，似乎清代记边之作，无出其右者”。这部书稿，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晚年曾回忆道：“与我同时在大高殿参阅档案的，有吴燕绍老先生。吴老先生是光绪二十年进士，专究蒙藏史，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老年勉学，诚为罕见……”

身为史家，其子吴丰培也一生致力于古籍的研究、整理，对父亲留下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手稿倍加珍惜。在“文革”期间，吴丰培屡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多次抄家。吴丰培把这些手稿放在四个旧式书箱里，混杂于许多旧书中，摆放在书房不起眼的地方。与旁边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古籍相比，这些已经微微泛黄“烂纸头”样的纸稿更加不引人注意。就这样，这些手稿躲过了一次次劫难。

“文革”以后，手稿虽然已经没有“外忧”，但在吴家，仍然是一个“禁区”。吴家藏书颇丰，原来的住所是一个四合院，每到暑期，吴丰培定要动员全家在院子里晒书。其他古书，孩子们怎样翻看，吴丰培从来不加阻止。唯有这部手稿，只许孩子们搬动，绝对不允许翻阅。每次书晒毕，也必由吴丰培亲自整理收好。

2011年秋，吴江市档案局一行人来到北京，拜访了吴燕绍的孙子吴锡祺老人，在吴锡祺教授的记忆里，祖父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毕竟，祖父过世时，他只有7岁。“祖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每天只在自己的书斋里不停地抄写。”但有一件事情给幼年时的吴锡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去世前一个月，他给孙辈每人抄录了一个文折。给我和哥哥抄录的，是前、后《出师表》，我想，这是他临终之前对孙辈的要求。”

吴锡祺教授将16本代代相传、完整保存的吴氏家族族谱郑重交予吴江市档案馆。16本族谱记录着明朝到清朝光绪年间吴氏家族的繁衍情况，也让吴江人了解了吴燕绍，以及吴氏几代人历尽艰险，保存《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这部鸿篇巨著的传奇故事。

百善孝为先，吴氏家族以孝道传家，以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家族，生生不息，人才辈出，历经600余载兴旺不衰。从明代全孝翁吴璋到名臣吴洪、吴山，再到边疆史地专家吴燕绍、吴丰培均青史留名。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但是吴燕绍一生的写照，更是吴氏家族历代传家立业的祖训。

施则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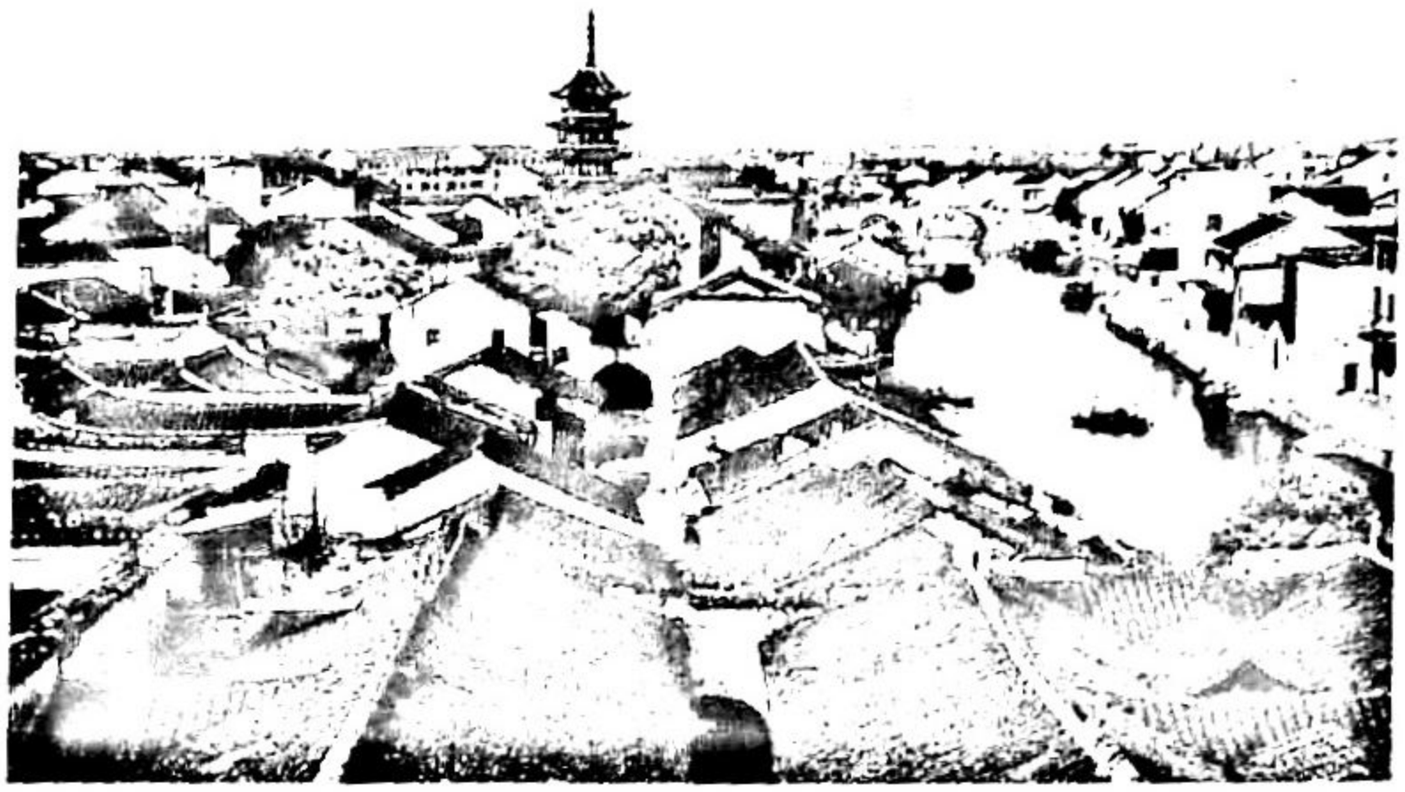
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



江南士绅一向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据史料记载，“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死而不能殓者施棺，病而无医者施药，岁荒则施粥米。”以施则敬为代表的震泽施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施则敬（1855—1924），号子英，吴江震泽人，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恩科举人，以知县见用。施则敬的父亲施善昌早年在上海经商，并创办了仁济善堂，从事慈善事业。施则敬继承父亲事业，胸怀安定民生之志，精力全都寄托在慈善赈济上，先后倡导各省义赈，北至直隶、京师、沈阳，以及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淮，南到江浙。尽管年岁地点更迭，而用心始终如一。

19世纪70年代后期，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施则敬家乡震泽镇



一本堂（施则敬出生于此）

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史称“丁戊奇荒”。面对频仍的灾荒，晚清政府已无能为力，以施善昌、施则敬等江南绅商为主的善士群体遂成为这次赈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力量。施则敬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篋，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并亲自赴山东堵筑黄河漫口。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发生特大水灾，直接受灾范围8万多平方公里，造成200多万人死亡。施则敬亲自到受灾现场，指挥运送竹木土石建造防洪堤坝围堵洪水。洪水去后，施则敬又输送财物、粮食，赈济饥饿疲乏的灾民，使灾民得以生息，皇帝为之嘉许。光绪十六年，直隶霪雨连绵，永定等河决口，数百里间一片汪洋，灾情极重。施则敬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调令，负责治理赈务，区别民户遭灾实际情况，日以继夜地督促胥吏，足迹遍及村落山谷，发放肉类口粮，使灾民各得其生。李鸿章非常赞赏施则敬的工作，认为他为干事之才。施则敬通过屡次赈灾，以道员任用，加二品顶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海战爆发后，清军和平民伤亡惨重，可是军医不敷调遣。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红十字会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并严守中立，不分敌我都得救助。这给国人很大震动，施则敬正是于此时开始接触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信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以施则敬为首的江南绅商为救助战争难民而开始自发组织救援行动。九月十八日，济急善局（后亦称“东南济急会”，简称济急会）在上海成立，中心联络机构设在协赈公所，参与人都是主

持义赈多年的头面人物。济急会在章程中说明“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救助行动。这场救援行动至次年三月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民间自行举办的大规模、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行动。其最终救助人数虽无法确知，但其运送的第一批难民就有一千数百人之多，其整个行动总费用达到了50多万两。也因这次救助活动，仁济善堂及其董事施则敬颇为引人注目，施则敬也从中看到了红十字会的强大力量，于是他开始筹划更进一步的行动。

光绪三十年（1904）的日俄战争为红十字会的成立提供了现实平台。日俄战争爆发后，旅居关外的各国侨民都在本国红十字会的资助下逃离战区。清廷也派遣轮船到东北接运中国难民，但俄国政府却说所有港口都已封闭，他国船只不得驶入，通过官方出面拯救难民已行不通。消息传到上海，施则敬“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遂出面邀集原办济急会同仁20余人在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商议，于三月三日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以“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为立会宗旨，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同时延请中外大慈善家“就近开办”，在上海设立总局，以便筹款募捐，另设分局于北京、天津，收留被救难民，而后“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但“善会”二字表明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且因中国当时未加入《日内瓦公约》，亦无法得到日俄交战方认可。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施则敬立即改弦更张，在教士李提摩太的引荐下，与英、德、美、法四国驻沪代表商议，另行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短短七天后，万国红十字会便在盆汤弄丝业会馆成立，中国首个红十字会就此诞生。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施则敬是最初议定的两位中方办事之一。红十字会的成立也得到清政府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址

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的大力支持。五月十五日，清政府命外务部照会瑞士，声明愿意加入红十字联约。七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

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施则敬等人立即筹划前往东北接运难民。为便于筹集救济款项，红十字会在东北的牛庄、辽阳等处设立分会，扩大救济灾民、资送回籍、救助伤员和战后放赈工作，涉及人员多达46.7万人。战争结束后，红十字会除了继续进行救济贫民、掩埋尸体、遣送难民以及医疗卫生等工作之外，还训练救护人员达数千人。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奏请保奖下，施则敬、沈敦和等12名中方"创始及办事人"以及总会、分会中30名西方董事均赏给"佩带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半年，因旅居海参崴的华人遭俄军滋扰，"所有庐舍悉被一炬，受伤八百人"，施则敬与沈敦和、任锡汾等人即于十月间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准备了大批救灾物资，派人前往救济。次年初，美国旧金山发生强烈地震，当地华人受伤惨重，施则敬等人除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拨银二万两外，又另行发出以"此之谓结团体，此之谓保同种"为主旨的募捐公启，由此集银三万两解往施济。《申报》视为"我国民之爱同胞也，必不以道路远近而间亲疏，目击耳闻而分厚薄"的明证。

日俄战争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停止了在东北的各项救助工作，影响力渐消。掌握着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剩余经费的施则敬、沈敦和以及清廷官员盛宣怀、吕海寰均希望正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宣统二年（1910）二月，清廷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使用大清红十字会关防，盛宣怀任会长，施则敬继续担任董事。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相继参与了1913年癸丑之役、1914年鲁皖豫诸省兵灾、1916年护国战争等重大兵灾的救赈。

晚年的施则敬依然热心慈善事业，1917年在上海创办了上海贫儿院，当时的大总统授予其"急公好义"匾额。1919年他被公举为吴江同乡会会长。1920年他再为华北五省捐赈出力。施则敬也始终不忘桑梓，他倡捐巨金重建倒塌荒废的頔塘浔震石塘十二里，接通南浔到震泽间之邮路，并接筑平望至梅堰塘岸工程。从开始到落成，历时5年。沿途石料平砌，尽管砧石撞击，水流畅通无阻，从此乡土安宁。

钱崇威 是非分明 不为政诱



钱崇威（1870—1968），吴江松陵镇人，字自严、慈严。清代最后一届翰林，是近现代史上吴江杰出的人物之一。

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的江阴南菁书院，是晚清非常有名的书院之一。青年时代的钱崇威就在南菁书院求学、成长。清光绪三十年（1904），钱崇威榜中进士，经殿试入翰林。第二年政府出资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习学法律。留学回国后，钱崇威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袁世凯在列强的支持下，凭借强大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迫使孙中山让位。在这一年，钱



钱崇威书法

崇威官至江苏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他当检察长没有多久，因“有鉴司法黑暗，苞苴成风，又不甘同流合污，便洁身引退”，钱崇威找了身体有恙的借口，辞去官职，到上海生活。1914年任上海律师公会主席。应朋友之邀，曾任北站两路局沪杭路华文秘书、江苏省民政厅文书科科长、青岛实业银行文书科科长。

钱崇威热心地方教育，积极提倡社会办学，先在松陵西门与王？一起办爱德女校，与费伯埙共议筹建吴江中学，嗣后又建议施肇曾创办震泽初中、育英高中，为桑梓服务，为家乡造就人才，并曾有拟办大学的设想，不意抗日战争爆发，计划遂被搁置。

钱崇威精于诗词，善书法。郑逸梅先生在《清代最后一位太史公钱自严》一文中写道：“他的书法挺秀，从矩度中具有超逸神韵，和寻常一般科甲中人板滞工的馆阁体不同。他作书能大能小，能楷能行，有的气势磅礴，有的结构精严，因此墨迹流传，蜚声南北。”生活在上海期间，钱崇威主要以卖文为生，有时候也帮人撰写状书，以补贴家用，后来他回到故乡，与志同友人写字作画，生活倒也自在安逸。

钱崇威善饮酒，性格豪爽，擅打孙派太极拳，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不为敌诱。他有一位相交甚好的朋友叫朱元直，日军侵占吴江时，钱崇威就避难在朱元直家。1938年，朱元直出任伪吴江县长，以副县长之职诱钱崇威出山就任。钱崇威愤然拒官，而后又出走到上海，以卖文鬻字为生直至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钱崇威应邀参加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江苏省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

1954年10月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鲠鲠老人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倾力工作。

钱崇威性情豁达，因他与列宁同日生，因此，杨千里曾刻：“我与列宁同日生”印章赠予他，一时传为美谈。钱崇威晚年居住上海，于1968年3月10日病逝。



钱崇威扇面题字

施肇基 杰出的外交家



施肇基（1877—1958），字植之，吴江震泽人。20世纪上半叶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外交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中国第一任驻美全权大使。他一生抱定“雪耻图强”的坚定信念，为外交事业奋斗一生。

施肇基出生于震泽镇，童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6岁的施肇基随清政府派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杨儒前往美国，充任使馆翻译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杨儒奉调任出使俄罗斯大臣，施肇基留任为随员。是年夏，施肇基从市立中心中学毕业后，辞掉使馆职务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并先后获得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他的求学动力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积弱，受人欺凌，原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血耻图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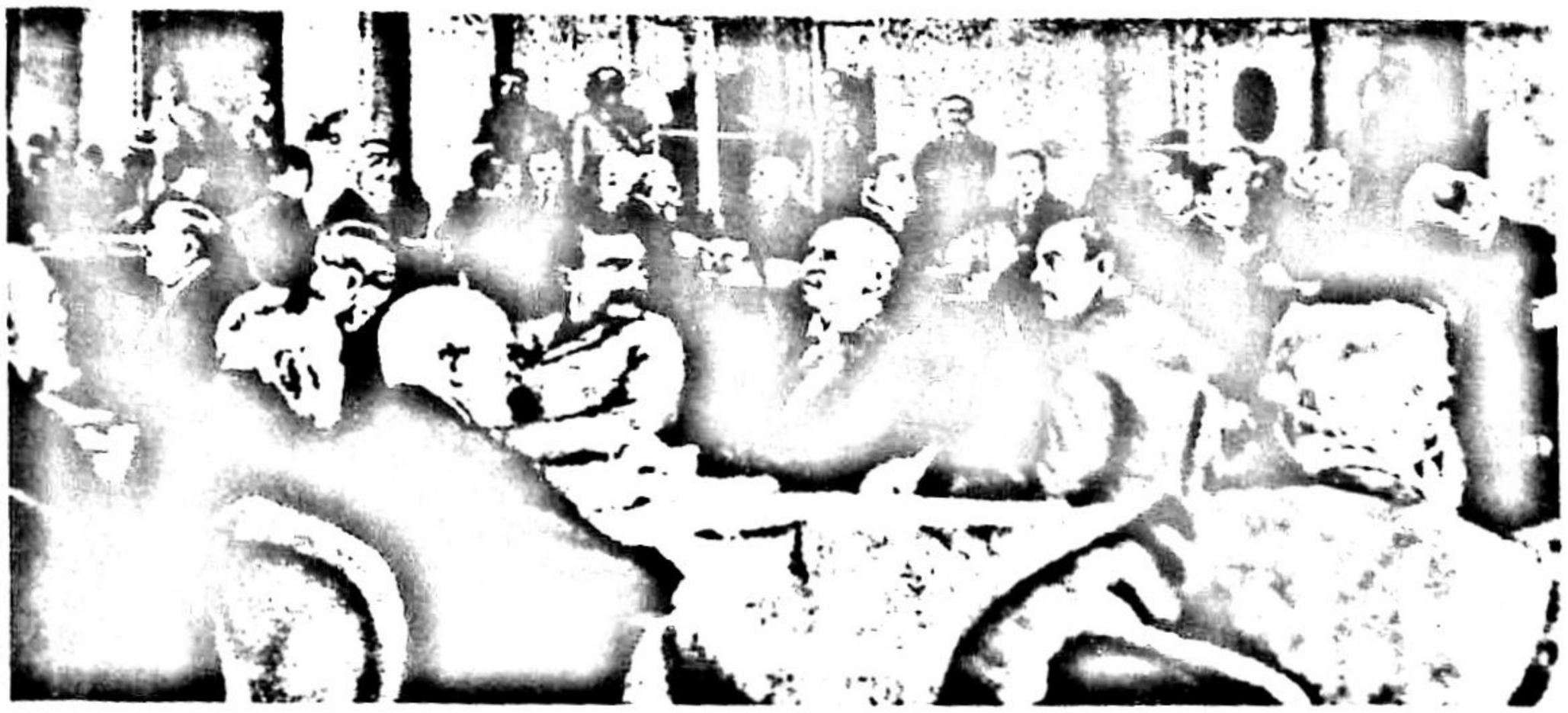


1932年奉调为驻美全权公使，赴任前与家人在伦敦合照（前坐者为施肇基夫妇及四女嘉珍）。

回国后，先后在邮传部、哈尔滨关道、吉林省、外务部等地任职。

在施肇基任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期间，最艰巨的工作是处理辖区内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施肇基上任不久，即奉命与东三省总督代表到沙俄中东铁路公司谈判收回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施肇基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在第一次与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的谈判中，就援引国际法，明确提出撤销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权的主张。由于他的有理有据，在第二轮谈判时，终于使沙俄低头，同意撤销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接收沙俄的水利会。在新的行船章程制定前，制定了《水利会暂行章程》，收回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

施肇基老练处理“伊藤博文遇刺案”。宣统元年（1909）十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前来我国东北考察。二十六日上午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哈尔滨。在检阅俄国仪仗队时，朝鲜志士安重根突然冲出连放数枪，击中伊藤博文导致其不治身亡。事发后，施肇基要求立即停发所有的电报，全面控制消息，建议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绝不发表任何声明，并积极跟进日俄审讯，录获安重根供词之后，亲自以英文草拟新闻通稿交由北京英文媒体刊发。待到各报陆续刊登之后，施肇基方才恢复电报局正常发报，从而占据话语权的先机，令日本人“对我报道无法辩驳，故日方对此案迄无抗议”，为国家化解一场可能的外交危机。



巴黎和会场景

宣统二年（1910）下半年，施肇基升任吉林交涉使，不久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年末，哈尔滨鼠疫流行，很快蔓延到东三省甚至关内。俄日以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各国外交使团更是频频施加压力。危难关头，施肇基挺身而出，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共商治疗之法。清政府任命他为“防疫大臣”，南洋华侨伍连德出任会长，共为会议主席。施肇基一方面争取朝廷的支持和批准，另一方面积极周旋于各国之间。重要的是施肇基从朝廷那里获准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旨，为及时控制疫情创造条件。施肇基与伍连德上下配合，在四个月内力挽狂澜，成功消灭鼠疫，创造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巴黎举行和会。中国派出五人代表团，施肇基作为代表团二席代表出席会议。施肇基与顾维钧一起进行会前准备，他们共同拟定七个问题：第一，二十条和山东问题；第二，归还租借地；第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第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第五，撤走外国驻军；第六，取消国外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第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和会是在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操纵下进行的。他们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决议将原来德国控制的胶东半岛主权交还中国，却又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所有经济特权。施肇基、顾维钧等人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对此条款保留意见，并且一致决定拒绝签字。而中国北

洋政府却已经作出愿意签字的决定。当时中国人民的愤怒之声也很高，中国留学生各组织和华侨代表、部分省的督军省长提出警告或纷纷致电代表团，制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施肇基和同事们商量后，不顾北京当局的决定，尊重和附和民意，果断地拒绝签字，同时，在巴黎各报还发表了正式声明："庄严声明中国代表团因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签字会正式举行。但施肇基等人已经离开巴黎。签字会中国代表缺席震惊了和会代表甚至整个世界。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为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召开了华盛顿会议。11月16日，施肇基代表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十大原则要求，表达中国政府的愿望。随后，施肇基与顾维钧先后向大会提交12项提案。但在美、英两国压力下，中国被迫接受不将山东问题在大会上讨论，由中、日单独谈判讨论。经过36次谈判，1922年1月27日，中日达成《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2月4日，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2月6日参会各国达成《九国公约》。中国总算有条件地收回山东权益，是外交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施肇基任国联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1931年9月18日，沈阳日军挑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寄托于国际联盟向日本施压，急电给施肇基，"要求国联主持公道"。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请求国联出面干涉。22日，国联做出决议，向双方政府同时发出紧急警告：避免扩大事态，寻求撤军办法。30日，在施肇基要求下，国联再次做出"停止冲突、双方撤兵"的决议。但是，日本不但不执行国联的决议，反而再次扩大军事行动。事变掀起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怒潮，施肇基身心非常疲惫，他向南京政府电辞国联代表职务。

离开国联这个火山口，施肇基又于1932年4月辞去驻英公使之职。1933年，施肇基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公使，1935年6月中国驻美使馆升格为大使级后，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全权大使。1936年8月，59岁的施肇基以年老体衰为由辞去驻美大使职务，1937年回到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施肇基不甘人后，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美国为中国争取抗战物资。其后，又接受美总统罗斯福之聘请，任"美国南非洲国际和平五人委员会"非美籍委员，代表处理南非问题。1945年6月，他作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出席旧金山会议。1948年至1950年，担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1954年秋，因脑溢血身体状况欠佳逐渐淡出外交舞台。

邵力子

计划生育的人



说起计划生育，大家都知道马寅初不遗余力地呼吁，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又名仲辉，吴江盛泽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教育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邵力子早年加入同盟会，与柳亚子等创立“新南社”，提倡大众文学。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后为共产主义小组），为早期中共党员。1928年2月起，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他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4月，赴北平和谈失败后，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9月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并出席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就是这位和平老人，首倡和推广节制生育。

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1年，邵力子到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很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



1946年10月18日，中央代表与各党派代表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人为邵力子）。

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他想到了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调查。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更多的就是探问人口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马寅初长得敦厚，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两位来客说："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22%以上，甚至可能接近30%，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300万之多。十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十五年后将达9.8亿，五十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邵力子当即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是经济学家，邵力子的来意就是希望他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连声说好，决心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有说服力的专著。

马寅初决心建立中国的计划生育理论。他焚膏继晷，撰写《新人口论》。书稿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举其要者：第一，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两者必须相统一；第二，要正确处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两者必须相适应；第三，

要正确处理人口的两重性——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育子女不仅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第四，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应该相互协调。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更应有计划。他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也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上发言，声援这一提案。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邵力子逢人便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分送亲友。遇到年轻的育龄夫妇，他总是习惯性地伸出一根手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

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右派，邵力子也因宣传计划生育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指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他反问："马寅初何罪之有？"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下仍坚持不改，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但邵力子说："科学是批不倒，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继续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年过八旬的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动情地说："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老有一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他忧心忡忡，他再一次向毛泽东打了报告。21世纪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这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二十年之后了，也因此有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辛酸调侃。

杨天骥 早期民主革命的鼓吹者



“古镇同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自宋淳祐至清嘉庆年间，曾出状元1人，进士、举人无数。2003年10月8日，同里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吴昌硕弟子、民国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无锡和吴江县长杨天骥故居，他是我们同里的又一值得骄傲的人物……”这是导游在讲解杨天骥的故居时，其中的一段解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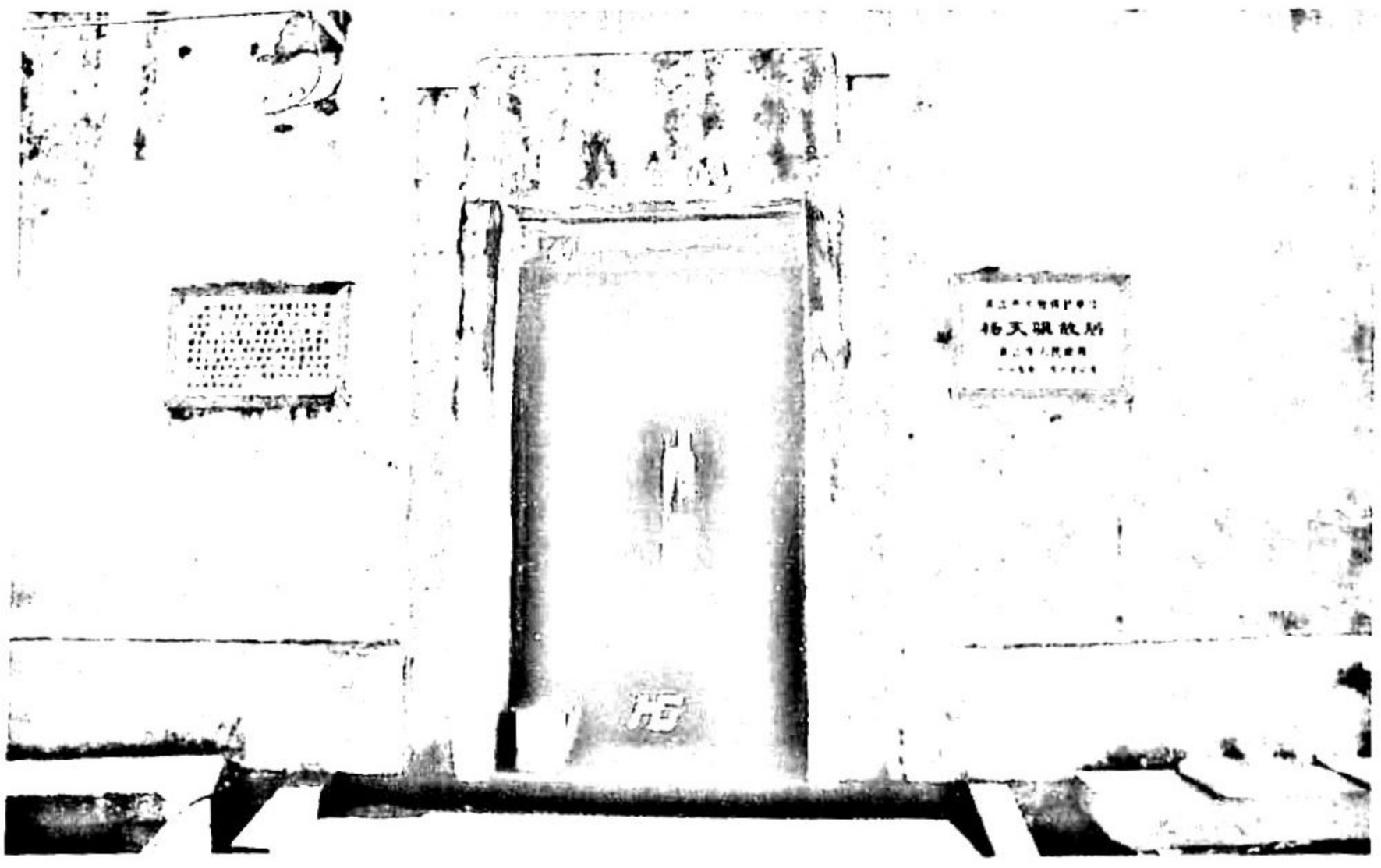
杨天骥（1882—1958），字骥公、千里，别号天马、茧庐等，同里镇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幼承父教，学诗词书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上海南洋公学，师从吴昌硕治印。二十九年，邹容、章炳麟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号召推翻清朝

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章炳麟为《革命军》作序，杨天骥与同乡金松岑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是年夏，《苏报》发表文章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并发表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文章，鼓吹革命，《苏报》遭封。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炳麟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史称“苏报案”。杨天骥与其父杨敦颐合著《满夷猾夏始末记》，为营救邹容、章炳麟等人和控诉清廷残民罪行，奋力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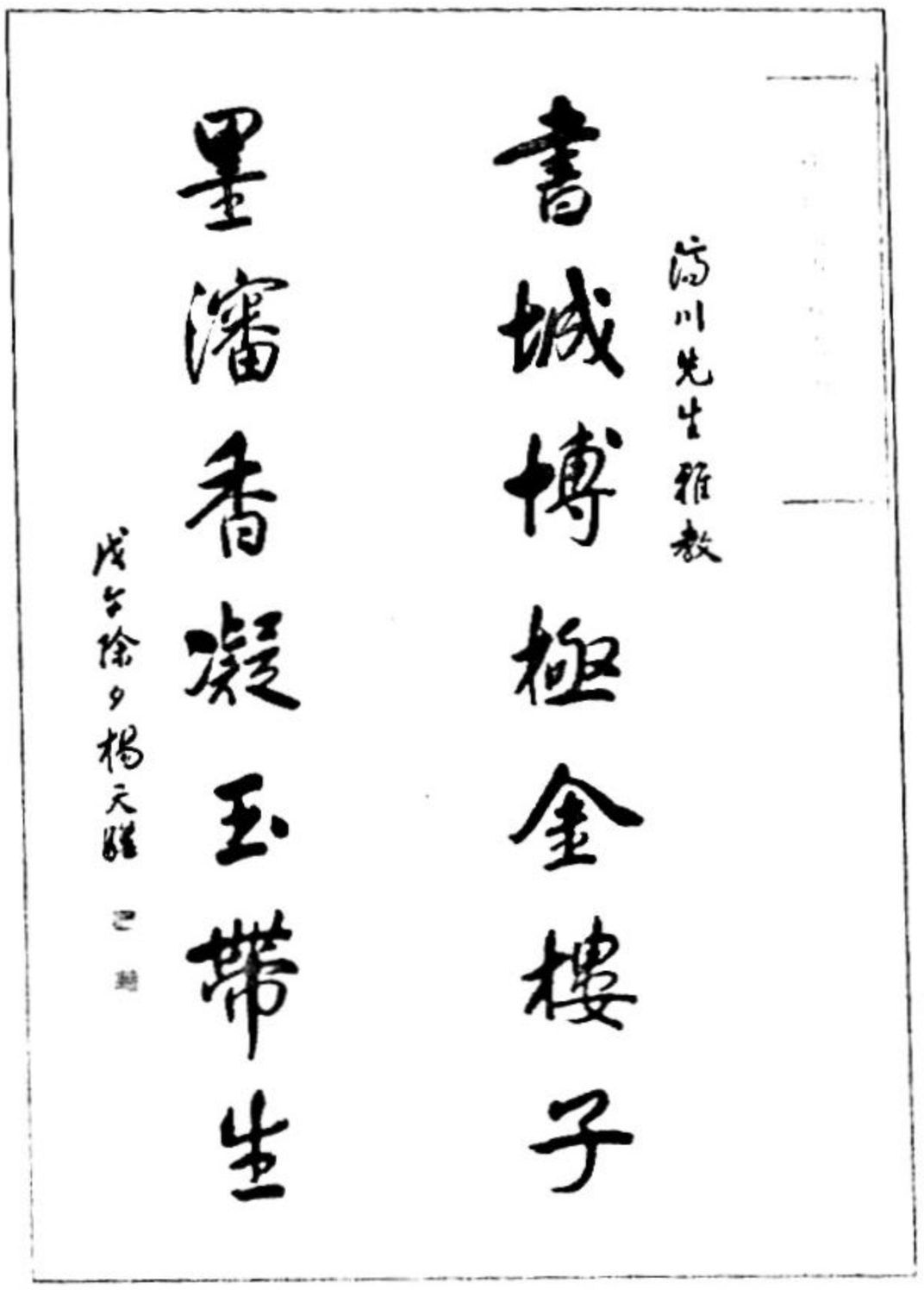
随后，杨天骥到上海澄衷学堂执教，新的思想新的教法深受学生爱戴。胡适当年是澄衷学堂的学生，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写道：“澄衷的教员中，我受杨千里先生的影响最大。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他出的作文题也很特别，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受杨天骥的启蒙，胡适成为了一个适者生存《天演论》的信奉者，他将自己的名字胡洪骍改为胡适，字适之。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二十五日蔡元培任主笔的《俄事警闻》停刊，杨天骥积极参加重组的报刊编辑班子，在第二天即易名为《警钟日报》，继续刊登揭露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侵凌中国主权的事实并加以抨击的文章，特别重视清政府外交情况的报道。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蔡元培任上海分会会长，杨天骥入同盟会。此后，杨天骥还帮助于右任、范光启创办《民呼日报》，以揭露清王朝的腐败，鼓吹民主革命，“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有通讯、言论、纪事、丛录等栏目。清廷视《民呼日报》为眼中钉，与租界当局勾结，强行封闭，前后共出92期。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陈去病发起成立“南社”,杨天骥入南社，柳亚子将其入社号定为“六六”。民间有“六六大顺”之意，他们希望民主革命顺顺当当、大吉



杨天骥故居



杨天骥书法

大利。第二年十月又参加创办《民立报》，激烈攻击清政府，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态，宣传政治主张。杨天骥在《民呼报》、《民吁报》与《民立报》均任编辑，以骏公、东方、杨东方、六一翁等笔名发表文章，他还力荐叶楚伧进民立报社。这段时间里，杨天骥与于右任、陈其美、宋教仁等结成莫逆之交，他是上海著名的报人与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鼓吹者，著名的革命党人。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杨天骥被列入重点搜捕名单。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杨天骥一度离沪去湖南湘岸榷运局任稽核官。不久去北京，任教育部、外交部、司法部秘书、参事等职务，前后共4年时间。第一次护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准备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派遣钱刚到上海，组织国会护法议员前往广州，杨天骥被派南下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任护法国会参议员。1920年，杨天骥又到北京政府国务院任秘书。1925年，由曾孟朴推荐，杨天骥任无锡县县长。杨天骥与叶楚伧等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奔走“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专制统治，被孙传芳列入拘捕暗杀对象，进行搜捕。1927年1月，同乡钱刚在上海组织军队准备配合北伐大军，事泄被驻沪直系军阀李宝璋杀害。李派暗杀队携枪跟踪在交通要道和杨天骥家附近，活动频繁，情势十分危急。无奈之下，杨天骥陪伴老父杨敦颐，佯病躲藏于法租界广慈医院，租界当局施压院方对其警告，没几日就被赶出医院。杨天骥乔装打扮，由上海乘夜船回到吴江家乡，再到浙江，与北伐军21师严重

部会合。后回吴江，在松陵镇成立吴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被推举任主席。1928年1月，杨天骥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翌年7月，杨天骥被委任为吴江县县长。抗日战争期间，杨天骥以经济委员会委员身份，在香港协助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主持港澳地区党政工作，募集捐款，购买物资运到内地以供抗战所需。

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天骥先是联络留港抗日志士进行潜伏，后取道东江游击队驻扎区到广西，再辗转到达重庆，与吴江同乡为抗日志士王祖勋病逝举行公祭，出《哀思录》等，积极抗日。

抗战胜利之后，杨天骥热心公益事业，为民伸张正义的秉性不改当年。1946年8月吴江旅沪同乡会获准恢复活动，修订会章并定名为“吴江县旅沪同乡会”，设立理事会，大家公推杨天骥为理事长，由毛啸岑等6人为常务理事，严宝礼、范烟桥、唐炳麟等18人为理事。会址设在上海市吴江路75号。同乡会除在旅沪人员中互帮之外，还积极关心参与家乡地方政事。

1947年6月，吴江同里发生南濠弄小学教师邹月娥遭5名国民党军官轮奸致死惨案，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罢市罢课，以示抗议，强烈要求严惩凶手。杨天骥闻讯后，马上召集同乡会理事商议声援家乡对策，并多方设法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态度非常坚决。他迅速行动，电函吴江县政府、江苏省民政厅，又电呈国府，力主正义。嗣后辗转迳呈主席，奉谕严惩。省民政厅、教育厅及国防部派员到吴江同里查处案件。最后，邹月娥惨案的5名凶犯被判正法。

吴江旅沪同乡会的作为，在原籍人民心中的威望颇高。有吴江当地人告发恶霸，不直接向吴江当地政府告发，而转请同乡会帮助上告。如1946年11月北厍杨姓居民告发镇长费希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滥用职权羁押不同意假名多征的百姓，就是函请吴江旅沪同乡会帮助上告的。1948年同里乡5名农民联名函告：石泓乡第拾保李姓保长，借职务之便，浮收经费中饱私囊，设赌局诱赌，从中抽头渔利，致有人亏负巨大而自杀，要求同乡会转请吴江县政府查办。这种曲线告状，正说明同乡会和他领导的旅沪同乡会，为民伸张正义，深受家乡人民认同。

不仅如此，杨天骥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才式人物，郑逸梅称他为“能文、能诗、能词、能刻、能治稗官家言，无一不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政多年，却不改文士之习，抗战时，甚至还写了颇有忧国伤时之诗。如《小捷》：“岂期离乱压衰年，毁室存身空自怜。欲去还留江山客，已秋还暑海南天。昨闻小捷神为王，但得言归梦也颠。唯有暗虫不解事，十分絮聒到愁边。”杨天骥的斋名叫“茧庐”。因此，他的著作均以“茧庐”为名，有《茧庐吟草》、《茧庐长短句》等传世。因曾师从著名画家、篆刻家吴昌硕，杨天骥书法俊逸，深於肌理，于右任编纂《标准草书》，尝邀参与其事。杨天骥少时习治印，治印更是他的强项，融吴昌硕、赵子谦两位大师姿致，且变化挹让、刀法益加雄肆，而立之年已名重江南，四方求其印者踵接，有《茧庐治印存稿》传世。

蓝公武 被追认的中共党员



他曾创作《民族祖国歌》而被毛泽东赏识，他曾连续在《国民公报》发表了59篇论文，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评论，对中国应在和会中提出废除“21条”和收回东北主权问题作全面论述。解放后，他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他在临终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就是来自同里的蓝公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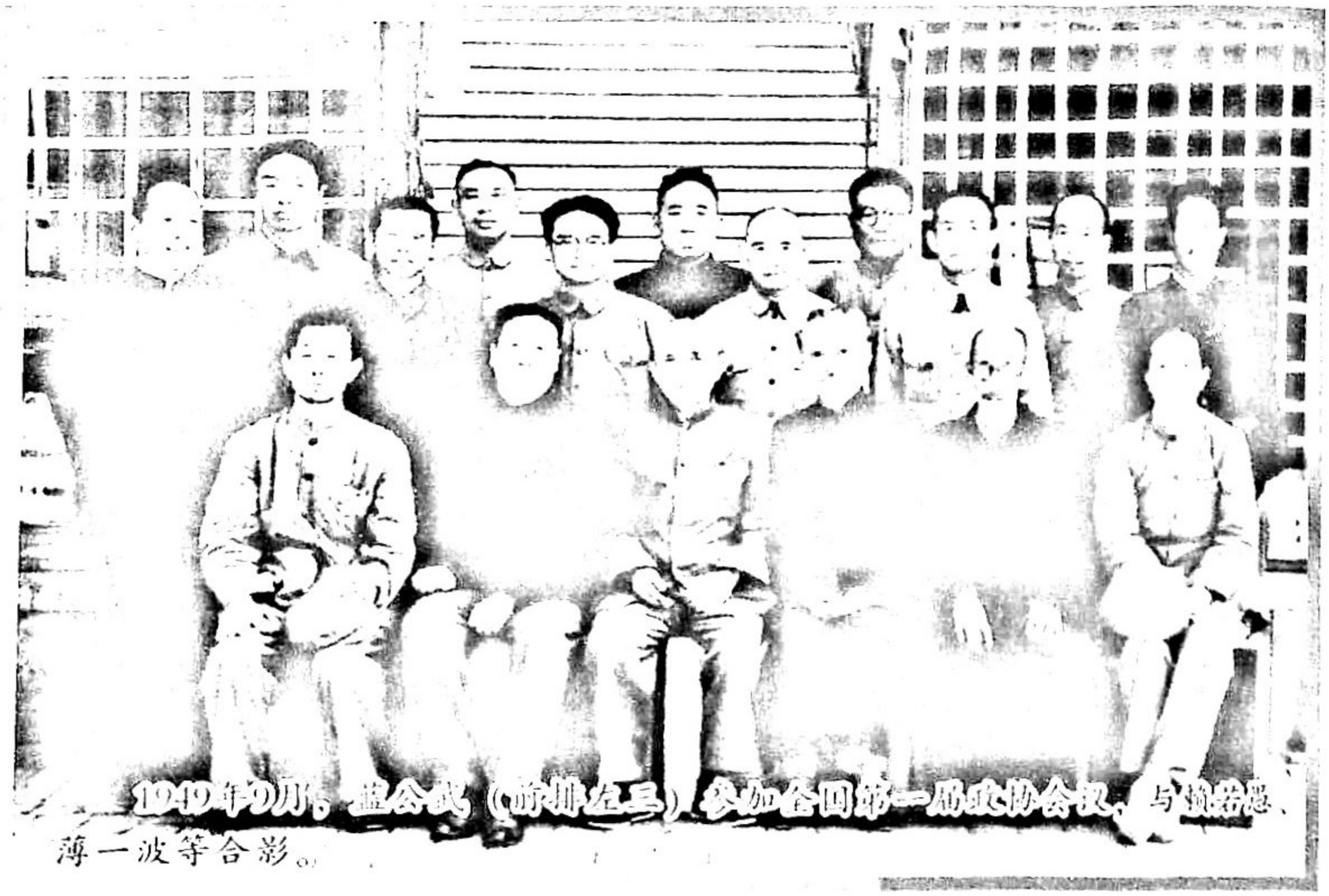
蓝公武（1887—1957），字志先，同里人，现代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光复会。1913年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1917年后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

和护国、护法运动。

“五四”运动后，蓝公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后经亲朋营救获释。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1948年4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经晋绥到达河北平山县陈南庄，听说蓝公武在北岳行政区公署工作，遂派车两请蓝公武。信上说：“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日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

毛泽东所说30年前拜读先生崇论宏议，是指蓝公武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国民公报》连续发表15篇专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做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蓝公武连续在《国民公报》发表了59篇论文，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评论，对中国应在和会中提出废除“21条”和收回东北主权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对中国和险恶处境发出了警告。



1949年9月，蓝公武（前排左三）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与柳若愚、薄一波等合影。

1919年1月16日到1月29日，他又为《国民日报》撰写“社说”10篇，明确宣布“吾主张民主政治”。公开支持群众的示威运动，说它“是警觉社会的晨钟暮鼓，促进改革的动力”。蓝公武的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国民公报》这样一个具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对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9年9月，蓝公武以华北地区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蓝公武，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蓝公武说：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还是干本行吧。毛泽东沉思后说：“能做教育工作者的人不少，而能做政法工作的人不多。你这个人刚正不阿，我看你适合做人民检察署的工作，同罗荣桓一起搞这个工作吧”。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蓝公武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蓝公武不但是中国文人的硬派，而且是中国执法者中的硬派。

蓝公武好友张东荪触犯了国法，在考虑是否逮捕法办时，张东荪托人请求蓝公武替他说情，毛泽东也就张东荪的问题征求蓝公武的意见，蓝公武说：“张东荪是我的朋友，对他加以处理我应当回避。”此后蓝公武不许张东荪再到他家里来，两人至死没见面。

一个解放军的师级干部，进城后思想腐化，喜新厌旧，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被警卫员发现，要揭发他的罪行，也被他开枪打死。高检署内部有些人认为，这个师级干部从红小鬼打到三大战役，身经百战，虽罪行严重，但考虑他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宽处理。而蓝公武则认为，此案情节恶劣，战功不能成为枉法的借口，应依法处以死刑。双方争执不下，呈报毛泽东评断，毛泽东亲批“照蓝公武同志的意见处理”。

蓝公武曾创作《民族祖国歌》被毛泽东赏识，1952年，毛泽东举办团拜会，酒会开始前，毛泽东拉着柳亚子来到蓝公武身边坐下，与他亲切交谈。毛泽东提到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读过蓝公武的爱国反帝篇，印象很深，还当场背诵了蓝公武在1906年创作八首《民族祖国歌》中的一首。在场的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和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都击掌作和，一致认为该诗写得气势磅礴，充满爱国、爱中华民族的豪情。

毛泽东等人对蓝公武的赞赏，使他感慨万千。蓝公武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八国联军侵华，令年轻的蓝公武感至屈辱和愤慨，于是他经常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创作了《民族祖国歌》组诗，这组诗在当时的爱国学生中流传很广，大家争相传抄，此诗富有时代气息和爱国情怀，留在了中华民族斗争的史册上。

1957年9月12日蓝公武因病在北京逝世。党和国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蓝公武大会，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祭，董必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蓝公武的历史贡献，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追认蓝公武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金诵盘

孙中山器重的“是医国手”



他会通中西医学，享誉上海滩；他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获赠“是医国手”美称；他曾与蒋介石、戴季陶结拜兄弟，又与周恩来交好；他参与南京抗日保卫战，救助无数军士难民。他就是从水乡黎里走出的近代名医金诵盘。

金诵盘（1894—1958），吴江黎里杨墅村人，出身中医世家。光绪三十年（1908）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在沪开设诊所，享誉沪上。1923年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军医处处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卫生勤务部副部长，参与南京保卫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考试院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行署卫生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爱国卫生委员会顾问、江苏省政协委员等职。

在上海行医期间，金诵盘融会中西医学，医德高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当时的《字林西报》报道说："金氏崇仁，中西合璧，一代名医，此由申城诞生。"其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上海开展护法活动，时常慕名前来就诊。金诵盘因早年加入同盟会，大凡革命党人前来看病，他分文不取，还常以医院的收入进行资助。为此，孙中山特意为他的医院题写"杏林翘楚"。

金诵盘对孙中山特别敬重，两人的交谊也特别深厚。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2年秋，金诵盘关闭了崇仁医院，变卖了大部分医疗设备，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孙中山。1923年，又应孙中山之邀，带领家人南下广州，任广州军医补习所教务长，兼任大元帅府医卫总顾问。金诵盘对孙中山的身体非常关注，孙几次重病，皆得金诵盘施治而转危为安。1924年初，孙中山的肝病再次发作，经过金诵盘的精心治疗，基本痊愈。孙中山为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而感到异常高兴，欣然题写了"是医国手"横匾送给金诵盘。国民党内高层人士大都接受过金诵盘的治疗，无不为他的人格和医术所折服。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金诵盘前往该校军医处任处长。

1924年10月15日，广州军政府平定了商团叛乱，庆功会后，孙中山邀请蒋介石、戴季陶和金诵盘到帅府小聚。戴季陶忽然提出要求："我与介石、诵盘三人跟随先生多年，情如兄弟，全听先生教诲。我们三人共有4个儿子，不妨让他们结为异姓兄弟。恳请先生给他们起名排序。"孙中山当即应允，略一沉思说："古人常嘱男儿应怀'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大志，我想四子就取'经、纬、安、定'最好。"后经协商，四个孩子依次排序：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几番结拜成兄弟，三个做父亲的也有意结拜。1924年冬，由蒋介石提议，三人结拜为盟兄弟，蒋介石最为年长，为盟兄，金诵盘年龄最小，为三弟。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初到北京即病倒，久治无效，于是电请金诵盘北上。金接电后即刻启程，抵达北京时，孙中山已逝世二日。他一路劳累，加之伤心过度，竟怆死在孙中山灵前，住院月余方痊愈。在北伐战争中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野战卫生处处长，后因不满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作为，以及军阀混战的乱象，愤而辞职，到上海开设静安医院，重新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


金诵盘、谭郁芳与金定国1934年合影

1937年"七七事变"突起，金诵盘出于爱国热情，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出来工作。他毅然将静安医院价值32万多元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全部捐给了中国红十字会。甫一至宁，就被任命为野战救护处中将处长，招募一千多名官兵，成立了第二救护总队。淞沪大战中，金诵盘两次奔赴战场，戴着钢盔和红十字袖

套，在敌机轰炸过的破屋里、在地下掩体里，抢救伤员。11月底，南京战况吃紧，各机关纷纷内迁，陆军医院仅留下金诵盘和300多名医护人员。金诵盘到下关送别他的上级同僚，回到医院却听闻他“已去下关乘船溜脚”的流言，并已有医护人员违抗军令，不辞而别。金诵盘怒从中来，指天发誓：“我金某人愿与大家共同战斗，与全城军民共生死存亡！”当晚，金诵盘在几位官佐陪同下，顶着凛冽寒风视察了陆军总医院、海军医院、宪兵医疗所，向千余伤病官兵分发了现金和慰问品。为了战时便于指挥调度，金诵盘特将总指挥部设在新街口的福昌饭店，紧急架上十几条连接重要军事据点、要塞的专用电话线。同时，紧急成立了4所野战临时医院和城郊31个临时救护站。12月13日，南京沦陷，痛心疾首的金诵盘接受了蒋公毅中校的建议，到美国大使馆避难。

在使馆小楼上，金诵盘亲眼目睹了日军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暴行，不禁怒火填胸。后金诵盘转入金陵女子大学内的难民营。险境中的金诵盘顶着暴露军医身份的风险，主动为罹祸同胞搭脉诊治，开具处方和配药，利用校医务所的美国医疗器械为百余名负伤军人和平民做了外科手术。1938年2月26日，金诵盘等人在国际友好人士沃特琳教授及天主教会一些爱国神职人员帮助下，装扮成美国教会神职人员，顺利通过了日军3道哨卡的检查后，辗转更换车船，经由上海抵达重庆。金诵盘陷身南京期间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后来，他与蒋公毅一起回忆了自1937年12月1日始，至1938年3月8日止在南京的日日夜夜，蒋用日记形式一一直录。1939年1月，由金诵盘修改并作序，以《陷京三月记》为题印行出版。1946年底，金诵盘特向设在东京的国际审判法庭提供了自己的证词，以自己和部下陷京3个月里的所见所闻，强烈控诉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金诵盘抵达重庆后曾任军医署副主任、院长。1938年冬，他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赴延安慰问伤病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几位领导人晤谈、合影。抗战胜利后，金诵盘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不愿同流合污，回到南京开设私人诊所，开办国医训练班，致力于培养医卫人才。1948年底，他又尽辞一切职务回到上海，深居简出，仅在每星期三上午去药房坐堂行医。就在这个时候，金诵盘接到周恩来手书，信中劝他不要轻易离开大陆去台湾，请他郑重考虑，并且告诉他蒋介石拟定了一个国民党要员去台的名单，其中就有金诵盘之名。果然，没几天，蒋介石派行政院李秘书长送来一张机票，请他去台。蒋经国也打来电话劝他，金回答说：“我实在没有必要去那个小岛。这几十年来，我虽然两度入军界供职，一次是北伐，一次是抗日，不过我素不参与国共两党之争，历来反对内战。何况我是一名医生，以治病救人为业，余生已不多，我不想再离开故土，去奔波流离了。”上海解放前夕，金诵盘与夫人带着儿子金定国，一家返回故乡黎里开业行医，对经济困难者送医送药。每逢阴历初一、月半，必到出生地杨墅乡间送诊，风雨无阻，乡民有口皆碑。

沈体兰 出席开国大典的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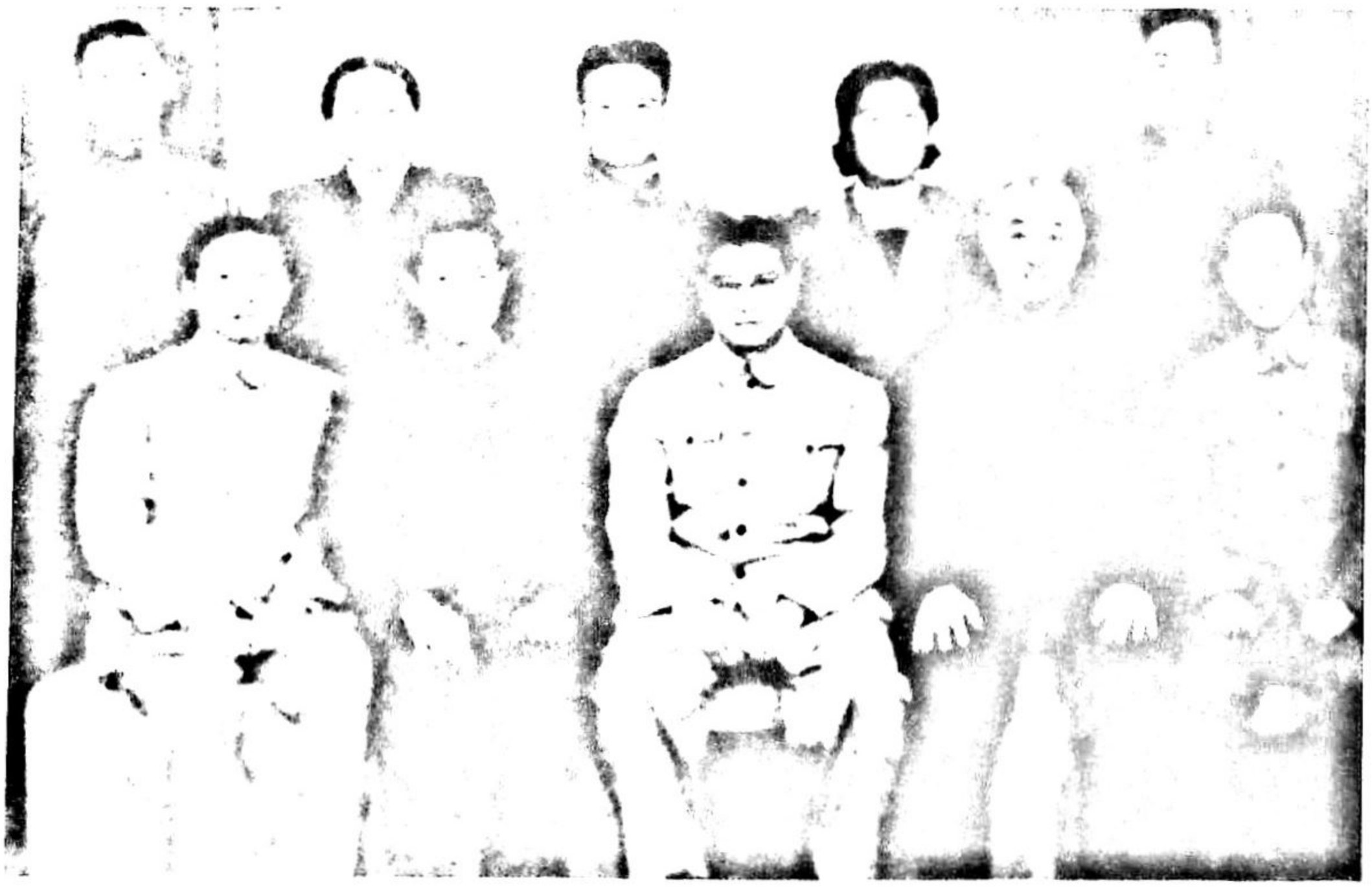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成员中有一位吴江人，他就是出生于金家坝的爱国进步教育家沈体兰。

沈体兰（1899—1976），吴江金家坝乡人。192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基督教传播。

在英国深造期间，沈体兰发表的英文著作《新中国的黎明》受到国内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回国后，他结识了中共党员浦化人和胡也频，从他们那里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常和他们探讨中国民主革命问题，共商开展革命文化的大计。

1931年9月，沈体兰应聘担任上海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前身）校长，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沈体兰先生到校任职后，制定“建设高尚思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体意识，实行公众服务”的新办学方针。他聘请进步文化人士任教，废除宗教课，开设时事形势课，建立周会制，邀请海内外学者名人讲演，还创办民众学校、补习学校和义务学校，招收工人、店员和失学儿童入学。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民主管理治校制度，积极培养学生“科学头脑、劳动身手、生产知识、革命精神”。

当年9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身为校长，沈体兰支持麦伦中学学生的各项爱国救亡活动，并发起组织爱国社团，宣传团结御侮救国主张。10月，沈体兰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校长会议，他在会议上反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发出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吁。回沪后，他活跃于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之间，与爱国人士陈巳生、吴耀宗、沈钧儒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和进步学社，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行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沈体兰加入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组织，并受宋庆龄委托，奔波印度、英、美诸国，宣传中国抗日斗争，扩大反侵略正义事业的影响。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代表团部分成员（前排右起第一人为沈体兰）

在中共的领导下，麦伦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影响遍及全市，学校有“民主堡垒”的声誉。学校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沈体兰及学校老师像父母辈那样关心、爱护学生。1948年10月，国民党警察局到麦伦学校要逮捕3名进步学生代表朱宗正、陈一飞、陈一心时，沈体兰和教导主任余之介坚决拒绝，严正表示说学校是教育机关，必须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随即通知三位同学立即躲避，并要教导处取走三位同学在学生卡上的照片，修改了家庭地址，防范警察局再来抓人。1948年6月5日大游行中麦伦有7名学生被捕，经沈体兰发函并派陈其德老师向警察局交涉后获释。

解放战争期间，沈体兰与张志让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在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组织的“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中，沈体兰主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用英语演讲，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全文登载于英文报刊。沈体兰与马寅初等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人权保障会”，联合28位民主教授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

1949年初，新中国即将成立，沈体兰应邀参加政协筹备工作，任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后，沈体兰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华东体育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体委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沈体兰故居

倪征噢

淡泊从容莅海牙



1946年5月的一天。中国历史上记下了一段最为憋屈的对话：

“东京审判的境况如何?”倪征噢问。“说是我们审判犯人，还不如说是犯人审判我们!”秦德纯答。

这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方首席顾问倪征噢取证伊始听到的第一句话。倪征噢的心凉到了极点，同时，正义的热血在他周身升腾，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倪征噢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殊死之战，哪怕用自己的生死荣辱，也要博得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92岁高龄的倪征噢老先生，在纵笔撰写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东京审判”时，那份酸辛苦楚、那份艰苦卓绝尚历历在目，使这位一生没有离开

过“法”字的老墓老人，无数次地汩水涟涟。

倪征噢（1906—2003），吴江黎里人。父倪迪民是秀才，母张蘭芬也出生书香门第，9兄妹中，倪征噢是老幺。年幼的倪征噢，在黎里、平望上过私塾，除必学的四书五经外，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父亲给他讲授的《史记》、《包公案》、《彭公案》等“课余作业”。他被这些在艰难困苦中执著追求真理、为劳苦大众昭雪伸冤的英雄人物所深深折服。辛亥革命那年，他在上海目睹了外国领事和律师的傲慢态度和中国法官黯然处于从属地位的境况。我要学法律！当中国大法官！当世界大法官！

在“东京审判”前夕，倪征噢刚从美英两国考察司法制度回国，本想静下心来著书立学，建立和完善中国法律。但为捍卫国家尊严，倪征噢毅然接收召唤，担任中国检察方首席顾问，即刻披挂上阵。

“东京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害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他的“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法官呵斥为空言无据，就差轰下证人台了。证据！翔实的证据！有力的证据！

日军在我国土上烧杀抢掠之时，军民被于打仗，哪里知道有一天这些杀人狂魔会受到国际法庭审判？世人都知道的种种滔天罪行，还要受害人提供证据？不然一切归零！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刽子手们，有可能会笑傲地走下被告席，走出审判庭！

“我们有何面目回国见江东父老？”倪征噢和中国检察官们，在心里为自己立下了生死军令状，定要为死去的3000万同胞“以牙还牙”，为重创了的民族情感恢复尊严在海牙国际法庭作殊死搏击。

南京万人坑、北平监狱、盟军总部，甚至是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等，只要可能有证据的地方，都留下了倪征噢等中国检察官们的脚步和汗水。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日本十几年中的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拟出发言材料，其工



东京审判

作之繁重是超乎寻常的。除此，他们还常在一起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有时还于住所内作在法庭上的控诉演习。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常以“土老二”、“土匪原”来蔑称土肥原；以“板老四”、“板完”（苏州话，“板定完结”）代替板垣。总之，为了赢得法庭上的主动权，他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按照庭规，审讯每个战犯都有确定的检察官及辩护律师。

检察官对所审理的战犯，不说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有举足轻重之作用。为严惩血腥屠杀千百万同胞的侵华战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倪征噢等同检察长（美国人）再三争论。松井和土肥原一开始就无可争辩地分给中方审讯，但板垣却由非律宾负责。检察长以已经分了工，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分工将会影响非律宾检察官的情绪为借口，不同意将板垣交与中方审理。倪征噢据理力争，经过一番斗争，法庭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板垣终于被掌握在中方手中。

在对土肥原的庭审中，中方出示了种种有力证据，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倪征噢说这是土肥原和板垣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真实写照。可美国律师却从中捣乱，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令人啼笑皆非。倪征噢冷静地解释说：“‘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说完后，他向美国律师报以轻蔑的一瞥，在座的法官们随之哄堂大笑。

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空洞无物，像是为“九一八”时的所有日本军阀开脱。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当晚柳条沟事件发生后，指挥日军的联队长岛本。此人说，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倪征噢当即打断他的话说：“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于是，岛本被法庭轰了下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一下子溃不成军。

在法庭的最后宣判中，法官用了8天时间，宣读了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判处7名主要战犯绞刑、16名战犯无期徒刑、1名战犯20年徒刑、1名战犯7年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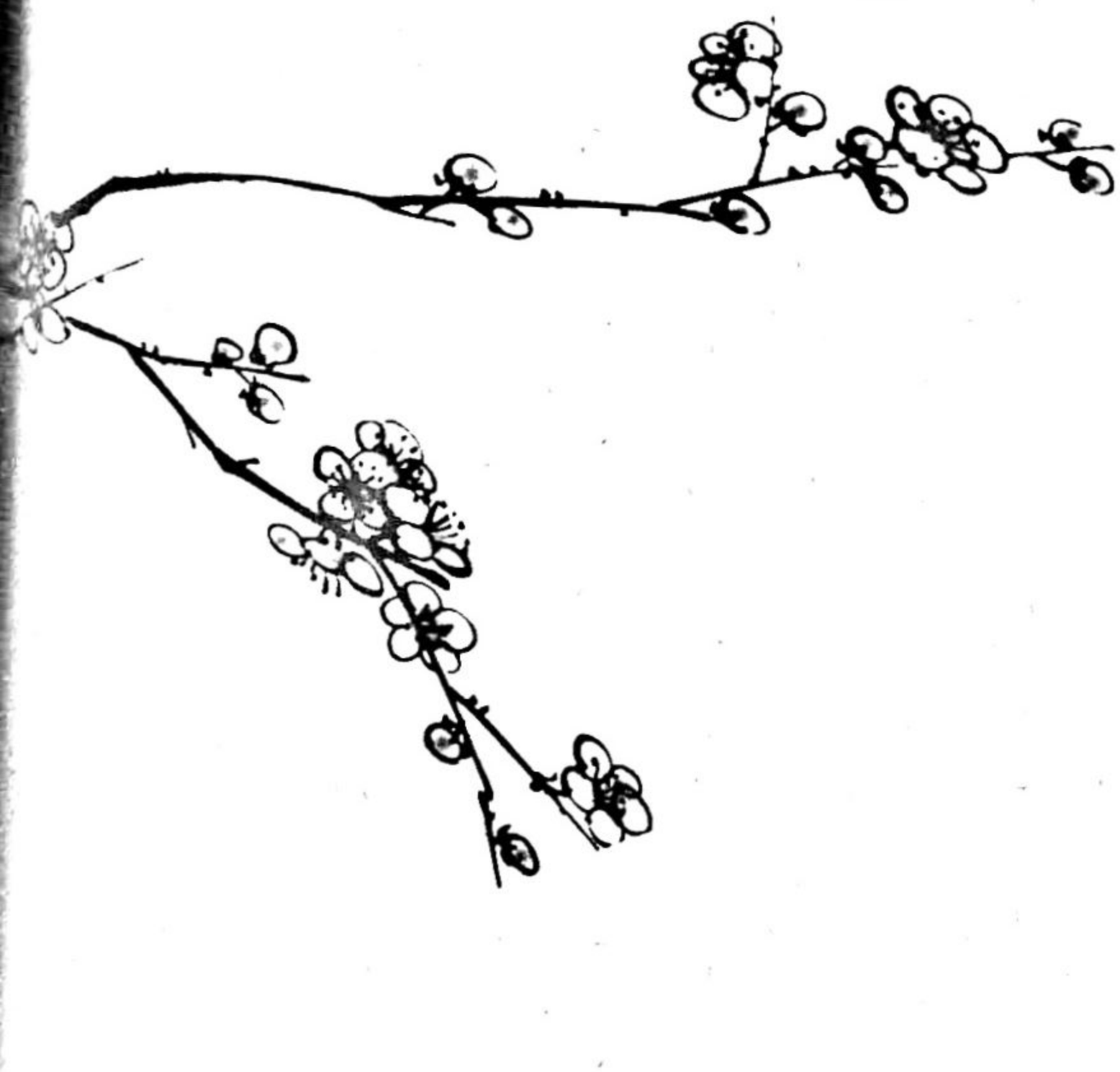
像“谈虎色变”的冷静反驳，像“糊涂酒鬼能证明什么”的迎头痛击，审判中不胜枚举，显示了倪征噢学识的渊博和辩论技巧的高超。倪征噢不辱使命，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利益。

倪征噢广博的学识也赢得了国际法学界的认可。1984年，联合国第39届大会及安理会上，倪征噢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任期9年。

爱国之人必爱家乡。1995年“十一”前夕，倪征噢应苏州大学之邀参加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会，回到了阔别80多年的故乡吴江，他还在就读过的樨湖书院（现在的黎里中心小学），为当时在黎里创办“求吾女塾”的三姑母建“王倪寿芝纪念亭”，他把崇尚读书、为人清正的教育理念永远地留在了母校。

宝德

明鉴录



第四章　抚民以仁　孝亲敬人

吴璋 千里寻母的“全孝翁”



吴璋，字廷用，松陵人，是明代宣德年间有名的孝子，被赞为“全孝翁”。500多年过去了，吴璋千里寻母的至孝史事至今还在流传。

吴璋11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小小年纪的吴璋与母亲陆氏一起相依生活。永乐二十一年（1423），吴璋的母亲，被挑选到皇宫的内廷去做事，从此母子天各一方。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吴璋，在母亲离开后，因为终日思念而郁郁不欢，终于有一天，他难忍思母之苦离开家庭，出外寻母。

宣德四年（1429），吴璋四处打听，知道母亲跟随淮靖王的妃子到广东韶州，吴璋一路风餐露宿、爬山涉水跟随到达韶州，四处寻母没有结果，却听说母亲又随亲王到

了江西饶州，于是吴璋再次上路，奔向饶州。他在沙砾上走路，鞋子破了，就赤脚走，走得皮开肉烂，但没有一丝退缩的念头。吴璋走过庾岭的时候，被黑色的毒蛇咬坏了脚，痛得晕倒在地，幸好遇到一位行医的道人救了他。伤好后，吴璋又出发了。

到了饶州地界，吴璋终于打听到母亲陆氏在亲王府中。他便上书给亲王，祈求带回母亲终养天年。但屡次上书，终不能得到亲王的允许。于是他就在王府的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来，匾额上书“寻亲”两个字，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着：“万里寻亲，历百艰而无悔；一朝见母，纵九死以何辞”。他独自居住在内，虔诚念诵经书。吴璋一路寻母，历尽千辛万苦，但始终没有见到母亲。二十年光景很快就过去了，但思母之心没有随时间的流失减少半分。此时的吴璋，心中发愿今生无论如何一定要再见到母亲。

正统十一年（1446），淮靖王后嗣康王嗣立，吴璋再次上书，字里行间情词恳切，终得康王朱祁铨允许，进入内宫看望母亲。二十年未曾谋面的母子终于等到了团聚的日子，本该格外欢欣，但此时吴璋的母亲已身患重病，卧病不起。吴璋看着命在旦夕的母亲，心痛不已又不知如何才好，救母心切的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和在药中来治疗母亲的病，周围的人都被吴璋的一片孝心所感动，而母亲的病情也稍稍稳定。康王听闻了吴璋千里寻母之事，也为他的一片至纯孝心所感动，于是赏赐了金币，并允许吴璋带着母亲离开内宫。吴璋于是带着病中的母亲踏上了归家的路途，但不幸的是，三天之后，母亲就在旅舍中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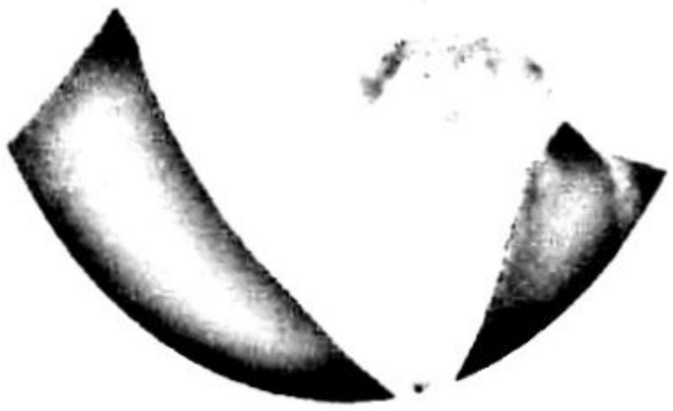
忍着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吴璋负母归家。有一次吴璋带着母亲的骸骨乘船过江，船行驶到江心忽然遇到大风，船几乎要倾翻。船上的舵公发现了吴璋母亲的骸骨，不顾阻拦抛入江中。吴璋情急之下也跳入江中，紧抱母亲骸骨浮在江水中。同船的人看了，都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众人携手又把他救回到船中。吴璋一路历经跋涉，终于带着母亲的遗骸回到了故土。家乡的亲戚朋友、乡邻族人都知晓了吴璋千里寻母之事，无不为吴璋的一片孝心所感动，人们四处传颂他的孝母美德。吴璋把母亲安葬在先祖的墓群中，自己每日清早黄昏都要去墓前请拜。墓地里，风吹过，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子欲养，亲已不在，垂首站在墓前的吴璋，无比哀切地思念着母亲，连路过的人看见了，也忍不住哀伤落泪。这一年，是正统十二年（1447）。

据史载，吴璋的儿子吴洪，孙子吴山，长大后都很有出息，先后做到了尚书的官职，并以明正公允、廉靖宽厚为世人所称道。吴璋自己在八十一岁那年去世，后人赞曰：寻亲廿载，迎母令终。负骨归葬，曰全孝翁。

陈尧弼

敢于为民做主 重视县城建设





明成化十七年（1481），陈尧弼到吴江出任知县。陈尧弼，字秉钧，贡士（相当于举人）出身，安徽太和人。他一身正气、性格爽直、扬善惩恶、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为民做主，赢得了吴江老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明成化十八年（1482），朝廷锦衣卫千户王臣与内侍太监到浙江去采办珍宝。锦衣卫原是护卫皇宫的亲军，负责管理皇帝出入的仪仗。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特令锦衣卫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的权力。他们倚仗皇帝的信任，一路上气势威赫。

王臣等人到了吴江，就向地方上索取银两1000两，并要求出船夫数百人为他们运送珍宝。当地人不同意，王臣的手下人就亮出武器要行凶。吴江县衙的官员见到这种阵

势，都退避三舍，不敢出头。

陈尧弼得知这种情况后，就亲自前往交涉。百姓见知县带守军出面去交涉，就有不少人跟着到了王臣的面前，一起呐喊助威。陈尧弼对王臣先晓之于理，叫他们不要扰乱地方。王臣等人却口出狂言不肯罢休，这激起了陈尧弼和百姓的怒火，军民们一拥而上，把王臣等人手中的武器收缴一空。陈尧弼人多势众，王臣等人只好抱头鼠窜落荒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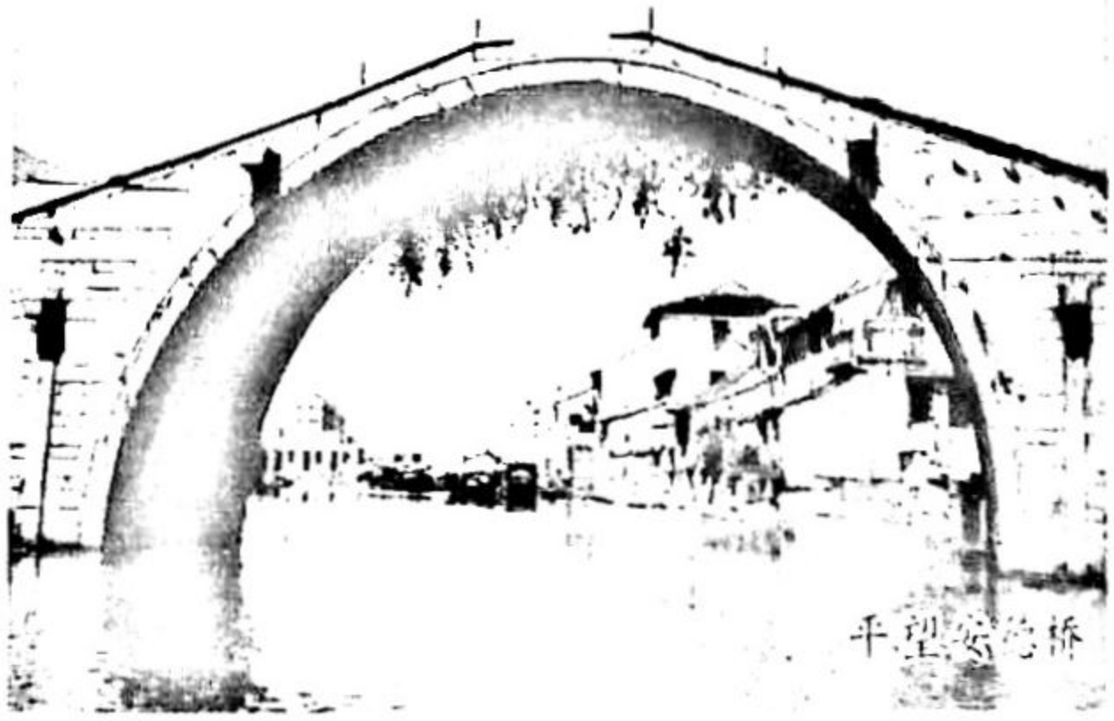
这件事情震动了朝野。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使苏松巡抚王恕在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支持陈尧弼，把王臣等人的罪行向朝廷作了禀报，并当众销毁了王臣手下的器械。这一举动传到吴江，吴江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陈尧弼也受到了鼓舞，更理直气壮地为百姓作主，扬善惩恶。

不久，又有奉命去浙江征调制衣梅的使者经过吴江。使者在吴江境内看到了一片片梅树，就停止了脚步，发话说每一棵征银一两，并在梅树上挨棵挂了红牌，表示这些树都被封了，不交银两不得处理。百姓诚惶诚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陈尧弼对强暴的使者并不示弱，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您是奉命前往浙江公干，吴江不是浙江地界。如果朝廷命令吴江办理此事，应该有公文下来，你没有公文，怎么能私自悬牌封树骚扰百姓呢？"一番话说得使者无言以对，怏怏而退。

陈尧弼在吴江担任知县时间不长，但为吴江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对县城的建设也很重视。明成化十八年（1482），他重建了县城城楼和城门，四座城门，东门叫朝阳门，西门叫望山门，南门叫望湖门，北门叫望恩门。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建平望安德桥，此桥一名平望桥，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于古运河与荻塘交会处，全长54米，宽4.53米，高9.3米，跨度11.5米，在巡检司署前（即现平望粮管所城隍庙仓库前）。据历史记载吴江最早的桥梁是平望桥，并有里人费永膺舍地立碑亭，有迎秀楼在桥旁，后并废。该桥西通荻塘河，下连大运河，农舟商船，日夜不绝，是莺脰湖泄水主道，故桥下水势湍急，遇有大风，舟行过桥相当险难。

之后，他调任会稽（今绍兴），时任翰林后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苏州人王鏊有《送吴江令陈尧弼移知会稽》以赠："汉庭治远无循吏，千载吴江尚见之。备识民间多利病，不知身上有安危。来时叔度常嫌暮，去后何公每见思。今日会稽真夺取，临期还作赠行诗。"


平望安德桥

金洪　心中永远装着百姓



金洪，字惟深，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其祖上金仪为吴江松陵金家埭人。成化十六年庚子科（1480）举人，二十三年丁未科费宏榜三甲132名进士。

弘治元年（1488），金洪就任靖江知县。他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事情一经他手往往很快就能有结果。在任三年间，他兴学造桥筑堤垦荒，开凿了环县城的河流以利灌溉。惩治奸滑之徒，为民申冤。离任后，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而修建了生祠。

弘治四年（1491），金洪调任吴江。先后在济农仓废址建察院，在西水门内建积庆桥。弘治七年，吴江发大水，田地淹没殆尽。踏勘时，他流着眼泪对灾民们说，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灾害，我再也不能让赋税给你们雪上加



松陵金家埭

霜，于是，他按全灾上报，为民请愿，免除了当年的赋税。同里旧时曾有税课局，他向上请求将之撤销，请同里名宿顾宽主持改建为社学，凡有志于学的近乡子弟，皆可入学。

金洪为人刚正不阿，他善于判案，堆满案几的状纸，不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处理完了。刚到吴江时，吏目抱来大堆文书，请他签署，以试探他的虚实。他不问原由，只是一一批签。吏目窃喜，以为新来的长官很好糊弄。三天后，又抱来一大堆请他签署。这次，他正色道，你以为我没有什么正事好做吗？把三天中主要文书挑选出来，我来签署，其他的你去处理。并发下话，对不尽职的一律杖责。这样一来，把吏员们都镇住了。每次御史来苏州视察，唯独吴江没有久拖不决的案子，金洪也因勤政爱民、雷厉风行的为政风格，得到了吴江百姓的赞扬和爱戴。

作为吴江父母官，金洪体恤民情，为百姓疾苦着想。吴中连年发大水，朝廷下旨疏浚河道，按规定，吴江要出劳力18000多名。当时正是严冬季节，雨雪交加，出远门施工十分不便。他就向上申请，把这些人留下来，挖长桥下淤浅的桥洞，清除河道芦苇蒿草，导太湖水入吴淞江。工程到下一年二月方结束。每名民夫日给米2升，有病的给予医药，遇到刮风下雨就暂停施工。他还经常亲自乘坐小船往来各处督工。这样一来，老百姓没吃到多少苦头，吴江的水患却得到了治理。

为了减轻百姓赋税，金洪不惧豪门滑吏，坚决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他力主清除奸吏滑胥操纵盘剥，打击豪户的气势，让富户多出赋税，少出徭役，把徭役分散到各家各户。这样一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得其所，百姓十分欢喜。不少人对他感恩戴德，以致有的百姓生了儿子都改为姓金，以不忘金洪的恩德。

在吴江任职的6年，金洪坚持廉政为民，节省各项开支，每年减少各种横征暴敛银20万两，贮存预积米达到二十七万三千多石，全县编户增至12里（明代户籍制度，110户为一里）。闲暇之余，他脱下官服，与百姓亲如一家，与当地文人士大夫们饮酒赋诗，表现出超群的亲和与才智。

弘治九年（1496），金洪结束了在吴江的知县任期，因政绩突出，升职为监察御史，巡按陕西。正德年间，因得罪太监刘瑾，遭其诬陷削籍。刘瑾被诛后，正德皇帝下诏恢复金洪的原职，但此时金洪早已看透官场，委婉辞任。

金洪的父亲金亮是正统十年乙丑科（1445）进士，曾任兵部武库司郎中；儿子金朴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1517）进士，曾任兵部主事。一门三代进士，在后世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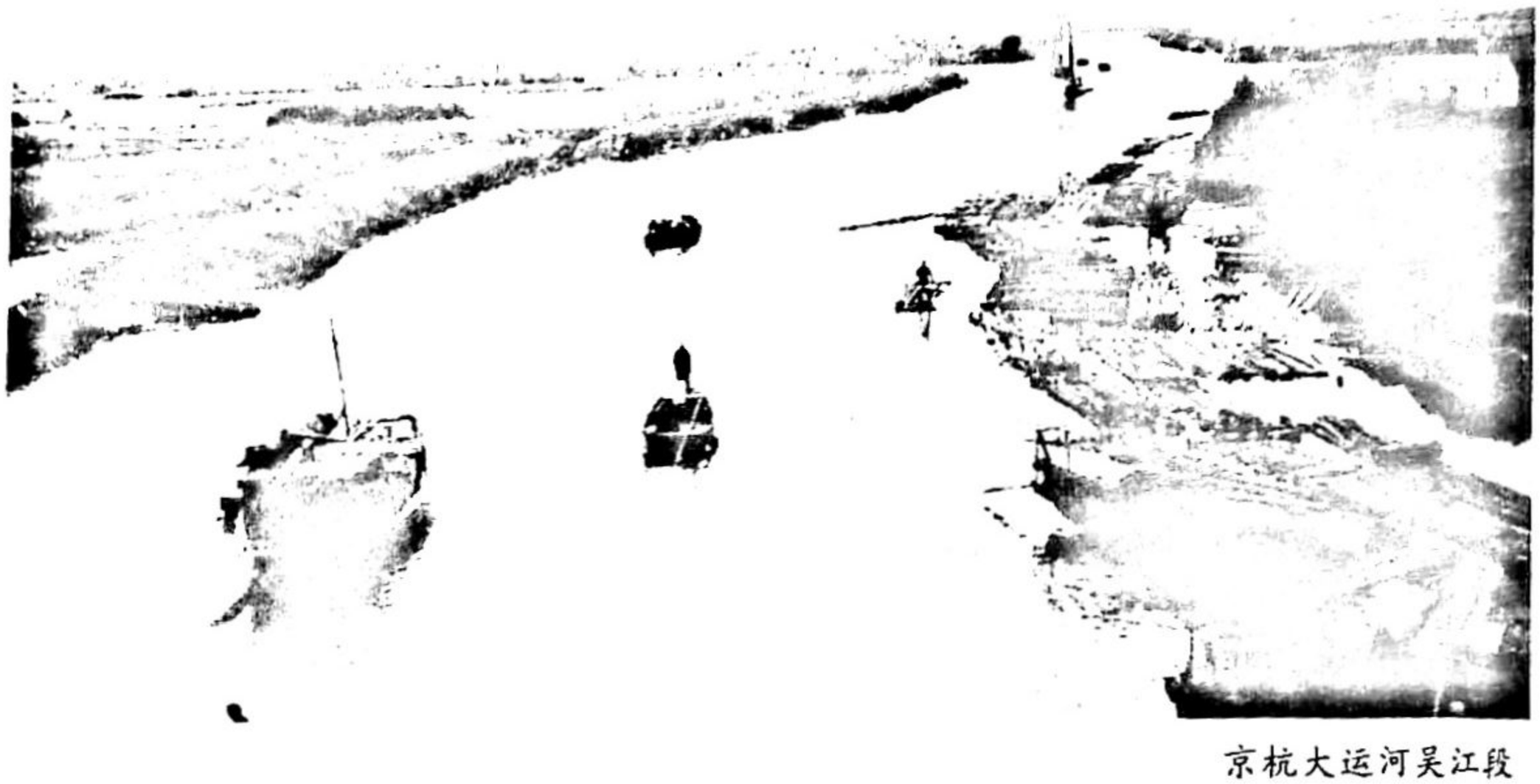
王哲



王哲，字思德，明代吴江松陵镇人。他的处世哲学是“说好话，行好事，为好人”，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好斋”。

王哲在江西任职时，把一个贪官革了职。福建莆田人林俊来此巡视时，打算重新起用此人，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林认为是故意跟他为难，非常生气，在往来的公文中说了许多不礼貌的话。王哲毫不介意，反而对上面说，林公是前朝名臣，处事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没有了解清楚，才出了点小纰漏。他又重新向林说明了理由，使林很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也更加敬重他。从此，两人反而增进了友谊。

王哲是明弘治二年己酉（1489）的举人，三年庚戌科



京杭大运河吴江段

考中三甲第110名进士，授监察御史。在巡抚福建时，他整顿了军队，清理了盐业。有某人被诬陷，同姓的百余户都被充军边关，关在狱中一年有余。他仔细查案重新审理后，把这些人全都放了出来。

弘治十年（1497），王哲巡按广东，正遇上南海县13个村的农民联合起事，镇守使准备发兵弹压。他说："农民造反必定有原因，13个村的村民有一万多人，如果发兵，玉石俱焚，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亲率广州知府，轻骑前往了解民情，讲清利害关系，并答应一定纠正官府的错误作法。他的说法有情有理，使村民心服口服，就自动解散了。另外，王哲看到发配关外的罪犯，因为路途遥远水土不服，不少人死在途中，就请求朝廷准许两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发配关外的罪犯就近充军，得到了上面的同意。

弘治十五年（1502），王哲巡按江西。他全力组织抗旱，终于在大旱之年喜获丰收。

王哲善于审理疑案。有一家的奴婢私自逃走了，这家的死对头硬说主人把奴婢杀了，出面把主人告到官府。王哲复审时，发现被告一脸受冤枉的样子，详细问清了冤屈所在，并秘密派人找到了奴婢，立刻释放了被诬陷者，并让诬告者受到相应

的惩罚。又有某大户家里被盗，就诬告与他有嫌隙的仇家，还贿赂了镇守使，想治仇家的罪。王哲审理案情后，把被诬告的仇家放了。镇守使对此极为恼怒，其他人也表示出或多或少的疑问。后来，王哲把真正的盗贼抓获了，大家才心悦诚服。丰城县生员雷礼家有块墓地被豪绅侵占了，告到衙门竟无人敢出面处理。案子移送到王哲那里时，豪门已经下葬完毕。王哲秉公办事，下令这家起棺另葬，把墓地归还了雷家。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赞扬王哲："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

弘治十六年（1503）王哲迁山东按察司副使备兵临清。有外国商人参与贩私盐，事情被揭露后，王哲将私盐全部收进国库，同时按质论价给予一定的补偿。大家都认为，他的处理刚柔得体，既维护了大明朝廷的威严，又礼待了外国人。当时，太监刘瑾刚刚得势，凡是不合刘瑾心意的官吏都被贬往南京，其中不少人路过临清时就客死在那里。一般人因为害怕得罪刘瑾，对这种事熟视无睹，王哲毫不畏惧，出面将他们一一入殓。

正德三年（1508），王哲升任广东按察使，不久又升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负责江防训练。正德五年，他到北京任佥都御史，巡视南赣（辖今赣州，包括邻近的湖南、广东、福建地区）、汀州、漳州。当时，江西正有人造反，有人问他有什么妙法。他说，最主要是安定民心。到了那里，他首先罢黜了贪官污吏，废除了横征暴敛，感化了造反的人，社会很快就稳定了。

正德六年（1511）初，一向骄横奢侈的宁王朱宸濠想与王哲结儿女亲家，王哲知道他有反叛朝廷的企图，就婉言拒绝了。夏末秋初，宁王设宴招待诸多总督、巡抚，席间送给王哲的瓜上涂了毒药。王哲吃了就出现满口胡言烦躁不安的症状，甚至要投井，幸亏左右人死命拉住，才没有发生悲剧。此事传到北京，皇帝念他忠心耿耿为朝廷奔波，就准予他回家养病。正德八年九月，好人王哲在家去世。

张明道



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一天，吴江城隍庙的城隍老爷大殿内一派肃静，一场特殊的就职宣誓仪式，正在此举行。只见，吴江县衙官员，肃立其下；新任知县张明道在城隍老爷面前燃香点烛，率领众属僚起誓，相互监督警戒，千万不要贪心……

张明道，湖北罗田人，字希程，号玉泉，明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此时，他年已50岁，授北京都察院都事。因为耿直，降调湖州府判官。正好知州缺员，他便代理视事。嘉靖十三年（1534），改任吴江县知县。

在城隍老爷面前起誓后，他说到做到，且处处以身作则。一日，他夫人见属僚某之妇身着华丽，而自己仅是荆钗布裙，回来在他面前叹苦经。张明道说："上天不可欺，

用不着去羡慕他们”。不久，那个属僚果然因为贪心而犯事。这样一来，衙门里少了许多无事生非的事情，役吏也更不敢张狂了。



吴江全县每年上缴赋额50万石粮食，以前的知县都违规向粮长要抽份，县丞以下相互效仿。粮长把这些非分要求往下转嫁，使普通百姓苦不堪言。他对天起誓，从今以后一律取消纳赋时额外加的科率，老百姓十分高兴。

吴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往来使者都要在这里歇脚用餐，迎来往送习以为常，一旦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被诽谤不止。他干脆把这些全部取消，即使节日喜庆的送礼，他都自己付账，从不取自于民。这样一来，这方面的开支比往常减少了七成。他常说：“让我去盘剥百姓，来满足这些非分的要求，求取所谓的个人名声，实在于心不忍。”

不少穷人向富户借了高利贷，几年后根本还不清，就只好逃亡在外。他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找回来，一一安排他们的生计。百姓诉讼到堂，他从不派公差去拘传被告，而是让他们自动到堂接受讯问，所以乡间对公差都很陌生。遇到亲戚间发生纷争，他就把对方召到公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必定让双方谦让而了结。

张明道很看重教化的作用。每月初一、十五，他都要到县学视察，亲自给学生讲解经义。生员们都是少年，但他都一律以礼相待，完全没有长者的架子。他让县丞李文瑞负责修葺社学，遴选乡师，让童子中的优秀人才入学。给他们制作统一的礼服，称作“童子衣”。他对陈昉因鱼辞职的故事很有感触，在仙里桥上建仙迹亭，录陈昉临走写下的诗和《小学》中冯球的故事，刻在亭上，以警示大家。他还为尚书吴山开凿的怀德井（即三角井）作记。

嘉靖十四年（1535）夏大旱，秋收只及往年的五成。他将灾情据实禀报知府王鸿渐和巡抚侯位。上面派吴县知县朱廷臣来踏勘，张明道拜托他体恤民情给予减免，最后朝廷恩准免赋三分之一。

张明道认为，人生苦短，子孙自有其生活，用不着为子孙去筹划。因此，虽有俸禄收入，但从不在自己手里留住金钱。他经常资助孤寡，帮助他们支付赋税。有一老妪要卖孙子来偿赋税，一孤儿因为不能清赋被逮入狱，都是他掏腰包给予解决的。他住得非常简陋，也没有什么余钱来养家。尽管夫人很不满意，但他照样我行我素。

他在吴江仅一年多时间，捐俸禄多次修理了寺庙、桥梁等。他认为，该修的都要修，否则有损吴江的形象，也不要把这些事情留给后人去做。嘉靖十四年（1535）冬季，他调任刑部主事。离开吴江时，仅有两只带来的旧箱子。百姓们久久不肯与他分别，不少人还号啕大哭。为了不致泯灭他在吴江的政绩，吴江百姓为他立了去思碑，以示永久纪念。

李迁梧

体恤民情 真诚待人



嘉庆年间，吴江来了个知县，清廉爱民，深受老百姓爱戴。此时的吴江，境内刚刚遭受倭寇蹂躏，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他一到任，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把以前征收赋粮税银额外加的科条一律取消。他还下令废除了不必要的馈赠和祭祀，尽量降低接待标准，退掉官府长期租借的马匹、车船，减少可有可无的劳役。他就是李迁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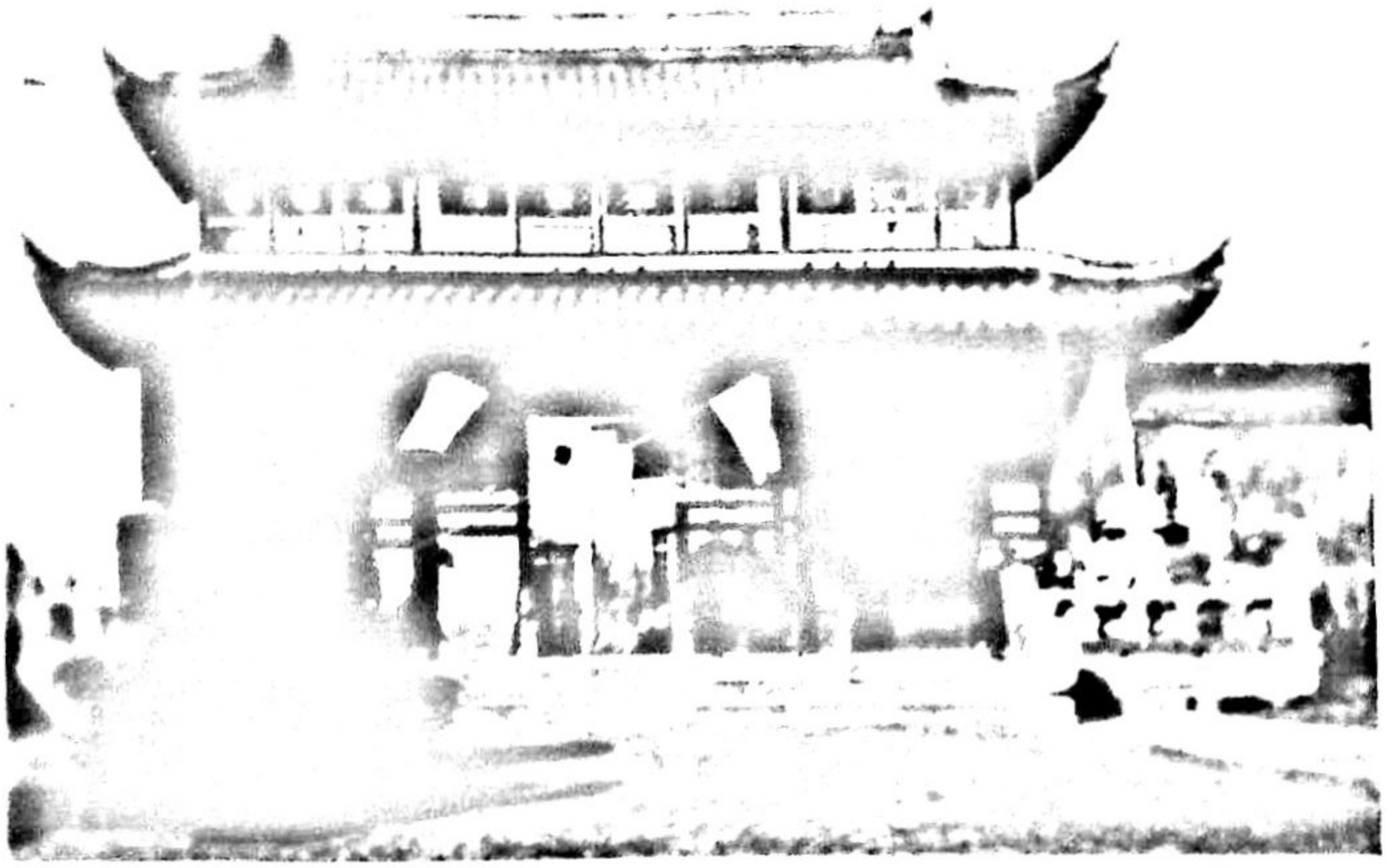
李迁梧，山东安丘人，字茂阳，号凤冈。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戊午科举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三甲57名进士，授吴江知县。

李迁梧身为吴江的父母官，他在处事方面坚持向上呈报实际情况，把真正的实惠让给老百姓。每当路上碰到告状的，他都当场给予裁定，绝不会回避退缩。面对那些刁

钻促狭无事生非的人，他就坚决给予惩办。

嘉靖四十年 (1561)，太湖地区突发大水，靠太湖的吴江县河港交错，地势低洼，灾情特别严重,大批的村庄被淹没，秋后颗粒无收，百姓无米下锅，生活备受煎熬。李迁梧看到灾后百姓难以度日，心急如焚，他捐俸开设糜所施粥。右佥都御史巡抚方廉奏请朝廷，蠲免东南赋额。上疏求免数月已过，迟迟不见朝廷免赋公文下来，而税赋官却三天两头到县衙催征。李迁梧说："百姓深受水害之苦，一日三餐难以维持，哪来粮米纳赋啊？"税赋官脸如铁板，硬生生地说："你身为朝廷命官，拿朝廷俸禄，不为朝廷办事，却为小民开脱，该当何罪啊。"李迁梧毫不退让地说道："身为父母官，不为百姓着想，还算得上父母官吗？"以后税赋官下来催逼，李迁梧干脆闭门谢客,不予理睬。把原先准备的催征工作全部停下来，单等上面来责罚。催得急了，他甚至身穿囚服，手托官帽，直奔苏州府衙求见苏州知府，表明绝不征收灾民一颗粮食，甘愿承担抗命大罪，听任发落。

这件事情传开后，很快惊动了朝廷，不久朝廷就派了钦差到吴江查办。午饭时，李迁梧请钦差到县衙用餐，桌上一碗青菜，一碗萝卜，外加一盆虾皮粉丝汤，热气腾腾。入席后，李迁梧端起酒杯说："大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下官以茶代酒，先干为敬。"话毕，一饮而尽。钦差端起酒杯，以为自己杯中是江南上等的美酒，仰面也一饮而尽。他正想细细品味，不料淡而无味，竟然是茶水一杯，心里那



吴江县衙

个火啊，直窜脑门，脸上的表情顿时像六月里的霉雨天，阴沉了下来。李迁梧已看在眼里，当即离席跪下："下官不恭，只是灾民们半饱难得，下官岂敢稍有侈享，望大人恕罪。"钦差被将了一军，只得强压怒火，违心说道："李大人如此为民操心，难得难得！"这顿粗茶淡饭吃得钦差倒是胃口，一肚子气，心想："我就不信你李迁梧竟一分钱也不贪！"于是他不查灾情，却先看县衙库银。可惜连查几日，所查账本笔笔清楚，库银也是分文不少。实在是无可挑剔，钦差又暗访衙役，可没有一个衙役不夸李迁梧大人清正廉明，是个难得的好官。原想在鸡蛋上挑骨头，最后一无所获，无可奈何。

三日后，钦差去找李迁梧，他正在县衙后堂接待，钦差步入后堂，只见东墙角安放一张小床，床上用粗布遮掩着，床下有两只旧木箱。看到这些极不协调的摆设，钦差以为找茬的机会来了，大声喝道："堂堂县衙之内，竟敢大胆在此安放这些破烂旧货，辱没官衙，还不出来受罪！"李迁梧连忙回话："大人息怒，这是下官的卧榻，并非外人造次。"钦差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迁梧补充道："下官出生山东安丘，家中只有老母亲和糟糠之妻，老母亲多病，全仗家妻侍奉，下官只身赴任，随带简陋行装，有个安身之处就足矣！"次日，李迁梧领钦差大人到灾区巡视一周，所见灾民衣食不周，无一不是苦不堪言，目睹灾区如此惨重，面对李迁梧如此体恤民情，钦差不能不肃然起敬，积压心中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钦差回朝后如实禀报，皇上下诏免除了吴江灾民一年的税赋。

李迁梧为官治于一方，廉洁谨慎，在任三年，不敢妄取一分，对下属也是至诚待人。有一次，李迁梧到绅士吴昆家里赴宴。吴昆用纯银的小船盛酒，酒灌满，小船上的帆就会自动张起，很是稀奇。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说些县里的公事。李迁梧把小船移来移去，就想找出帆张合的机关所在。吴昆见李迁梧对这酒具很感兴趣，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临别时就送给了李迁梧，李迁梧也没有推辞，就把它带回了衙中。每次喝酒时他都用这小船来盛酒，边喝酒边把玩，情趣逸然，任期满即将离开吴江时，他把这银酒具仔细擦干净封好，亲自送还到吴昆家中。吴昆见此惊讶不已，一方面这是件小玩物，他早就忘了，另一方面，他认为李大人做事过于认真了，推辞再三，只好收还了原物。

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城中失火殃及县衙。李迁梧组织僚属吏役紧急迁徙狱中囚徒、库银和图籍。火救灭后，他乘农闲时间征调民力，利用仓库中的旧材料以及罚没款重建公署，历经百日告成。徐师曾作《吴江县重建公堂记》，认为是因陋就简，一改当时奢华建衙门的风气。他还修整了平望驿站，时任刑部郎中吴江人吴邦桢为之作记。

万历五年（1587），吴江又遭大水，老百姓再次回想起李迁梧当年的种种爱民之心，便在城隍庙为他立了神主时时祭祀。

叶重第 留存“清白”在人间



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二十日，汾湖滩边的叶家埭素色一片，哀嚎、哀乐此起彼伏，鲒州王田前知县叶重第，以其42岁正值壮年愕然辞世，上有老母、下有子嗣，其悲、其哀不可言状，而逝者留下的一大批书籍和弥留之际一再重复的“清白、清白……”更是让生者扼腕叹息一位清正廉明之官、一位为民造福之官的离去……

叶重第（1558—1599），字道及，号振斋。明洪武年间，祖上为避祸隐居吴江北厍。他是吴中叶氏第二十三世、叶绅曾孙。高才伟器，资性警颖。文章奇宕耸秀，气干宵汉。万历四年（1576）19岁时中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被任命为山阴（今绍兴）知县。还乡省亲即将赴任时，不幸父亲去世，在家守孝三年，到万历十



玉田石桥

八年庚寅十二月重新任命为蓟州玉田县知县。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长在天堂间吴江的叶重第，看到的玉田实在是一个乂穷乂陋的地方，而且地处畿辅重地、紧枕边境要害，过往军队、进贡物品及豪猾之徒频频过境，是个出了名的难治之邑。叶重第至此为官，确实要考验他的执政能力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叶重第这第一把火烧的是历任玉田官员都不敢轻易动的驻地部队。玉田是边塞要地，少不了戍边的驻军。本来县中圈有军马牧场，但骄横的驻军不少时候会放任马匹牧草，甚至蹂躏庄稼，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叶重第核实后，依法处置违法者，驻军官员大为生气。叶重第义正词严答道：我只知道铲除民害，别的不能顾及了。

玉田濒临渤海，常年水患不断，叶重第亲率百姓修堤筑坝，抵御来水，食冷菜冷饭、住泥潭草屋，一身泥水一身汗，日夜与民众一起奋斗筑坝第一线，终于换来了一邑的平安。执政者为民谋利益，叶重第赢得了玉田老百姓的衷心爱戴。

更让玉田老百姓感动、甚至感激涕零的是，那年适逢玉田闹饥荒，在百姓饥肠辘辘、无米下锅，或背井离乡去逃荒、或守着荒野慢慢饿死的时候，叶重第——百姓的父母官，在救民水火与保乌纱帽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叶重第打开邑中军备库粮，以半价卖给百姓，秋收后再以同样的价格向百姓收回，补上库粮。这不是一般的小事，弄不好要丢乌纱帽、甚至会掉脑袋，衙内反对的官员自然很多。但叶重第说，倘若有利于民，规制尚且可以改变，难道借粜就不可以了吗？他走村串户，计口授粮，虽逢饥荒之年，人心不慌，几乎鸡犬不惊。

百姓最苦徭患，叶重第清厘旧籍，按人口捐额，于是流寓在外的百姓口口相传，争相回到故土热乡，纷纷宿田垦荒，就此烟火再生、人丁兴旺。按照当时的朝廷规定，凡是军队经过的地方，当地必须提供粮草。而军队往往还要征调地方劳力

为他们服役。有些地方官员就借机伙同军队在百姓中征粮征役，收取钱财，中饱私囊。所以，叶重第平时就极其注意提取一定数量的赋粮专仓存储，以应付临时的需要。

万历二十年 (1592) 五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王李昖向大明朝廷求援。十月，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李如松统兵前往朝鲜。叶重第因为提前做好准备，军队一到就按规定供应粮草，不取民间一粮一草。这次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没有给地方上造成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叶重第平时注重以德化民，听讼从不用刑。一次，他看到一个已经定案的案子，经过仔细核实、推敲，他觉得这实是个错案、冤案，但案子口供已定，怎么办？叶重第一夜未眠，苦思冥想后，他改动了口供中的一个字，救出了15条即将服大辟之刑人的性命。

玉田的百姓对叶重第感恩戴德，叶重第3年期满离任后，当地百姓特别造了叶公祠，以示对他的怀念之情。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九日，皇上在对政绩斐然的叶重第敕命中如此褒道："……尔顺天府蓟州玉田县知县叶重第器识才华并茂，文学政事兼优，自脱簪制科，宣猷民社，再更巨邑，并著贤声，惠泽普而四境春温，法令行而一庭秋肃……"

万历二十六年 (1598)，他在玉田的任期满了，因治行卓著，要提拔他到部里任事，因种种原因，他推辞了这份美差，最后安排到工部任主事。同年，升工部虞衡清吏司员外郎，协助丹阳人姜宝办理工程。翌年，出朝为贵州提学佥事，因为路途遥远，老母不便同行，就以老母需要奉养为由辞官归里。

叶重第为官清慎，数年薄宦，家无余资，留给儿子的，唯书一床，唯匾一方，匾上是"清白堂"三字。叶重第曾对其好友说："我越是做官越是穷，周围的人都笑话我笨拙，没给子孙留下什么东西，我留下'清白'二字难道不值吗？"

叶重第去世时，家贫无以为殓，只得把即将收割的田地卖了供费。



叶家埭



刘时俊 唯不可推的“刘公堤”



刘时俊（?—1629）字恒甫，号勿所，四川隆昌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任桐城、庐江、吴江县令，刑科给事中、太仆寺少卿、南京刑部给事中、兵部右侍郎等职。

刘时俊为人方严警敏，在任期间关心民生，注重教化，敢作敢为。在桐城任职时破除迷信，改寺庙为书院。在庐江期间禁止土豪霸占河水，盘剥百姓。万历二十九年（1601）担任吴江知县后，更是为民主持公道。

当时征税太监陈增到杭州办事，一路上各地知县对他行跪拜大礼，阿谀奉承不绝于路。到吴江时，刘时俊丝毫不为之所动，按标准礼仪予以接待。陈增本想在吴江耍耍威风，而这时，恰逢县里的结社活动，读书人在驿站来来

注注，他料想现在抓不住刘时俊的把柄，闹将起来，恐怕会在这些读书人面前失了面子甚至遭到驱逐。读书人也是惹不起的。于是他只得强压怒火满腹愤恨地匆匆离开吴江。但他一直伺机报复。不久，他寻找到一个借口，给苏州府衙发去一封公函，说几年前的一天他在苏州阊门丢失了一批贡品，价值数万，据盗贼交待，参与窝赃的一共53人，而涉及的都是吴江的大户人家。苏州知府朱燮元看到公函后十分震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时俊得到消息后，认为“一旦陈增的诡计得逞，吴江将不可收拾。母鸡带小鸡时，遇到猛禽尚且要挺身相斗，我身为父母官，何惧之有”经过调查，他找到了应对之法。他到苏州拜访朱燮元，讲明自己的想法，请求由自己出面解决此事。得到允准后，刘时俊立即回到吴江，召集衙役和弓箭手二三百人准备抵抗来犯之人。果然，陈增派手下人到吴江兴师问罪。那些人进了县衙，刘时俊命关上仪门，把来人绑起来审问：“你们所称之事已经过去几年，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告发？况且你们指称的事发当日，押送贡品的队伍其实在徐州路上，这又如何解释？”刘时俊先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然后一声威喝：“分明是无中生有，从实招来！”随后对来人动刑，打了几十棒，来人痛得忍不住，终于承认是诬告。刘时俊将来人的具状递交上去，陈增见了无话可说，只得把事情隐了下去。

过去吴江的征赋定为十限三分，催征的吏胥还要自定比例中饱私囊，老百姓苦不堪言。刘时俊到任后，造设户口册，让百姓据实填报田亩、地址、户口，再根据户部核定的数量下发到各户，以八限三分为准平均摊分，使奸猾之徒无从钻营。漕粮到县里调运时，索取折耗往往贪得无厌。他跟漕抚联系后，确定为每百石加4石的标准。装运时，他让唱等级的、看仓库的、掮栲栳的依次传递筹码。每间廒屋设一名看门人，按人给签，验明才可以进入搬运，不准混进一人，发现冒充的一律鞭打，决不轻饶。这样严格管理后，每年可节省漕米2万石。

吴江塘路是连接江浙的交通要道，虽年年修缮，坍塌却很严重。万历三十三年(1605)，刘时俊深感现有塘路不利于舟车通行，也极易招致洪灾之害，决定对吴江境内的北抵长洲县界南至浙江秀水县界的塘路进行大修。修塘路过程中，从筹款到资金使用，再到工程施工，他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既方便百姓，又保证了工程质量。筹款过程中，他将自己的俸银捐出来，又鼓励百姓采取捐钱、出力、工食捐助等方法协助修塘。对于百姓义捐“银助”者，助银一两以上至数十两者竖碑刻名；百两以上者除刻碑外，还颁发“尚义”匾额；数百两以上者除刻碑给匾外，还给予冠带优礼。又设“役助”，出免役钱可以免除北运南运之劳役；设“事助”，准许狱内轻罪囚犯以工代罪；设“免役”，完助工银40两免北运一名，20两免南运或派头一名；设“空役”，查往年有名无实之役，劝令塘长、管兑出银代赎；为随堂各役、水夫纤夫铺兵设“工食捐助”；又通过减少漕粮折耗“轻粮”和“粜易汛米”筹集资金，上司也拨付批发了助工银两。在建设中间，刘时俊还安排专人对各种收支事宜、设计所用工料式值、工料收放细数进行了详细记录。“银数虽及三万，而总撒

相合，毫发不差，出纳虽千百番而簿票互稽，纤毫不混。”他还建立了抽验法，利用编号、造册等方法，“一根一块皆可枚数，一尺一寸不容互混”数十里塘工了然于心。

此次大修耗银27340余两，扶正原用巨石砌的石塘9里，用巨石筑砌新塘69里，修桥9座、泄水涵洞28处，共12000丈，使塘路面貌焕然一新，起到了防范太湖水患的目的，便利了行旅交通，人呼为“刘公堤”。平望镇士民感念刘时俊的恩德，为他单独修建了“刘公祠”。

盛王赞 利为民所谋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入仕、升官、发财，在常人眼里，这是古人对十年寒窗苦读的最高梦想和追求。崇祯十年（1637），苏州胥江的一艘宴船上，即将赴任兰溪知县的盛王赞端起酒杯，把第一杯酒洒向江中，却向饯行的亲朋好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与诸位订下盟约，从今天开始，凡是有利于老百姓，无利于当官的事情，不可以不做；而有利于当官的，无利于百姓的事情，决不可以做。”

盛王赞，字子裁，松陵镇盛家厍人。少年时家庭十分贫苦，他从小被寄养在阳澄湖外公家长大。艰辛的生活，催发了他发奋读书的激情，同时，也磨砺了他为人正直、处事不阿的品德。明崇祯三年（1630）他以吴县籍考取举

人，崇祯十年中进士，授兰溪知县。

在兰溪，他对自己的誓言只字不敢忘，赴任伊始，他就把县衙内原来一切用公款为个人服务的事宜全部改革清理，严格要求自己。兰溪地处交通要道，官差往来常要从地方上拉夫，出运输工具，老百姓苦不堪言，负担很重。他就捐俸雇请上百人专门应付，造了房子让这些人集中居住，按日发给工费，不再从普通百姓中去征调。三年任满，将要入京述职时，衙门收到赎金400，主簿想给他当做盘缠。他说："县内交通要道上的陂塘都废弃了，亟须修葺，这些钱正可派上用场。"于是马上让吏员去承办，两个月就完工了。他乘小船上道时，只有两挑衣被和书籍。述职后，盛王赞重新回到兰溪任职。当年发生饥荒，上面下令制止籴米，怕富户囤积起来牟取暴利。他就严厉禁止私贩出境。这样一来，各处地方米价急剧上涨，惟独兰溪的米价仍然比较平稳。

浙闽巡抚王范下公文，要求各地上报奸贪之人的名单，盛王赞没有什么可报的。屡次来催，他还是没报。此事激怒了巡抚，认为他目中无人。结果，以"偏执乖张"不是罪名的罪名，弹劾了他。兰溪的百姓听说了就罢市，以示抗议，甚至拥塞城门，不让他们的盛知县离开。为不掀起更大的风波，盛王赞只好更衣趁夜色出城。消息还是走漏，知道的百姓追赶上百里，争着要送给盛王赞钱和布匹作为报答，但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了。

盛王赞罢归后，廷臣倪元璐、范景文、郑三俊等相继上奏章推荐。最后，崇祯皇帝下令要重新启用。此时，北京在入关清军的四面围攻下形势吃紧，他无法再去北京。兵部尚书张国维是东阳人。当时，东阳刚刚平定了许都之乱，许都虽然被抓住了，但余党还在负隅顽抗，急需派得力的人去治理。于是，张国维就请求将盛王赞派往东阳任知县。

他到东阳后，首先检查监狱中关押的囚犯，凡是与许都有联系的都尽行释放。这样一来，还散在外面的余党就传开了，新来的县太爷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把抓进去的放了，我们还是偃旗息鼓、解甲归田吧。一下子，就把事态平息了。他到东阳才7天，因为母丧丁忧。当地人想按照军队中遇丧不奔的例子，向上请求挽留，但没有成功。

此间，兰溪县百姓一直关注着这位曾经的父母官，念念不忘他的恩情，为颂扬他，兰溪百姓还专门为盛王赞立了生祠，每年按他的生日办会，称"盛公会"。以后，苏州一带的人经过那里，动不动就会有人问询：盛公的身体好吗？朴实的言语，显现出一方百姓对盛王赞最真挚的情感。

潘见龙



阆中，而今被誉为四川最大的“风水古城”，保存较好，也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城之一。康熙十九年（1680）的阆中，虽山川秀美，但数百万军饷囤积境内，就像是压在吴江籍知县潘见龙身上的一块巨石。蜀道之难、巨量军饷囤积、缺少运力……潘见龙感觉遇上了天底下头等难事，他自戴刑具请罪，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实情向上报告，住宿破庙以求良策……

潘见龙，字从云，震泽镇双杨人。他从小天资聪慧，吃苦耐劳，勤奋读书。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他先后任河南叶县、四川阆中县知县和浙江海宁知州、广西曲靖知府。为官时都以廉洁清慎被人称赞。

康熙十年（1671），潘见龙被授命为河南叶县知县。



叶县土地贫瘠，并且刚刚发生战争，百姓生活艰苦。潘见龙到叶县一上任，就减免火耗、徭役，把不合时宜的制度做法全部改掉。然后又从发展农业解决温饱入手，广招外出的灾民开垦土地，又结合叶县水源充足的特点，从小生长在稻米之乡的潘见龙，就传授当地百姓南方水稻的种植方法，命令工匠制造耒耜、桔槔等耕作和灌溉农具。不到三年，叶县粳稻遍野，粮食获得了丰收，一斗米只值二三十钱，摆脱了贫困的叶县百姓，称颂知县潘见龙为“良牧第一”。

康熙十三年（1674），西南边境发生了战争。叶县是交通要道，来往军队很多。为了不让过路军队骚扰地方百姓，他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他和当地百姓一样，为支援打仗着破衣、骑瘦马，与百姓同甘共苦。当军队经过叶县时，他满足供应，并且亲自去见主帅，恳请他们不要骚扰百姓。因此，虽然大军轮番过往，但叶县地方仍然秩序井然，百姓安定。康熙十六年（1677），潘见龙因母亲去世，丁忧回故里，叶县百姓“泣送不绝于道”，他们感念这位为大家在贫苦时带来稻米温饱、战争时不受干扰的好知县。

潘见龙守孝期满后被任命为四川保宁府阆中县知县。阆中在四川北部，与甘肃、陕西两省交界。勇略将军提督赵良栋，刚刚平定盘踞成都的吴世璠（吴三桂之孙），以谭彭为首的叛军还不时带着军队扰乱地方，治安很乱。有人劝潘见龙不要去上任，但他说：“死生由天命，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见困难就回避呢？”还是泰然上道赴任。

到了阆中，潘见龙才知道，号称一个县的阆中，其实只有区区几十户人家，衙门也是断墙残壁。夜里见到的是时隐时现的青磷野火（家乡吴江称“鬼火”），境况

一片萧条。而他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有数百万军饷囤积在境内，缺少运力调运不出去。潘见龙思考后，决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件事。他将实情向上报告，并且自戴刑具请罪。然后，在马神庙里住了3夜，设想运军饷的办法，他的义举感动了当地人，有个在阆中做买卖的陕甘商人受到感动，也戴上刑具向同行们发倡议帮助潘见龙，远近的人纷纷响应，聚集了不少民夫，将军粮运了出去。随后，潘见龙又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因阆中地广人少，他就采取招抚流民的措施，不畏艰难，想尽办法发展生产，提高百姓生活。

潘见龙还注意整顿治安。诛逆堂魁首谭彭后，谭家属百多人都被抓了起来，知府叫县里看管好。潘见龙说："谭彭的家庭成员很多，并且十分彪悍，他们自认为必死无疑，对他们管得太严容易出事情，不如以恩义与他们结交。"于是放宽囚禁，好好地进行安抚慰问，从根上对他们进行转化。这样一来，谭彭的妻子和子女都很感激，使之"皆泣谕其下，毋负贤君在"，告诫其他人不要辜负了潘知县的一片好意。关押在阆中的一年多时间，谭彭的家属没有一人逃失。

潘见龙在阆中3年，招抚流民，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受到了当地人的称赞，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后被擢为浙江宁海知州，升刑部员外郎，进刑部郎中，迁曲靖知府。无论在哪一处为官，潘见龙以改善百姓生活为己任，以安定一方为责职，他的勤政廉政，为"七品芝麻官"树立了榜样。



钮琇 抵衣民生之多艰



康熙四十三年（1704）9月的一天，广东高明县境内大雨滂沱，那是县令钮琇启程回故里江苏省吴江县归葬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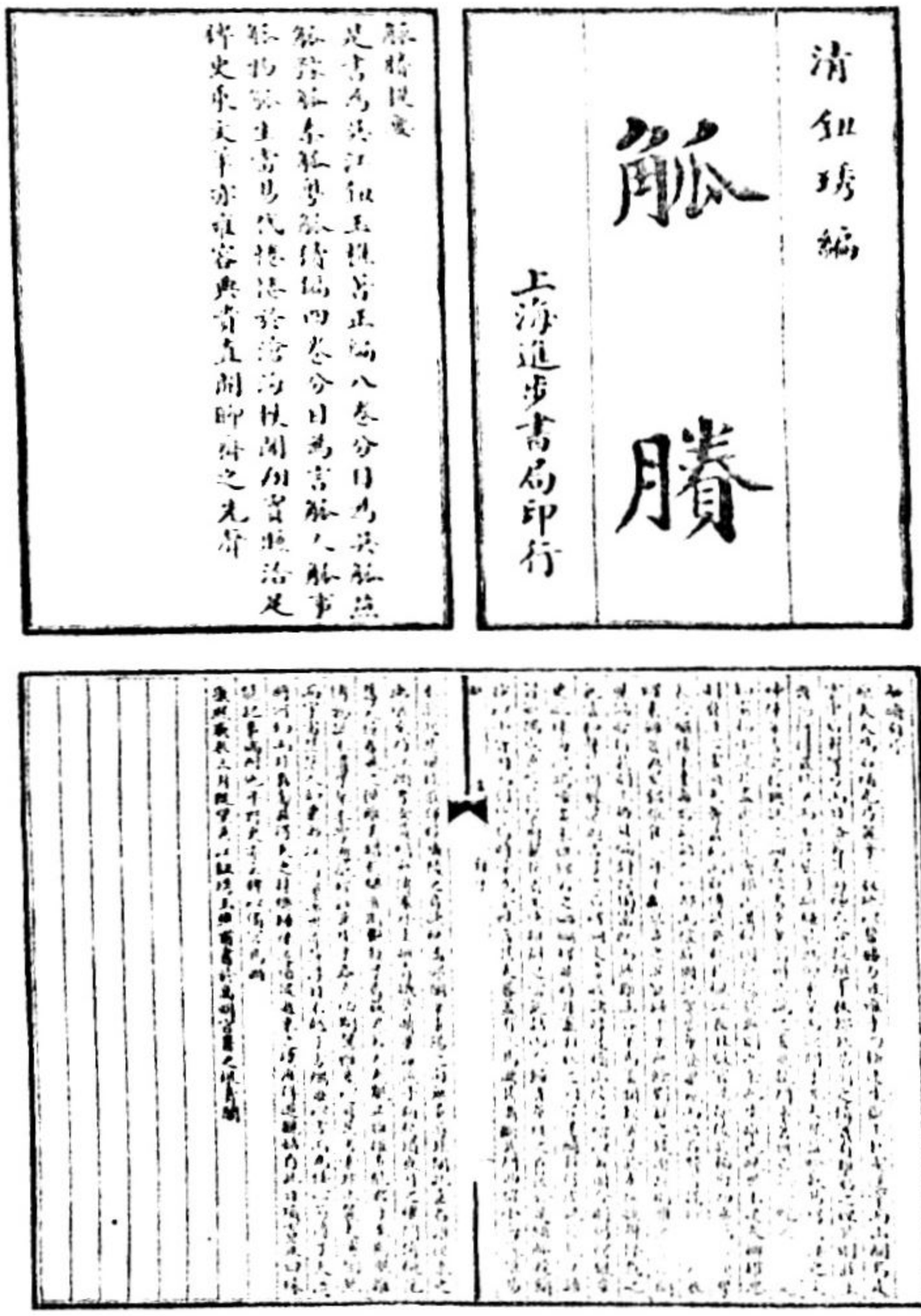
“求求老天爷留人哪！求求老天爷留人哪！”质朴的高明县百姓，在庙宇里拜菩萨，在屋前屋后求上苍，哭声不绝于耳，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钮县令多留一些日子、再多一些日子……

终于要上路了，百姓们不舍得让自己的县令受车辇颠簸之苦，男丁们争相扛抬棺木，妇女们紧随其后，高明百姓以送葬父母的最高礼节，相送着他们的好县令、好父母，走过一乡又一乡，相送百里、千里之外……念念不忘钮琇县令的广东高明县百姓，还设名宦祠对他世代祭祀与缅怀。

钮琇（约1644—1704），字玉樵，清初吴江县南麻镇人，出身于一个极不得志的读书人家庭，家境贫寒，钮琇为家中长男。父钮宏孺，对他厚望有加，注《离骚经》，检校《通鉴》，辅钮琇于学识，家塾于名士吴南邦。康熙十一年（1672），钮琇获拔贡生的资格，开始进入仕途。历任河南项城知县、陕西白水知县兼摄沈邱蒲城事、广东高明县令等职。

从康熙十九年（1680），钮琇被任命为河南项城县知县起，至四十三年（1704）病卒于广东高明县任上，先后为官24个春秋，在钮琇的心中，始终秉承着一个原则：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

初到河南项城之时，也是钮琇为官伊始之日。他没有像其他官员到任那样，与当地名人绅士结帮拉派、打成一片，而是直接深入项城最基层，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多的情况，做出“自古项城多旷士”的总结性评语。针对项城百姓为免赋税而出逃这一现象，钮琇捐俸添置牛、种、耕具等，帮助百姓恢复生产，重拾生活信心。在河南沈丘，钮琇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在广东高明，看到大沙围水患较重，他当即下车召集人员，现场筑堤数百丈，“自是，水潦而无害”。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体现了钮琇较



《觚賸》

高的为官之仁爱品德。

公正廉明、不畏强权是钮琇留给世人的又一方面。沈丘监牢中有6个男女囚犯，已经关押17年，原是受江南某案株连的。他审清后毅然将他们释放，并以此控告有关官员制造冤假错案，使这些官员被罢职归里。沈丘前任知县升迁太常博士，临行时对钮琇说，本职在任13年，从来不敢碰这些地头蛇，你来了才几天就把他们扳倒了，真让人佩服。钮琇在陕西任职期间，浦城连年遭灾，民不聊生，强盗光天化日进行抢劫。钮琇不畏险情，亲自率领捕快、衙役深入盗窝，抓了盗首，村民们又群起协助，一一抓了余党，盗案很快就消失了。高明县山深林密，强盗经常出没，钮琇采取了因地制宜、以情感召的方法，贴出告示招抚盗首，有24人应召，让这些人去守御关隘，以此赎罪，对其中生活困难的，按人口发粮食，还给其安排住处，社会秩序就此得到稳定。

百善孝为先。康熙十九年（1680），钮琇首任河南项城知县，便迎养父母双亲于官舍。只过了短短二三年，父母相继离世。钮琇从项城扶榇柩南归，“于出郭之日，白衣冠而送者，填关塞路，妇女儿童无不雪涕。”由于缺少路资，归葬队伍不得不在一处叫沙河的地方滞留下来，借住师姓家。直至筹借到盘缠才上路。在丧亲的悲痛中，在举步维艰的归葬路上，钮琇眼中看到的、心里想到的，依然是“哀民生之多艰”。他对身边官员、也是对自己说：民而贫维官之咎，官而贫实民之福。

在钮琇24年为官生涯中，从中原调到西北，又从西北调到南粤，却没有获得升迁，终身只是一个七品知县。作为一位“儒吏”，在他高产的作品中，几乎也没有牢骚，这大约是繁琐政务与簿书之闲不废笔墨所分不开的。官当到哪里，文章就写到哪里。他写散文、诗歌，最出彩的还是他的小说《觚賸》。有写在京都求学候选的《燕觚》1卷，项城的《豫觚》1卷，白水的《秦觚》1卷，家乡吴江的《吴觚》3卷，钮琇钟爱家乡之情也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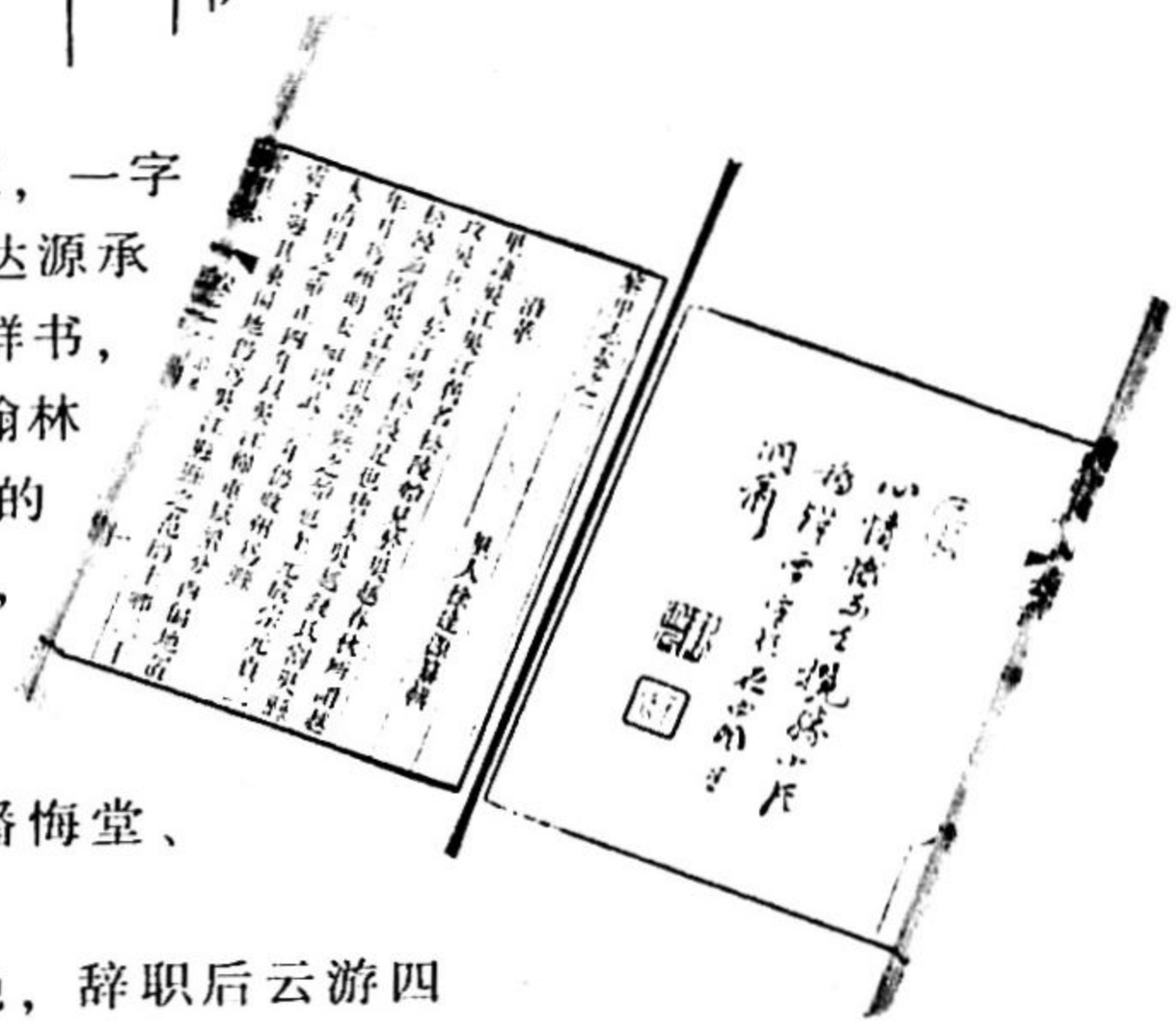
清康熙朝问世的文言小说集，在艺术上屈指而三的作品是《聊斋志异》、《虞初新志》和《觚賸》。《四库全书总目》、《清史列传》称《觚賸》：“其文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2002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将此三书一并收入，亦显示出《觚賸》在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徐达源

热心乡梓 不遗余力



徐达源（1767—1846），字岷江，一字无际，号山民，别号小峨山人。徐达源承绍世家文翰，自小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初由太学候选取为布政使理问改任翰林院待诏，是掌管缮写、校对、文史的官员。他为人豁达淡泊，看轻仕途，由于待诏一职极其清闲，而徐达源是喜欢干实事的，任翰林院待诏一年后即返故里黎里闭门著述，与潘悔堂、陆浩、陆俊相笃。



徐达源编写的《黎里志》

徐达源工诗文，书法也是一绝，辞职后云游四方，常与袁枚、阮元、王文治、吴锡麒等名士相唱

和，并为他们的诗集作序。在南浔小莲庄碑刻长廊中，刻有记录他们诗文往来的《紫藤花馆藏帖》刻石31方，《紫藤花馆藏帖》的拓本也曾流传到日本，藏之圣庙之中。同时，徐达源也擅绘画，所画墨梅“简老疏古”，山水小幅亦有独特风格，人们争相赏购。冯登府有《乞徐山民待诏梅花》诗：“能事曾传杨补之，自将淡墨写清姿。春风画里吹难落，不管江城笛一支。”用来称赞徐达源。

正是通过平望诸友的往来，徐达源结识了平望才女吴琼仙。乾隆五十三年（1788），徐达源和吴琼仙两人结成连理。婚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诗人赵翼有诗赞徐达源吴琼仙夫妇：“画眉才子便拈题，香阁联吟到日西。千百年来曾几见，人间如此好夫妻。”文学家袁枚，耆年重望，来到徐达源夫妇家做客，见到吴琼仙诗，击节称叹，两人遂拜袁枚为师，袁枚称他们为“天机清妙”。吴琼仙作为女诗人得到了当时文人的敬重，她不仅作诗，也能作画，曾自写小影，勒之于石。在写韵楼写下了不少诗篇，她的《莺脰湖诗》，写尽了莺脰湖风光；她的《写韵楼诗集》将她的英名留给了后世。《写韵楼诗集》在吴琼仙逝世后刻印，刻板后，当地名流纷纷提笔为其题咏。



徐达源与吴琼仙

徐达源精研史学，也是地方志专家，嘉庆十年（1803），他编纂成《黎里志》十六卷，脱稿后，里中陈阶琛（字琅敷）、陈丹峤等人一起参与考订等事宜。该志条目井然，搜罗淹贯，是黎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志书。徐达源后又汇集黎里自明代以后120余家诗作辑成《禊湖诗拾》、《禊湖文拾》，晚年移居甫里，又作了《吴郡甫里人物考》、《吴郡甫里诗编》。其编撰的《黎里志》、《吴郡甫里诗编》都由唐仲冕作序。徐达源还著《紫藤花馆文稿》、《新咏楼诗集》、《无隐庵笔记》、《修养杂录》、《南北朝文抄》、《水利节略》等。

徐达源秉彝好德，除了重修徐俟斋外，嘉庆十四年（1807），徐达源又捐资重

葺徐俟斋涧上草堂，并作《涧上草堂记略》，还出资修葺里中明太常卿凌信祠墓及泰太尉庙、禊湖书院等。嘉庆二十五年（1815）吴江因连年水患，盛泽镇织机户失业聚众多达数千人，黎里周家以米二百石，首先倡捐，徐达源也不甘落后，亲自赴盛泽捐资赈恤，并向当地提出“筑圩岸，浚河港，以备水患”等建议，事后欲回黎里，为大风所阻，盛泽杨秉桂有《己亥春仲山民丈以赈恤机户事风阻滩桥感事见怀次韵奉寄》诗：“机声寂响断炊烟，鸿雁哀嗷二月天。但愿今年桑叶贱，红蚕成熟过三眠。”

乾嘉年间，江南一带村镇地痞为患，如果有穷民死后择地入土，一定要出高价格，吴江以黎里和盛泽最为明显。道光三年（1823），为使贫民死后能够入土为安，徐达源和本镇士绅蔡子湘等集义捐金，创建黎里众善堂，为一部分穷民解决了入土下葬问题。由于徐达源的这次义举，之后吴江各镇相继都创建了众善堂，使贫民百姓殁后有了一个最后归宿。当时吴江知县李廷芳特作《山民创建黎里众善堂记》。徐达源的侄子徐乔林在《和山民叔移居南溪留别柳湾旧馆诗》中极赞他的义举：“捐资卜筑禊湖边，众善同归一善缘。突兀胸中万间屋，自家翻少买山钱。”

徐达源急公好义，散施家财，最终不得不弃其原屋，卜居黎里镇之南的“南溪草堂”，又称“南溪老屋”，并于老屋中辟一室为“柳湾书馆”。



写韵楼

费兰墀

为民请命的松陵进士



封建时代，地方上考中进士的多寡反映了当地的文化水准，凡中进士的均授官重用，并被志书记录在册。在吴江这片水绿灵秀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优秀人物。321名进士名录中，有位行谊乡里、为民造福的松陵进士费兰墀，用其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在历史长廊中留下深深足迹，广为乡民赞誉，名列乡贤祠，获后人敬仰。

费兰墀（1769—1825），字心谷，一字秀生，吴江松陵人，费振勋之子，家学深远。吴江费氏一脉可追溯到后蜀费黄裳，其第十世孙费士寅（1160—1230）由成都始迁吴江，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参知政事（副宰相），开禧（1205—1207）中，因不肯依附权贵韩侂胄，不再为官，看中江南水乡，定居吴江垂虹桥堍，人称吴江“东城费

氏”。后代子孙纂家谱，称费士寅为吴江支始祖。自费士寅起的第二十代孙费延厘卜居苏城，费延厘之子费树蔚买宅于桃花坞，遂称桃花坞费家。他们和吴江费璞庵、费孝通父子是同族，费璞庵是费世寅第廿二代孙，同里费氏族长费树蔚逝世后，费璞庵接任族长。费士寅以后十余代，未有成进士、作显宦的，至第十六世费洪学、十七世费振勋、十八世费兰墀，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分别中进士，官中书舍人、广西学政、翰林院编修，科名连绵，为吴江望族。

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费兰墀因谙习掌故、才华横溢，皇帝在殿试中钦点第一名，授予编修一职，专事编纂前朝国史。他后因牵挂吴江的老父母健康，任职一年就退隐南归，尽孝双亲膝前，二十载如一日。

费兰墀是位淡泊名利、远离官场荣禄的学者型人物，也是位勇于为民请命、心系民瘼的忠胆义士。他尽孝之余，关注教学，时常去常熟虞山书院讲诗文，授理论，悉心培育青年学子，著有《莲庵文抄》等佳作。他虽退职在家，却不忘国事，体恤民情，关乎桑梓庶民之疾苦，奔走呼吁，献计献策，组织救援。

道光三年（1823），江浙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吴江深陷，饥荒一片，灾民困顿。费兰墀直言上书御史程邦宪（吴江人），陈述家乡水情，揭露吏胥在赈灾中的舞弊营私行为，竭力主张奖励地方士绅捐米赈灾，并提出捐银千两者可给予九品以外的职衔。他亲力亲为，主动监督本地赈灾银两的自行发放，不经上级官吏之手，避免了因层层官吏克扣而导致的数额短缺。当年，吴江、震泽两县乡绅未经官府的直接捐款高达十万，这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费兰墀急智为民、刚正倡廉的一面。



太湖大堤

洪灾这年，由于水位远远高出太湖堤坝几尺，淹死了不少人，棺木随水漂流。费芝墀组织人力捞棺1.6万余具，腾出他家的私田做义冢，还有不够的，另购山地安葬于苏州郊外。他指挥地方志士，在横扇崇昊教寺、八坼永福教寺、平望莺脰湖平波台等地按计划给老弱病残发米救济。同期，他倡导在县城设立仁善公局，同里镇设立仁仁堂，大力宣扬扶贫救困的济世精神，积极为地方做善事。

久居吴江的费芝墀热爱乡土，时时关心地方上的动态，乐善好施，救济弘猷，鞠躬尽瘁。他曾联络与他同年中进士的苏州知府邱南屏，仗言直书吴江、震泽乃至苏州的漕务弊端，提出苏州一带赋税过重的看法，分析本地一亩田所缴赋税（一斗八九升）为西北各省十数倍的不合理性，请求奏明朝廷减额。后来真的减去三分之一赋税。他在书信中这样反映："大吏仰蒙圣主简任，值此重灾，自无不悉心讲求荒政。……今吴中吏治，稍稍整饬，求其如循吏之为，尤未可信，其何以拯民于饥溺而赐之更生也？近年各省州县自查报被灾分数以至平粜赈恤，一一奉行无阙，然非州县真能尽心核实，则此数者皆无益于灾民。州县固不敢讳灾，或有稍存粉饰，未尝亲身周历灾区，内委之幕友，外假手吏胥，则分数容有不实，而赈粜皆足以致弊。故曰：救荒以州县为重，州县得人最难。救荒之要，在于尽心力以求实惠之及民，而不惟其文具也！"

松陵进士费芝墀摈弃名利、尽孝乐善的高尚情操，克己复礼、撰著授学的名儒风范，行谊乡里、救济弘猷的卓越贡献，令后人悟觉"清介自守"不仅是对待物质追求上的一种正确态度，更是对为官者"正己"的严格约束，也是对为民者"正心"的品德要求。"清介自守"，让我们从前人的事迹中体味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救济弘猷的远大志向，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找到自我的前行方向。

任兰生

因公殉职 留下不朽遗产



任兰生（1837—1888）字畹香，号南云，吴江同里镇人。其名和字皆自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而来。

自明代初期开始，任氏家族就居住在同里。任兰生家世显赫，曾祖父名祖望，祖父名振勋，皆为国子监生，官至资政大夫。他的父亲酉附，贡生，候选训导，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副局长。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的主人，任兰生的名字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和退思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历史也如实记载了任兰生在任时所办的“兴水利”、“救灾民”、“清狱讼”、“办教育”、“备仓储”等许多抚民以仁、广受称颂的好事。

任兰生曾五应童子试，均落榜未取，21岁入皖军，因功授奖，升为九品官职，同治三年（1864），27岁的任兰生捐升为正五品同知候选，后投安徽巡抚乔松年麾下，被委任前敌营务处，因办事得力，策划机宜，深得在前线与捻军作战的安徽布政使英翰的赏识和重用，后随英翰与捻军作战，因功升任。

光绪三年（1877），时年40岁的任兰生官至凤（阳）、颍（州）、六（安）、泗（州）兵备道，在任时“劝农桑，兴水利，修书院，设义塾，修道路，浚河塘”，广得安徽老百姓的赞誉，有口皆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绪十年（1884），任兰生遭内阁学士周德润的弹劾，当时朝廷派尚书崇绮查办，第二年，任兰生被革职。在任期间，任兰生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广得百姓赞誉。《清史列传·任兰生传》中就记载了他的诸多政绩，如：山西、河南灾荒，难民涌入，任兰生倡捐廉俸，募赈钱十数万，救活了无数的难民；安徽发生蝗灾和水灾，任兰生稳定物价，并请款募捐，工赈并举，无人逃荒；领导修路、修桥、兴建义学等。因此任兰生离任之际，“士民顾念旧恩，如婴儿失慈母，遮道攀辕数万人，无不泣下”。

这一年，任兰生48岁，遭贬回到故乡同里，请画家袁龙为他设计建造安家之园，因《左传》中“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为园取名为“退思园”。

远离官场的任兰生，原本是想在退思园里躬身自思，但朝廷的一纸诏书，又让他重踏仕途。光绪十三年（1887），经张曜、曾国荃保奏，又经凤颍六泗士绅联名上书，任兰生被朝廷重新启用，回安徽官复原职，专门负责救灾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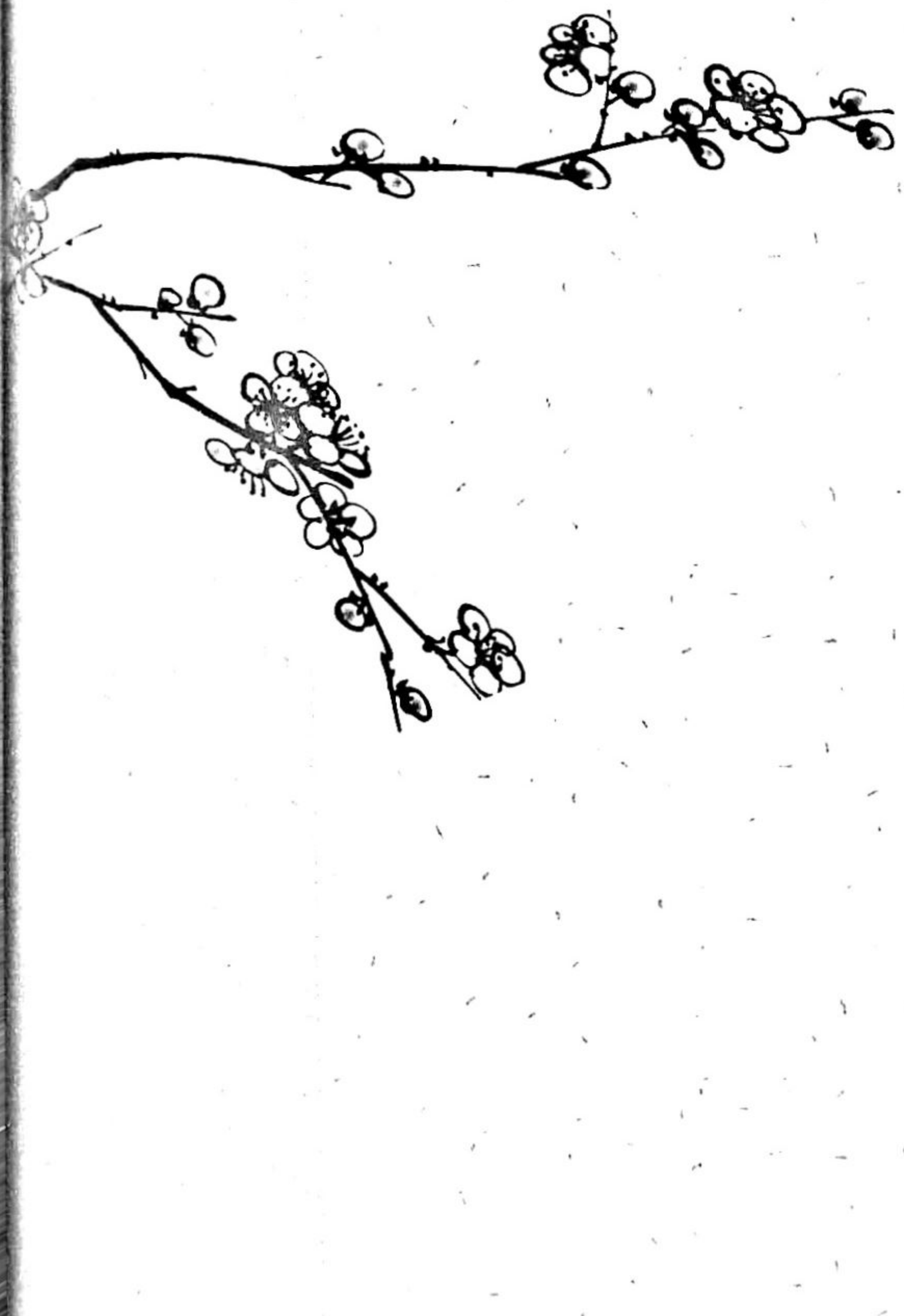
这一年黄河决堤，任兰生即被派往皖北抗洪救灾，他常常骑着马顶风冒雪“周历灾区千百余里”，视察灾情，问民困苦。光绪十四年（1888），安徽北部又暴发大水，下流腾涌，任兰生救灾保民，各处巡查。据记载在一次巡视中，因咆哮的洪水使马受到刺激，任兰生被掀翻掉下马，摔伤尾闾，受伤破裂的地方不幸染了毒疮，死于那年四月十九日。任兰生死后，皇帝下诏对他积劳成疾病故从优议恤，并为任兰生立传，附祀英翰专祠。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50岁的任兰生，还没来得及坐在园子里躬身自思，就因公殉职了，而他建造的退思园却将无尽思考留给了络绎而来的后人。



德

明鉴录



第五章　忠于国家　服务人民

杨芷 抗击倭寇保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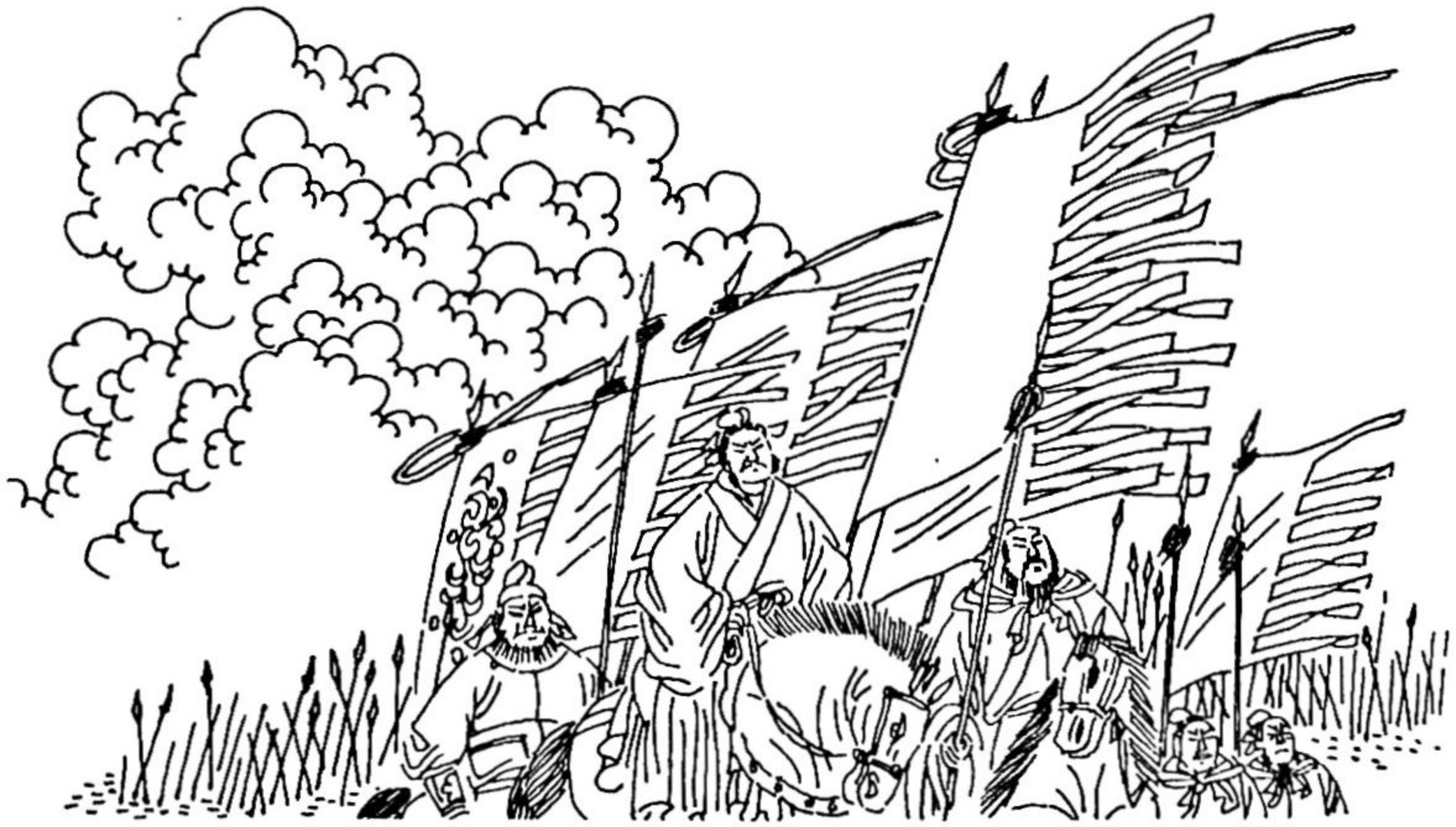
吴江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历史上的吴江，也曾数度陷于兵临城下的险境之中，而吴侬软语的吴江军民同仇敌忾，共保家园的事迹，屡入青史。明嘉靖年间，知县杨芷率军民抗击倭寇，为吴江历史留下了精彩一笔。

杨芷，字文植，湖北安陆县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三十二年任吴江知县。明嘉靖年间，中国沿海频频遭受倭寇侵扰，北起直隶、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倭寇进行了严重的侵扰和破坏活动。倭寇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居民财产，抢劫商船货物，焚毁大量房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朝廷多次派兵征讨都无济于事，以致沿海民众人心惶恐，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谣传不胫而走。吴江也屡遭倭寇侵犯，百姓不堪其骚

扰，杨芷到任后，决心要像名将俞大猷一样抗击倭寇，保一方平安。

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倭寇由昆山循青阳江进犯吴江。知县杨芷派飞舰截断上游，阻止倭寇西窜，击杀倭寇18人。紧接澄湖一仗，生擒倭寇首领2人。五月，倭寇92人由乌镇沿烂溪窜至平望，欲进通县城。杨芷得讯后，下令沿运河塘举火。倭寇见有准备随即直奔钱田。杨芷带领水兵与嘉湖兵团围困倭寇3日之久。六月，3000多倭寇抢掠苏州后，带领12艘满载赃物船只回柘林，在出石湖经吴江时，杨芷及举人周大章带领轻型战船由瓜泾港杀出，击毙倭寇16人，生擒36人。期间，倭寇还多次来犯松陵、黎里、同里等地，都被知县杨芷率军民一一击溃。

随着战事的频频发生，杨芷在视察地形后，认为平望盛墩一带是扼制倭寇北进的咽喉要地。为了有效抗击来犯倭寇，杨芷决定在平望官塘袅腰桥北面建造一座敌楼，并令太学生沈敷负责营建。整个工程连头带尾，仅用了12天时间，用银不到40两，耗时之短用银之少，足见吴江军民歼灭倭寇的迫切心情。建成后的敌楼，基方一丈七尺，高一丈九尺，分上下两层。底层四周有栏杆环绕，楼门为铁铸大门，坚不可摧。上层四周有低矮的凹凸型城墙环绕，楼顶高悬书有“吞海楼”字样的匾额。吞海楼集了望、指挥和防御于一体，是当时非常理想的军事设施。



胜墩抗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奔至平望盛墩唐家湖，并企图血洗吴江城。当时，除吞海楼外，南运河中早已筑起拦河堤，唐家湖底还布了钉板。只见，知县杨芷在吞海楼上沉着指挥，将来犯的倭寇硬生生地逼入唐家湖。他随即命令善泅水的兵士潜入水下凿穿倭寇船底，数百只三四人的小船将敌船团团围住，在船上、水里与敌人展开搏斗。陆兵在敌楼上用弓箭射杀，截断倭寇逃路。倭寇慌乱逃往平望。此时，保靖宣慰使彭荩臣率领士兵2000余人前来支援吴江抗倭，与倭寇在平望相遇，两处官兵奋力击杀倭寇。此次战斗，共歼敌3000余人。百姓为纪念盛墩抗倭大捷改盛墩为“胜墩”。此后的几个月内，倭寇不是满载数船辎重大张旗鼓地来挑衅，就是偷偷摸摸地来滋事，都被杨芷督导的水兵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屡战屡败的倭寇头目徐海，在不甘与绝望中，于九月二十五日，投海而死，倭寇之患遂渐平息。

明嘉靖《吴江县志》在评述此次战斗时写道：“自胜墩之捷，（民人）始知倭寇之易破，我兵之易张，人人自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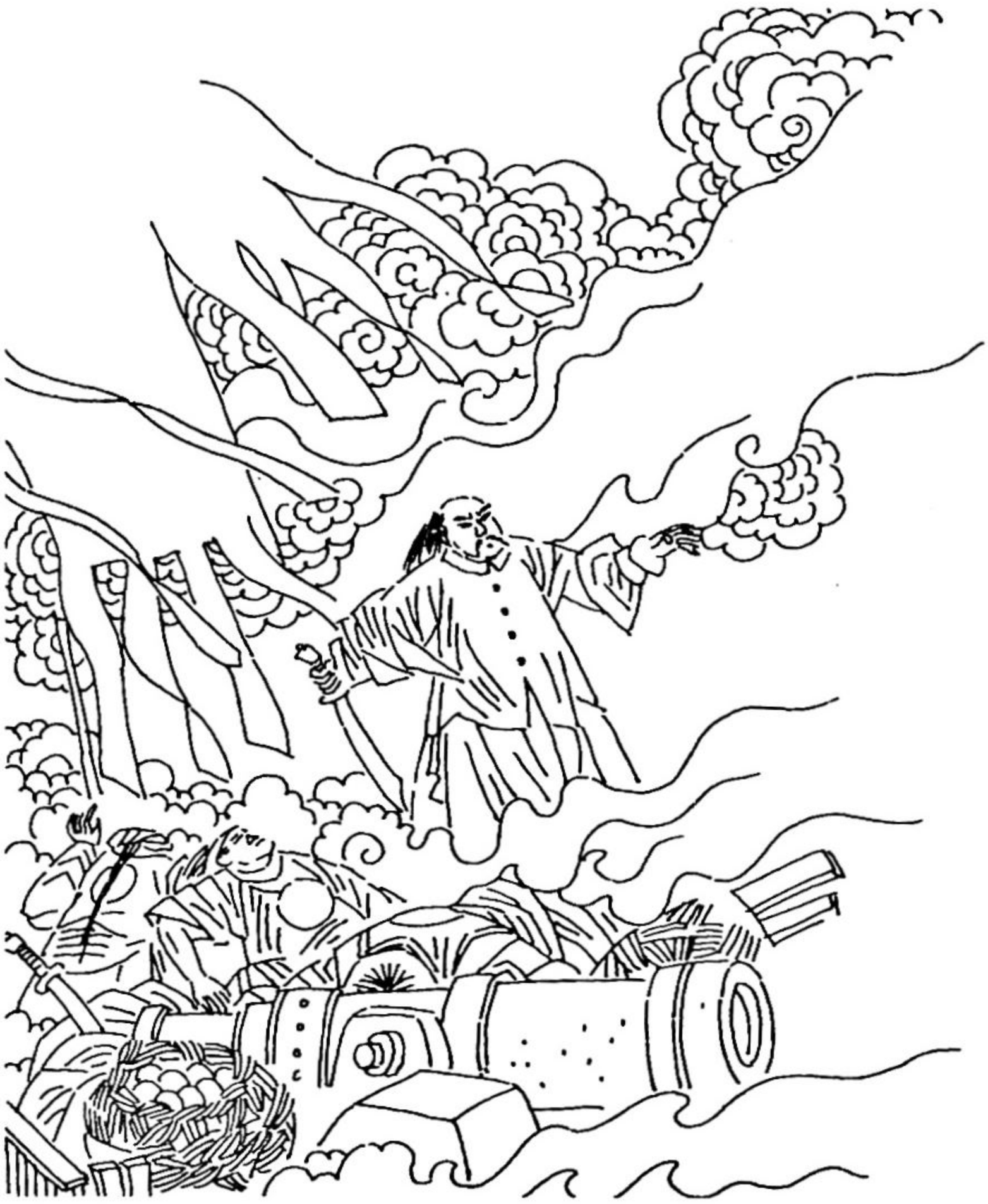
张曜 金戈铁马戍边疆



在吴江黎里镇的蒯家弄底，有一处被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名字有些独特，叫做退一步处。它如同一艘远方泊来的方舟，安静地停靠在深弄的尽头。故居的主人是清末爱国将领张曜。

张曜（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浙江钱塘人（一说直隶大兴〈今属河北〉人）。张曜本为异姓，怎么居住在黎里蒯家弄？这得从蒯贺荪这个人说起。蒯贺荪，字则钦，号士荪，自幼聪颖过人，十九岁时在京城就已经小有名气。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恩科顺天举人，后官至直隶州知府。张曜为蒯贺荪的内侄，幼年随蒯贺荪来黎里读书，蒯贺荪离开黎里后，张曜便在镇上以做买卖为生。

咸丰三年（1853），蒯贺荪率军镇压捻军，正逢战事不



张曜抗俄

利，蒯贺荪军队被困的时候，张曜前来投奔，并协助蒯贺荪在与捻军作战中，屡立奇功。蒯贺荪十分欣赏这位内侄的军事才能和危难时刻的舍身相助，就将族弟蒯秀塔的女儿嫁给了他，于咸丰四年在黎里完婚。次年，张曜在与捻军作战中又立功，被升为总兵，后又升任河南布政使。

同治三年（1864），张曜来黎里新蒯家弄底居住，并将居所命名为“退一步处”，有归乡退隐之意。本想在江南小镇上就此安居的张曜，却逢清末年间，中华大地屡遭列强侵犯，民族陷于危难之际。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张曜再次出仕，征战边疆。

同治十年（1871），沙俄悍然出兵强占伊犁。面对这一情势，清廷一片混乱。在朝廷急需人才之际，张曜以提督名义跟随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左宗棠，率军讨伐入侵中国喀什、占领南疆的中亚浩罕汗国高级军官阿古柏，相继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底定天山北路。至光绪三年（1877），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重创阿古柏军队，阿古柏身亡，残部逃往境外。清军取得粉碎殖民主义的胜利，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张曜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于协办新疆军务之职。光绪十年（1884），张曜东归。同年，中法战争爆发，张曜马不停蹄，奉命保卫京畿，后历任海军帮办广西、山东巡抚等职。在山东，张曜办海岱书院于青州（今益都），亲自督治黄河水害，最终鞠躬尽瘁，为国操尽最后一丝精力，病死在工地上。

如今，建于同治年间的张曜故居“退一步处”，在岁月中静静地守护着主人传奇的人生。小院四楼四底，厅前有一庭院，院南有平屋三间。院东侧为长100余米的新前家弄，弄临院处开有三个漏窗，院内之光通过这三个花样各异的漏窗透向昏暗的弄中，给进出之人带来很大的方便。

金戈铁马已成烟，黎里人并没有忘记这位将军女婿。1986年7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将“退一步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修复，让人们更加了解和怀念这位清末爱国将领。



退一步处（张曜读书处）

陈去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俄国出兵入侵中国黑龙江，并占领了东三省主要城市。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16岁的陈去病热血沸腾起来了。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吴江同里人。他了解到不少有志之士都去了当时新兴的君主立宪国家日本，也就开始考虑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新年里，30岁的陈去病告别了中国教育会的同仁，只身赴日考察。

初到日本，这个小小邻国各方面的发展，令陈去病惊叹不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新兴的君主立宪制与腐败保守的清政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从梅田驿坐火车去东京，一路隧道重重，巧夺天工之感油然而生，但是陈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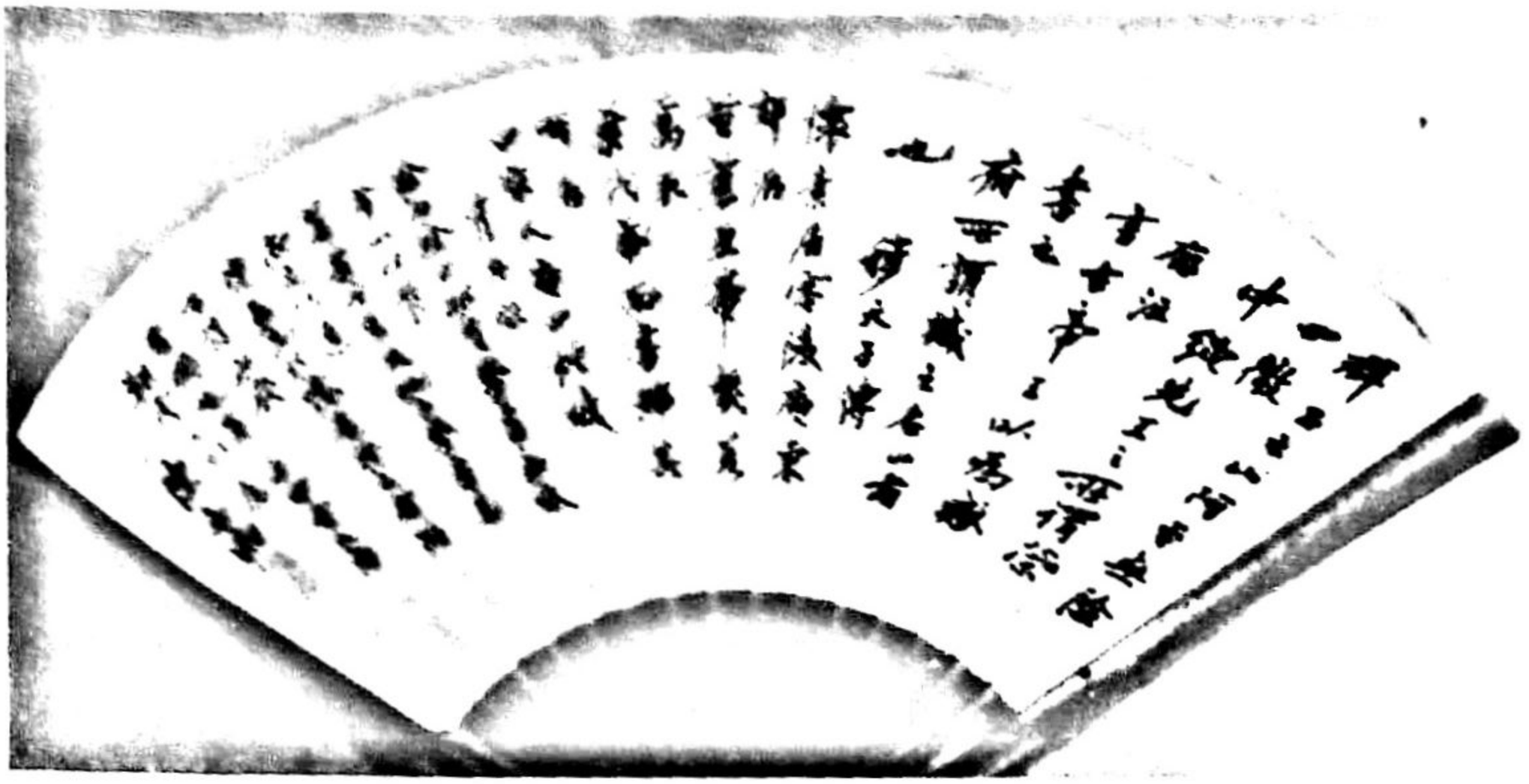
孙中山题“二陈先生之墓”牌坊额

的心情快乐不起来，一种作为弱国弱民的悒郁沉重地压抑着他。

3月12日，陈去病和秦毓鎏等十一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参观大阪博览会。当时，正赶上大阪天王寺博览会开幕，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但是这博览会却像一盆凉水凉透了他们的心。

博览会设有台湾馆，当时《中日马关条约》将中国台湾省割让给了日本。在台湾馆中，他们看到了展出的几具木偶，有的穿戴翎顶补服，有的小脚盛装，有的披麻戴孝，有的伸手行乞，都是中国人的形象。馆中设有茶座，招待员一律是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或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这明显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更有甚者，日方在台湾馆中把福建产品也展示其中，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表示福建也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看了以后，陈去病及其同伴都异常愤慨，一行人就去找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的官员桑宝协商，要他与日本交涉。桑宝却推三阻四，不肯出面，怕得罪日本人。陈去病等人十分痛心，感到这不是小事，于是就决定自己去面对博览会负责人，要求日本当局将福建产品迁出台湾馆，并且取消对中国人侮辱的表现。他们对博览会负责人说：“我们学生年少气盛，做事不计后果。如果不采纳我们意见的话，我们将敲碎玻璃窗，采取行动。”经过激烈的交涉，理屈词穷的日本方面，面对凛然正气的陈去病等人，不得不将福建产品移出博览会。

博览会事件给陈去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他感到，中华民族再不奋起自



陈去病扇面墨迹

救，离被瓜分的日子不远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的自救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从自身做起。接着，陈去病倡议组织吴江游学会，并建议在吴江当地组织游学公会，募集款项，资助爱国青年出国，培植有志之士。他在给同里支部的信中写道："警警警！白话做言竟走笔。醒醒醒！庞然巨狮勿高枕。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信刚写完，就传来一则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镇压革命会党，准备向法国借兵借款，答应事平之后，将以全省的电线权、铁道权与矿产权送与法人作交易。第二天，陈去病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召开的500人"拒法大会"。又隔数日，非法霸占我东三省的沙俄不仅拒不撤兵，而且变本加厉提出新的侵略要求。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又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陈去病和一批留学生纷纷表示要组成义勇队，亲赴东北前线，和侵略军决一死战，夺回我大好河山。

正当陈去病和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操练之际，日本警察出面干涉。迫不得已，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使这个新生的组织得以生存发展，陈去病在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解囊资助，情愿自己节衣缩食。但是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由，强行解散这个组织。这就使爱国留学生们彻底看清了清政府朽木难雕的本质，纷纷用尖锐的笔触剖析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政策，陈去病在由他主编的留日学生《江苏》第四期上，发表了"满清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有力鼓动。

陈去病在日本时很想谒见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但孙中山正好离开日本去了东南亚，失之交臂。但在日期间陈去病却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党人，为日后孙中山在

上海召见他作了充分准备。此时陈去病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决心担当起推翻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清王朝统治者的重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将母亲赐给他的一直沿用下来的原名陈庆林改为陈去病，表示要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榜样，肩负天下兴亡之责。

宣统元年（1909）11月，陈去病与柳亚子等创建南社，用文字鼓吹革命。继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孙中山先生亲切地誉他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者”。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陈去病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统治日益不满，脱离政治，专心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工作，历任东南大学、持志大学教授等职。

他官虽不做了，但仍是一腔热血，好打抱不平。

苏州西郊天平山，以万株红枫和范仲淹安葬其祖先成为纪念处著名。天平山环境清幽，树木郁葱。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里最好的宣传词。陈去病与南社社友经常在这里聚会，研讨国家大事。

1928年，孙中山墓地中山陵的供石任务落到了金山（金山石雕匠人闻名全国）地区，天平山正在此中，据说当时有关方面就是看上这里的灵石，而且任务很紧，于是，一些签约赚钱的户主竟敢“开千年旧禁”，向范氏祖坟山开挖。范家后人当然不肯让别人“挖祖坟”，于是就打起了官司。1928年3月14日的《苏州明报》以《开采总理陵墓石料发生讼案》为题发了报道。

陈去病看到了这一报道，颇为震惊，这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耿直之人，立即到天平山勘察情况，还联合了张一麐、张继等名绅研讨法律文书，写下了《履勘天平山采石记》碑文。

陈去病所撰碑文洋洋千言，还能不忘拎出来孙中山的名句：“以天下心为心，往往屈己以徇人，舍己以从民之欲，举棋革命，荡平胡虏，建兹民国。”说明孙中山的坦荡胸怀，孙中山决不愿意看到为他建造陵墓而破坏文物古迹的情况发生。他号召大家应以已故总理为榜样，号召吴地的有识之士，要“作不平之鸣，卒之公道在人，是费用白，而鬼蜮之计，终以沮遏”。后此事得以圆满解决。此碑和《布告》等四块碑石现仍立于天平山高义园大门两侧的沿墙内。

或许蒋介石也觉得陈去病这个人耿直无私心，可以重用，于是还想着请他出来为官。这位老夫子索性连书也不教了，和蒋介石玩起了“藏猫猫”，他跑到苏北高邮等地巡游去了，弄得大家找不到他，只好罢休。不做官不捧场也就算了，但这老夫子不依不饶，多次在公众场合顶撞蒋介石，甚至曾用拐杖指着蒋骂“小棺材”（苏州话）。

1933年10月4日，那天是中秋节，陈去病患痢疾骤剧不治，临终前写下“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陈去病死后，蒋介石仍然命令为他举行了国葬，公葬于苏州虎丘南冷香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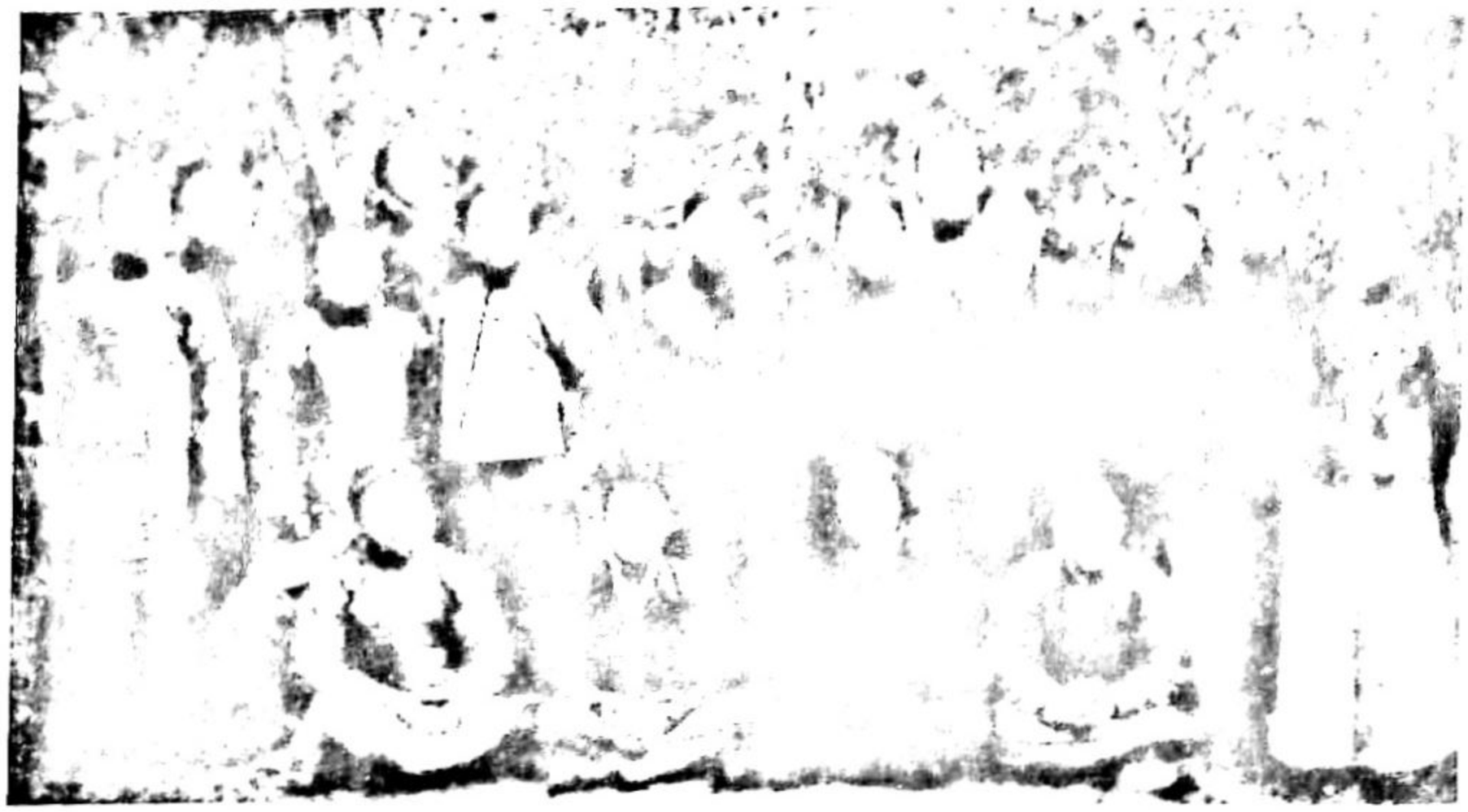
柳亚子

南社旗手 革命诗人



2011年下半年，吴江市首届民间“显宝”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吸引了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在这次盛会上，两份已经泛黄的1945年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再次绽发光彩，最终获得一等奖。其中9月2日的报纸上刊登了柳亚子的《赠毛润之老友》一诗，10月25日的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题写的“柳诗尹画联展特刊”八个大字，苍劲有力，特别醒目。可以说，这两份报纸不仅记录了“重庆谈判”期间的历史，见证了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民主情怀，更见证了毛泽东与柳亚子的深厚情谊。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吴江黎里人。1909年创办并主持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



南社虎丘大会合影（前排右二为柳亚子）

海通志馆馆长。“四一二”政变后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

分湖水泽，连接江浙。明清鼎革之际的著名爱国诗人、抗清志士吴易、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等人曾在此从事反清斗争。柳亚子少年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瓜分豆剖的危局，而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思潮大为传播，小小年纪的柳亚子受父辈影响，已具有反清意识，喜读顾炎武、夏完淳著作，崇尚激昂慷慨之作，以诗歌为武器宣传革命爱国思想。他崇拜卢梭，曾将自己的名字更为“人权”，字“亚卢”，即亚洲的卢梭。他曾在报刊上宣传卢梭的民约论，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向君主乞求的君主立宪制。他最早发表的诗作《放歌》中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的激情：“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间。”“胚胎革命军，一扫粗与糠。”他又在《江苏》、《女子世界》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哀女界》等文，呼吁妇女独立解放，竭力鼓吹革命。

柳亚子在以诗歌为武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积极行动起来参与革命。光绪二十九年（1903）柳亚子进入爱国学社读书，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的学生，并结识了革命青年邹容。柳亚子对邹容的才华非常钦佩，积极与另外两位同乡资助邹容出版了革命宣传巨作《革命军》。《革命军》的出版在国内引起轰动，被称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三十一年春间，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发起学生自治会，主编《自治报》（后改称《复报》）。三十二年，柳亚子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因而自称是“双料革命党”。同年，他在上海吴淞口的邮船

主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此后他编辑的《复报》日渐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小报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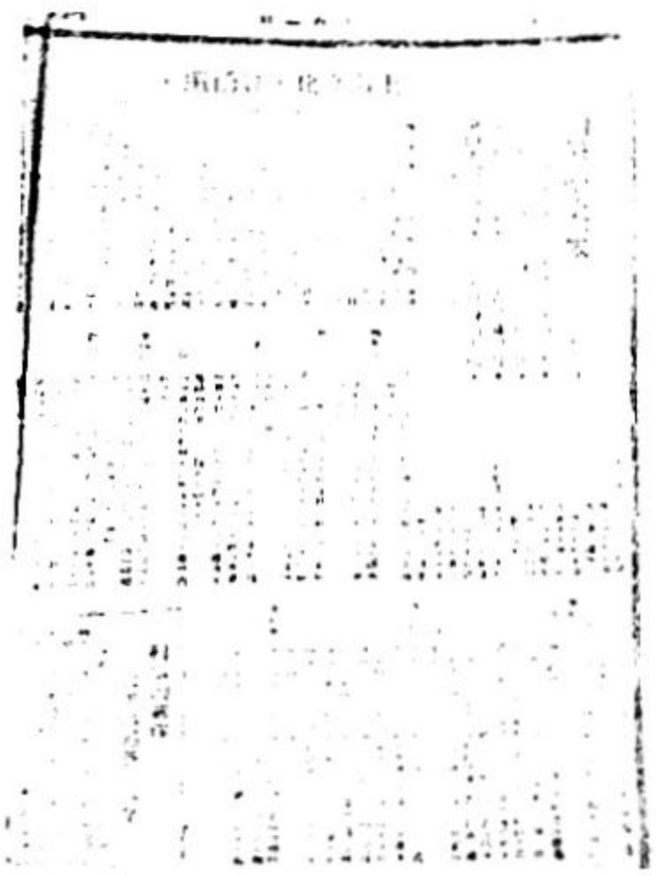
宣统元年（1909）11月13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在苏州虎丘成立了南社。在中国近代史上，南社作为以宣扬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文学团体，在反清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南社成立时，柳亚子22岁，意气风发，勇于任事。南社存在的十余年间，他奔走筹划，不遗余力，承担了《南社丛刻》22集的大部分的编辑、校印，并始终坚持南社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南社的代表人物。同时，南社也吸引了大批革命志士参与，宋教仁曾被推为《南社丛刻》的编辑员，后来在民国史上煊赫一时的文人如包天笑、成舍我、邵飘萍、武人如黄兴、陈其美、李根源也都曾列名南社。

民国成立后，柳亚子不仅是著名的革命诗人，更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柳亚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认真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积极维护国共合作。1925年11月23日，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出取消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并要撤销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毛泽东等人的职务。接着，他们又策划在上海成立伪中央等一系列反共活动。柳亚子对此严厉加以批驳。这年的12月，他发表了4000余字的长文《告国民党同志书》，指出：反动派"自己不肯站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而去勾结反革命的势力，甚至于去领导反革命的势力，要掀起党内轩然的大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叛党叛国叛总理吗？全国同志，人人得而声讨之矣！"此举激怒了在南京的国民党右派，声称要开除他的党籍。1926年5月，柳亚子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迫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柳亚子当即与何香凝、彭泽民等表示坚决反对。期间，柳亚子邀约了侯绍裘、朱季恂等共产党员，一起去找蒋介石，当即责问他：你到底是总理叛徒，还是总理信徒……由于柳亚子等真理在手，蒋介石默不作声。柳亚子未等会议结束，就返回上海，表示与蒋介石分道扬镳。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遭迫害被搜捕，以匿于复壁得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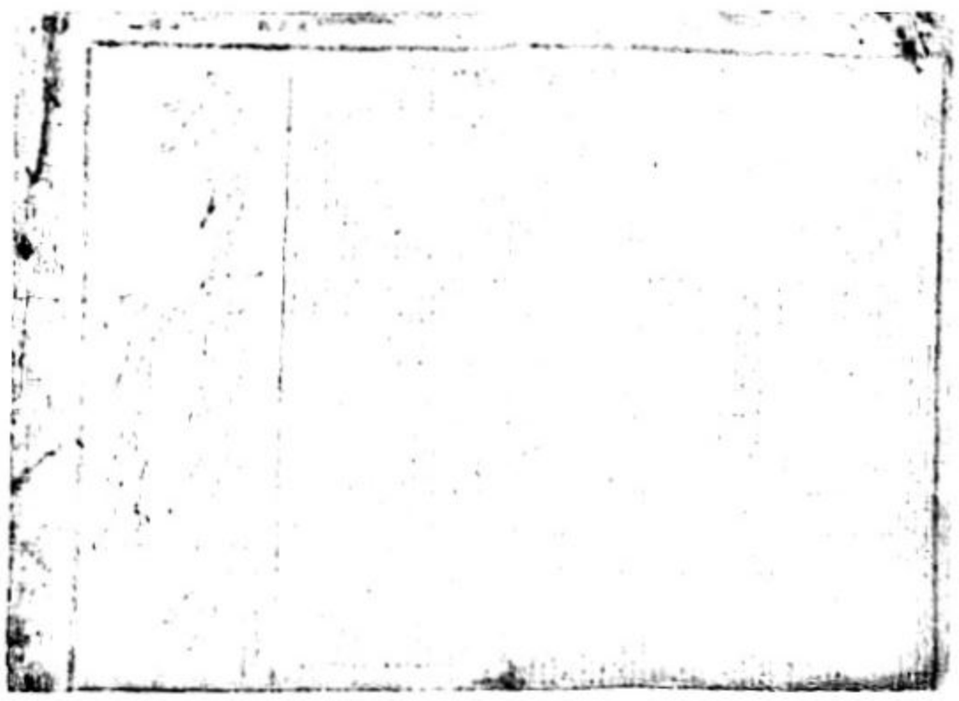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华界，柳亚子困居法租界，自题寓所为"活埋庵"。抚今思昔，他又重拾南明史和抗清的民族志士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和陈子龙等故事，搜集了许多有关南明的史籍，写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117种，但终因战乱大量文稿散失，编写明史的愿望没有实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在香港的柳亚子，亲自撰写电文，和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四位国民党元老联合宣言，发电报责问蒋介石，斥责蒋介石倒行逆施，破坏团结，破坏抗战。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会前发出电邀，请柳亚子参加会议，柳亚子断然拒绝。恰好时任国民党海外部长的吴铁城由南洋返渝路过香港，他奉了蒋介石之命，约了杜月笙一起到了九龙柯士甸道柳亚子寓所，邀请柳亚子赴渝出

席全会。柳亚子拍着桌子，正颜厉色地对吴铁城说："我宁可做史量才，也不去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全会。"说着把吴铁城、杜月笙赶出了家门。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在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以柳亚子"自离沪到港，先后在刊物及公开场合作种种违法'国策'之言论"议决将柳亚子开除党籍，同时断绝了他的经济收入。柳亚子闻之泰然地对其外甥徐文烈说："出卖国民党的就是他们，我还是而且始终是一个真实的国民党员，奉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郭沫若曾评价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更是广为流传的佳话。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重庆的43天中，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柳亚子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结识的老朋友。8月30日，刚到重庆不久的毛泽东就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等人。席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了这首诗。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又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在柳的寓所，柳亚子请毛泽东校正他准备收入《民国诗选》的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并向毛泽东索诗。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得到毛泽东题赠的《沁园春·雪》后，柳亚子很快作出了和词《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10月下旬，柳亚子将毛泽东赠与自己的词，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柳诗尹（瘦石）画联展"上展出，《新华日报》于11月11日刊出了柳亚子的和词，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则发表了《沁园春·雪》，在重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1945年
9月2日重庆
《新华日报》



1945年10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

钱刚 北伐战争急先锋



1937年5月，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内，一片肃穆气氛。一方金山石制成的高5.4米纪念碑巍然耸立，碑身正面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钱涤根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历历在目，墓前肃立着烈士生前的好友、同事、黄埔军校学生及吴江各界人士。他们面露悲戚庄重之色，共同纪念为北伐战争已牺牲十年之久的钱刚烈士。

钱刚（1887—1927），字涤根，吴江松陵人。自小随父生长于江西南昌，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三。身材虽不高，但气宇轩昂，性情豪爽，思维敏捷，处事果断，并酷爱武术。面对清王朝的衰败没落，再加上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少年时期的钱刚心中就树立了革命救国的志向。



钱刚烈士纪念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胡憨臣、廖伯琅介绍下，钱刚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当时他还不到19岁。光绪三十四年，他入江西常备军随营学堂（后改为陆军宪兵学堂）学习军事，三年毕业后进入江西李烈钧部任职。由于李烈钧部急需新式军事人才，再加上钱刚志向宏大、聪明能干，很快成为李部的中间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钱刚在江西追随李烈钧，积极响应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斗争，深受李烈钧器重，旋任江西都督府副官长兼内卫队长。1912年1月，江西军政府成立，钱刚被委任为军政府军法处长，任职后严于律己，秉公执法，消除奸宄，为当地军民所折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李烈钧部的军事改革，改造新军，致力恢复江西战后的社会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1913年和1915年，钱刚又追随李烈钧先后参加“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坚决反对袁世凯窃取共和成果和复辟帝位，拥护共和。

1915年8月，钱刚秘密回到家乡吴江，住在大东门城墙根，与唐昌言为邻。在吴江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外出联络革命同志，很少在家闲居。每次回来，都不断向好友、邻居宣传革命。1917年和1919年，钱刚参加两次“护法运动”，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奉命在上海迎接国会议员南下广东。在1922年平定广东陈炯明叛变中，被任命为大本营命令传达所少校副官长、广东增城警备司令之职。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并创办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李烈钧部被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钱刚被委任为该军参议。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钱刚悲痛万分，赴南京与江苏省省长韩国钧、警备司令冷遹等人一起商量组织追悼大会，参与治丧事宜。10月，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的军阀势力，进行了第二次东征，钱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谍报主任。东征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副官，兼入伍生招待所主任。

钱刚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是在第三期，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他认真做好各

项工作。据1926年1月1日《新黎里》报第三版的《国民党县党部开会消息》一文报道，钱刚当时致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并寄回了黄埔军校招生简章，要求县党部配合军校做好招生工作，为军校输送优秀人才。他不但要求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做好该项工作，还积极动员与钱家有世交的金家的热血青年金鲁望投身黄埔。

1926年4月，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市党部委派，钱刚秘密潜入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今贝当路）均益里1号，组织江苏省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联络各地军民组织别动队，扰乱盘踞江浙的军阀后方，以响应国民革命军准备于7月开始的北伐。钱刚被任命为江苏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当时，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直系军阀孙传芳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徽。经过二个多月的多方奔走策动，钱刚等在孙传芳的部队中组成了10个支队，人员达数万之众。由于粮饷尚未落实，暂时未举行起义。

1926年8月，浙江的警察所长夏超拟在嘉兴发动起义，相约钱刚在上海响应。夏超起义失败后，引起反动当局的警觉，悬赏重金通缉钱刚。他便由贝勒路搬到马浪路暂住。孙传芳对钱刚的搜捕，引起别动队更加广泛的活动。孙传芳将原驻上海一部移往杭州，调李宝璋充当淞沪警备司令，派出便衣队到处搜捕钱刚。同时，委派钱刚的同窗好友、原江宁知县吴耀春到上海，劝说钱刚停止活动，许以高官厚禄和出洋等优厚条件进行诱降。钱拒绝与吴见面。

1927年1月14日，钱刚部下第五支队司令许坦被捕遇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钱刚在同乡金天鸿的安排下搬往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1927年1月15日傍晚时分，钱刚进入新居时，碰到了原在上海市党部的熟人。他错愕之间以为市党部也有人在此居住，未加注意，还是回到了家中。过了不到两小时，李宝璋的便衣30多人包围了钱刚的住地，冲到楼上，将刚吃完晚饭正在刷牙的他绑架而去。1927年1月16日清晨，钱刚在上海近郊龙华镇被杀害，时年仅40岁。国民政府追授钱刚少将军衔，褒恤在案。

钱刚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殉难的高级将领之一，也是国民党早期殉难的高级将领之一。钱刚殉难后，他的老上级、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纷纷请求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对其进行褒典并举行公葬，因此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为了不忘烈士的功勋，钱刚殉难的地点——今徐汇区龙华西路171弄附近，也改名成了“涤根路”。



上海龙华西路弄堂

张应春 现代妇女运动先驱者



张应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女党员、妇女运动先驱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11月11日，正值农历十月初一，张应春出生在吴江黎里镇北厍村，当日应农谚有“十月芙蓉应小春”之说，故取名应春。

张应春的父亲张农是南社成员，为人正直、扬善嫉恶，他主张女孩亦应上学知书达理，于是张应春自小就进入学堂接受教育，为她日后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奠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石。

1920年夏，张应春受“强国必先强种”的感召，毅然考入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毕业后，1923年的秋天，她经柳亚子介绍，前往上海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任教。

在松江，张应春结识了中共党员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

朱季恂。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应春思想觉悟进步很快，经常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阅读《新青年》、《前锋》、《向导周报》、《松江评论》等进步报刊，一起讨论社会改造。此时的张应春已清楚意识到，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之所以受压迫、被奴役，其罪魁祸首就是万恶的封建伦理道德。她提倡女子解放就得以实际行动与之挑战，于是不顾社会各种非议，毅然带头操刀剪发，以一头爽灵灵的齐耳短发，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世人面前。1924年初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开始，由侯绍裘介绍，张应春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1925年初，张应春返回家乡，在母校黎里女子小学任教。同年秋天，张应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应春深知革命舆论的重要，向中共党团组织递交《吴江妇女》月刊的创办计划，后在柳亚子、侯绍裘的协助下，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吴江妇女》于192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正式创刊，张应春担任主编，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她亲



张应春（左一）在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与同学们习刀舞

自撰写文章，阐述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及阶级解放的关系。在张应春撰写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她大声疾呼“就是要唤醒一般的妇女，来打倒一切的压迫和束缚我们者”。

《吴江妇女》共编辑五期，付印发行四期。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弥漫，革命刊物的发行从来都是租界巡捕房和军阀特务关注的对象。《吴江妇女》在闸北一家印刷厂排印，为了安全，每期都采取轮流前去校对的做法，发行工作则由张应春亲自承担。为了广泛联系读者，她不惧任何风险，公开在每期刊物封面注明通讯处：“上海望志路永吉里41号张应春转”。为了编印《吴江妇女》，张应春呕心沥血，亲自撰稿、约稿、编辑、筹划经费，每天工作达十六七个小时，常常深夜不眠。刊物当时受到上海和江苏许多妇女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妇女运动史上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中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和同学杨德群。惨案发生后，张应春怀着对女烈士奋斗勇气和革命精神的崇敬，连日到处奔走，开会演讲、游行示威。她亲自动笔，起草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宣言中写道：“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只流男子的血，不流女子的血，还是不够，我们从各国革命史上的成例观察起来，一定要有女子出来奋斗而流血，那革命才得成功……我们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奋斗吧！踏着女烈士鲜明的血迹，猛勇地前进。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的途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

1926年下半年，张应春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了革命。1927年4月的南京，阴云密布、杀机四伏。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应春不幸被捕，随后被秘密关押在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张应春坚贞不屈，除了“我是共产党员”的铿锵回答，什么都不说，恼羞成怒的敌人一无所获。大约在被捕后三四天的一个黑夜，她被敌人残忍地杀害，时年27岁。

获悉张应春不幸捐躯的噩耗，亡命东渡日本的柳亚子悲愤难抑，当即写下痛悼诗句：“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媚痕入梦时。挥手人天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深切褒扬张应春心比男儿烈的英雄气概，激励更多好女儿、好男儿投身革命激流。

春去秋来，在家乡吴江，一代代后人来到墓碑前瞻仰、缅怀这位妇女运动的勇敢先驱者。张应春以她一生的行动实践了她的铮铮誓言：“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的途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

金佩扬

迎来吴江解放的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是一名普通丝厂工人，也开过杂货店，但在动荡的年代里，强烈的爱国心和追求进步的信念，让他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党。他领导吴嘉工委，参与了嘉兴和吴江的地下工作和解放斗争，他就是金佩扬。

金佩扬（1905—1998），出生于吴县西山，父亲在黎里镇鲍义昌烟纸南货店当学徒，母亲为吴江黎里人。1911年进黎里树人小学，后进“吴江第四高等小学”读书。当时的校长傅庸庭，教师庞竹君、金剑平、毛啸岑等人皆是爱国进步人士，在他们的熏陶下，少年时的金佩扬就已萌生爱国之心。

1930年金佩扬进入上海闸北恒丰路鼎昌顺丝厂工作。当时同期进厂的练习生常聚在宿舍里看书报，谈理想，就



解放军奔赴吴江县城

在宿舍中他结识了对其一生起了重要影响的青浦人夏明辉。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寇入侵闸北，炮火连天，丝厂首当其冲，厂里十几个青年，人人义愤填膺，在金佩扬和夏明辉带领下，自发组织起来，拖了两辆板车，把身上仅有的零用钱都拿出来，买了面包水果，到前线去慰劳将士。因战事丝厂倒闭，他又先后在黎里镇上的小电厂和上海日晖港煤栈工作，1939年在平望开设了“大生烟纸杂货店”。1940年8月，金佩扬见到了特地来平望看望他的夏明辉，夏明辉当时正受中共路南特委派遣，开展（青）浦西地区工作。金佩扬当即向夏明辉提出了入党要求。经过组织的批准开始走上了革命征途。

加入革命后，金佩扬以开办商店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工作。1943年初，金佩扬接受委派，与中共淀山湖工委书记林岑（陈鹤年）等人在芦墟镇开办汇丰五洋杂货商行，领导淀山湖地区的工作。9月曾去浙东发展革命力量。同年冬返回吴江。

1945年，金佩扬开始任中共吴江县委书记。当时，粟裕将军建立苏浙军区后，为实现党中央控制交通要道，解放大城市的战略意图，命令八支队一路东进，准备与淞沪支队在淀山湖地区会师。上级同时电令淞沪支队西移淀山湖地区，向八支队靠拢。淀山湖周围地区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是东取上海、西进杭嘉湖平原的枢纽，国民党军队有重兵驻守，汪伪警备总队分散在淀山湖地区村镇，还有各种散兵游勇也很猖獗，我军比较薄弱。当时，陶勇的部队前锋到达了乌镇、双林一线。但要想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取得联系，并成功实现会师，是相当困难的。危难显英才。金佩扬受命与八支队进行联系。金佩扬通过南浔的一个朋友，从练市找到新市，终于在菱湖镇找到了八支队副政委韩念龙，转交了淞沪支队电台的频率和联络讯号。后虽因天目山自卫反击战需要，八支队奉命撤回，未能实现会师计划，但金佩扬已经成功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淞沪地委和淞沪支队遵照党中央指示奉命北撤。为留下部分党员骨干坚持党的秘密斗争，金佩扬陪同淞沪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姜杰等

人，转移到金善洪家潭（今洪溪镇），以经营做生意为掩护，召开党的会议，决定成立淞沪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特派员领导地下斗争。1948年前后，金佩扬多次到嘉善陶庄、魏塘等地活动。在陶庄他结识了开航船的陈光华，曾合伙开杂货店，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又通过陈光华结识了陶庄镇上的县参议员杨六海。他认识到杨六海有向往进步的一面，因此经常向杨灌输进步思想，分析当时形势，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使杨六海看到形势的变化，同情共产党革命，为金佩扬提供了国民党县党部活动、县参议员会议以及陶庄镇基层政权等情况。金佩扬在嘉善魏塘和嘉兴活动时，又派共产党员钱品康到嘉善天凝镇，秘密做王家鹏（代庄经理）、王家林（天凝自卫队长）等人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形势和大势趋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策反天凝自卫队武装，准备把这支武装争取过来，扩大吴嘉湖地区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虽策反未成，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对以后迎接解放起了积极配合作用。1948年3月，中共吴（江）嘉（兴）工委成立，统一领导江、浙两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金佩扬任书记，主抓武装工作；沈如淙任工委委员抓嘉兴方面工作，协抓武装；委员金亮负责吴江方面工作。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吴嘉工委抓紧统战工作，为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作准备。经过金佩扬、沈如淙争取，嘉兴县参议员王江泾区区长刘先正投奔革命，一些乡镇自卫队在策反工作下，也纷纷响应起义。不久，金佩扬指示沈如淙：解放军即将渡江，马上把已控制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搞武装斗争，武装拉起来后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后方，保护桥梁公路不遭敌人破坏，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

1949年3月，金佩扬离开嘉兴回到吴江，接受任务策反地方武装。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在全县各区组织自卫队，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实际矛头是指向日益活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此，能不能掌握武装为我所用，成了顺利解放吴江全境的关键。金佩扬与赵安民接受指令后赶到吴江，连夜下太湖，至南厍乡住下，开始做发动工作。东太湖一带的乡长、自卫队长，有不少是赵的部下，因此工作非常顺利。1949年4月28日晚上11点半，金佩扬与赵安民带领反正的地方武装400余人，从太湖四都村迅速进入县城。进城后即关闭城门，派武装人员看守好政府、监狱，保护银行、档案、商店、工厂，维护地方治安，其余人员全部登城监视，防止城内外敌人破坏。29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干部胜利会合。地下党组织在城厢保存了8000多石大米，以供军需民用。此后，5月4日金佩扬又随29军政委张藩到达平望，5日到达盛泽，与吴嘉湖独立团团长刘先正、政委沈如淙接上联络。5月5日，吴江全县解放，第一届县委县政府成立，鲁琦任县委书记，李前、金佩扬任副书记。

后来，金佩扬历任苏州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纺织厅丝绸处处长等职。

费孝通



一位毕生志在富民的学者，一位毕生关注乡村经济发展的老人，2010年10月23日，在这位老人百年华诞之际，富裕、感恩的家乡人民为他修建了一座特别的纪念馆——中国江村园。1500平方米的园内，通过图文、史料、遗物、置景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展现了老人光辉的一生，也烙下老人心系故乡、26次调研开弦弓村的历程和成果。他就是费孝通。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4岁进入母亲杨纫兰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



费孝通走访江村

规教育。后相继就读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途中迷路，费孝通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慎跌入山涧身亡，他则被当地群众救出转到广州治疗。身心俱痛的他，被姐姐费达生召唤回了家乡。曾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创办机械缫丝厂的姐姐，考虑到弟弟是学社会学的，他一直要求到纯粹的农村去看看，而开弦弓村保持着江南农村的自然经济和民风民俗，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安排他到了开弦弓村。没想到，这一安排成了费孝通学术生命的一个重要起点。

自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就成了时代“弃儿”，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回到家乡吴江、来到开弦弓村，看到乡民们的不富裕甚至是贫穷，费孝通忘了自己身心的创痛，一种愿望在他心中升腾，那就是：富民。费孝通不仅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且更重点地把目光紧紧盯住村民的田地、米价等，他要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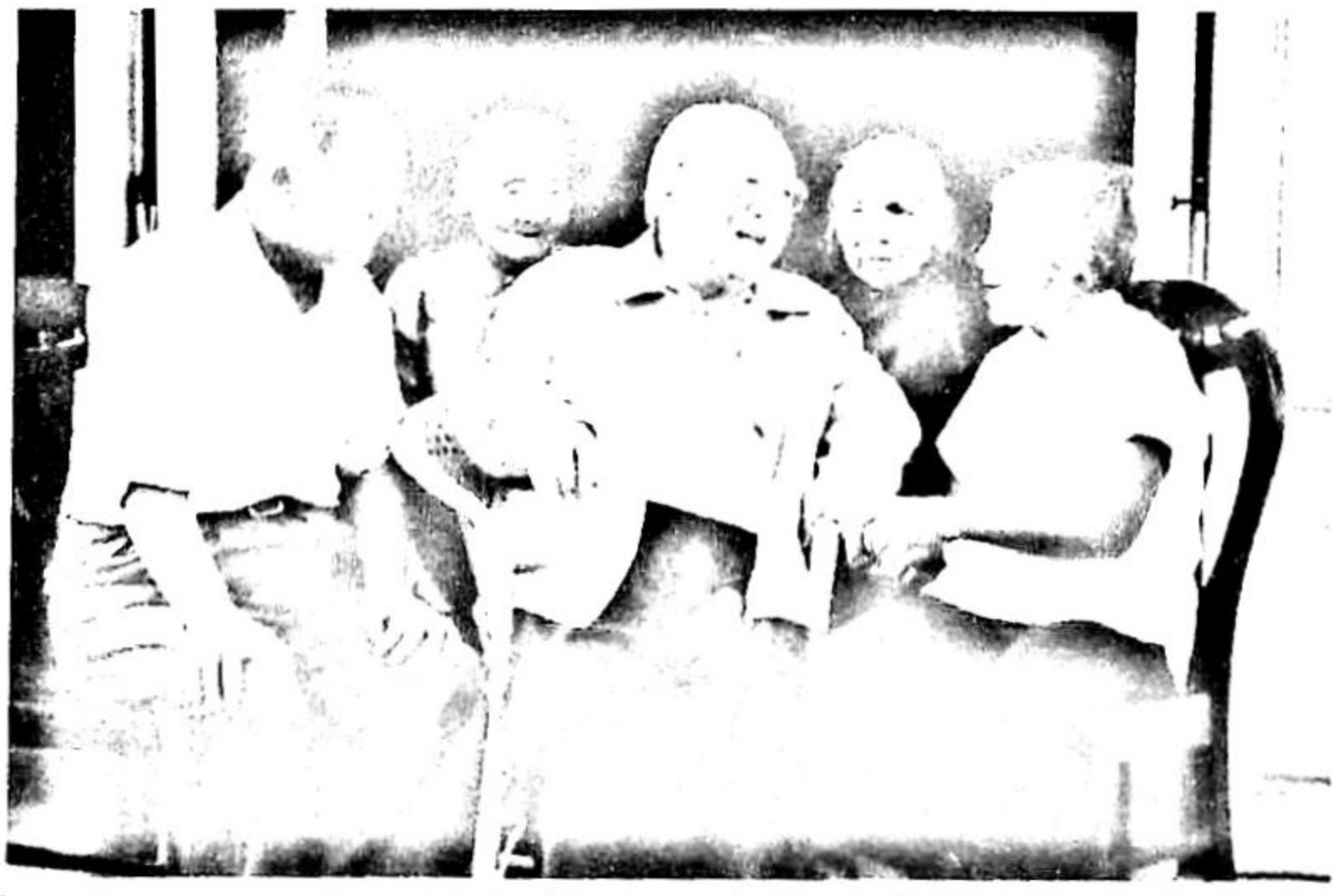
走村串户，费孝通都是讲方言，这让村民感到非常亲切。只是在村民眼里，这个年轻的学生有点与众不同，不好好养伤，却拄着双拐到田头、工厂，到农民家中一家家串门访问，还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看到了很多鲜活的东西，他掌握了农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正是那时的所见所闻让费孝通明确了自己一生的目标，那就是了解中国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随后，在去英国留学的轮船上，他趁记忆犹新，把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这份稿子就是后来费孝通博士论文《江村经

济》的雏形。现代人类社会学奠基者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曾赞誉道："这篇论著将被列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小村子变成"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不出教授所料，《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步入了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费孝通一生26次调研开弦弓村，和村民感情极好。他在《重访江村》中写了自己和姐姐费达生一起再次来村里时的情景："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拢了来，握着她的手……有些老年人也还记着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直到现在村民们还记得费孝通最爱吃红烧肉，最爱喝家乡的熏豆茶。

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乡民告诉他，村里有缫丝厂、蚕桑、运输等副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村人均收入翻了几番。费孝通听了很高兴，他说自己几十年前设想的事情，终于在这里实现了。

三访江村后的十几年里，费老走遍了家乡吴江的23个乡镇。一次一个大变化、大发展，看到农民家家户户盖起了楼房、日子红火起来，他开心得不得了。同时，他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致富形式，在全国不少地方得到传播和实施，富裕了的农村，远远不止一个开弦弓村、一个吴江。《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发表了费孝通的《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文章，农民富裕了、小城镇居民富裕了、中国普通百姓富裕了，那才是整个中国的富裕，那才是费孝通一生的愿望。



2002年9月29日二十六访江村时，费孝通看望邱纪珍等老朋友。

杨承宗 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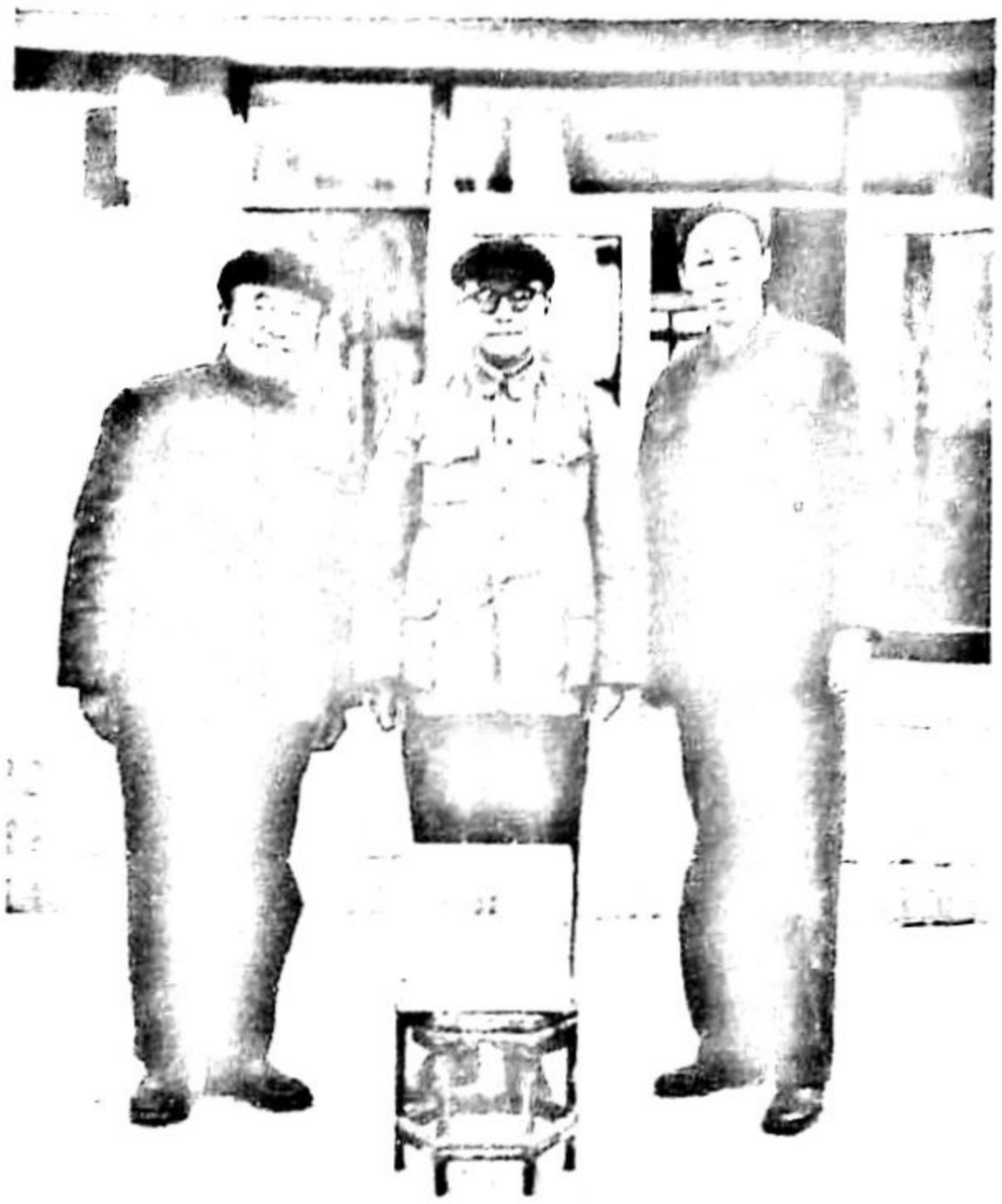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16日，在中国科大礼堂中，正隆重举行杨承宗先生百岁华诞及从事学术活动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科教界专家学者和杨先生曾工作过的单位代表以及他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齐聚一堂，温家宝总理专门寄来贺信。

这位百岁老人，通过视频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还写了书面发言稿，他说："回顾我走过的岁月，我经历了百年社会的大变迁，目睹军阀混战、外强凌辱、百姓生灵涂炭，为此立志科学救国。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郑大章先生，他不仅教我放射化学，而且身体力行，教我爱国的民族气节。我要感谢严济慈先生，是他把我推荐到居里实验室工作，我因此有机会认识约理奥·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

杨承宗（1911—2011），江苏省吴江县八坼人。杨家祖宅位于现在松陵镇八坼社区永宁桥下、中心街68号。他于21岁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北京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作准备。

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夫人的长女、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夫人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50多年前，他婉谢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万法郎，另加补贴”的聘任，毅然选择了回国。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回国后，他的薪酬是“每月1000斤小米”。



杨承宗（中）将居里夫人制作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赠给中国计量科学院。

他的很多同事、弟子蜚声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因“两弹一星”的特殊贡献戴上了共和国勋章，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对此，他总是付之一笑：“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回国前，伊莱娜·居里夫人送给他10克珍贵的碳酸钡镭标准源。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还特地请他传话给毛主席：“反对原子弹，首先自己要拥有原子弹。”正是这句话，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加快制造“两弹一星”的决心。杨承宗亲手将居里夫人实验室所赠予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捐献给国家。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所长钱三强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并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

身为“洋博士”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

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对安徽科技协会付出了重大心血。在此期间，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为中国大学体制改革走出第一步。

杨承宗侄女杨家琴女士，生活在八坼社区。在杨家琴的记忆里，杨承宗作为一位著名科学家，显得十分朴素。1983年，杨家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看望杨承宗，“他就穿了双布鞋，格子衣服，头上戴的是很普通的帽子。”杨家琴回忆道。在科研方面，杨承宗很有钻劲，“他虽然不为名不为利，但很要面子，容不得自己失败、坍台，做一件事，一定要做成功了才会说。”杨家琴说。在科学实验中，有不少原料都是杨承宗自己花钱买的，为此，杨承宗曾经把自己家里的高档照相机卖掉，为这事老伴也曾经跟他拌嘴，“他就是不想花国家的钱。”

杨承宗一直惦记着家乡，尤其是家乡的小朋友。2009年1月28日，杨承宗还给吴江日报小记者团写过一封回信，鼓励小记者们立大志，为“新新吴江”和“新新中国”奋斗，并写下“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赠词。杨承宗还给吴江档案馆题词“兰台瑰宝”。

杨承宗，这位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大建校元勋、原副校长、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他开展的天然放射性元素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铀化学及从矿石中提取铀的研究等，奠定了我国核化学研究的基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杨承宗为吴江市档案局（馆）题词



杨承宗故居



程开甲 [illegible]的“核司令”



2011年11月12日，秋色满京华，吴江市档案局一行6人抱着敬仰的心情，登门拜访了94岁高龄的程开甲。面对家乡人，程老和蔼可亲地操着浓重吴江口音的普通话和大家拉起了家常，讲起了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故事，并拿出许多照片供挑选收藏。临别前，程老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并欣然题词“做好档案工作，建设乐居吴江”。

程开甲，生于1918年，吴江盛泽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程开甲（左三）在核试验基地

阅读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名人传记，这些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他。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名师，开始在物理和数学上崭露头角。在王淦昌介绍和美国自然科学史大家李约瑟的推荐下，程开甲1946年8月远渡英国拜在著名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门下求学。在波恩的门下有许多人后来与核武器有缘，如奥本海默、福克斯、海森伯，还有中国的彭桓武、程开甲，可谓星光灿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程开甲马上决定回国。许多同学劝说无效，还是导师波恩理解程开甲对祖国的热爱，亲自为他送行。

回国后，程开甲一直从事他熟悉和热爱的物理学研究，为我国核物理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相关学科的建设，编写教材，并亲自上课讲授，并建立了内耗热力学理论。1956年，程开甲参加了国家的《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研究人才的需要，1958年程开甲与施士元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他在原子弹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分管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两大块工作，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为核武器爆炸威力的设计提供重要依据。在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中，他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关键问题之一的起爆中击聚焦设计，为弹体结构设计与加工精密度提供依据。程开甲后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带领几个年轻教师研制出一台双聚焦β谱仪，成功地测量了一些元素的电子衰变能谱，接着又研制出一台直线加速器。1960年，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开始还不知道接受什么任务，直至接到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长通知

时方知是被钱三强“点将”，参加原子弹工程。

1962年夏，为在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程开甲被调到国防科委（后称国防科工委、现受总装备部领导），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筹备创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

在中国准备核试验的初期，基本是白手起家，没有仪器、没有设备，也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作借鉴。程开甲就与吕敏、陆祖荫、忻贤杰等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1962年11月，在他主持下，起草了“试验技术方案（初稿）”的技术准备工作纲要，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作准备。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实验方法和测试手段，程开甲亲自编写冲击波、电磁波理论等方面的教材为科研人员讲课，带领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钻研核试验的理论和技术问题。短短的两年中他跑遍全国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仪器。程开甲遵照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经过努力研究，逐步完善，终于拿出了一个全面的、在科学技术上广泛交叉的、有高度预见性、准确性和创造性、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提出了有定量分析的爆炸图像，研制出1000多台测试仪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程开甲很自豪地说：当年法国人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前苏联也仅仅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数据，而我们拿到了全部数据。

程开甲不仅是一位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

程开甲非常关注科学发展趋势。在一次回答周总理的询问中，他提出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理论技术支撑下，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地下核试验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对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试验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后，他又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并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

作为核试验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始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勇于负责。第一次核试验前夕，一条条电缆沟从原子弹爆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开



程开甲为吴江市档案局（馆）题词

甲提出：向所有电缆沟垫加细沙。这需要拉几百辆汽车沙子，是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我国地下核试验后的钻探取样任务，在当时世界核试验史上是首创的，已经掌握核技术的4个国家谁也没有搞过，钻探取样任务重、困难大、危险多。当钻探取样部队刚钻进到空腔，还没有完全打通进入空腔的通道时，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就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不顾塌方、辐射和毒气的危险，身着防化服，冒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走去。他们走进去几百米，才看到里面是一个大空腔，核爆炸后形成的高温高压，烧得岩体流下来形成的凝固形状清晰可辨，戴着口罩还能闻到呛鼻的味道，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虽然只从“锅底”取到了少量的石墨在核爆炸后生成的金刚石样品，但他亲临空腔掌握了核爆炸的力学效应、玻璃体分布以及石灰岩地质泄漏影响等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22年中，他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地面、地下、空中核试验30多次，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为中国核弹试制成功和国防科技工作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他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试验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是当之无愧的“核司令”。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当官”的人，他更愿意别人称呼他“程教授”。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程开甲经常挂念着家乡的发展，2007年4月，90岁高龄的他回到吴江参观，欣然为吴江青少年们留下了他的衷心寄语：“从小爱科学、努力打基础、长大成栋梁”。

杨嘉墀

影响中国科技历史进程的人



1975年11月26日，那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升空的日子，就在国人振臂欢呼雀跃之时，渭南测控中心，科学家们面对一组卫星传回气压过快下降的数据，空气似胶一样凝住了，这组数据告诉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靠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实现姿态控制的卫星，如果转不到三天，便会因氮气消耗殆尽而提前返回，落点将会改变到人口密集的河南西部……科学家们一个接一个发言，都认为根据计算结果，运行三天的希望几乎是零……钱学森点名要听他的意见……那人慢慢放下正计算着的笔，用沉稳的语调说："……坚持三天问题不大，我的意见按原计划进行。"钱学森拨通了中央领导人的电话，拍板卫星能按原计划三天返回……一锤定音的那人，叫杨嘉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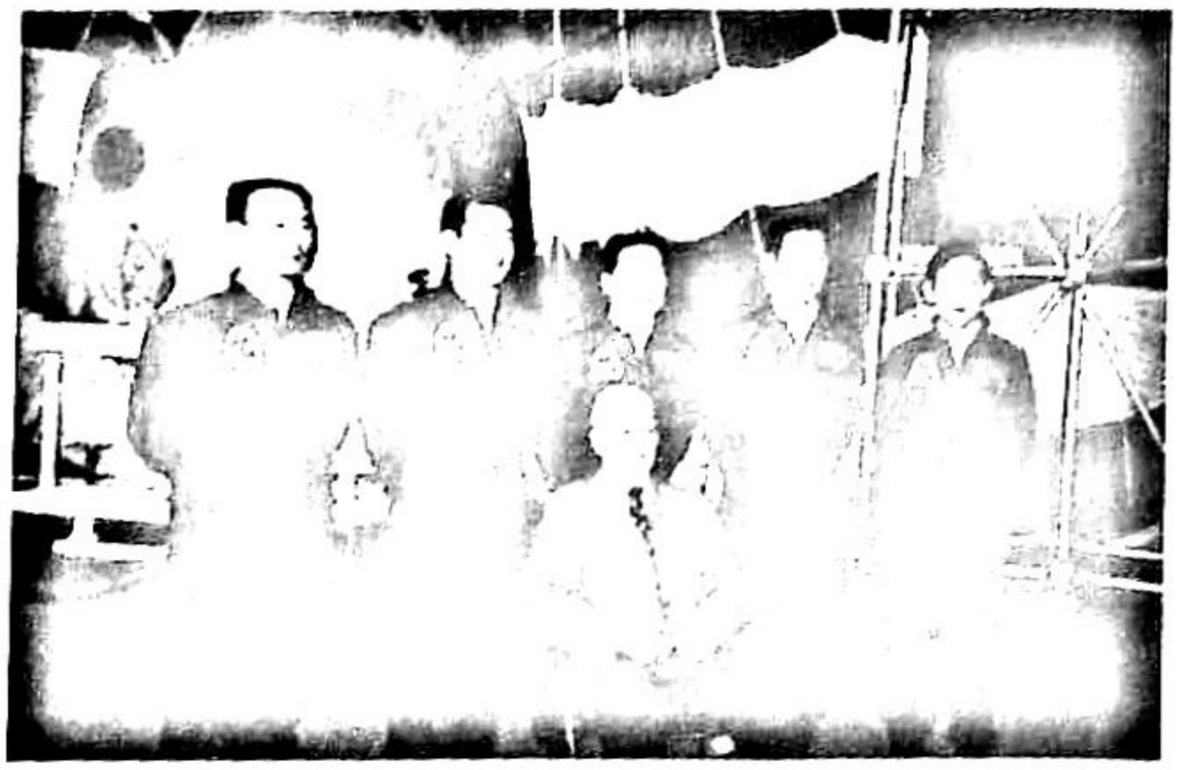
杨嘉墀青年时期合影

杨嘉墀（1919—2006），吴江震泽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发起人之一，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对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具有巨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导弹、人造卫星、登月工程；几乎在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及时提出重大、决定性建议……

“嘉墀”一名，是祖父杨晓帆给起的。嘉者，善与美也，如嘉谋，嘉言，山泽多藏秀，士风清且嘉。墀者，台阶也，班固赞西都的赋中有这样的词句：玄墀扣砌，玉阶彤庭。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哈佛、玉阶渐上；研究所、航天部、航天工业部，彤庭渐进。祖父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么个名字？那是源于杨晓帆坎坷的人生经历。

杨家祖籍原本河南，是无情的黄河水泛滥后将他们逼到江苏最南端紧傍太湖的吴江震泽镇。杨晓帆年未弱冠，便继承父业，与丝织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度春秋，惨淡经营，竟成了震泽的首富。“纺织娘”、“金孔雀”丝曾风行于法国、瑞士。在20世纪20年代与日本丝进行的殊死较量中，他深悟复兴丝业必须自己培养人才。在任丝织业会会长时，出巨资兴办了一所“丝业小学”，为的是给儿孙们留下一片成才的绿地。嘉墀出生了，老人又把无限希冀寄托于小孙子身上，期望他能一步一个台阶地成为有用之才，更期望他能成为国家繁荣强盛的一个石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出一份力。没有辜负祖父的愿望，杨嘉墀驰骋中外、纵横天地数十年，嘉称连连，丹墀生辉，给祖上、给祖国争了无数的荣光！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杨嘉墀在美国就已小有名气。194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同事把他推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钱斯，钱斯看了



杨嘉墀会见中国航天员

他的《富氏变换计装置及其应用》毕业论文后，握着这名被美国同学称为“书生杨”的手说：“我们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位曾参与制造出先进雷达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掌握制空权的专家没有看错人，当他把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光谱记录仪的自动化课题交给杨嘉墀后，副研究员杨嘉墀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吸收光谱仪的研制。这一成功，不仅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还被专家定为“杨氏仪器”，至今还被当作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保存着。30年后，与杨嘉墀一起工作过的两个同事来中国，带给杨嘉墀的礼物中，就有一张杨嘉墀与“杨氏仪器”的合影。

1956年，祖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向海外学子发出了召唤。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人生上一阶阶台阶最强大的动力。面对美国的高薪挽留，他无动于衷，在夫人徐斐的支持下，杨嘉墀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家中的一切，购买了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他归心似箭……1956年8月，杨嘉墀终于踏上了祖国贫瘠而又滚烫的土地，一头扎进了“科技兴国”的热潮之中。

就在杨嘉墀返回祖国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自动化所，杨嘉墀担任技术工具室主任。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杨嘉墀成为赴苏考察6人团成员。6人团考察后向中央提出建议：鉴于我国目前科技和工作状况，卫星工程上马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60年代初，我国探空火箭取得显著成绩，为卫星研制打下了基础。由杨嘉墀主持开展的导弹热应力和加热加载测试系统，还填补了国内空白。

1963年，在原子弹研制已快进入尾声时，人们才发现整个试验还需要不少仪器。情况汇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力量不够抓科学院。”于是，杨嘉墀受命负责原子弹爆炸试验配套仪器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及地震动测量仪。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亮度是多少，国外的资料没有，国内更没做过这方面的模拟试验。爆炸时的亮度测不出来，摄影师便无法在拍摄时掌握曝光量。而有了火球温度测量仪，就可以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的亮度；摄影师在拍摄完后，可以根据实际亮度，在后期制作时，在暗房中对所拍的照片曝光量进行补偿。可以说，这台仪器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留下宝贵的原始资料，立下了大功。而仪器上使用的一个关键元器件——光电倍增管，竟是杨嘉墀返回祖国时带回的。

"文革"开始后，杨嘉墀被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曾临时参加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为在爆炸事故中受重伤的北京礼花厂女职工王世芬制造假肢。杨嘉墀研制的利用人体神经信号控制的假肢，技术含量很高，不仅方便了王世芬，还远销到海外市场。王世芬说：当年有人告诉我，给我研制假肢的有一位是搞国防建设的科学家，30多年来，这只假手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为此我很感谢他，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1975年11月29日，返回式卫星环绕地球转足了47圈，安稳着陆，国内外无不为之一震。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主持研制这颗卫星上的姿态控制系统的杨嘉墀和他的同事们，用了近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冲击中，杨嘉墀几乎是白天写检讨，晚上进实验室，靠边站，劳动改造当厨子，去造假肢……但他依然执着，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党！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科学技术立国"计划，欧共体"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杨嘉墀无一不高度关注、深思。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计划的相继制订登台不是偶然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发展高科技，带动综合国力，占据世界制高点。一种越来越紧迫的危机感牵动着他的心：10年动乱，科学技术已经落后很大一段距离的中国该怎么办？

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几位科学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由王大珩执笔、其他3人签名的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很快完成。这份倡议一路绿灯，直呈中央，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批示，邓小平在建议书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这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领域，确立了15个主题项目作为突破重点，以追踪世界先进水平。这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一计划的提出，充分展露出杨嘉墀等几位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雄才大略，甚至可以说功盖天下。《中华英才》大型画报，以《"科技四老"与"863计划"》为题，详细介绍了四位老科学家的经历和"863计划"取得的成绩。文中写道：作为个人，除了政治领袖，真正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并不多，但当今中国的四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却催生出了我国的一个战略性发展计划，引发了我国一次历史性的科技大会战。

1999年9月18日，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受到国家科技最高奖赏，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杨嘉墀挂上一枚光泽闪亮的金勋章。

2005年，事隔"863"倡议19年，杨嘉墀在86岁高龄时，又带头提出了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和5位院士一起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并得到了高度重视。这是杨嘉墀在失去知觉之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许，在失去知觉那一刻，他没有遗憾了，因为最重大的事情，他已经办妥了。



后记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正式出版了。

吴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其中有一大批官吏勤政清廉，爱民如子，他们的事迹千古传颂。编纂出版融思想性、可读性和地方性为一体的《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年4月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档案局、市方志办借全国上下重视公务员培训职业道德教育的东风，积极筹划出版一部反映吴江官德教育的书籍。我们组织有关人员从吴江籍或者曾任职吴江的数百名官吏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作为编纂对象，严格依据档案和方志史料，开展搜集、编辑和整理工作。编写时重点突出官吏在勤、公、仁、廉等方面的突出事例、事迹或成就，强调故事性和可读性。另外，吴江当代名人众多，我们也选择了费孝通、程开甲、杨嘉墀等一批杰出人物作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代表，以丰富教育内容。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还参阅了《吴江县志》、《吴江名人录》、《吴江札记》等书籍。

本书的出版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公务员管理局党组书记杨士秋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吴江市委书记徐明，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吴江市人民政府市长梁一波，拨冗为本书作序。市领导吴炜、李斌、李铭、沈金明、周志芳、吴琦等同志欣然担任本书编委会副主任。何斌华、俞前、孙俊良、沈春荣、沈昌华、马常宏、范振涯、蔡怡等同志对本书的编著和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江日报社和古吴轩出版社的同仁为保证本书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匆忙，加之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10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 / 王海鹰主编.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80733-950-2

Ⅰ.①官… Ⅱ.①王… Ⅲ.①廉政建设-吴江市-古代-通俗读物 Ⅳ.①D691.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729号

责任编辑：王　琦
特约编辑：董　侠
见习编辑：潘　娜
装帧设计：吴自强
责任照排：何　芳
责任校对：张　蕾
特约校对：丁建华

书　　名：官德明鉴录:吴江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选
主　　编：王海鹰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787×1194　1/16
印　　张：15.75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950-2
定　　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5640827